

博克爾著
胡肇椿譯

英國文化史
上冊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博克爾小傳

亨利·托馬斯·博克爾(Henry Thomas Buckle)爲十九世英國著名史家，生於一八二一年十一月。他底父是倫敦底富商，遺產甚鉅，博氏席豐履厚，遂資以周游歐洲以至埃及、敘利亞諸土，而專致力於史實之搜求。幼年時因體魄孱弱，不久即離開學校而完全在家庭中受父母之教育指導。人極聰穎，年三十一即通曉語言達十九種。一八五一年，他決定寫一部文化史，而一八五七年是書告成，遂名滿天下，一躍而登第一流史家之席。他曾被選爲各種專門會社之會員，而於一八五八年三月復得在皇族學院講演，研討女子對於知識進步之影響問題，極博一時美評。

一八六一年復有壯游之志，十月，南出埃及，越西奈及以東沙漠(The desert of Sinai and Edom)而趨敘利亞。其明年四月達耶路撒冷。旋由倍羅脫(Beirut)返歐，不料在拿撒勒(Nazareth)中道得疾，其年五月，一代史人遂捐館於達馬斯革矣。

譯者

目錄

第一章	歷史研究底方法	一
第二章	自然定律底影響	二三
第三章	形上學者所應用的方法	八八
第四章	道德定律與知識定律底比較	九九
第五章	宗教文學及政治底影響	一四二
第六章	歷史文學底起源	一八八
第七章	由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的英國思想	二一六

英國文化史

概論

第一章 歷史研究底方法

——研究歷史之方法及人類活動規律性之證明的敘述。這些活動本爲思想定律及自然定律所支配，故兩部分之定律皆須研究，且不恃自然科學，歷史亦不能成立。——

在人類知識各大支流中，史之著述最多而亦最普遍。一般的意見似乎以爲歷史家底成功與其勤勉是成正比例的；研究愈遲則所得亦愈多。

史底價值之信心已傳佈很廣了，祇看史底冊籍銷流之廣及其在教育方案上所佔有之地位即可知。由某種觀點看起來，這種信心是完全正當，不可非難的。時至今日，誰也不能不承認史料之羅集，就大體上觀之，未嘗不費儘番艱難；若歐洲及其以外各大國之政治、軍事年史已精細地編輯成秩，排列簡便，而其所依恃之證據也完全是精選過的，即法律史、宗教史也都受到極大的注意；同時關於科學、文學、藝術及有裨於社會之發明，以至於民族風



倫及優美生活方法等進化底探討亦曾下相當的研究，雖研究的程度比較差些。為欲增進吾人對於過去之認識，故古代遺物分毫皆曾為研討上之憑藉；古城底遺址展露了牠們底胸懷，古幣重現於人間宣吐其來歷，銘刻孳生出爾本，古契點染了牠們底璀璨的本來面目，象形文字亦有了了謬譯訓釋了；即皇古遺文，至是也受了重新的綴拾排列，喚返人們底回憶。有幾個支配人類言語變遷的定律亦已發現，且經語言學家之研究，竟能說明民族早期遷移之最晦暗時期。又政治、經濟既成立為科學，且因之發見財富分配不均之種種原因，而這種不均乃為社會混亂之主要淵藪。統計學又經過努力攻修，廣集材料，非唯注意於人類物質方面底事情，抑且於道德方面之特點亦包羅殆盡；例如，各種罪惡之數量，其彼此比例數以及年齡、性別、教育對於罪惡之影響等是。與這種偉大運動同時進行的乃是自然地理學：氣候現象有了紀載，山岳有了測量，河流有了勘查，並窮其源，各種天產經過了精細研究及開採其蘊藏；又對於供養生命之各種食物皆用化學方法加以分析，食物所含原質也經過計量及稱衡了。至食物與人體組織之關係，亦已得到相當滿意之確定。同時，因凡對人類發生影響的各種知識皆待增廣而不能遺漏不顧，故在其他方面，當有許多特殊的研究組織起來；以故，關於現代文明人底死亡率、結婚率、生產底比例、職業底性質、工資及生活品價值底變動等我們現在皆能明瞭。像這些或其他同樣的事實皆經搜集及組織起來以供應用。這種組成民族結構的研究是非常精密的；還有其他與有關聯的研究，其精密之點雖較遜，但範圍廣闊些。又非但偉大民族底行動及特性皆已記錄下來，即此外許多散居地球上各地方底其他種族均經遊歷者之訪訊，而其生活情況備詳於著錄；因此使我們能將文化各時期及各種不同情況下底人類狀態作一比較研究。但是我們還要

說，我們對於這個問題底求知慾尚未能認為滿足；這慾念仍繼續着在增加；使其求知的方法亦繼續着有增無已，而以前所觀察的仍大部分在保留着——如果將這許多事情集合在一起，那麼，我們就能隱約感覺到所積集的許多事實負有重大的價值，人類進化之迹因其助力亦得以考察出來。

但在其他一方面，若敘述關於這種材料之利用，則情形又大異。人類史最不幸的特點，即雖然各部分皆已片斷地儘探無遺，但未有能將其集成整，而確定其彼此之關聯者。在其他知識底田園中，綜合的需要已普遍地認為重要，且曾努力由各種單獨之事實發現支配這些事實之定律。可是，史家不常採用此法，且流行一種特異的思想，以為他們底責任不過是敘述事實，而他們又偶然因個人底道德、政治底謬誤的觀念之反應，反使這些事實栩栩生動。照此看來，則任何著作家有因思想之落後或天賦之鈍魯，不能應付此思潮最高峯者，祇須在數年中稍事涉獵相當的書籍，即可妄列於史家之叢；他便能勝任撰作一部偉大民族底歷史，且其工作可被學壇視為權威者矣。

這種狹義標準之成立，其結果將使知識之進步受牽掣。因有此種偏見，歷史家——指全體而言——於是從不承認這種廣博及預備工作底需要，這種需要能使其由全部之自然關聯領悟所研究之題材。其結果則有些史家之觀點對於政治、經濟、文學茫然若無所知；或昧於法律，或忽於宗教事業及思想之變遷，或輕藐統計哲學，或蔑鄙自然科學；而類斯種種題材固極屬重要者，蓋因它們本為世間底主要環境，而人類底性情及品格固皆受其影響而表現於其中者也。但這許多重要的題材確曾經過深遠的研究，唯皆彼此獨立而不相關聯；比例及彼此印證

的效用已失，亦未聞將這種題材集中於史底傾向。實在講起來，這種題材卻是史底組合成分。

從十八世紀初期以來，曾有少數的大思想家發覺史底退化而努力設法補救。但例極鮮見：在全部歐洲文學裏祇有三、四種可稱爲創作，而確含有有系統之嘗試，及應用最竭人心理力的方法研究人類歷史者。這種方法，其他知識支派曾證明是有效的，且由經驗所得的觀察也祇有依此方法方能成爲科學上的真理。

十六世紀以後，尤以在最近百年中，我們可以在一般史家之中發覺幾種現象，就是觀察底理解力增加及有擬採用曾被遺棄之題材的願望。因此，其題材之蒐集漸趨龐雜，而這種類似事實之收羅及其彼此之相關卻常時暗示着綜合性，這在歐洲之早期文學裏是絕無此痕跡可尋的。即以史家之能與較廣博之思想接觸及此種單思習慣之鼓勵而言，以上情形已可認爲極大之成就。至於單思一點，雖或近乎妄用，卻爲各種真知識所以成立的最重要條件，因爲沒有它，科學也無計成立。

雖然歷史文學之探討確較前爲樂觀，但我們不能不承認，除極少數例外，這些也不過是探討罷了，至於支配民族特性及命運底原理則絕無成就。關於以上的實在的影響，我將留在此書之別部討論，現在所要說明的，只就人類思想最高的目的而言，歷史仍是非常窮乏，呈混亂及草莽未開狀態，爲無定律無基礎之題材所有之自然現象。

我們對於歷史之認識是這般地不完全，而史實又如此其豐富，似乎應該有種較以前任何嘗試更爲廣大的工作，努力將此浩瀚的研究與其他部分相輔並行，以維持我們知識底平衡及融會。現在這部著作底理想即本着

這種精神。固然求理想與實行之完全平行是不可能的；但我仍希望從事於史學者成就一些事業，能似其他研究者之對於各科自然科學一樣地收並駕之功。說到自然方面，各種顯然無規律及矛盾的事態已有了明白的解釋，或表明其與某種確定及普遍律相洽合了。這種成功實基於才智者及堅忍苦思者之具有發現規律性（*regularity*）的眼光，以從事自然事態之研究；假若人事方面之探究也採用這方法，那麼，當能得到同樣的效果無疑義。凡有以歷史事實為不可綜合者，實際上，他們是最初就存此念的。更甚者，他們不但臆斷所不能證明的事實，且即在現實知識情態中最不確切的事實亦復妄加臆斷。凡熟習最近兩世紀之歷史者，必注意到每代都表露出一二正常的及可預測的史實，這卻是前代所認為無可臆測及反常者；故促進文化之顯著步驟即是堅強吾人對於常規方法、定律之普遍性的信仰。如此，則某項史實或某類史實尙未能歸納於常規者，卻須引我們過去的經驗為資鑑，而承認其將來有解決之可能性，不可遽認為不可歸納。在複雜中覓取正常規律的冀望對於科學家是很平常的事，其中之卓越者已視此為信條了；但假使這種期望之所以不能遍求之於史家，則必因其才智之不及自然之善見者，及其所研究之社會事態過於繁雜也。

這兩種原因牽掣了歷史科學底創造。而最有名的史家顯然是遜劣於成功的自然科學家；故從事於史學之士，在智力方面，實未有能與開普勒（*Kepler*）、牛頓諸人比較者。（註一）至於事態之繁複，則使哲學史家所遇之困難遠過於自然學者以上；一方面，他底觀察易陷於個人意氣及偏見所釀成的錯誤，在它方面，他又無計應用大的自然的實驗方法，——這種實驗固常能將外界最複雜的問題變易而為簡單化者。

所以，無怪乎現在人底活動底研究和自然活動底高深研究比起來尙是幼稚時代。這兩種研究，在進步上相違如此遠，在物理方面所發生的事態的規律性及預測是等事態的力量常常即在未被證明的情形中亦給姑假定之，乃同樣規律性在歷史上則非惟不能假定，且遭拒絕。因此，凡人欲提高歷史使與其他學術研究地位相儕者，一着手即遇障阻；因每令人感覺到人事是神祕的、天定的，且使我們底考察不易深入而常常隱蔽其未來的途徑。這種敘述當然是無理的，且亦無從證明；再者，事實每能明顯地證實，凡我們知識愈增加則對於「均等性」(uniformity)底信心亦愈見堅強，即同樣的情境下必發生同樣的事實。故現在不如對於當前困難作較深的審察，同時對於根深蒂固的共同的成見——即主張史學必須常常保持其以經驗為主之情狀，決不能成立為一種科學——宜澈底地根究一下。但這卻引起一個潛伏於整個主題底根源中底極大問題，簡言之，即：是否人類以至社會之活動由固定的定律支配着，抑或這些活動乃由於「機遇」以及超自然的干與的結果？這兩方相反的討論將引起相當的有興趣的思潮。

關於這問題，有兩種原則可以代表兩種不同的文化階段。以第一種原則為立場，每一事件都是單獨的、分立的，其產生僅視為偶然的機遇底結果。此說最為毫無學識者所奉為天經地義，但經驗一經增廣，其說遂暴露弱點，因經驗常暗示我們以自然所表現的繼續均等性及並存性也。譬如，未受文化浸染，專恃漁獵為生的游牧民族必以為食物底供給是某種偶然的結果，無待解說的。無紀律的供給及有餘與不足的现象不會令他們懷疑到自然底盡有何規劃；他們底思想也從未感到這些能支配事件發生的規律及因以能預料未來的普通原理的存在。但當

這種民族進化至農業時代他們初次嘗試種植的食物，於是又以爲那食物之形狀以至其所以生存之故，皆歸功於他們自己工作底結果。他們撒下甚麼種子，即能得甚麼果。其所需要的食糧更能由他們自己支配，且更能確定是他們自己工作底結果。看到散佈在地下的種子和成熟的穀粒底關係，即察見一清楚的計劃和規常的均等性底結果。他們現在非但對於未來能够確定，且得到一種信念遠較以前那不可恃的事業爲廣闊。於是「事件固定性」底模糊觀念因之以起；而意念中也漸隱約蘊釀了以後所稱爲自然定律的觀念。在這偉大的進化過程中，每一步伐都使他們對於這見地更清楚。當他們底觀察日以增積，且經驗推移至較廣的字域的時候，遇到的均等性更爲他們所從未夢及者，遂使以前所主張的「機遇原則」站不住脚。更有進者，一種對於抽象論定的傾好發生了；於是有人綜合其所得的觀察，蔑視舊時流行的意見並以爲每一事項及其前提有一必然的關連，而此前提又復與其前一事實相接；因此全世界組成一必然的連項，在裏面每人或許都是活動的一分子，但不能決定所活動的是那一部分。

於是在社會正常的邁進中，自然規律性觀念之增進毀滅了「機遇說」(chance)而代以「必然關聯性」(necessary connexion)。由這兩種——「機遇」與「必然」——主義當各自發生了「自由意志」(free will)和「前定」(predestination)底信條，這我想是很可能的。欲在比較進步的社會中，明瞭這種變體事態之如何發生並非難事。大凡一國家庭財富積集至相當程度，那麼，每一個人民之生產力足以維持其個人之生活而綽然有餘；故不必人人皆任工作；因此特殊階級於以產生，其中大多數以追尋享樂爲度日之方，而有少數則從事

辦知識之獲得和傳佈。在後者中往往有忽略外界底事件而轉其注意力於內心底研究者，其富於才智之士，遂成爲新哲學及新宗教之創始者，且常對於信仰其說底人發生極大影響。但這種創始者底本身實亦爲時代所左右。乃欲逸出其周圍意見底壓迫是不可能的；故所謂新哲學、新宗教者，當非憑空創造，乃不過綜合當時思想界（註二）之流行觀念而指示以新方向罷了。照此說來，則「機遇說」之於外界恰如「自由意志」之於內心；同時，「必然關聯性主義」則同等地類似於「前定說」；其唯一不同點即前者由形上學者所發展而來，後者則出發於神學者而已。在第一例裏，形上學者以「機遇說」爲出發點，對於思想之研究應用武斷及不負責的原理而形成爲自由意志說；自由意志者即所有各種困難似乎也皆可免除，因完全自由，其本身即是各種活動之造因，並不受任何影響；故和機遇說一樣，乃是不容再爲分說的最終事實。在第二例裏，神學家將必然關聯說改易爲宗教之方式；因其意念中早已充滿常規及均等性之觀念，故自然地將這種合理規律性謾於神權底預知；因此除一神信仰外，再附一信條，即萬物之始已由上帝予以絕對的命定。

這兩種相反的自由意志及命定說（註三）當然無疑地是解決人生之謎最平安而簡單的方法；因其易於了解，且合乎普通入底思想，故雖迄於現世兩方底信仰者其數尚非常可觀；他們不但阻絕知識之源，且各立派別，彼此難恨，常惹起社會之紛亂而增加私人生活關係之煩惱。但在現今較前進的歐洲思想家中卻有一種新興的意見，以爲以上兩種學說都是錯誤的，換言之，即對於任何事項之真理我們還沒得到充足的證據。這是個重要的問題，故未申說以前，先宜盡力解釋清楚。

對於我所設想的自由意志及前定說底觀念底起源發生任何懷疑都可以的，但對於這些觀念現在確實所根據的基礎實無辯論之餘地。前定學說是基於神學底假定；自由意志則基於形上學之假定。前一種學說之贊助者其所進行之設想還未有絲毫完滿之證據。他們要我們相信造化者——同時他們誠心承認它底恩惠——雖然至高至善，但在選擇及未被選擇者之間已有一獨斷的區別；它在永常中已預決數百萬未來生物之滅亡，而這種生物僅在其支配下方能生存；又它所以這般處置者並非為公正主義，不過為無限權力（註四）之伸展而已。這種學說於新教徒之間以及於蒙昧固執的喀爾文派（Calvin）頗為流行；但在早期教會裏是奧古斯丁（Augustin）第一次把它系統化了，奧古斯丁則似乎是取義於祖先崇拜者（Manichaeans）。總之，不論其本身彼此之矛盾如何，在科學底研究中，這種學說必須被認為無結果的假定，因為既出乎我們知識範圍以外，則決無方法以確定其真偽。

其他一說早已頗為自由意志者與「阿民教義」（Arminianism）是相連屬的但在真實上卻基於人類意識至高無上的形上學信條。這說以為每一人感覺並稔知他是個自由的主動力；沒有一種精微的議論可以減去我們對於佔有自由意志之意識。現在這種與普通理論方法挑戰的最高裁判權底存在含有兩種臆說：第一種雖屬屬於真實的，但從未經證明；第二種是虛假的無疑。這些臆說以為有一獨立天賦之機能叫做意識，其運用是確實無疑的。但首先我們不能決定意識是否機能之一；且有幾個最大的思想家曾表示意識不過是思想之一種情狀。（註五）果如其說，則以上的理論根本被推翻；因為即使我們承認各種思想之機能，當完全運用時，是同等正確。

的，可是沒有人會對其思想所達到之情狀作同樣的反應。現在姑且取消這一點反駁的理論，第二步我們可以回答，即使意識是一種天賦的機能，可是歷史底證據可以證明它底極端錯誤。（註六）在文化進展及人類不絕的過程中底各大階段都顯露着思想底特異點和信心，而這種特異點及信心每每留了印象在時代之宗教、哲學及道德上。每種信心在一時期是信仰，而在別一時期則每有徒成笑柄者；且皆在其本時代中能深入人心，變為意識之一部——即所謂自由意志者。但不能說這些意識之產物盡屬真實，因許多都是彼此矛盾的。故除非各時代有各種不同的真理標準，人底意識證據恆不能證明一意見之是否真實；否則兩種背馳的主張都有同等的正確了。除此以外，還有一觀點可以由普通生活中之遭遇窺探出來。我們不是在某一情景中感到鬼魅及幻像的存在嗎？但這已普遍地認為絕無存在之可能了。若駁斥此理論，以為這種意識是彰著的而非真實的，則我要問，如何可以決定何者為真，何者為偽？（註七）若這種誇張的機能在某一部事物中欺蒙了我們，又有何憑藉可以信它不在其他方面都在欺蒙我們呢？設無憑藉，則其機能根本是不可靠的了，如有憑藉——無論何種——則其存在已表明需要有一種以意識為附屬的權威，如此則「意識至高說」推翻，而信從者須被迫重新建設其全部理論了。確實的，以意識為獨立的機能，其存在之不正確及其自身之矛盾，使余早信觀察個人思想之普遍方法永不能將形上學成立為科學；這種研究是祇有憑藉的應用定律方能有成；這些定律是由歷史的程序發現而來的，就是說，這些定律包含人事全部現象之考查。

倘幸而我寫此書之目的，並不要引起信歷史為科學者信恃前定主義或自由意志說；（註八）在研究的時期，

我所要他們承認的就是以下幾點論據：即當我們表現一種動作的時候，我們是因某種或幾種動機而表現的，這些動機乃是某幾種前因底結果；故若能認識前因底全部及其變動，即能正確地預測其全部直接的結果。除非我是犯了極大的錯誤，否則，凡頭腦清楚而以實證立意見者，必須有此見解。（註九）譬如說，若我能熟悉某人底性質，我即常能預料在某種情況中他將如何動作。萬一對於這種預測失敗了，則我必不諉過於這種錯誤是由於那人底專斷及反覆的自由意志，亦不假因於神底預先處置，因為這兩方面我們都沒有絲毫的證據；但我必誠悅地猜想，或許是我對於他所處的某幾種情況不甚清楚，或者對於他底思想之普通作用未有充分的研究。可是，若我有正確的理解力，同時完全明瞭他底性情及其周圍底事項，則我必能預測他將採取的（註一〇）——受各種事實影響的——行徑。

否認自由意志之形上信條及事實前定（註一一）之神道信條之後，我們底結論必歸納於下面：人底動作既完全由其前因所決定，故必有均等性，就是說，在同樣情況之下，必常發生同樣的結果。又因各種前因非在思想中即總思想外，故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各種結果的變化，換句話說，即歷史所充滿之各種變遷，人類各種之不斷的活動真實進步與衰落，快樂與悲慘，皆是雙重動作底結果；外像對於思想底動作及思想對於外像底動作而已。

倉理的歷史祇有靠這些材料纔能建立起來。一方面，我們有人底思想受它自己生存律底支配，並且當它不受外力操縱底時候，照它自己組織的情況發展它自己。別一方面，我們所有的所謂自然者，亦受它自己定律底支配；但不停地和人底思想交相接觸，激動他們底熱情，引起他們底智慧，因為決定他們動作底方向，若無這種擾亂，

他們底動作是不會引起的。如此，人改變自然，而自然亦改變人；同時各種事項因這種交互的變易而必然地發生。

現在直接的問題就是要確定發現這種變易律底方法：這——我們立刻將看到的——就引我們入於初步的考察，兩種變易，究竟那一種比較重要些？就是說，人底思想和慾望較受自然現象底影響呢，還是自然現象較受人底思想和慾望底影響呢？因為很顯然的，那一階級比較活動（若是可能的話），就先被研究；這是一部分因為它底結果比較特著，故易觀察；一部分因為開始先綜合較大力量的定律，其所存留不能表白的事實必較開始先綜合較小力量的定律為少。在未考察這問題以前，須先敘述幾個現有的、確切的精神現象更迭延續之規律性底證明。因此敘述，以上的見解更能堅固；同時我們將明白現在已用以解釋這大問題底方法是甚麼。

實在獲得的結果有非常的價值是顯然易見者，非但因綜合所包括的範圍廣大，尤以此種結果乃由於非常的整備而來的。大多數道德上的考察是依恃神道或形上學底假設，而我所說的研究卻完全依恃歸納法；這種研究是根據無數的事實底羅集，包括許多國家，排列成最清楚的方式——即數學表格；這些表格大多數不過是由政府人員收集的，他們既沒有任何特殊理論要擁護，也沒有原故妄牽強附會報告底真實。

這種關於人類動作最容易了解的推理，曾普遍地被人認為無庸爭辯的真理，是從以上或相類的來源獲得的；它們是根據於統計底證據，用數學方式來表明。任何人若能明瞭這種簡單方法所發現之多，則必非但承認精神現象更迭延續之均等性，且必熱誠地感覺，若用較有力的方法，即現在所有之知識已足夠應用以表露更重要

的發現，但在未能預測未來的研究以前，我們現在祇有涉獵到統計家所創始的人事均等性之存在底證據。

人類底動作可以簡易而明白地分成善良與卑劣兩類；因為這兩類是互有關係的，且放在一起就組成我們道德行為底總和，故一類之量增加，則以比較的眼光看起來，其他一類必呈減少的現象；因此，若能於某時期中偵察得某民族之惡德底均等性及方法，則於其善行方面亦能發現一符合的規律性；反之，若能於其善行方面證明其有規律性，則必須於惡德方面推度一相等的規律性；這兩類動作，以分類的名詞講起來，是彼此增補的。（註二）

再用另一方法解說，很明顯的，假如能表明人類惡劣行為因周圍環境之變遷而變化，則我們不得不推度其善行亦為——惡劣行為之殘餘——亦有同樣的變化；我們更不得不下進一步的結論，即這些變化是廣大而普遍的。因此，這些因在繁雜的社會中運行，必能不顧社會所包有之特殊人類底意志而產生某種結果。

假如如人類底動作是被他們所處的社會情狀所支配，則以上即是我們所要尋覓之規律性；反之，若找不到這種規律性，則我們或信他們底動作乃依據於每人所特有的專斷及私見——如自由意志等等。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決定在一個確定的社會中，其全部的道德行為是否有一規律性存在；這又是要決定那種統計能供給最大價值資料的一個問題。

這——證據最主要的目的既然是要保護清白的人來抵制犯罪者，自然的，歐洲各國政府，早知統計底重要，應該開始收集窮困羸弱的罪惡底證據。這些證據已堆積層層，直至組成一大部的記載，包含無數排列的事實及註釋，因為這些證據，是發覺透澈，故關於人類道德性質方面，我們所習得者遠較以前世紀（註一）所堆積的經驗為多。但在

概論方面欲將所有由統計上所得的推論敘述出來是不可能，故我祇考查二三種最重要的，並指明其間的關係。

各種犯案裏面，恐怕謀殺罪是最輕妄和最不規則的了。因為當我們想到這種罪——雖然是長期惡劣行為底總動作——常是驟然衝動的直接結果；當預謀的時候，這種犯罪（即使是極難免被傷害的），必需要一極巧合的機會，是犯罪者所常等候着的；他必須忍耐等候時間，和尋覓他所不能支配的機會；當時機到了，也許他底心曠化了；他犯罪不犯罪的問題還須視各種衝突動機——如畏懼法律及宗教刑罰、良心責備、將來痛悔的省悟、愛底獲得、妒忌、報復、失望——底平均力如何。當我們將這許多事情合觀的時候，就發生許多複雜的原因，使我們自然地對於在這些支配犯罪的無定的動作裏面偵察常規和方法要抱失望了。但現在事實如何實際是，謀殺案是很有規律性的，且和某幾種已知的情狀有均等的關聯，如潮底漲落、季候底轉變一樣。開特雷（M. Quetelet）終身從事於蒐集及整理各國之統計者，經過辛勞的研究以後說：「犯罪中之每一事件，其發生之重複數目含有絕無錯誤的永恆性；即使是難以預測的謀殺案常種因於偶然的爭論。從經驗上我們知道，非但每年的謀殺者其數目幾相等，即他們所用的殺人工具也有同樣的比例。」這就是一八三五年所稱為歐洲第一統計家底語，以後則每種研究都加增它底正確。因為近來的研究會確定一非常的事實，即犯罪案底重複均等性較自然定律之於人體之疾病及毀滅更為明顯，更為易於預料。例如，在法國一八二六年至一八四四年之間有一個奇妙的符合，被告犯罪者之數差不多和同時期巴黎之男子死亡數相等，其不同點即犯罪數之波動實較死亡之波動為少而已；同時在每一種罪案中都發現一樣的規律性，各種罪案都受同樣的均等及定期重複律底支配的。

凡深信人類動作受個人之特點影響較社會之普通情狀爲甚者，必對以上所敘述者表示驚疑。可是尚有一情境更可駭異。在公開及登記底犯罪中，沒有一種像自殺似的完全以其個人思想爲定者。謀殺或意圖劫掠，且帶是不能如願的；有時受敵黨之挫折，有時受公正官吏底裁判。但自殺卻不易受到阻止了。決定自殺的人在最後一刹那並沒有受到敵人拚扎底禁阻；他既很易避開政府力量底干涉，他底動作就變成孤立了；其動作既與外面的擾亂隔絕，則較其他犯罪更屬於個人意志之產生物，尤爲明顯。又這種犯罪與其他普通的犯罪不同，是不甚受前謀者底煽動底影響的；所以這些人，既不受到同伴者底慫恿，也不會受到阻止其自由意志發生之一切外力底障礙。因此，我們常易聯想到，以爲欲在自殺中找尋通則或在這樣反常、孤立、立法不能制馭、精明的警察無法禁阻的犯罪中發現規律性是不可能的。還有一種阻礙對於我們底見解發生防害者：就是關於自殺底最好的證據也常常其不完全。譬如說溺斃一事，自殺每易視爲偶然失足；而真正之偶然失足卻又視爲自動的了。如此，則自殺非能近乎專斷及不易抑制，且於證據方面亦頗晦隱不明；綜上觀之，則於所追源的自殺產生通則一點，不得不抱失望了。

這些即是這一種犯罪底特點，但確是一種可驚駭的事實，也就是我們所有的證據希望能歸納於一個大結論，且我們再不疑惑自殺不過是社會普通情形底產生物，而犯罪的個人不過將以前情境所必致發生的結果實行出來罷了。在一指定的社會情形裏，某一部分底人是必要戕傷他們自己底生命的。這便是一個通律；至關於那一種人常會犯自殺罪這一特殊問題當然另受特殊定律底支配；但這些特殊定律在其共同活動時，卻要受支

配於其所附屬的大的社會定律。這大的定律是這樣地不可制止，無論生命之愛惜，來世之恐懼，皆不能阻止其動作。這種特著規律性底原因，就是此後我所要估量的；但這種規律性底存在對於熟悉道德統計者是很明瞭的了。我們由各國所得到的統計答案中看見每年都有同比例的人民自戕其生；因此，雖然蒐集完全的證據是不可能的，但我們也能在極少錯誤的範圍中，預測來年自殺底數目；——當然，這也要社會沒有任何顯著變化纔可以。即以倫敦而言，雖然像這樣變遷極多的，世界最大，最奢華的都市，我們還能發現深信社會定律者所難料到的規律性；因為政治底激動，商業底興奮，食物昂貴所產生的悲慘，都是自殺底原因，且在永常地更迭不休。在這大城裏，每年大概有二百四十人自殺；各年合計，因受臨時原因底影響，其變化常在最高數二百六十六人與最低數二百十三人之間。一八四六年是火車傾覆大慘劇的一年，倫敦自殺者有二百六十六人；一八四七年開始漸降至二百五十六人；一八四八年是二百四十七人；一八四九年是二百十三人；一八五〇年則為二百二十九人。

這些不過是我們現在所保有的關於規律性底證據，而表示同一的社會情形之下必產生同樣的罪犯。欲深察這種證據底效力，必須明白這種證據並非由特殊的事實武斷地選擇出來的，卻是綜合所有罪犯統計底一個殫精費力的敘述，包括幾百萬次底觀察，展佈及於不同的文化階段，不同的法律、意見、道德、習慣的各國。又這些統計都是由專為此目的而聘用的人所收集的，他們多方尋搜真理，以求事實之準確，故我們必承認罪犯之存在，以其固定及均等系統而言，實是人類道德史上一個最可證實的事實。我們現在有用同等精密研究工夫在不同情狀中得到證據之平行連索，共同指示着同一的方向；共同迫我們下一個結論：即人類之犯罪，大部分是該犯罪者

所處之社會情形底結果，而不全是犯罪者個人惡德之過。這是根據適合於全世界，廣汎而確實的證據底推論；這是無論形上學者或神道學者用以混淆過去事蹟之任何假設所能推翻或非難的。

凡熱稔自然律之作用在自然界中所擾起之各種狀態的讀者，必也希望在道德界裏發現同等活躍的擾動。在兩種例裏，這樣的變化由狹小的定律進行，直至某一特點與廣汎的定律相遇合，於是即變易其正常之活動。關於這一點，機械科學在力底平行四等邊形底絕妙的原理（theory of parallelogram of force）底例裏有一種好的例；照此原理，兩種力所成之斜角線，註一四其作用與二力所產生者相同。這個定律已包含着重大的結果；它和重要的機械原料，力底合成和力底分解是相關聯的；凡熱知這證據之立場者，對此真理無復疑問。但當將此原理應用於實際目的時，則發現其活動恆被其他定律所誤引，例如空氣摩擦，及我們所運用之物體底密度——由其化學組合或原子分佈所成者。擾動這樣地加入後，機械律之純粹及簡單作用因而隱沒。但雖然定律底結果是常受擾亂，定律之本身卻仍是完全的。（註一五）同樣的，廣汎的社會定律——即人之道德動作非其自己意志之產物，乃是前因的——其本身難免擾動；這種擾動影響其運用，卻無累於其真理。這一點即够足表明一國中青年學界總數之稍有差異的原因。確實的，鑒於道德界問題之繁多那般超過於自然界，我們所驚異之點乃其變化不顯過大；由此細微之差異情況看來，我人似有一意念，感覺這些廣汎社會定律之偉大；它們雖常受到阻止，似乎總能戰勝一切障礙，且若以大的數目統計之，簡直沒有表示甚麼擾動。

非僅人類罪犯，其結果顯著者均等性。即每年註冊底結婚數亦不能決定於個人底性情及其志願，卻為個人

絕不能違抗的廣汎的普通事實所攝佈。現在都知道結婚和較底價格有一固定不移的關係；在一六在英國，一世紀底經驗曾證明結婚不與個人感情有任何的關係，不過是被大部分人民之平均薪資所規定的；故這個大的社會及宗教之現象非但受食物價格及工資率底搖動，且完全受其支配。在其他例裏，均等性之原因雖尚無從知，但其均等性卻已發現了。今試舉一特異的例，我們便可加以證明，即記憶力底錯亂亦顯著着這種必然及不變易的正常的普通性質。最近倫敦及巴黎郵政局宣佈無法投遞函件之數目，而這些函件都是作信者忘記書寫地址所致；其各種不同的情況姑不計及，但此種無法投遞函件之數目卻是年年如出一轍的。年年有同等比例的作信者忘記這簡單的動作；因此每年關於這小小或可說是偶然的事情，我們能確實預言被記憶力遺誤的人數。

凡對於事項之規律性有堅定之觀念，並能堅實了悟此偉大的真理者——即人底動作是受其前因之支配，在實際上永不矛盾，雖然外表反覆無常，實乃宇宙正常大計劃之一部，此種計劃以我們現有之知識很難知其大略——凡能了解歷史之基礎與門徑之真理者，以上所援引之事實，可謂絕不新奇，且係其所應已預料者，及早被認識者。如果，研究工作底進步率如此迅速而熱誠，真使我深信下一世紀末消逝以前，證據的連索定能完成。同時，不信道德界之有堅確規律性之歷史家，將與不信物質世界之哲學家同樣地找不到了。

我們將洞察以上所述我們動作受定律支配之例證，乃從統計上得來的；這一種學理雖然尚在幼稚時代，其對於人性研究上所啓示的光焰卻已較其他科學之總和爲多了。可是，雖然統計家創用其他範圍內已奏功效的種種方法去研究這個大的題材，雖然他們應用數目，作爲發現真理的最有效的機構——我們卻決不能以爲除

此外絕無其他可恃以研討的資料；亦不能推度以爲自然科學從未應用於史學，故於史學爲不實用。確實的，當想到人與外界接觸之頻繁時，我們即確定人類動作與自然定律之間必有一密切之關係；故自然科學之所以未曾引用於史學者，其理由乃史家尚未洞見這種關係，或既洞見而缺乏聯接之知識。因此在二大類研究——內心與外界——之間發生一不自然的分離；雖然現在歐洲文壇已有打破這種「人爲的屏障」之願望的切實表徵，可是不能不承認現在確尙無成就以助成這偉大的目的。道德家、神學家及形上學者繼續從事其研究，而對於科學家底工作，他們既視爲簡劣，且毫末加以重視；他們所攻擊的這些研究工作確實對於宗教興趣是危險的，且鼓勵我們對於人類理解力之預期的信心。在其他一方面，自然科學之攻修者，明知他們是進步的團體，當然對於他們底成功表示矚矜；且當其將所發現的種種與對方之靜止狀態相比較時，每易陷於輕視對方事業無成之一途。

史家應調和於兩派之間，宜顯示此兩種研究應謀連結之點，俾免除彼此敵對之自傲態度。解決這連結的問題，亦即所以固定史之基礎。因爲歷史所研究者，既是人類動作，而此等動作，又是內外現象衝擊的產生物，則我們必須考察此等現象彼此之重要性；推廣研究直至明瞭其所含之定律；確定精神學者及自然學者兩大派所已有之未經發見的資料。這種工作我頗期成於下兩章之所述；若果有所成就，則本章工作至少對於縫合這寬大而幽暗之裂隙——這裂隙把密切而不可批離之題材強加劃分而爲知識之障阻——的一點上面有所獻助。

（註）這裏所指的是以史學爲其主要的研究。培根也有關於史學之著作，不過他視爲附屬的目的，顯然他對於史學思想程度不似其後的研究者。

(註二) 蓋索布爾 (Bonnafre) 在他底名著史學評論 (Histoire Critique de Maniché) 曾有懇切的評語。他說：「偉大宗教底教義都是基於前朝的哲學的。凡認識思想史者，當然無不對於斯陶爾 (M. Stahl) 底直截了當：「民族底哲學是拿神學為模本的。」一語表示首肯的。(見赫林拉美底特拉和斯 Kilmuth, Trévoux, 第二册第四四頁一八四三年巴黎出版)

(註三) 這些彼此相反的學說，假如沒有普通所感覺的希望補足二說缺點，而以原有理論方法來解說的話，便會受一般所承認：以為因減少道德上的責任而捨棄自由意志是危險的，不過因恐觸犯上帝底權力，而捨棄前定說亦有同等危險。故自來有過各種嘗試想調和自由和必然性，而令人底自由與神底預知，彼此能够諧合。

(註四) 即使研究不似奧古斯丁那般深遠的安布羅茲 (Ambrose) 也十分冷淡地說：「上帝能够那般莊嚴地說，也能够端嚴地去做。」見尼安得 (Neanter) 第四册第二八七頁，喀爾文說：「上帝在永常中命定一部分人類永久的快樂，一部分人類無限的悲慘，其動機不外乎為其自己之願望及自由意志而起。」

(註五) 傑姆士·密爾 (James Mill) 在思想底分析 (Analysis of the Mind) 一書，第一册第一七一—一七二頁說：意識和信仰是同樣的東西，而極大的錯誤就是說：意識是和其他感覺不同的一種感覺。照陸克 (Locke) 底人類理解論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第二册第一章及其著 (Works) 第一册第八九頁說：「意識就是任何事物經過入底心之一種知覺。」布郎 (Brown) 在思想哲學 (Philosophy of the Mind) 第六七一—六八頁裏反對意識是一種官能，又哈密爾登爵士 (Sir. W. Hamilton) 在利德著作底評論 (Notes to Reid's Works) 第二三三—三九七及三七三頁裏不滿意於利德將意識降為一特殊官能。康威 (M. Comin) 底哲學史叢書第二 (Hist. de la Philosophie, II. Serie), 第一册第一三一頁說：意識應作「複雜的現象」第九四頁也說：「良知為智慧底必要條件。」同時，最近一作者在喬治底哲學新統系 (Jobert: New System of Philosophy) 第一册第二五頁裏宣稱：「我們有我們底意識——這是確實的。」

(註六) 這是需要解脫的意識在它底證據的事實方面講起來是確實的，但在真實上都是易於錯誤。我們能知覺到某種現象就是證明這發現象存在心裏面或是呈現於心上；但如果說這種意識就能表明現象底真實，那麼，不會再進一步，非僅貢獻一個證據，且下了一個判斷，我們就引入了一錯誤的成分；就是意識和判斷混合在一起的時候，每致失其正確性，因為判斷常是錯誤。

已故的布蘭科·懷特 (Blanco White) —— 一個見理精深的思想家——說：「必需的自由和強制的自由之間的重要分別從未受到注意。任何事物都不能強迫我底意志；這種事實是每個人多少都知覺到的，但同時我們同等地知覺，假如沒有動機，那麼，我們即不能被決定是怎樣的。」（見布蘭科懷特底生活一八四五年出版第三冊第九〇頁）但一個人怎樣能知覺到：「任何事物不能強迫他底意志？」這不是意識，卻是判斷，這是「也許」的判斷，不是「是」的意識。意識底意義，必完全指現在，永不能包含未來事的「或許」和「能夠是」的意義的。

（註七）當柏拉圖要找尋人類思想底標準去測驗幻像及夢底真偽的時候，他也感覺到極度的困難。他唯一的結論是：假如個人底思想所見到是真的，那麼，於他就是真的；但這是問題底逃避，而不是解決。

（註八）自由意志，就是存在思想中的動作因子，是離動機而獨立行動的。若有人說我們有這種動作力而沒有動機，但當這種力在實際上運用時，我們又常意識地或無意識地被動機驅使者——若有人這般主張，那他簡直是述說一種無結果的議論，這種議論並不和我底見解相扞格，這也許或也許不真實的，但確未有人得到證明它的成功。

（註九）這就是照現象實證，呈現於理解之前而用理解所融合的普通論理所估量者。但康德 (Kant) 曾下一非常的嘗試要避免這種實際的結果，以為自由乃理性所產生的觀念，故必須歸於超越的理性律；就是說，歸於這些經驗境域以外而不能用觀察證明的定律。

（註一〇）這當然是個假設的情境，不過舉以為例罷了。我們從來沒法完全知道某個人底前因，就是自己底也難明瞭；但可以確定，愈明白了前因，愈簡易於知道結果。

（註一一）天意干預主義和前定說是連合的，因為神能預見各種事物也必能預見他所要干預的目的。反對預知就是限制上帝的全知全能。故有以為在特別的情況下，有特殊的天意阻止普通事項之進行者，也必須主張在特別情境中，其阻止乃前定的；否則就有非難神靈的意義。因為，如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所說的：「見尼安得教會史 (Nesander's History of the Church) 第八冊第一七六頁」：「知識既是知識，當然並不含蓄有因果力底意思；但這知識既是隸屬於創造知識的藝術家，那麼，它便和藝術家底藝術所產生之因果力發生關係。」

（註一二）有幾個道德家也建立一種第三類的動作，他們稱為中立者，既不屬於善行方面，亦不隸於惡德方面；因此發生著名的「或然主

論」(Doctrine of Probability)是幾個聲譽崇隆的天主教良心研究者所創立的，但給巴斯卡爾(Bacon)熱烈的攻擊。道主義最劣點姑不計及，即就它底實際的狀態看來，這僅是一個定義的問題而已，因為每種不同的動作必傾向於善或惡，乃可規定其所傾向底範圍；且確實的，每種惡德底增加，即減少相連的善德行為，雖然這種現象不常是絕對的。

(註一三)我說這點是有意的：凡曾考慮這些題材的人，必注意到道德問題底作者是怎样地反覆敘述前底陳腐及卑陋的意見；故這些道德關於道德行為及道德哲學底著述，還會感覺到像初讀時一般地蒙昧。人類思想底正確偵察者一向是詩人，尤其是荷馬和莎士比亞；但這些深刻的觀察者祇是注意生活底具體現象；到了分析的時候，便離開了變化的階段，所以現在我們祇能單靠著經驗以實證它們底結論。統計家底大進步在能應用「平均數學說」(Doctrine of Average)這些研究，在十八世紀以前是沒有人想到的。

(註一四)當兩邊各都代表一種力時，那麼，它底對角線往往成爲一合力；假如我們當這種合力爲一合威力，於是對角線底比較即成爲合威力之比較了。

(註一五)自然定律本來是無形的，它不過是關係的綜合，除在思想中以外並不存在；故無論其定律如何小，決無例外，——雖然運用時也許有無數的例外。

(註一六)「實在可驚奇的，食物價格和結婚數會有這樣密切的關係存在。」……「存在食物價格和結婚數之間底關係，並非單限於英

(英)國；若我們有方法確定這些事實，恐怕在每個文明社會裏卻可考見這種結果。我們有從法國所得到的需要的回覆；這些答覆卻同有以上所述的見解。」見波爾底國家底進步(Porter's Progress of the Nation)第二冊第二四四至二四五頁，倫敦一八三八年版。

第二章 自然定律底影響

——自然定律在社會組織上及個人性質上所生的影響。——

對於人類種族發生強有力影響之自然主動力，可分為四大類：即氣候、食料、土壤及自然之一般現狀是；最後一類我是指的那些現象，經過視覺或其他感覺——雖然大半是視覺——的媒介，組合而成的觀念底聯繫，因此使不同的國家發生不同的思想習慣。凡永久影響人類之各種外界現象都可歸於四類中之一類。最後一類——我所謂自然之一般現狀者——產生一主要的結果，即激起幻想，惹起無數的迷信而成為知識進步之一大障礙。且在愚昧幼稚的民族中，這種迷信底力量是那般厲害，自然的各種現狀竟使一般人底性質呈現着種種特態，及使其國家宗教亦具有特殊性，這種特性於某種情形下竟不易廢除的。其他的三種主動力，照我們所知道的，沒有發生這種直接的影響；但它們，現在我正要證明的，對於社會普通組織曾原成了最重要的結果，且因此隨着構成許多民族底顯著而遼闊的限異，這些限異常被認為人類各種種族之基本差別。但正因人種這種本有的分別是假設的，(註一)故受氣候、食料及土壤底影響所構成的差別，卻很能給與一滿意的解說，且當其原因發現以後，可以掃除許多史學研究底困難。故第一步，在論到這三大主動力與人類在社會情形中之關係一點，我主張先須考察此三大類之定律；等待這定律之正確性憑着現在底自然知識範圍去盡力循索，得到成功以後，然後再考查這

來一種主動力——即自然之一般現狀——而且我尙擬指出自然一般現象之變化如何當然地產生了各國之重要的分歧點。

開始講到氣候、食料和土壤，就很顯然的，這三種自然力彼此相輔關係的程度並不算小；這就是說，一國底氣候和其通常產植的食料有很密切的關係；同時食料本身要受土壤、地之高低，大氣底情狀，總而言之，各種情形總合而成之自然地理學——就廣義而言——底影響。

既了然於自然主動力之結合性以後，那麼，最好不要分別來看，宜視其各類結合活動所產生之總效力。這樣我們即刻對於整個問題易得一明白的見解；我們將避免強分現象底紛擾；且對於自然權力在早期社會中所施於人類命運底顯明影響，將得一更深遠的根究。

氣候、食料、土壤在一民族中所產生的結果，其中以財富之積聚爲最早而主要。雖然知識底進步自然地促進財富底積聚，但很確實的，在社會開始建立時，財富必已在知識啓昧以前即開始有所積聚了。富人必須從事於生存必需品底集取之際，乃無所謂閒逸嗜好與高尚之追求；更沒有科學之創造，極其量的享受，也不過是嘗試最野蠻民族所能發明之粗劣及不完備的工具以冀節省其工作而已。在這種社會情形中，財富之積聚乃是必須採取的第一大步驟，因無財富則閒逸無由生，無閒逸則知識無所孕育憑藉，若一民族之消費常等於其所有，則必無所剩餘，故無積聚之資財，即無法以維持其族之無業階級。(註二)但假如生產超過消費，而盈餘以生，這種盈餘，照公認的原則講起來，又必積增而成一資源，人人直接或間接受其資助而不用自己創造財富以謀生活。到這時候知

階級之存在是可能的，因為已開始有剩餘的積聚，人們能用非其所生產之物品，而專心致力於早期為生活逼迫，無暇計及的問題了。

蓋此之故，社會各大改進中，財富之積聚必宜首列，因缺此則無嗜好，無閒暇以獲得知識；而文化之進步，後此我要證明其全靠知識為其出發點。現在可見在完全蒙昧的民族中，財富創立速率之驟緩完全為其本土底自然特點所挾持者。稍後，當財富已有了相當疊積，其他原因方加入活動；但在這種情形以前，進步祇能單靠兩種情勢而定：一、靠工作進行時之能力及規律性；二、視那寬大的自然對於工作之酬償怎樣。這兩種原因底本身即自前因底結果。工作底酬償是受土壤肥沃底支配，而土壤本身底一部分是受其化學成分之混合底調整，一部分是受河流及其他自然原因之灌溉程度底節制，又一部分更受大氣底熱度及潮濕底調合的。在另一方，工作進行時之能力及規律性又復完全受氣候底影響。這一點在兩種不同的情形中表顯出來：其一——很易明白的——即酷暑時，人往往覺得不舒適或有不適宜於那種在溫和天氣時所願表露的自動的勤勉。其二——不甚惹人注意，但有同等重要性者——即氣候之影響非但對於工作有減弱或增強的力量，且於工作者習慣上之規律性亦生效力。我們可以考見在極北地帶生活的人民，沒有能如溫帶居民之富有恆久及猛進之努力的。其理由更為明顯：若我們想到較北的國家，其天氣底寒烈，和年中竟有幾個月過着黑暗的生活使居民不能再繼續其通常戶外的工作；結果則勞動階級被迫停止其平常從事的事業而反習於散漫不羈的習慣；他們勤勉的鏈索已被折斷，而又失了長期不斷的練習所賜與的動力了。因此，其國民性較氣候容許繼續勤勉的人民尤為多變而專斷的。確的，

這一原則就是這般的強有力，即在相反的情形中，我們亦能見到它底運用。關於政體、法律、宗教及習尚方面，我們實難找到那視瑞典之較挪威、西班牙之較葡萄牙更大的差異。但這四個國家有一大的相同點。四國內的農業都是不能繼續進行的。在南方底兩國，工作是被酷熱、乾燥的天氣、土壤之惡劣所阻止。北方兩國，因冬季底嚴寒及日子底縮短亦產生同樣的影響。其結果，這四國雖然其他方面是差異之處甚多，卻都顯著着某種不固定而易變的性質；恰與較有規律及安定之習慣很相反；這種有規律的習慣是建立於氣候能減少勞動階級之工作間斷，而予以長期不斷的職業底國家裏的。

這些就是支配財富創立的自然原因了。當然無疑的，還有其他的情況亦含有相當的力量，且在較進步的社會情形中，這種力量發生同等或有時竟至超越的影響。但這些都是指較後的時期而言；若考察極早期的產業史，則必發覺這全受土壤及氣候之制裁：土壤是支配工作後的收穫；氣候是支配工作本身底能力與永常性的。祇要對於過去的事蹟瀏覽一遍，即可明白這兩種自然重要性之偉大權力。因為沒有一國底歷史有例可以證明那國底進化是靠自己的力量，除非很適宜地占有兩種重要性中的一種。在亞洲，文化分佈常限於爲人類獲得財富之肥沃及積沖土之大地域內；若不稍具財富積聚的知識，進化便不能開始。這片大的地域毫無阻止地從中國東南部直伸展至小亞細亞西岸，而菲尼基，而巴力斯登。但這一長帶地域之北方乃是狹長的不毛之國，永久繁殖着粗悍而流浪的種族；他們因爲土質瘠薄，一向與窮乏爲伍而又因安土重遷，故從未能自拔於野蠻的地位。這完全要靠自然的原因，看以下的事實即可明瞭。蒙古和韃靼之游牧民羣在各時期曾在中國、印度及波斯建立了偉大

的帝國，且在各當時，其文化並不較其他興盛之古王國爲低劣。因爲在亞洲南部之肥饒平原，自然供給了全部財富底原料；在這裏這些野蠻種族纔第一次獲得相當的精美物品，產生民族文學和製定政制；若在其本土，這些事一件也不能成就的。(註三) 同樣的在阿拉伯本國底阿拉伯人因土壤之絕對乾燥，永久不脫爲粗悍和不開化的民族，因爲在他們這種情形中，和其他情形一樣：愚蒙總是赤貧的結果。但在七世紀時，他們征服波斯；在八世紀征服西班牙之最富饒部分，在九世紀征服旁遮普(Punjab)，最後幾羅有印度全部。(註四) 他們在這新的居留地建立了國家以後，民族底性質也似乎受了極大變化。他們在本土時不過是飄泊流徙的野蠻人，現在呢，開始能積集財富了，且因此在文化學術方面也纔有些進步。在阿拉伯，他們不過是一個浪遊的畜牧種族；但在這新的居留地，他們變成了偉大帝國底創立者——於是建城市、立學校、集圖書，而他們所遺留之權力底痕跡至今尙能在科爾多巴(Cordova) 巴格達和德里看出來。(註五) 到這裏我們又有一個同樣的例：接連阿拉伯之北部——僅一狹長的紅海之隔——有一大沙漠，非洲地方之在同一緯度者皆入其版圖，伸展直抵大西洋底西岸。這龐大無垠之地域，多爲不毛之地。(註六) 故其居民亦完全陷於未開化之境與阿拉伯同，祇因無財富之積聚，無計獲得知識。(註七) 但這大荒漠的東部卻受尼羅河汎濫之灌溉成爲肥沃之沖積層，使工作得到最豐盛，最出乎意料之外的收穫。結果則這一地方，財富迅速地積聚起來，知識遂立刻隨着而滋榮繁長，這一帶地域遂蔚爲埃及文化底發源地；這種文化，雖或言逾其量。(註八) 卻和其他非洲各民族之仍在野蠻情態者大相懸別。返觀非洲其餘民族乃從未飽爲其本身稍獲進步或相當地超出於自然之貧乏所造成之愚昧的範圍之外。

以上的考慮，都很清楚地證明文化形成的一基本原因：土壤之豐腴於古代社會影響最大。但在歐洲文化上講起來，其他一大原因——即氣候——最佔勢力；我們知道氣候所產生的影響，一方是對於工作者底工作能量，一方是對於工作底規律或不規律性。其結果之差異，恰與其原因巧相符合。因為雖然各種文化必以財富之聚積為其前因，但問題卻又視在如何條件之下積聚方能進行。在亞洲和非洲，其條件乃是肥沃的土壤造成豐富的收穫；在歐洲乃是舒爽的氣候造成有效的工作。在前一情形，其結果視土壤與出產之關係如何而定；換一句話說，就是自然之一部對其他一部之作用。在後一情形，其結果視氣候與工作者之關係；即自然之作用不在對其本身而在對人。這兩類關係中，第一類比較不甚複雜而又不易受擾動，故見效較速。此即文化所以無問題地先孕育於亞洲及非洲之膏腴地域的原故。但雖然他們文化開化最早，可是尙不能謂為極蓋然燦備之觀。不過按以下所述的情形觀之，則可證所謂真正有效的文化進步實不在自然底賜與，而端在人底能力底運用。故歐洲文化，其早期受氣候之支配者，已表露其進展之能量，而與發源於土壤之文化迥殊，但植基於自然之文化，其力量無論如何彰著宏大，總是有限與固定的；總之，我們對於其力量之曾否增加或能否增加了無把握。至於人底力量，執已往的經驗及類似點觀之，是無限的；我們從來也沒有一些證據可以勉強劃定人類智力必需停止的理想界限。因腦力底增加特限於人類，而又別於外界自然之顯著現象，故氣候底主動力，能引動其工作而獲財富者，較土壤底主動力為尤適合於其最後的進步。土壤底主動力固為財富獲得的原因，惟不能激發其能力；它不過是土質與生產——豈是蓬勃叢生的——之量值底自然關係罷了。

以上所述的，不過是氣候與土壤影響於財富創立的各種方式。還有一點同等或更重要的卻也須討論。財富創立以後所發生的問題爲如何分配；就是說，比例上若干應歸上等階級，若干應歸低等階級。在一個進步的社會階級裏，分配是要視幾種非常複雜的情況而定，此處暫不述及。（註九）但在一個很早的社會階段裏，在其較精細的權權問題未開始以前，我想可以證明財富底分配，乃與其創立同爲全受自然定律底支配的；並且這種定律更形活動，竟不斷地保留着世界最大部分之居民於永久和難解決的窮苦中。假若這點能够證實，那麼，此等定律底重要性可彰然表露了。因財富既爲不可掩塞的權力底源，則很顯明的，若無其他問題，考察財富底分配即考察權力底分配，且欲上溯社會上及政治上不平等底始原也儘可借鑑於此。這種社會及政治底不平等，其活動及反抗乃組成每一文化國家底大部分歷史。

總觀這些題材，我們可以說，財富創立及積聚開始以後，便分配於兩種階級之間：勞動者及非勞動者；後述一種人，以階級而言，似較富於才能，前者則人數較多。維持這兩種階級底資財是先由低等階級建立起來，而其體力乃受上等階級之優越技能所支配，集合及經濟化。工人底報酬叫做工資；策畫者底報酬叫做利益。以後繼起一種所謂放款者；即是，有一部分人既不去策劃，也不去工作，惟將其積蓄借給策畫者，復因着借款底關係而分有策畫者一部分報酬。在這種情形中，放款者即由節省其積蓄而得報酬，這種報酬即所謂利息。故遂形成三重的分界——「利息」、「利益」與「工資」。但這還是以後的情況，直至財富有相當的積聚纔是這樣；在我們現在要敘述的社會階段裏，這第三階級——即放款階級——還未達分立而單獨形成一階級的地位。（註一〇）現在祇要能

確定，當財富積聚後，調整分配於兩階級——工人與雇主——之間底比例數底定律而已。

現在既已明白工資即為工作底價格底酬報，但工資率與其他商品底價格同隨市場變動而上下，若工人之供給溢出席需求則工資必低減；反之，工資也增加。今假設某一國家，其財富分配於工人及雇主之間，則工人數目底每次增加將減少每個工人平均應得的報酬。我們現在且不計一般意見所公認的其他紛擾原因，我們將發覺在長期中，工資底問題即是人口底問題；因為工資真正付給的總數須視他們所獲得的財源底豐約而定，但每人所得的工資數必因工作者之增加而致減少，苟無其他原因為之障阻，則財源本身之增進迅速，常與其較大之要求同為正比也。（註一一）

要知道那一種情況最適合於工資母金底增加，卻是個很重要的關頭，但這點我們現在可暫置勿論。現在所當注意的問題，不是財富底積聚，而為財富底分配；目的是要確定那些鼓勵人口激增，使超過工作市場之容納性，而維持極低之工資平均率底自然底原因是什麼。

影響工人階級之增加底自然主動力中，以食料為最有力而普遍。若有兩個國家其他各種情形都相似，單是食料一項顯有差異——一國底國有食料賤而豐裕，他國則稀少而昂貴，則前一國人口之不可避免的增加必較其他一國為迅速。（註一二）又用同樣的推理，工資底平均率在前一國因為工作市場充斥的原因，必較後一國為低。（註一三）故為現所欲研究的目的着想，考察各國食料所依繫的自然定律實為最要；不過以現在的化學及生理學知識底豐備，我們關於這一點還可以得到些正確固定的結論。

食料受人類消耗後產生兩種僅有而重要的生存必需的影響。第一種供給人類一種「動物的熱度」，缺此則生命立即停止；第二種運用於人底細胞組織中，即在人底構造的機能內起一種新陳代謝的作用。爲這兩種不同的目的，於是也有不同的食料。我們身體底溫度是被不含窒素底物質保持的，故名爲「不含窒素底物質」；我們機能底不斷的衰謝是靠含窒素底物質之常存在活動以回復其健康。在前一情形中，不含窒素物質內底炭質和我們所吸入之氧氣化合而起內部燃燒的作用，使我們重行發生動物的熱度。在後一情形中，因淡氣與氧氣絕少化合力（註一四）故淡氣或含窒素底食物反抵禦燃燒；（註一五）因這種互繫的情形，即能盡重長細胞之責，而恢復人類機能因每日勞苦所忍受的損失。

這就是食料底兩種大分類；若要考察食料調整與人之關係底定律，那麼，我們就會發見每一類底重要主動力乃是氣候。居住於熱帶國底人較居住於寒帶國者容易保持其動物熱度；故祇需要較少量的不含窒素的食料，這種食料底主要作用，即在維持其體溫至相當程度。同樣的，在熱帶國底人，所以需要較少量的窒素食物，也因爲就普通看來，他們體力之運用較少，因此細胞之陳謝也緩。

故熱帶居民於自然普通情況中，其消耗食料既較寒帶者爲少，則其人口增進——若無其他問題發生——必較寒帶爲速。但人民供養物之過剩，是由於供料豐裕，抑由於消耗較少而起的一個問題本屬無關重要的。人民食量雖或較小，但其消耗力實與食量大者同，因大量的營養料感着過剩，於是便給人口澎漲一個機會，使其銳增較寒帶國爲烈；在寒帶國內，雖然亦有同樣豐盛的糧食，但因氣候的關係，消耗亦快。

這是第一點，氣候定律因食料之媒介，與人口定律，及財富分配定律發生關聯。但是還有一點，用同樣的推理，可以使以上的理論更覺穩妥。就是在寒帶國裏人非但是受環境所迫而致食量增加，且食物價格較昂，獲得較困難，而工作耗費亦較大。其理由，在下面極簡單地敘述一下，不須詳細討論，因尚有其他對這有趣底題材底理解我們更需注意者在。

食料底作用，我們已知道有兩點：即保持體溫及細胞之新陳代謝作用（註一）第一種作用，是因吸入肺內的氧氣經過全體組織而和我們食物中底炭質化合而發生的。炭質與氧氣底化合必發生相當熱度，人體構造即因此維持其必需之溫度。憑化學家所熟知的定律說起來，炭質和氧氣和其他成分一樣，祇能在某一固定的比例中纔能結合；故若要保持健康之平衡狀態，食物所含的炭質，其量必須與吸入的氧氣相上下；又因外界的寒冷而致體溫降低時，這兩種原素量都應增加。在寒冷的天氣中，營養上炭化較高的需要，顯然是起於下列兩種彰著的情形中：一、空氣稠密些，則人所吸入的氧氣量較在因熱度高而空氣稀薄的氣候中為多。二、寒冷能加速人底呼吸，使呼吸次數不得不較熱帶國之居民為多，因此加增其所吸入的氧氣平均量。在兩種立場上，氧氣之消耗都較大；因此炭質之消耗也應同其正比；這兩種成分如能在某一固定的比例中結合，則體溫及人體構造底平衡狀態方能維持（註一七）。

從化學及生理學上加以研討，我們便可得一結論，即國家氣候愈寒冷，則其居民之食料愈要豐富的炭質。這一點純粹的科學的推論，已得到實驗的證明了。兩極地域底居民消耗大量的鯨油和鯨脂，這若在熱帶這種食料

恐怕要置人於死地了；故熱帶普通的食品幾完全是水果、米和其他蔬菜。現在經精細的分析後，已釐定兩種底食料含過量的炭質；熱帶食料則保有過量氧氣。現在不再詳細贅說，祇略舉如：油所含的炭質是六倍於鮮果而極少氧氣；澱粉質，於營養方面又是蔬菜類中之最重要的成分，那裏卻幾含一半的氧氣。

這種情形和我們所要研究的題材底關係是頗可異的；因為有個很彰明的事實——這我要特別提出的，且為我們未發現的幾種較普通的定律所支配者——即富於炭質的食料，其價值較缺少炭質的食料昂貴許多。世界上以氧氣為其主要成分的果實是非常的豐富；這可以不蹈危險或幾乎不甚費事即能獲得。但富於炭質的食料——為氣候寒冷地方底生命原料——其生產卻沒有這樣容易而自然。它不是像蔬菜一樣地由土壤長植的；它包含着兇猛動物底脂肪，要得到它，人必須冒極大的危險，費極大的工力。這雖是兩種極端情形的比較，可是仍舊是很明顯的，即人民愈近此兩極即愈受其所被制馭底情形所支配。照通則講起來，國家愈寒冷，則其食料愈富於炭質，愈暖則其食料愈含氧氣。（註一八）同時因炭化食料乃大半取給於動物界，故較由植物界所取之氧化食物為難得。（註一九）結果是，氣候寒冷的民族中其主要食品為炭化食品者，就算他們底社會仍在幼稚時期，已表現一種較以氧化之營料為生，不勞力、不用競爭而得。自然供給底民族為勇敢而富於冒險性。（註二〇）從這種重大的分歧，即生出許多結果來，這裏我卻不必多加追討；現在的目的不過要指明食料的不同是怎樣地影響於財富分配於各階段的比例罷了。

其比例底變動如何，我想在上面已弄個明白了。但不過現在再重述議論所根據的事實，也未始是無用的；工

費率隨人口而變動，工作市場不過多則從事增加，超過容納則加以削減。人口本身雖受其他許多情形底影響，也無疑地要因食料供給而生變動；供給豐富而人口增加，供給缺乏即停止或減少。生命之必需食料在寒冷國家較熱帶國家為缺少而尤需要；故這兩種立場足以鼓勵其工人及人口之增加。簡單地作一結論，我們可以說：在熱帶國裏有一減低工資的永常趨向，而在寒冷的國家則反是。

將此大原則應用於歷史之研究程途，我們將於任何一方面都能考見正確的證據。且決無例外。亞洲、非洲、美洲底各古代文化都是發源於氣候較熱的地方；它們底工資率卻很低，因此勞動階級底情況是很低下的。但歐洲文化乃獨發源於氣候較寒的地域；故工作報酬增加而財富底分配較人口因過量之食料而激增的國家為平均。這種差異，我們現在可看到，產生了許多重大的社會上與政治上的結果。但在這些問題提出討論以前，且先徵引一個明顯而驚人的例外卻證實了這個通律。這就是歐洲底一個大民族占有了極廉價的國有食料；這種民族即愛爾蘭人。在愛爾蘭差不多二百多年中底勞動階級都是靠着馬鈴薯為生；而這種食料是在十六世紀末葉或十七世紀早期纔傳入愛爾蘭的。（註三）馬鈴薯底特點是，除非易於腐爛，否則總比其他相等量的食料為賤。若以其繁殖力與其所含之營養量作一比較，那麼，平均一畝地出產的馬鈴薯其供給食料的能量可兩倍於同等面積的麥田。（註三）結果則食薯的國家，其人口——若無其他不同點——之增加亦二倍加速於食麥國家。真確的事實所表明着彰彰甚著。直至前幾年，社會現狀因疫癘及移民之故而生變換，於是愛爾蘭底人口總計纔致每年僅增加百分之三；英國在同時期則僅增加百分之一。五。結果這兩國底財富分配就完全不同了。即使在英國，其人口

繁殖也似乎太快；工作市場有人滿之患，而工人階級之報酬亦感不足。（註三）但回頭一比幾年前愛爾蘭人生活艱難的情形也就綽裕多了。愛爾蘭人處境的慘苦無疑地，都是被昏愂的治理者所壓迫而成的，且這種腐敗而錯誤的政治，直至最近，在英國底光榮上遺留了一個最大的污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資底極度低廉，這非但剝奪其舒適的生活，抑且阻止其文明生活中應有的普通禮教；而這種惡劣的情況即是基於豐富而價廉的食料鼓勵人庶激增，使工作市場充斥的天然結果。一個在二十年前曾游歷愛爾蘭的有識的考察者說，那時的平均工資是每日四便士；可是這區區的少數還不能常恃以得一個長久的職業。

這一國底自然原料較任何歐陸國家為豐裕，而其食料賤廉的結果乃致如此。假如我們能大規模地考察各國底社會及經濟情形，必能發見同一原理在各方面活躍着。我們可以考見——假設沒有其他問題的話——人與食料決定了人口增加數，而人口增加數又決定了工資率。我們更將發見，工資若是永常的低廉（註二）財富分配必更不均衡，而政治及社會勢力之分配也必異常地失其公平；換言之，下等階級及上等階級之尋常及普遍的關係，其始即為自然之特殊現象——其作用我曾擬表明者——所決定。綜以上觀之，我相信我們對於自然與道德界底密切關係；約束這種關係的定律；以及何以古代文化每每達到某一進化階段而又消沈，不能反抗自然底壓力或向前抵禦那阻絕其進步之外界阻力的理由底察見，較前更為清楚些。

第一步，若轉看亞洲，我們即可發見所謂內外現象衝突之最好例證。照以前所說的情形看來，亞洲文化常限於財富易得的富饒地域內。這廣闊的地帶包括世界最膏腴的部分；而各地域中以印度斯坦佔有最長期之燦爛

文化。(註三五)因關於研究印度底材料較亞洲任何部分爲豐足，所以我選它作例子，且用以表明那些由政治經濟、化學、生理學所綜合的定律，亦可以廣汎地考察——也只有歷史纔能達到此目的——來證實的。

在印度，因氣候的酷熱，使以上所說的一種定律易於活動，即通常的食料亦含氧化質而非炭化質。又因其他定律，使人民不由動物而由植物界獲得其通常食品，而植物所含有之澱粉質乃植物底最主要成分。同時在高溫度下，人不宜於耐勞的工作，因此需要一種易於生長之食料，且在較少之數量內含多量之滋養料者。假如以上觀點是正確的，那麼，在印度民族通常所有之食料中，應發見幾種特點。在印度古代，最普遍的食料就是米——這是五穀中最富滋養的食料；而其賜與工人之報酬至少六十倍。

因此，應用幾種自然定律即可預知一國底固有食料，且可預測其以後的結果。還有很奇特的：印度南部居民現在雖不大用米作食料，但仍以他種穀類叫做「拉其」(Rai) (譯者註一)的來代替，而不用動物食料。原來的米是那般適合於以上所述的環境，在亞洲底熱帶國幾仍用爲普通食料，且在歷代各時期中亞洲底米不斷地輸往世界各國。(註二六)

因氣候及食料之特殊表徵的結果，在印度即顯有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在工作市場過剩的國家都可以發見的。(註二七)假如考查印度所保存之最早記載——二、三千年前的——不難發見與現在相似的一般情形的證據；這種情形，可以相信在資本開始積聚時即已存在了。我們發覺上等階級異常富足，而下等階級乃極度窮苦。用

(譯者註一)現在印度東、南部產一種主要穀食。

勞力創立財富者所得極爲微薄；其餘財富皆以地租或利潤方式爲上等階級所吸收。因除知識外，財富卽是權力底最永久的來源，所以財富極度不均等，那麼，政治和社會權力底不均等便自然地隨之而起。所以並不是奇的：自印度有史以來，大部分的人民都爲紛擾的窮貧所逼迫，其生活每祇堪糊口，常處於愚鈍賤辱的地位而接連着不斷的暴運，屈服於高貴者之下，祇合於做奴隸或被驅着去戰爭而置他人於奴隸的地位（註二八）凡此種種，實在不足駭異的了。

欲在印度某一長時期中確定其平均工資率之正確的價值是不可能的；因爲，其數目雖可以用通貨來表明，可是通貨底價值，卽購買力，因生產價值底變化起了無量數的變動。但爲現在研究便利起見，有一個更妥善的方法，其結果之正確遠過於僅恃收集工資之證據的敘述。這就是一國底財富祇能分爲工資、地租、利潤及利息，而利息平均又是利潤之確實衡量（註二九）故地租及利息高則工資必低（註三〇）因此，我們若能確定通貨底現行利息及土地——被地租所吸收者——底出產比例——便能得一工資底完全正確的觀念；因工資乃是殘餘物，卽地租、利潤及利息付給後所給與工人的剩餘。

印度利息及地租之高是很顯著的。在西紀前九〇〇年所製定的米紐法典（Institutes of Menu）上通貨最低的合法利息規定爲百分之十五，最高爲百分之六十。這種法律並沒有因過舊而毀棄不用。直到現在，米紐法典還是印度法律學底基礎（註三一）並且我們很有根據地知道一八一〇年借款所付的利息，仍是由百分之三十六以差百分之六十。

以上所說的，僅是現在所要研討者之一點而已，至於地租，我們也得到同等準確而有價值的報告。在英國及蘇格蘭耕種者用地所付的地租，其總數的估計為總生產四分之一。在法國，平均比例為三分之一；（註三三）在美國就少得多了，這點向為人所習知，且有幾處地方確實地其所納簡直等於零。（註三三）但在印度，法定的地租，即法律及國家常例所承認的最低率，為生產之半數；好在這種苛律還未能認真施行，因地租既增加得這樣高，耕種者所得非但不及生產之半數，且以所得之微渺，甚至無力購買下期的種子。

從這種事實所得的結論當然是很明顯的。地租及利息既常在高率，而利息又必因利潤率而消滅，那麼，工資也必隨之而低削；例如印度某種財富，其總數分為地租、利息、利潤及工資，故欲前三者有所增加，惟有取償於第四種，其理甚明；換言之，勞動者所得的報酬與上等階級所得者相較，其比例相去極遠。又，這雖然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推論，但現在無需理論上之補足，已可說明即在現代——祇有現在纔能有直接的證據——印度底工資還是十分低，人民一向還是勉強工作着，其所得的工資僅足以應生命底需要罷了。

這是國有食料底廉賤及豐裕對於印度所發生的最大結果。（註三四）但惡果尚不止此。於是在印度——在任何國家也一樣——貧窮挑撥起輕蔑，財富產生了權力。假如沒有其他原因，階級和個人是同樣的；愈富則所占有的權力亦愈大。財富分配不均必形成權力分配之不等，誠可預測；而從來占有權力的階級且無不濫用其權勢，是以我們頗能明瞭印度人受氣候底自然定律底支配以致於貧窮，其命運終陷於無可避免的退化。今舉數例已足證明——尚非證明——以上議論所示的不容置辯的原則了。

印度人底大部分被稱爲奴隸，(註三五)當地法律關於他們有幾條細密而奇特的條款，譬如這種被輕視的人，有與其上等階級同席坐者，就要受流放、鞭打及凌辱之刑罰。(註三六)言語有輕視他們者，則其口必被焚灼；有侮辱行爲的，則其舌被撕割；和一個婆羅門爲難的，則必被處死；和婆羅門同坐在一氈上的，則處以終身殘廢之刑；若爲受教之慾衝動而私聽經典之誦讀者，以沸油灌其耳；萬一經典被他偷誦了，則必被殺；其本身犯罪，則所受的刑罰較上等階級爲重；反過來說，其自身若被謀殺，則賠償僅與一犬、一貓或一鴉之被殺同。若將其女配嫁給婆羅門，那麼，世上所能施行的刑罰似尙嫌不足以科其罪；於是宣布那婆羅門因受極卑賤的婦女底佔辱，必入地獄。甚而工人底名字底字義也必須含有輕蔑之意，使其地位可令人一望而知。但這些處置猶以爲不足以束縛社會底下等階級，乃加訂法律，不許工人積聚財富；又宣布即使其主人賜給他自由，在實際上他仍是奴隸；立法者解釋說：「因爲他本來的地位是這樣，誰能有權力去取消他呢？」(註三七)

當然的，誰能取消他底地位？這也實在不用猜度權力能這般濫用的理由所在。因印度卑賤而有永久性的奴隸在大部的人民裏頭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自然定律已命定其地位永無反抗餘地的了。這些定律底能力，在實際上，是這般地顛仆不破，作用一旦發生，那麼，生產階級只有永處於屈服地位而已。凡建立於熱帶的國度，考諸文獻上的記載，當財富有了積聚以後，那國家底人民即沒法能逃避這種劫運；又凡因國家氣候之過熱，沒有不形成食料出產之過豐，而過豐的影響，則財富分配之不均，政治社會之不平等，也沒有不隨之而發生者。在這種情形下的國家，其人民是無足輕重的了；他們在政治上沒有發言權，對於他們自己所創立之工業，財富沒有管理權。其唯

一事業乃工作；其唯一責任乃服從。因此，養成他們一種膽怯及奴隸性的服從習慣，在歷史上我們可以常見得到的，因為這是一件無可置疑的事實。他們編年史裏並沒有反對他們底統治者，及階級戰爭、民衆變叛或較大的黨亂作亂等記載。在這個豐饒而膏腴的國家裏，固然也會有過許多的變遷，但各種變遷都是局限於上層社會，而無與於下層，民主底成分總是缺少的。有許多貴族之間及朝代更易的戰爭，有政府底變亂，宮庭裏底騷動，王位底爭奪，但沒有人民底革命（註三八）沒有減輕自然所賜與的艱苦。直至文化蔚起歐洲，纔有其他的自然定律起而活動，生出其他的結果來。在歐洲纔有平等的步驟，纔有財富與權力之不均狀態底糾正。這種不均曾造成許多古代大國之主要弱點的事物之在文化上有地位者，大都起源於歐洲，這實是當然的結果；因為祇有歐洲纔有保持各部平均關係的嘗試。祇有歐洲纔有計劃地組織社會；計劃規模雖不甚大，但亦足包括其所有的各階級；因此每一階級都有發展的機會，而同時因以達到全體底永固及進步。

其他限於歐洲底自然特徵怎樣地促進歐洲底進化而減少其迷信，將在本章底後段有所闡述；但此種研究尚需引用其他新的定律；所以現在第一步，應先完成當前的探討；同時我主張先證明應用於印度的理論亦可適用於埃及、墨西哥及秘魯。假如這小小的研討，即能包括亞非、美三洲不同而相去遼遠的國家之特著文化，那麼，可見我們上述的原則更形穩固了；我們也可以得到更充足的證據，用以測驗這些大的定律的正確性，且以免除一般人以為我用狹隘而不完全的材料以附會其說的私見。

在非洲各國中，埃及文明獨顯優越的理由，及其憑藉自然底特徵而超邁其他鄰國之故，皆見上述；國內底財

富因而增進加速，非惟供給大量特產，且使知識階級利其暇日及機會廣拓其知識之圍。不過他們雖擁有這得天獨厚的利益，卻沒有什麼重大的建樹；其中因果乃因某種環境使之然，關於這點下述將有詳細的解說；但最低限度，我們尚不得不承認，他們固已遠邁於非洲各民族了。

埃及底文化與印度同，以土地底肥沃爲其因素，且其氣候亦酷熱，所以兩國也具有同樣的定律；同得同樣的結果。兩國底固有食料都賤而豐；因此，工作市場充斥；因此，財富與權力之分配懸殊；因此，這種不平等產生許多不可避免的結果。這種情形怎樣地在印度發生作用，已見上述；雖然埃及給我們的研究材料不若印度豐富，但也是證明兩國文化底類似點及支配兩國社會與政治進步程序之大原則底相同性。

假如我們考查古代埃及及人民底種種主要情況，實如印度底副本一樣。因第一點，亞洲富饒地域之通常食料爲米，非洲則爲稷實。從底格拉斯河（Tigris River）西至大西洋，鄉村中都可以找到稷樹底踪跡；（註三九）它供給阿拉伯數百萬人民底日常食料。（註四〇）且幾概括赤道以北之全部非洲。在遼廣之非洲荒漠上，實有許多部分是果樹無法生長的所在；但土地尚宜於一種較堅實的植物，故稷實大量繁生，在撒哈拉（Sahara）以北，供人食用以外，亦爲飼養家畜底唯一糧秣。（註四一）又在埃及，稷樹是非常廉賤的植物，（註四二）在極早期因其繁殖之多，早已用以供飼養重致遠的駱駝了。

從這些事實看來，若將埃及代表非洲、印度代表亞洲底最高文化，則稷實之在前一種文化底地位，都顯然與米之於後一種文化同。又因而可觀察到，凡在米方面所表現出來的自然底重要特點也可在稷實方面找尋出來。

至講到化學方面，那麼，二者都含有營養底主要成分；印度植物中所含的澱粉質不過轉為埃及底糖質罷了。說到氣候底定律，它們彼此底相近更無待言；因為樓實和米固同屬熱帶地方底產物，且大都繁生於赤道一帶的。關於繁殖及其對於土地之關係底定律，則二者亦極為相類；因樓實和米一樣地不需煩苦的勞作而可得最大收穫，且其所供給之營養料遠過於其所佔的土地之所能產，有時一畝地竟可栽植二百株以上的樓樹。（註四三）

兩個不同的國家所得自然之影響，其相類有如此。同時，在埃及或印度土地肥沃的地帶總是文化形成的先驅；故土地底饒裕既可支配財富創立底速度，而食料底豐富又可支配財富分配底比率。埃及及最富饒之區是薩伊德（Said）而就在這裏，我們可以找到技藝及知識之偉大表現，和底比斯（Thebes）、卡那克（Carnac）、盧克索（Luxor）、頓得拉（Dendera）和愛特福（Edfou）底遺蹟。（註四四）且在薩伊德這地方——或常稱西倍伊德（Thebaid）——還盛行一種食料，其繁殖較米及樓實為尤速。這就是玉蜀黍，最近以前是祇限種於上埃及，它底生產力這般驚人；工作者在玉蜀黍幾可得二百四十倍的收穫。（註四五）從前在下埃及，玉蜀黍這一種植物是沒有人知道的；但那地方底人除樓實以外，也有用尼羅河肥壤所盛產的蓮實作成一種食料。這一定是很便宜而易得的食料；和這種食料混合在一起的還有其他植物和草本植物，這些大概都是埃及人特以為生的。其供給如是裕如，故在回教侵入時，僅阿雷桑德利阿一城（City of Alexandria）幾有四千人從事於販售蔬菜的小買賣。

因國有食料之豐富，結果發生許多事件，和印度如出一轍。普通在非洲，人口之增加雖然一方受氣候之激勵，但在他方也受土地瘦瘠的阻撓的。但這種阻撓絕對不存在於尼羅河兩岸，（註四六）故以前所說的定律即大施作

用。因這些定律之作用，埃及人非但享有賤廉的食料，且需要較少量的食料；因這種雙重的關係，就展越了其人口增進的限制了。同時，低級人民容易養育其子女，因溫度高可以省去許多其他的費用；因熱度強烈，成年人所需的衣服是極簡少的，至於工人階級底兒童那簡直是裸體了；比之寒帶國裏，必須保持相當溫度及需要溫暖而價格較昂貴的衣服底情形適成相反。代俄多拉斯（Diodorus Siculus）在十九世紀時游歷埃及，曾說在埃及及養育一個小孩以至成人，所費不過二十希臘銀幣，幾乎不到十三個先令；他以為這種情形就是該國人口蕃殖的原因。

綜合以上而言，埃及人民所以蕃殖是因土地增加其供給，而氣候減少其需要的原故。結果，埃及人民非惟較任何非洲底國度為稠密，且較任何古代國家為甚。我們對於這一方面底知識雖然尚屬簡陋，可是已得的材料卻都是很確鑿的。黑羅多塔斯（Herodotus）——對他研究愈深，愈知他底精密——說（註四七）在阿米斯（Ariasis）據說有二萬個人烟稠密的城。這也許是言過其實；但代俄多拉斯忌嫉黑羅多塔斯盛名之心常使其反揭其說的；他在後於黑羅多塔斯四世紀遊歷埃及時，在這重要的一點卻也證實了黑羅多塔斯底敘述。他不但說埃及在那時是所有國中住民最稠密的，且根據當時的重要紀錄說埃及以前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國家，稠密地域幾有一萬八千城以上。

這兩個古代作家是靠着個人見聞而研究埃及情形（註四八）他們底證據比較有價值些，因各人所得的材料來源不同；黑羅多塔斯底材料完全得於美姆非斯（Memphis），代俄多拉斯則得於底比斯。兩方底敘述無論如何懸殊，其於人口增加之繁速及人民墮於奴隸之情形其見解實同。確實的，即就所遺存的耗費大而工程奇偉的房

顯而易見，已可推斷證明國家當日建設底情形了。與築這般輝煌（註四九）而無濟實用的（註五〇）建築物，也可見統治者之施暴政，人民之必迫爲奴隸。假若人民是自由的工作者，所得爲公平的工作報酬，那麼，無論有如何累積的財富，如何奢糜的用途也斷不能作這種無益的消費。但在埃及和印度卻決不計及此，因爲每件事都是要取悅於上等社會而壓迫下級的，在兩種階級之間有一種極遼闊而不可逾越的鴻溝。（註五一）設使工人階級中有欲改變他底職業，而顯露其對於政治發生注意的，就要受重刑；除了國王、教士或軍人外，無論農夫、工匠或任何人都不能佔有土地。大多數的人民是和勞力負重的獸類相去不遠；所希望於他們的就是不偷懶，無報酬的工作。萬一怠忽了工作，那就痛鞭立下了；同樣的刑罰平時也會施之於家僕和婦女。這些刑制他們都非常明瞭；而且對於這種以專制爲基礎而祇靠暴虐爲維持的社會制度處之甚慣。因此，在舉傾國之力而人民受惠極有限的情形下，是可以與築這種偉麗的大廈無疑；這種大廈，淺薄的觀察者每崇爲文化底表徵，其實就是腐敗與不康健之各種情形的混合證據；在這種情狀裏，不完整的文明底技巧與藝術，實破壞了人民無量數的幸福；所以人民在淫威壓迫下，辛苦艱難所建樹的東西，反爲危害自身的因素。

在這種社會裏，說是有甚麼顧恤人民痛苦的地方，實在不必妄想了。但我們試回想埃及上等階級之糜費人民工作及生命，毫不顧及利害的妄舉也實在可以駭歎！關於這一點，祇要看那屹立而無可匹敵的墓碑就可證實了。據說從埃利方泰尼（Elephantine）搬運一塊石到塞伊斯（Sais）卻需三年的時間，二千的工人；僅一紅海運河已需埃羅十二萬埃及人民底生命了；造一個金字塔需要三十六萬人民，二十年的工作；我們對於這種難以蓋

價的糜費也有相當的概念了。

我們若由亞非兩洲底歷史再掉轉頭來看看新大陸，那麼，對於以上的見解又有了新的證明。當歐洲人未到美洲之先，較為開化的地方是墨西哥和秘魯；或者再加上從墨西哥之南直伸至巴拿馬地峽底一狹長地帶。在後一帶地方，即今所謂中美，那裏底居民受土地肥饒之賜似已獲有相當的知識；因為遺蹟尚存，可證明那時的人會擅有機械及建築之技藝，遠非完全野蠻民族所能有的。（註五）舍此以外，他們底歷史委實已經湮沒無聞；但我們根據科班（Copan）、巴蘭開（Palenque）、烏斯馬爾（Uxmal）等建築底敘述大可證明中美為某一種文化底古發源地，且含有類似印度及埃及各種之文化重要點；這就是說，財富及權力分配不均及大部人民流為奴役是相同的。

雖然關於考察中美以前情形之史實已經完全消失，但屬於墨西哥及秘魯者猶得倖存。現在尚有許多確鑿的史料可賴以為探討這兩國古代情形及其文化之性質和傳佈之資。但在未探究這題材以前，應先指明那幾種物質定律是決定美洲文化底地域的；換言之，就是何以某幾種國家，其社會單獨地有固定及緊密的組織，而新大陸底其他部分，卻仍停滯而為散漫而鄙野無知的蠻族呢？這種探討當然非常有趣，因那更可證實自然力支配人類命運的超絕而不可抵禦的力量。

第一種情形使我們驚奇的，就是美洲和亞洲、非洲一樣，文化都是發源於熱帶國；秘魯國全部都在南熱帶上，中美和墨西哥全部則在北熱帶上。氣候怎樣地影響到印度及埃及底社會政治設施，上面已有述及，且我相信亦

已證明其結果乃減少人民底慾望及需要，而產生財富及權力之不公平分配。但此外還有另一趨勢，使一國底平均溫度左右其文化，這種論究，我現在即付討論，因在美洲所取之例證較任何地方為清晰而明白。在新大陸，自然作用之範圍遠優於舊大陸，其作用力亦遠勝之，同時，自然作用力對人類影響較烈的國家比之作用力較弱者在研究上為尤生效果。

若讀者能記憶豐饒之國有食料所生之強烈影響，必易明瞭美洲文化，因受自然現象之驅迫，是必然地限於發現新大陸者所尋覓的數部地域了。因為除土壤之化學及地質上的變化外，凡調整每國之土地肥沃的兩條件，就是熱與濕潤。熱與濕潤充盈則土地饒裕；反之，則瘠磽。這種準則之應用當然不概括其他絕不相關的自然情形所發生的例外，但若各方情形相等，則此準則之作用是永不變的。且「加等溫線」(Isothermal Lines)之發明，有助於我們對於地理植物學之知識，因此使我們能定上一點為自然之定律，此不但從植物生理學所得的論據可以證明，且從各國植物之分配比率上的精密研究亦可論定之。

對於美洲大陸下一普遍的考察，即可表明這定律和現在所研究之題材的關係。第一以濕潤而言，新大陸之大河流都集中東海岸，沒有在西岸的。這種異狀底原因還沒有研究出來（廿五三）但南北美洲確沒有一重要的河流灌注入於太平洋；而在其他一面則有無數闊大而重要的河流如內格羅河(Negro)、拉·普拉塔河(La Plata)、聖·佛蘭西斯科河(San Francisco)、亞馬孫河(Amazon)、俄利諾科河(Orinoco)、密士失必河(Mississippi)、阿拉巴馬河(Alabama)、聖·約翰河(Saint John)、波托馬克河(Potomac)、薩斯奎那那河(Susquehanna)、

得拉韋爾河 (Delaware)、哈得孫河 (Hudson) 和聖·勞務斯河 (Saint Lawrence) 這個大的水網使向東的土地常常得到灌溉。(註五四) 但向着西面的，在北美祇有一條有價值的河流，就是俄勒岡河 (Oregon)。(註五五) 至於南美，從巴拿馬地峽以至麥哲倫海峽更沒有一條大河了。

至講到土地肥饒其他主要原因——即熱力——我們在北美卻發現相反的一切情形。即東面受灌溉，而熱卻在西方。這兩岸底溫度差異恐怕和幾個重要的氣象定律有關；因為在整個北半球，大陸底東部和島嶼都較西部為寒冷。可是無論其屬於一個廣汎的原因，或各有其特殊原因，都是現在的知識所不能決定；但事實顯然，其對於美洲之早期歷史是很可注意的。因上面差異的結果，兩種土地肥饒的情況從未在墨西哥以北的大陸任何一部發生連結的關係。一面的區域需要熱；其他一面則需要灌溉。財富之積聚因此阻滯，而社會進步亦因而停止；除非直至十六世紀歐洲文化輸入美洲以後，沒有一例可以顯示緯度二十度以北的民族達到印度及埃及居民所輕易獲得的不完全的文化。(註五六) 在另一方面呢，緯度二十度以南的大陸忽變易其方式，緊縮而成一狹帶的土地，直展至巴拿馬地峽為止。這狹小的區域就是墨西哥文化底中心；若以此和以上的論據相比較，那麼，其所以然便易知曉了；因陸地之特殊形狀加增其海岸線，使北美之南部含有島嶼的性質。因此發生一種海島氣候，即濕潤之充盈，此種濕潤乃由海水之蒸發而來的。(註五七) 故近赤道之墨西哥，就地位言，則充滿熱量，就地形言，則易得潮濕；祇有在這一部分的北美，兩種不同的情況——即熱與潮濕——是結合在一起了，恐怕也祇有這一部是有文化的。無疑的，假如加利福尼亞和南哥倫比亞底沙磧平原不是這樣瘠磽，而受東方河流底灌溉，或東方之河

流兼有西方之熱量，則任何兩種結合之結果都必形成豐饒之土地，而這種土地由世界史確實證明，都是任何早期文化底前驅，但既然這兩種肥饒之原素在緯度二十度以北之美洲各部不能兼有，則可知除非此兩線有過交通，否則文化決不能因以發展；且亦從沒發見——我以為也決不會發見——一個證據可以證明在此大陸上有一古民族能於生活之藝術上得到多大的進步，或組成固定而永久的社會。

以上都是講到關於支配北美早期命運底自然主動力。至於南美，則另有一種情況在活動着；因東海岸較寒於西海岸的那個定律，非但不適用於南半球，且恰代以另一相反的定律。赤道以北是東面寒於西面；赤道以南，卻是東面熱於西面。（註五八）我們若基於這種現象以與大河系統之所以判別美洲東、西部底情形相比觀，那麼，南美兼有熱與濕潤，而是北美所缺乏的便顯然了。結果是南美之東部土地異常肥沃，非惟在熱帶以內，即在以外也這樣；巴西底南部以至於烏拉圭一部，其所佔有的肥饒，實非同緯度的北美任何區域所能夢及的。

把上述的情形綜覽一過，便會想到南美底東部既受自然底厚賜，必成爲文化發源地之一——即因自然（註五九）之厚賜所產生的文化之一。但如果再加以觀察，又會發見自然之關係並不止此，我們必須對於第三種大的主動力加以注意；這種主動力已足夠消滅其他兩種的自然結果而使其居民仍處於野蠻之狀態，否則必成爲新大陸各國中之最繁盛的區域了。

我所說的主動力就是「貿易風」；這是個可驚的現象，我們以後將可看到，各種先於歐洲底文化都大受其損害。這種風幾遍於緯度五十六度的區域；——赤道以北二十八度及赤道以南二十八度。（註六〇）在這個包有世

界最富饒的地帶中，貿易風經年吹括，或由東北或從東南。(註六)這種有規律性的吹括原因現在已經明白了，且知道一部分是因赤道上空氣之轉移，一部分是因地球之轉動；因由兩極來之冷空氣是永常地吹向赤道，因此在北半球產生北風，南半球則為南風。但這種風卻因地球之運動——環繞其軸由西向東而轉——而偏向。又地球之轉動，在赤道方向當然較任何處為迅速，因此赤道四週之速率遠越於由兩極來的大氣底運動，強逼其吹向另一方向而成為東氣流，亦即我們所謂的貿易風。我們現在所注意的，並非貿易風底解說，卻是怎樣敘述這偉大的自然現象與南美歷史底關係。

貿易風吹向南美底東岸，繼續由東方吹經大西洋而達充溢水蒸氣的陸地。這種水蒸氣積聚於風向線，及其達岸，則有時凝結而成雨；可是當其向西進行時，被阻於峻巍之安第斯山脈 (Andes) 而不能通過，於是傾其所有水氣於巴西；結果，巴西常傾瀉着陣頭的大雨。這種充分的雨水，加上美洲東部之特殊的河流系統，而又附以熱量使其土壤底活力作用遠非世界其他部分所能比擬。(註六)巴西底面積幾等於歐洲全部，佈滿著偉岸而茂盛的植物。其生長那般繁密而蓬勃，自然似乎是放恣地行使其權力。於是這個大國底大部分佈滿了稠密而綿互的森林，那些高大的樹，瑰豔絕倫地怒展着，表露着千條萬縷偉麗的彩色，而不斷地爆發其豐盛的出產。樹頂上棲止着翩翩輝煌的好鳥，它們築巢於鬱翠而高危的濃陰深處。下面的根幹處叢生着灌木，蔓延草和無數的寄生物全部活躍着生命。還有種類萬千的昆蟲類；奇形的爬蟲動物；點綴着絕美的花紋底蛇與蜥蜴；通通在自然底大工場和倉庫裏找到生存的途徑。這奇異的地方，什麼都不缺乏，故森林之外是圍繞着大的草場，因熱與水氣之蒸發，可營

變無數靠章爲生的畜類；至於附近的平原，富於另一種生活方式的，卻是狡詐兇猛的獸類底棲息所，它們彼此掠奪，似乎人力沒有力量可以制止的了。

這就是巴西駕於世界他國之上的豐盛及盈溢的生活（註六三）但是在自然這樣的光輝和華盛當中，反沒有人類底地位。他們是被周圍的威嚴降迫而爲渺小了。反對他們的力量是這樣大，他們從不能自動地反抗，也從未能集合着抵禦自然積聚的壓力。整個巴西，雖屬得天獨厚，卻常是保持着不開化的狀態；這些遊浪的野蠻居民不能抵禦自然底豐厚所賜予的阻礙。因這些土著，像原始社會底民族一樣，厭惡去經營事業；又因不知道征服自然的技巧，故從不設法去解決阻止社會進步的困難。這些困難是這般嚴重，事實上，在三百餘年以來，以歐洲人底知識技能力之大猶不足以當廓清之任。在巴西沿岸昔日固曾輸入了相當的歐洲文化，這是土著之力所不能及的。但這種自身尚不完備的文化從未透入該國底腹部；在內地仍舊保留着許多古代的風習。人民愚昧，粗暴成性，不知自制，更不諳法律，而繼續生活於原有的野蠻狀態。在他們底國裏，這些自然定律是這般傾其力以經營活動在這廣闊無垠的大地，所以農人自來就覺得這種集合的活動底影響是無可逃避的。農業底進步是被層密的森林阻止了，收穫也被無量數的昆蟲毀壞了。（註六四）山嶺過高而不能攀登，河流過闊而不易架橋；這些現象都計劃着遮斷人們底思想而抑止其勃起的野心。這就是自然能力桎梏着人類底精神了。真是沒有一處有這般威風的自熱界和渺小的內心底痛苦困頓底情形啊！且人類底思想，因這種情勢懸絕的威嚇，不但沒法進步，且假使沒有外力底援助，必終致當然地退縮的。因爲即在現在，由歐洲不絕地輸入了許多改進的方法，還未有顯著進步的表徵；

殖民雖日見增加，而已墾之地尙未達五分之一。人民底習慣，其野蠻一如往日；至於人口呢，倒是值得注意的，以巴西物質原料之豐盛，動植物之富裕，土地受大河灌溉之利，海岸佈滿着良港——這超過法國十二倍以上的廣大的土地，而其人口卻不到六百萬。

以上的審察已足夠表明何以巴西絕無文化表徵底理由了；自開國以來，任何時期中，都找不到一件事實可以證明其人民有超乎草莽初闢時的進步表現。但反觀巴西對面的一國，雖然處於同一洲，同一緯度上，卻受着不同的物質情況底支配，因此產生不同的社會結果。這就是有名的祕魯王國。它包括南熱帶底全部；若按以上的敘述看來，實可算是南美唯一的向着文化領域進行的一部了。在巴西，氣候底熱度附加着雙重的灌溉，一是由於東方特有的大河流系統；二是由於貿易風所吹積的水氣。這幾種情形的結合形成了無可比擬的沃腴；從人類方面着想，這種沃腴反致斲傷人類底前途，因為富饒會遏止了人類底進步，如果不是這般富裕，那麼，情形或許會較好些。因我們已很明瞭，凡自然生產力超過某一限度時，不開化的人類底不完備的知識是不能與之競爭的，且亦無法克勝之而爲我利用。但假如自然力僅達到相當的充溢，使人類可發揮其駕馭的能力，則必然發生亞洲及非洲底同樣情況；那麼，那時自然底豐饒非但不會障害社會底進步，且反鼓勵財富之積聚以推進之，蓋沒有積聚的財富，社會底進步即失其動力。

所以當我們推想到最初決定文化之物質環境時，不但需要自然底豐富，且亦須顧及所謂自然底駕馭；就是說：我們估計天產底數量時，同時也須顧及怎樣利用此等原料。在墨西哥和祕魯，我們可以考見它們是美洲國家

中唯一能具這兩種條件的民族。它們底天產數量雖然遠遠遜於巴西，可是比較容易處置得多；同時氣候底熱度引起了其他定律之活動，——這些活動我會試加說明，上古各種文化皆曾大受其影響。最奇怪的是關於緯度方面——這我相信從未有人察覺到的——現在秘魯底南方邊界就是墨西哥舊時之邊境；還有一件奇怪的暗合的事——在我卻以為爲是很自然的——就是這兩國底邊界都在熱帶以內；墨西哥底邊界是北緯度二十一度，秘魯是南緯度二十一度半。（註六五）

這就是歷史經過精選的研討以後，所呈現於我們眼前的奇異的規律性。假如我們拿墨西哥和秘魯同上面曾提過的舊大陸國家相比較，那麼，其社會現象着實和歐洲文化以前的情形一樣，都是附屬於自然定律的。第一點，其國有食料所具有之特質，恰和亞非兩洲之最富饒地域相同。雖然舊大陸底營養植物不甚見於新大陸中，可是新大陸中卻有另一種植物底供給，其功用和米、稷實極相類；就是說，有同樣的豐盛，同樣地易於生長，同樣地有大量的收穫；因此隨着有同樣的社會結果。在墨西哥和秘魯，通常最重要的食料是玉蜀黍，我們有許多理由可以相信這是美洲底特產。這和米、稷實一樣，顯然是熱帶國底出產；雖然據說在拔海七千尺還能栽種（註六六）可是在緯度四十度的地方已很少見，且其豐盛亦因溫度之低落而遞減。譬如，在新加利福尼亞平均收成是七十或八十倍；但在墨西哥本部，同樣的穀類可有三、四百倍的收成，且收成好的時候，尙可有八百倍的收成。

凡民族能得格外豐盛之植物以維持生活者，無須十分努力於生活底掙紮，同時有充分之機會增加其人口而產生如上述印度、埃及之同樣的種種社會及政治的狀況。又玉蜀黍以外，還有一種食料也可以作爲例證。就是

在愛爾蘭曾激增人口而發生惡影響的馬鈴薯，據說也是秘魯底土產；這一點雖然曾給某名家所反駁，但事實上，書秘魯第一次被歐洲人發見時，馬鈴薯確是非常蕃植。在墨西哥，則直至西班牙人侵入後，纔有馬鈴薯；但墨西哥人和秘魯人大半恃香蕉而維持其生活；香蕉之蕃植力這般驚人，祇有我們所有的確實而不可搖動的證據方可令人深信不疑的。這種奇特的植物在美洲是和氣候底自然定律有密切之關係；因當溫度達至某一點時，它就是維持生活之主要食料。至於其營養力，我們可以說，一畝的香蕉可以供養五十餘人；但在歐洲，同樣大小的地，種着麥祇能供養兩個人。至其生長之繁盛，如果沒有其他例外的原故，那麼，其生產力實四十四倍於馬鈴薯，而一百三十三倍於麥。

現在根據各種重要觀點看起來，很容易明白爲什麼墨西哥、秘魯底文化和印度、埃及底是極端相似了。在這四國及其他幾個南亞、中美底國家裏，曾保有相當的知識；這些知識若以歐洲底標準看起來，當然非常簡陋，但以之與同時代或鄰近的國家底愚昧比較一下，實在是非常超卓。但在這幾國內，同樣的沒有能力將其所有之簡陋文化傳佈出去；也沒有一些近乎民主精神的表現；上等階級同樣地有專制的權力，而下等階級也同樣地被輕蔑奴視。因我們已很清楚地看到，這些文化是受某幾種自然定律底影響；這些定律雖然有補於財富之積聚，但無助於財富之分配。又人類之知識仍在幼稚時代，註六七絕無能力可以抵禦這些自然主動力，或阻止其影響於社會之組織，像我在上面所曾討論過的。在墨西哥和秘魯，合乎富人奢侈的各種藝術都有大的成就。上級人家底房屋內部佈滿着令人驚羨的精美的裝飾品和用具；他們底臥室內掛着華美的垂簾；他們底衣服和身上底裝飾品價

值連城；他們底珠寶精美而樣式新奇；他們底富麗而瀟灑的長袍鑲着由全國最僻處收集得來的珍貴羽毛；以上都是佔有無限財富與浪費誇耀財富之證據。至直屬於這階級之下的是一般平民；他們底情形怎樣，是很容易猜想得到的。祇魯底全部賦稅都由他們負擔；而貴族和教士可完全豁免支付。（註六八）但在這種社會情形中，人民財富之積聚是不可能的，故祇有直接受政府之支配以工作代替支付政府底費用。同時，治國者卻深知在這種制度下，各個人底獨立的情感是難以抵敵的，於是繩以苛律，使極少的事件也不能有自由的行動。甚至平民如果未得管理者底許可，簡直不得私自更衣或遷居。法律規定了每人底職業，所穿的服式，所娶的妻子及所宜有的娛樂。（註六九）在墨西哥，這種事情也是同樣的；同樣的物質情狀隨着發生同樣的社會結果。凡歷史研討所及而視爲最重要特點即所謂人民之情狀者，這兩國是符合的。因雖有許多小小的差異（註七〇）但國內祇有兩種階級——上等階級乃專暴者，下等階級乃奴隸——這一點是很相同的。這就是墨西哥被歐洲人發見時底情狀，且此種趨勢必已有相當的歷史了。像這樣的社會情形實在使人難於忍受下去，我們從確鑿的證據上知道：人民中所產生之一切怨恨心實是助長西班牙侵入者底進步，而促成墨西哥淪亡之一原因。

研究愈深，那麼，所謂「人類思想之歐洲期」底以前各種文化底相同點愈覺顯著。將民族分爲數等級制，這雖在歐洲各大國是不可能的；但在埃及、印度——而在波斯爲尤著，此蓋均由來已古矣。（註七一）這種制度在秘魯是很認真地施行着；墨西哥雖然沒有法律規定，可是習俗相傳，兒子是必須繼續父親底職業，由此可證實當時的社會確有相同之點了。這就是固定及保守精神的政治表徵，我們以後可以看到凡上等階級專權的國家都表

現着這種精神。在宗教方面，這種精神也表露着對古代遺教極度崇敬，而對一切的變改深惡痛絕；關於這一點，美國底最著名著作家也曾指出墨西哥與印度斯坦土著也有類似之處。說到這裏，不禁想起研究古埃及史底人也總發見埃及人有同一的傾向。對於埃及墓碑最有研究的惠更生（Wilkinson），說他們那不願改變其固有宗教信仰之固執性，實較任何民族爲甚；（註七三）當黑羅多塔斯在二千三百年前遊歷埃及時，因看到他們對舊風俗保守之拗執，即早已確定他們永不會有易俗移風的可能了。由另一種眼光看起來，這幾個距離遼遠的國家，乃有這般的同樣點，實也同等地富於趣味，但它們本由同樣的原因發生出來的。在墨西哥和祕魯，下等階級既完全受上等階級的支配，故也有同樣的可怕的工作底浪費，和我們在埃及及所見者同；而在亞洲各處兀存的古廟、荒廢底遺蹟，也可以看出同樣的事證。墨西哥人和祕魯人也同樣地有恢宏偉麗的屋宇建造出來，且其浪費無聊一似埃及，但這種建設的成就，除非人民底工作受到不公平的報酬和暴虐的濫用，決不易辦到。（註七三）這些奢華的紀念物，其價值如何，無可估計；但其所費必極可驚；如美洲土人本來不知鐵底應用，那麼，在建築大工程時，也必不知應用方法以減少工作量。現有幾點特殊的史實可以對於這問題稍窺一斑。且舉帝王底宮室爲例：我們發見在祕魯皇宮底建築曾在五十年中役使二萬人；墨西哥底則達二十萬人；這種驚人的史實，即使沒有其他的證據，已足使我明瞭這幾國——爲極不重要的事而費去極大的力量——底情形。（註七四）

以上從各種無可置疑的確實的來源裏所集得的事證，可以證明這些偉大自然定律底力量。這種定律在歐洲以外的繁盛的國家裏，鼓勵了財富底積聚，但抑止了它底分配；因此，使上等階級獨佔社會及政治權力之最重

要的一種原素。結果，在各種不同的文化當中，大部人民大都不能由國家底改進中得到利益；因此進步底基礎是非常狹隘而進步之本身亦不甚穩固。（註七五）及至受到外力攻擊，則全部制度隨之瓦解了。在這種彼此分裂，相敵視的國家裏，社會是站不住的。且無疑的，在社會傾覆實現以前，這種偏僻而不合規的文化已開始衰敗了；故他們自己底退化，即助長着外力侵入者底進步，而淺陋古王國於傾覆，假如有較優良的制度存在，這些古國或許還能引延其國祚的。

以上所述，皆在表明歐洲以外的文化怎樣因特殊的食料、氣候和土壤底關係而蒙其影響。現在讓我考查其他的自然主動力——即我所統稱之爲「自然現狀」者——底影響；這些自然現狀啓發着許多廣闊的研究，以深察外界促成的人類之某幾種思想習慣所發生的宗教、藝術及文學底特殊風派——總言之，各種人類思想之主要表現——底影響。若要確實知道這種情形怎樣發生，還須對以上已結束的研討加以補白。我們已知氣候、食料和土壤完全是和財富之積聚和分配有關，故現在也可看到自然現狀是和思想之集成和分佈有關的。在前一情形中，我們須研究人類底物質關係；在後一情形則爲人類底智力關係。前一種我已竭力予以分析，這恐怕已傾盡了現在所有的知識以供研究了。（註七六）但其他一種，即自然現狀與人類思想底關係，卻包含這般廣闊的考慮，需要從各方面得來的這般衆多的材料，我已能預料其結果了；不用說，我並不求完備無遺的分析，且除將幾種複雜而未經探討過的過程綜合而爲定律——這些定律底作用，外界曾因而影響了人類思想，侵害其自然的行動，而常阻止其自然的進步者——以外也沒有甚麼希冀。

在這種意義上，自然現狀可分爲兩類：第一類，就是那些激動了想像的現狀；第二類，爲引起理解力或智慧之邏輯底運用。雖然在一個完滿及平衡的意念裏，想像和理解力各有其相等的作用，且彼此能相補助，但根據大多數的向例，理解力每過於薄弱，不能約束想像而挽回其危險的狂瀾。進步的文化趨勢就是要補救這種不平均，而授予推理力以一種早期社會中想像所獨有的權力。是否有理由要恐懼這種反動將進行過度而推理機能反將壓制想像，卻是一個極富於興趣的問題；可是在現在的知識範圍內，這問題恐怕不易於解決。不過，可以確定，這種情形未曾發生過；因爲，即使在現代，想像較以前任何時代爲受抑制的時候，仍有着過分的力量；這不但很容易地拿各國人民中普通所流行的迷信來證實，且還可以引神祕的崇古觀念這一點作佐證，這種崇古的心理雖然逐漸減退，但仍阻止着知識階級底獨立精神，迷惑其判斷，而拘束其創造力。

現在以自然現象來說，很顯然的，凡能激起恐懼或驚愕的感覺，及引起心中之空泛不能制止的觀念者，也有燃起想像之特別趨向，而使理解之作用在其範圍中漸趨遲緩。在這種情形中，人把自身與自然之權力及尊嚴相比較，於是便很痛苦地感其自身之渺小。一種劣等性的感覺潛蓋着他。各方面有無數的阻礙牽制着他，而限制他個人底意志。他底心受不可了解的，及難以解釋的恐嚇，於是不再去深究這種嚴肅的偉大中所包含的實際了。（註七七）反過來說，在自然作用淺小而微弱的地方，人反得有自信心。他似乎較能倚靠他自己底力量；他能夠——事實上——一往無前，向各方面發揮他底權力。假如現象越接近他，那麼，使他更爲易於對現象得到實驗及精細的觀察；考究及分析的精神得着激勵，他且嘗試着要綜合自然底現象而納之於定律。

若以人類思想受自然現狀底影響一點看起來，各偉大的古代文化都無疑地發源於熱帶或鄰近熱帶的地方；這些地方底現狀是最威嚴、最可怕，而自然在各方面都是於人有危害的。普通在亞洲、非洲及美洲外界是較歐洲爲可怕。但固定及永久的現象如峯巒及其他劃分疆界的高山大河等是這樣，即偶然的現象如地震、颶風、大風雨及疫癘等，也會在這些地方常時發生非常災害。這種永常而嚴重的危險所產生的影響，和自然之威力所產生者同，即兩方有促進人類增加想像力活動之趨勢。因爲想像底特殊範圍內所關涉的，既屬人類未知的事物，那麼，凡事未得到解釋，及關重要者皆能激起想像底機能。在熱帶，這種事件較任何地方爲多；故在熱帶，想像實較占優勢。舉幾個這種原理底作用底例，就可瞭然明悟，而給讀者以根據這一點而發生的證據。

加增人類不安全的各種自然現象中，地震，以其影響於生命之喪失及其發生之突如其來而言，確是最嚴重的。在地震以前，大氣之變動，確能立即襲擊人底神經系，而直接地損傷智力底運用。無論如何，地震所產生之影響，會激起思想底特殊聯系及習慣是無疑的。它們所引起的恐懼，激起痛苦的想像，迷亂判斷力，而使人偏向於迷信的幻想。最奇怪的，是地震底一再震動，也非但不會麻木人們底感覺，且有加強感覺的力量。在秘魯，地震較任何國爲普通（註七八）；每一次底發生都增加一般的憂鬱；故有時恐懼之情幾至不可支柱（註七九）；於是心情常常陷於最佳而焦慮的情形中；人們見到這些不可避免及難以瞭解的嚴重危險，每深印着自己能力薄弱，及方法應付之竭盡的觀念（註八〇）；於是相等比量的想像被引起，而神力干涉之信仰亦因以很活動地增進。人底力量失敗，而超人的力量成立了；不可思議的，及不能看見的事物於是給人們相信是存在着的；更因而發生一種畏懼及無告的感

覺，這就是各種迷信之根基，缺此，則迷信決不能存在。

在這種自然現象較少的歐洲，也可舉幾個例。在意大利及西班牙、葡萄牙底半島上，地震及火山底爆發較任何大國普遍而有害；也恰巧正在這裏迷信最流行，而迷信者階級也最有勢力。就在這幾國內，教士們開始建立他們底權力，基督教最腐化的事情每在這裏發生，而迷信壁壘所霸佔的時間也最長。除此以外，還有一點可以表明自然現象和想像佔優勢的關係。照普通說起來，藝術恆認為近乎想像，而科學則近於智慧。（註八二）試看所有的偉大的畫家，幾乎現代歐洲所有的大彫刻家，大多是意大利或西班牙半島所產生，這實是一件彰明較著的事實。至於科學方面，意大利當然也有幾個特出的人才，但和他們底藝術家、詩人比起來，人數卻未免相差太遠了。至於西班牙和葡萄牙底文學則完全是近乎詩方面的。又在他們底學校裏，曾造成幾個世界得未曾有的大畫家。可是在另一方面看來，純推理的機能是完全忽略了；找遍整個的半島，從上古到現在，從未在自然科學史上遺留過豐功偉業的餘烈；沒有一個人的名字可以在歐洲知識進步上獨霸一個時代的。（註八二）

自然現狀當着十分威脅的時候，怎樣地激發想像、鼓動迷信，而阻絕知識這一點，還可以用一二個事實為之證明。在愚陋無識的人民中，有一直接的傾向，即把所有嚴重的危險都歸於超自然的干涉；強烈的宗教情感因以發生，非但屈服於危險之下，且對它發生忠實的崇拜了。這就是在馬拉巴（Malabar）森林中一部分印度人底情形；凡研究野蠻民族底狀況者都能尋出同樣的例出來。確實的，在這樣情形中，有幾國底居民因崇敬長權的感覺，竟不敢損害兇猛的獸類和有毒的爬蟲類；這些獸類所施的禍害，他們色喜相告以為是免災的原因了。（註八三）

熱帶底古代文化就這樣地和無窮的困難相鬭爭，這是歐洲文化興盛的溫帶所沒有感覺到的。蹂躪人類的野獸、大風雨、颶風、地震（註八四）及同樣地發生危險的事情底損害，常常壓迫着他們，而影響其民族性之風格。以爲單是生命之損失，倒是極小的騷擾。真正的禍害卻是在思想中產生一種聯想，這種聯想使想像超越於理解而占優勢；在人民中淺假養成一種崇敬的精神以替代了研究的精神；又助長了一種性情，使易忽略自然原因之研討，而將各種事像之發生歸於超自然作用。

我們對於這些國家所知道的一切，都證實這種傾向必是很活躍的。除極少的例外，健康在熱帶氣候裏較溫帶爲不可靠，而疾病亦較爲普遍。我們常可以很清楚地觀察到熱帶人底畏死，使他們更易傾向於找尋超自然底助力。我們對於另一宇宙生活既屬這般漠然無所知，實無怪乎即以最堅強的心志，乍對此黑暗及漫無經驗之未來底來臨，也要氣短了。在這樣的情況中，理性是完全靜止的；故想像之馳放，遂成不可羈勒。自然原因之作用既然沒有了地位，於是超自然底力量總要開始運用。因此，在任何國家，凡危險性的疾病發生了嚴重的形勢，那麼，每每立即增強了迷信的傾向，而減少理解以推廣想像。這種原則是這般地普遍，所以世界各部底民族常將特殊的險症歸因於神底干涉，這點以那些急病奇症爲尤顯著。在歐洲也常信疫癘是神怒底表現；這種見解雖然早已成爲過去，但在最文明的國家裏也不見得完全消滅的。（註八五）在醫學知識最幼稚或疾病延播最普遍的地方，這種迷信當然是很顛仆不破的。兼有兩種情形的國家則迷信更甚了；即使祇有一種情形存在，而迷信的觀念已極頑強，所以我相信所有的野蠻民族不但將非常的疾病歸因於他們底善惡之神，就算普通的疾病，他們也不能自拔於

超自然底迷信之外。

這裏還有一例表明在古文化時代，外界現象對於人類思想所給與的不良影響。在亞洲最進步的區域裏，其康健狀態因各種自然原因的關係，遠遜於歐洲最文明的區域。（註八六）僅從這個事實看來，已足夠對於民族性（註八七）產生相當的影響，且加以以上我所指出的情形，那麼，當然更甚了。到這裏還可以說，歐洲各時期所發生的大瘟疫，大都是東方所傳來，那裏是它們底產生地，也是受害最嚴重的地方。現在歐洲所有的兇暴的疾症，事實上，幾乎沒有一種是本土所固有；且最利害的疾病皆是在西紀後第一世紀以降自熱帶國傳入爲多。

總括這些事實，可以說在歐洲以外的文化中，所有的自然都是協力地增加想像機能的權勢，而削弱推理的。以現在所有的資料，可以循索這個大定律底最詳盡的結果，及表明歐洲怎樣保有一個極背馳的定律；這種定律，整個講起來，使自然現象傾向於限制想像，而擴展理解；因此感悟人自信他們自身的力量，助進了勇往研討及科學的精神，以引帶其入知識之門。這種精神常時在進化，且將來的進步亦必須靠着它的。

不可以爲這便能够很精細地尋出歐洲文化因以上的特殊點和前於它的文化底巨大懸別。這種工作要另有一種的研究及思想，現在還沒有人有這般造詣；因爲一方既然應有一廣闊而普遍的真理的認識，繼着這真理也必須包羅萬有而能完美地證實以滿足一般讀者。確實的，凡慣於這方面的考慮而能通悟人類歷史者，必能立即明瞭這種複雜的問題所綜合之範圍愈廣，則顯明的例外之機會愈多；且當理論所包含之範圍極大時，例外亦必不可數計，但原理仍保留其絕對的正確的。現在有兩個基本的意見我想表白的是：（一）有某幾種自然現象是

對於人底思想發生作用而激起想像的；(二)這種現象在歐洲以外比較歐洲多得多。如果以上的兩種意見能成立的話，那麼，在這些想像受到刺激的國家裏，特殊的結果——除因受到其他原因而抵消外——必然地因以產生。至有無相對立的原因發生，且不去管，這對於原理之真實毫無關係，因為這種原理是根據剛纔所述的意見的。故從科學的眼光看起來，這種綜合是完全的了；現在與其多加例證，毋寧就此結束，因各種特殊的事實很易受人誤解，且總是不喜歡這種結論而加以證實的人底意見相違反的。但爲使讀者明瞭我所主張的原理起見，這裏最好舉幾個例表明這些原理底真實作用：因此我要簡單地敘述他們對於文學、宗教及藝術三大分類中所產生的結果。在每一類中我還要表明其主要點是怎樣地受自然現狀底影響；又爲欲令這種探討簡單化起見，我更要在某一方面舉兩個顯著的例，並將希臘和印度底思想表現作一個比較；蓋因這兩國底材料最豐富，而自然方面底相反情形亦最顯特。

如果我們研究印度底古代文學——就算在它底最燦爛的時期——我們很能發見想像不可約束的優勢。底最顯著的證據第一點，顯特的事實就是對於散文絕不注意；所有才華豐茂的作家都專心於詩，因爲詩最適合於他們底民族思想習慣。他們對於文法、法律、歷史、醫學、數學、地理及形上學等的見地幾乎都用詩寫的，且照着一定的詩底格局把它們描畫出來。結果，散文著作既全被輕視，詩底藝術乃得到專力的培植，於是梵文乃可自傲其音律之多，而複雜較任何歐洲文化爲甚。(註八八)

特殊的印度文學格式卻帶着特殊的精神。在這種文學裏，每件事物都表現着人底理性的輕視，這話倒並非

是過甚其詞。即使充滿着病態的想像，也是到處地放縱着。在最富於國民性的著作品如拉馬牙那（Ramayana），馬哈巴拉（Mahabharat）和彼拉那（Puranas）等篇都特別地可以看出來。但我們在那極不易含有想像階段的地理及紀年史系統裏，也可發見這種精神。在最有權威的書裏面所敘述的幾個例很足以指出一個與印度完全相反的歐洲思想的比較，且使讀者明白，即在文明國度的人民中，輕信也是很普遍的事。（註八九）

在想像蒙混真理之各情狀中，過分的崇拜過去，是最遺害不淺。這種崇古心理對於理性底每一種真理都有背馳的意向，它不過是詩情的放縱而傾好於迂遠和渺茫的事像罷了。所以這也很自然的，在智慧比較遲鈍的時期，這種詩情當遠較現在為流行；自此以後，它逐漸地繼續減弱，而進步的感覺卻要相等地得勢；故崇拜過去，縱着就是希望將來。但以前這種崇拜心是很利害的，無數的痕跡可以在各國底文字及公共信條中找尋出來。就是這種原故，每每能使詩人感悟着黃金時代底來臨。在這時代，世界是充滿着和平，惡劣的情感是靜止了，罪惡也消失了。也就是這種原故令神學家發生人底原始德行和純樸的觀念及人類墮落的概念。也就是這種同樣的原則流行着一種信仰，以為在古時，人非但性行較佳，治生較樂，且體格亦較強；因此他們能得到較高的身材，及活到較長的年歲，這都不是他們這些弱而退化的子孫所能及到的。

這種意見既由想像而非理解而來，那麼，在任何國家內，這種意見之勢力實可供我們特以為估量想像機能之優勢的標準。將這種試驗應用於印度文學，我們復可在上面的結論上得到顯特的證實。梵文書中所充滿着那往古可驚佩的技巧，是這般冗長而繁雜，即使要替它們作個提要，亦未免要佔據很多的篇幅，但在這些創作中有

一類卻還值得注意，而應予以簡單的敘述的。我是暗指着一非常的時代，並設想以爲人曾經在那時代生存着。那以爲人類在古代能享高壽的觀念，純是那些古人優越於現代人的感覺底自然產品；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幾種基督教底著作及許多希伯來人底著作裏找出證明。但拿這些著作底敘述和印度文學底內涵相比較，那就未免顯得相形見拙了。在這一點，印度人底想像，是超邁於任何民族以上的。因此，有許多同樣的歷史紀錄裏面，我們發見古代普通入底壽命有活到八萬年（註九〇）聖人更活到十萬年以上。固然有些死得早些，有些遲些，但在往古最隆盛的時期，合各種階級統計之，那麼，平均的年齡還是十萬年（註九一）古國王幼底斯撒（Yudhishtar）偶然提及他在位已達二萬七千年（註九二）而又一國王阿拉加（Alarka）也在位六萬六千年（註九三）他們還算是天折的了，因爲有幾個早期詩人竟活到五十萬年（註九四）但最顯著的例卻是一個印度史上最卓越的人，他是個國王和聖人一身兼備的人物。這位才高望重者生活在純潔而尊崇道德的時代裏，而他享祚也很長；因他登王位時已是二百萬歲了，其後在位六百三十萬年；禪讓後，還繼續活了十萬餘年呢（註九五）

對於往古之無限制的崇拜，同樣地使印度人將一切優越的事物都歸美於皇古時期中；他們又常弄出一個簡直使人莫從置信的年日。他們底偉大的法律彙編，米紐法典，分明總是三千年前的著作；但印度底編年史家對這年代的估算還大不滿意而將它歸屬於歐洲明眼人所難以意料的時代。照最有名的印度學者說起來，這些法典是在現世紀以前約二十萬年以前纔顯示給人類的。（註九六）

以上這些不過是好懷遠古，喜歡誇大及漠視現實的一部分的表現，而特別顯著於印度學術界中。非但文字

如此，即在宗教和藝術，這種傾向也非常大。壓制理解，而提高想像力是他們普遍的原則。由他們底神學說，神底性質及廟宇底格式看來，我們很可以看到外界之森嚴及恐嚇在他們思想中是怎樣地充滿着偉大而可怕的印像。他們將這些印像盡力表現使形諸述像，且其民族文化之特點也即導源於此了。

我們對於這方面的見解要因和這對立的希臘情形比較而更明瞭。在希臘，我們會發見一個和印度完全相反的國家。自然底作用在印度是那般的驚人，在希臘就微弱得多，而且對於人的恐嚇性也都沒有那樣利害。在這亞洲文化底大中心所在，人類底能力是被周圍的現象——和他施用恐嚇力一般地——所限制。除熱帶氣候內所有的危險以外，還有巉峻而幾乎高接穹蒼的大山，旁邊放瀉着洋洋大流沒有人力可以轉移它底方向，也沒有橋梁可以架設的。那無路可通的森林，整個區域包繞着茂密的叢木，那蒼涼遼闊的荒漠……這一切，都教人認識自己的渺小，缺乏能力與自然力相抵抗。轉頭再看外而大的海洋，颶風排山撼嶽地激蕩着，遠較歐洲底任何海洋底危害為大。且其氣勢這般疾迅兇烈，簡直是無計與之爭持。在這些區域裏，似乎所有事像都是要牽掣着人底活動，整個海岸線從恆河(Ganga)口到半島之極南端絕無一平安而有用的港口，也沒有一個能夠避風的港塢——而這卻是較世界任何國為需要的。

但在希臘，自然之現狀既是這般地完全相反，生存的情形也就變換了。希臘——像印度一樣——也是一個半島；但在亞洲那一國，每件事像都是大而可怕，在歐洲這一國，每樣事物卻是小而安靜的。整個希臘所擁有的國土似乎還小於葡萄牙國，（註九七）大概僅占現在所謂印度斯坦底四十分之一的廣袤。因位置在一個狹窄的海

之四通八達的部分：東鄰小亞細亞，西接意大利，南望埃及。各種的危險遠遜於熱帶文化國家。氣候也較便於攝生；（卷九八）地震不常有，大風雨之毀壞性較微弱；兇猛的獸類，毒惡的生物也比較少得多。關於其他地勢上大致狀態，同樣的定律也適用的。希臘最高的山還沒有及到希馬拉雅山的三分之一，所以沒有一個山有永久的積雪的模樣。說到河流，非但沒有像亞洲山泉所傾瀉下來的這樣宏鉅的容量，且因自然這樣特別的呆滯，走過希臘底南北，簡直除了幾條小川外，尋不到別的；這些小川很容易徒涉，且在夏季總是乾涸得見底。

爲着這兩國物質現象有了顯著的差異，那麼，民族底思想之聯系上也因而發生同樣的影響。因爲既然所有的觀念必一部分由思想之自然運用而發生，一部受外界暗示而起，於是本於原因方面之大變異，必產生互歧的影響。在印度，周圍之現象底傾向是激起恐懼；在希臘卻是反給以自信心。在印度，人是被威嚇的；在希臘卻是被鼓勵着的。在印度，各種的阻礙是這麼衆多，這麼驚人，這麼顯然的不可思議，生活底困難祇有冀求超自然底直接統治者底解決了。這些原因既出乎理解力範圍之外，因而靠想像力得來的資料乃皆集中着不斷地加以研求；想像力本身既運用過度，其活動益成危害；理解力被侵佔而全部之平衡性於以毀壞。在希臘，卻因相反的情形發生了相反的結果。在希臘，自然沒有像印度那樣危險，那般地侵入，那般地神秘。故在希臘，人底思想沒有那樣受驚嚇，也沒有那樣迷信；自然原因開始加以研究；物理、科學首先成立；而人因漸漸發覺其自己之力量，乃勇敢地追尋一切事像底實際。這種勇敢精神乃絕非受自然危害其獨立性及被暗示以知識矛盾之觀念的國家所可冀而有的。

且曾比較印度及希臘之公共信條者必很明瞭思想之習慣是怎樣地影響於一國底宗教。印度底神學，像其他熱帶國一般，是以恐懼心理為根據，而且是最嚴厲的一種恐懼。這種感覺之普遍，其證據是充滿於印度人之聖書、傳說中，甚而於神之形像及狀態中。恐懼的想像既是那般深印於他們的腦海，那麼，最普遍之神便為恐懼所結合的印像。譬如說，大自在天神之崇拜是最普遍的了；夷考其源，我們可以相信是婆羅門教徒從印度底原始假借而來的。總之，起源是很古，很普遍的了；而大自在天神和婆羅門及維什努（Vishnu）組成印度有名的三體合一的神。這個神本來與恐懼的印像相關連的，我們對此原無所事其驚異，因為這種恐懼祇有熱帶的想像力所能感覺到的。大自在天神在印度人腦中是代表一個令人可怖的東西，圍繞着一條蛇形的環帶，手執着人底骷髏，戴着人骨組成的頸鍊。他有三隻眼睛；他底性情之兇殘可以在它底身上所披着的虎皮表顯出來；據說他浪游着如瘋狂人一樣，在肩上昂仰着死的東印度毒蛇底頭。這個恐嚇幻想所造成的怪物也有妻，叫做多迦（Durga），有時叫做開里（Kali），有時又用着其他的名字。註九她底身體是黑而藍的；她底手心是紅的，表示她對於血的飢渴。她有四隻臂，其中一隻卻攜着一個巨人底頭蓋；她底舌咋伸於口外，腰部圍着被犧牲者底手頸上裝飾着一圈可怕的頭。

我們若掉轉頭來看看希臘，就在他們宗教最幼稚時代，亦發見不到一線的這種痕跡。因在希臘，恐懼的原因顯然比較少，恐懼的表現因而也沒有這樣普遍。所以希臘人不會將印度人所慣有的恐懼觀念參入他們底宗教裏。亞洲底文化傾向，是把人和神之間的距離推展得太遠了；希臘文化底傾向卻恰巧相反。故在印度斯坦所有的

神都含有怪異性；如維什努有四隻手，婆羅門有五口八手等是。但希臘底神卻完全常以人形來代表的。（註一〇〇）假如國內的藝術家用了其他形像作神像，那就必不會得到人家底注意。他可以繪成較人類更強壯、更美麗的形態；但仍必須是人。能激動希臘人底宗教情感的神人相似一點在印度人看起來，要視為極不合理的了。

這兩種宗教藝術表現之差異，附着有神學傳說之同樣的差異。在印度書籍中，其想像力皆極力趨向於敘述神底功績；凡事成功愈難，更愈喜歸功於神力。但希臘底神乃非但有人底形像，且有人底品性，人底事業和人底嗜好。（註一〇一）亞洲人看到自然裏頭的任何事像於他是恐懼的來源，因此養成一種崇拜的習慣，使他從不敢把自己底動作和神底作動混為一談。歐洲人被物質世界底安穩和平淡所鼓勵，並不畏懼和神並行，他們假如生活在熱帶國底危險中的話，那麽，不免也許會退縮而不敢罷。因此，希臘神和印度神有那般的異樣，在相互比較之下，我們委實似乎由一個創造的世界跑入其他一個創造的世界了。希臘人是綜合人底思想上的觀察而應用於神的。（註一〇二）女人底無情是以代安那（Diana）來代表；美麗和縱慾以維那斯（Venus）來代表；驕傲以朱諾（Juno）來代表；成功以密納發（Minerva）來代表。至其他普通的雜神，也應用着同樣的原則。內普丟恩（Topune）是個水手；伏爾根（Vulcan）是個工匠；阿普羅（Apollo）有時是個奏提琴者，有時是個詩人，有時是個牧人。至於愛神（Cupid）卻是一個執弓箭的放蕩小孩；主神（Jupiter）是個多情而性情溫厚的王；而商神（Mercury）比較不是輕重，有時拿來代表誠實的使者，或著名而普通的竊賊。

將人與神底力彼此相接近的同樣趨勢也表現在希臘宗教底另一點上。我底意思是指英雄崇拜之表現，以

希臘生物之崇奉爲最早。照以前所講的原理看來，這種情形不能在熱帶文化裏尋找得到的，在那裏，自然現狀已充塞着人以自卑無能的觀念了。是以很自然地，英雄崇拜並不能組成印度宗教之一部，卽埃及人、波斯人以至阿拉伯人都不會有的。(註一〇三)但在希臘，自然界對於人既沒有這樣屈辱和玩弄，他就更想到他自己底力量，而人底本性也不致於像在別處一樣的墮於不自信中。結果，在希臘古史裏，生物之崇奉已被認爲國教之一部了；這一點對於歐洲人是那般地自然，以後的羅馬教會仍舊非常成功地採用這種風俗。雖然一種完全不同性質的其他情形漸漸減除了這種偶像崇拜的形式，但其存在仍值得視爲歐洲文化所以別於其他以前之文化的無數例證之一。(註一〇四)

這樣，在希臘，每樣事像在在都提高人底尊嚴，而在印度，又適與相反。總而言之，可以說希臘人對於人底權力較爲重視；而印度人則萬事付托於神。前一種人所關涉的都是已知的和有用的；後一種人卻是惑惑的和神祕的。但是在這小小的古希臘半島上，那印度人爲自然威力所壓迫，費去同等的推理力，而從不知所止的想像都失其效用了。在希臘，想像力在世界史上卻初次多少被理解力所調和而限制着。非惟勢力削弱，它底活力亦減少了。它是被混合而趨於柔和；既不允其過分充溢，亦不使其誤入愚妄之途。但它底能力仍舊保留着，我們大可於古希臘思想底遺留品內得到充分的證據。那麼，他們所收穫於自然者實是很完全的；因爲人類理解力底進程及懷疑底機能是啓發着，而並不毀損想像力之崇敬及詩底本能。至於兩方之平衡是否很正確地適合着，是另一問題；但我們可確定的乃在希臘，適合之程度較任何以前之文化爲接近。無論影響如何，一向對於想像力之機能總陷於過

分的重視，遂使純粹之推理永沒得到充分的注意，這點實是無可疑惑的。又事實彰然，希臘文學最先補救了這種缺點，且其中有一種精密而有系統的嘗試，要去查合乎人類理性的意見，因此，給了人類一種權力去判斷其自身底一切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所以選擇印度及希臘爲以上比較之代表者的原故，實因我們所得到那兩國底史料尚屬不少，而且也會仔細地分別纂輯過。但我們所得到其他熱帶國文化底一切問題，在在都可爲我所主張關於自然現狀之影響的見解作堅強的證佐。在中美，廣汎的發掘曾舉行過；研究的結果，證明其民族底宗教像印度一樣，是一種純粹的，同等情形的恐懼的制度。（註一〇五）無論在中美、墨西哥、秘魯或埃及，沒有一國人民願意把人底形像來代表他們底神，或把人底品性歸原於神。就說到他們底廟宇，也是龐大的房屋，建築的時候，也是窮思極巧地從事，但究其極不過要使人們深印着恐懼的觀感而已，恰和希臘人爲宗教目的所用輕而小的建築物完全相反。因此，在建築的風格上，我們也可發見同一的原理在作用着；熱帶文化之危機在乎過分暗示着無限（infinite），歐洲文化之安全，乃在暗示着有限（finite）。若要追尋這兩種大的對立的關係，必需表明無限、想像、綜合及演繹是怎樣完全相連繫；而又和有限、懷疑、分析及歸納是取敵對的地位。但欲作一完備的例證，那就會出乎本章範圍以外，且亦恐非我底知識能力所可及；現在我必須讓讀者公平判斷，我所知道的不過是一個不完全的概略，但最低限度總算對於將來思想的材料底尋求給了讀者一個暗示，且可爲歷史家開闢新的園地——若非奢望——提醒他們自然底力量處處都可及到我們身上，故人類思想史祇有拿物質宇宙的歷史及現狀和它相連合起來，方能瞭解。

(註一)我很熱誠地將現代大思想家關於人種之假定的差異的話表明於下：「各種欲規避考量社會及道德對於人類思想之影響的普通趨勢中，最普通的乃是將行為與特性之分歧歸因於本來天然的差異。」(見密爾政治經濟原理 [Mill'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一冊第三九〇頁)普通作家常易錯誤地傾向於提議這種差異的存在，這種差異存在與否固不敢必，但實在從未證實過。

(註二)我所謂無業階級者 (unemployed classes) 即阿丹·斯密斯 (Adam Smith) 所稱的不生產階級 (unproductive classes)。雖然兩種語解都不十分正確，但「無業」二字於意義上似較切合。

(註三)西藏底謎粗，就算是字母也是由印度傳入的，這實在可以相信。

(註四)他們在九世紀時即早已建立於旁遮普，但並沒有征服加塞勒特 (Guzerat) 和麻臘婆 (Malwa) 這兩處在五百年以後纔征服的。

(註五)阿拉伯人底唯一可稱的科學就是天文學，這是在八世紀中環回教管轄之下發達蘊釀而成者，以後日見進步直至巴格達在第十世紀仍占東方民族中文學底重要地位。(見蒙都加拉底數學史 [Montclair, Histoire des Mathématiques] 第一冊第三五五、三六四頁)這種老的異教阿拉伯人和野蠻人民一樣地居住在空曠之地，卻有這樣合乎實用的天象之經驗底認識，但沒有證據可以實際地證明他們是視此為一種科學而研究的。多爾恩博士 (Dr. Dorn) 在亞洲學社會報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第二冊第三七一頁裏說：「若講到他們底天文學底知識，實在是無跡可尋的。」普索布爾 (在他底史學評論第一卷第三〇頁裏)對於波塔哥拉斯 (Ptolemaea) 時代之阿拉伯哲學是非常熱心，他告訴我們，這種民族常研究科學的。因欲建立這事實，他摘錄八世紀早期時期蘭維耶 (Bonhaviere) 所寫的回教徒之生活一書之一大段而稱為「法蘭西最傑出的人才」，假如這是一個正確的摘錄，那麼，蘭維耶底著作底讀者將以為天才者在法蘭西是很不幸的；至於回教徒一書，則與神史相參無幾耳；作者不僅阿拉伯底原書，且所著者皆已給馬勒西 (Marseni) 和波科克 (Pococke) 詳述過了。

(註六)理查遜 (Richardson) 經過道不毛之地游歷至的黎波里之南部，他注意到「荒蕪和不可克服的枯瘠的現象」(見理查遜底撒哈拉一八四八年版第一冊第八六頁；又第四〇九頁底塞人圖畫頓那姆 (Denham) 曾描寫蒙蘇克 (Mounzouk) 至塞德湖 (L. Tchad) 之突阿 (Yeo) 一帶而懷遠望的道路；他是歐洲人中曾冒險的旅程者極少數之一)。(見頓那姆中阿非利加 [Carnel

Africa) 第二至六〇頁) 即在差德湖之近岸亦絕少植物,「祇有一種易於繁殖的草本和小柔的鈴花是我所能發現的。」(見第九〇頁)

(註七) 利宜然在一八五〇年放途經過的黎波里 (Tripoli) 至差德湖的數日中,頗因當地人民底固定住實而生驚奇。他說:「無論在非洲或非洲底王國中,毫無文化之進程可言。各種事物都照着以往世紀之慣例而進行。」(見非洲之使命 [Mission to Central Africa] 第一册第三〇四、三〇五頁)

(註八) 關於這點,我在下舉一個例。一個原很明達和有相當學問的作者說:「關於埃及人對於物理底知識,其同時代人頗倍其有寬衡的驚人力量,我們既不能假設這些記載於經典上的例證是源於超然的力量,乃必須確斷地說埃及人確有自然定律及化合之透澈知識,非現代最有學識的人所能及的。」(見哈密爾登底埃及學 [H. Hamilton] 第六一、六二頁) 這種胡說的东西在十九世紀發表,真是個恥辱。但又有最近的一個作者(見金字塔底螺旋 [Vase on the Pyramids] 第一卷第二八頁) 對我們說:「為特殊的目的,埃及人是賦有極大的智慧與科學的。」照真正的科學講起來,埃及人是沒有份兒;至於說到智慧,固然與古希伯來底野蠻民族有明顯的分別,但他們是較劣於希臘,若和現代的歐洲相較,那就不可比量了。

(註九) 確實的,有許多複雜情形尚未考見,因為雷迪 (M. Redi) 很公正地說:大多數的作者過於注意於財富底生產,而忽略財富分配底規律。(見雷迪著科學社會 [Sciences, Society] 第三册第二七一頁) 因欲證實這點,我可提一提地租原理,這原理不過是中世紀以前幾發現過的,因為包含許多精緻的議論,故還沒有得到普遍的採用,就是主張這原理的人也未能繼續他自己底學說。工作價值與貨物利潤之比例這一定律是關於財富分配我們所能達到的最高綜合;但以地租與價格混合的人卻不能一致地承認這點。

(註一〇) 在更進步的社會階段中,還有財富之第四分階級底存在,及工人生產之一部被地租所吸收。但地租並非價格底一厚素,不過是價格底結果;在平常事件進行中,要經過相當時間它纔能開始作用。地租之正確的意思乃是利用土地天然不廢之力所付之價格,必不能與平常之所謂地租相混淆;因為後者包含貨物利潤的意義。我所以注意到這一點,因為有幾個反對李嘉圖 (Ricardo) 的將地租底始原列入較早期,忽略了外表的地租實常是利潤的假飾。

(註一一) 「於是工資就要依據勞動人口數和資本,或其他購買工作力底財源間底比例而定;為簡約起見,竟可稱為資本。假如某時某地

之工資較高，假如勞動階級之生計及生活較豐裕，設無其他理由夾雜於其間，那麼，必是資本底比例較人口為大。對於勞動階級影響重大的，並不是積聚或生產之實在量，更非指定分配於勞動者間的資財；其重要性實在這些資財及應分有資財之人口間底比例。勞動階級之情況不能改良，非改變這些比例機能於他們有益；故無論為彼等利益計的任何設施，假如不以此作根基，必是夢囈而已。」（見政治經濟學原理一八四九年版第一冊第四二五頁）李嘉圖在他底穀類價值之影響（Essay on the Influence of Low Price of Corn）底論著裏，用他平常的簡潔語說出三種可能的方式：「工資之起落無論其是固定、增加或減縮，於各種社會情形中是很普通的。在固定情形中，它是受人口增減底支配。在增加的情形中，是錄資本或人口之迅速的增加。在減縮情形中，就視人口或資本之較大的遞減。」（見李嘉圖著述〔Ricardo's Works〕第三七九頁）

（註二）生活之安適的標準方面當然也是這樣。

（註三）「最好的一點無過於工人之供給須常以工人生活可能維持之情形為比例。」（見李嘉圖著述第一七六頁政治經濟學原理第十一章）

（註四）「動物體內之各種原質，淡氣對氧氣之化合力最弱，更明顯的是它和氧氣結合時奪取燃燒之原質而毀滅之。」（利俾齊化學討論書〔Liebig's Letters on Chemistry〕第三七二頁）

（註五）有幾種物質底所謂防護力尚未完全考見，在十八世紀末葉以前絕無人疑其有存在之可能者。現在知道這種力和普通毒物原理是相關的。（見威納〔Turner〕著化學第一冊第五一六頁）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知事實有種毒物於傷口是致命的，但入於口中卻無害。（布羅提〔Brodie〕底生理學之研究〔Physiological Researches〕一八五一年版第一三七—一三八頁）將此事實屬於化學定律似乎較與布羅提堅持說有幾種毒物「痲痺肌肉之呼吸作用而毀殘生命，惟不即影響於心底活動」為有理由。

（註六）兩種作用都同等重要，以前者為尤迫急，由實驗證實——我們應希望在理論上——當動物餓死時，其體溫繼續遞減；故餓死底近因不是衰弱而是寒冷。

（註七）請閱本章末後的註釋。

（註八）據說要保持人底健康，即在溫帶的歐洲，其食物中之「炭素在冬季應較夏季增加八倍」。（利俾齊動物化學〔Animal Choo-

Malin) 第十六頁)

(註一九)最富於炭素的動物無疑地是動物；最富於氧化的植物。在植物界裏，炭素是這樣多，因着這種優勢及其液氣之缺少，使化學植物學家定植物為炭化的，而動物為氧化的。但到這裏我們有一雙重的相反現象。植物是炭化的，因為它們是非氧化的；但它們與寒冷國家富於炭化的動物食料相反而是氧化的。除此以外，還極有可注意的，即植物之炭質皆聚於幹和不營養的部分，這是不能吃的；而動物之炭質都聚於脂肪及油膏底部分，非但可吃，且為寒冷國民族所最喜。

(註二〇)馬爾科姆爵士(Sir J. Malcolm)在波斯史(History of Persia)第二冊第三八〇頁裏說到東方植物之廉賤，波斯之萊蘭部地方，果實是簡直沒有價值。叩維埃(Cuvier)則詳為比較植物與動物食料，且以為前一種為易得，故較天然。但事實上兩種都是天然的，雖然當叩維埃著作時，尚無所謂氣候與食物關係的定律。

(註二一)邁陽(Meyen)植物地理(Geography of Plants)一八四六年版第三一三頁說：馬鈴薯是於一五八六年輸入愛爾蘭；但莫洛區(Mculloch)商業辭典(Dictionary of Commerce)一八四九年版第一〇四八頁則：普通以為馬鈴薯直到一六一〇年纔輸入愛爾蘭，那時密爾威·勞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寄回少許，種植在奧洽爾(Yough)近畿之別墅花園中。

(註二二)阿丹·斯密斯底國家底財富(Wealth of Nations)第一冊第十一章第六七頁以為可維持三倍的人民；但這位大作家底這種估計是他底工作中最劣的一部。他為了以後，還有精密的計算證明遺棄底敘述。「一畝的馬鈴薯可供養兩倍侍一畝稻麥為生的人。」勞爾底農業全書(London's Encyclop. of Agriculture)一八四四年第五版第八四五頁在克洛區底食品(Diet)一書，第一〇四八頁裏也有同樣的句語。強壯的愛爾蘭工人每日平均消耗量估計是，男底九磅半馬鈴薯，女底七磅半。

(註二三)最低的農業工資在現在的英國是每日一先令，至松奇(Thornton)在一八四五年所集的證據，是林廉西(Lincolnshire)那時所付的工資，最高每星期有十三先令以上；在約克西(Yorkshire)或蘭蘇勃蘭(Northumberland)也差不多是高的。

(註二四)所謂低廉工資，我是指工作之低廉酬報。這當然是和工作價值或工資率無關的。

(註二五)我用印度斯坦這名稱是照普通的意義，是由南非至科摩林角(Cape Comorin)，雖然正確地說來，該地包括印度(Nerbudda)以北各部。

(註二六)以我所能觀察的，米曾向四轉輸，說米是印度底土產，除歷史證明以外，尚有言語學方面底可能性，且梵文所給與它底名字已經佈很廣了。十四世紀時，米是輸給巴(Magadha)沿岸底普通食料，現在卻已通行於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頭克洛區底商業，與第一一〇五頁說：米底種子，在十七世紀後期從馬達加斯加轉輸到卡爾來那(Ceylon)。現在，在尼加拉瓜和南美都種得很興旺了，古希臘人雖然很知有米，但並不種植；第一次輸入歐洲種植的，還是阿拉伯人。

(註二七)關於食料代俄多拉斯已注意到印度特著的肥沃及其當然之財富積聚。但於分配之經濟定律——卻和所有的古時作者——是完全不知道的。

(註二八)一個有才能的學問的古代基督教底辯護者替這些悲憫的人民說：「關於印度人之卑陋，沒有像當我們尋證據時的來得彰明瞭的了，但若承認其確具奴隸性之行為，則何以不責其不具自由人之德性呢？經長期的壓迫，教育他成這樣無疑的順服了。」(肯內提亞於孟買學社會報[Vans Kennedy, in Transactions of Society of Bombay]第三册第一四四頁)

(註二九)斯密斯國家之財富第一册第九章第三七頁，內中所主張的說得是太專斷了，因從不安的社會情形所得的證據必須思索過的。但利息和利潤之間有一平均之比例則甚明顯，並經梵文法學家所明白規定了的。

(註三〇)李嘉圖在政治經濟之原理第六章第六十五頁說：「工資增加則利潤必然減少。」又在第十五章第一二二頁：「工作工資提高，則貨物利潤必減低。」在其餘的地方，他有同樣的敘述，這給普通讀者很不滿意，因為他們知道在美國，譬如說：工資和利潤是同等高的，但其含糊之點在文字而不在思想；李嘉圖底所謂工資是指工作值，以還意義來看，他底意見是正確的。若工資是指我們所謂的工作報酬，那工資和利潤就沒有關係了；因地租低時，工資和利潤都可以高，如美國底情形一樣。這就是李嘉圖底意見，可以從下面一段看出來：「利潤當然是有賴於工資的；不是虛的而是真的工資；不是每年付給工人的磅數，而是欲得此等磅金之必需的工作日數。」(政治經濟論第七章李嘉圖論著第八二頁)

(註三一)科爾布盧克底法例彙編(Colebrook's Digest)第一册第四五四頁，第三册第二二九頁米利夫「已往法律之最高權威」已往法律之創始者。」最近的印度史家埃爾芬斯圖(Elphinstone)在印度史第八三頁說：「米利夫法典仍是印度法律學底根基；其土要點至今尚未更改。」這部特著的法典亦是蘭旬人和老羅法律底基礎。

(註三二)這是由熱心法國農業的人得來的估計。地租當然是因以下每一例而變遷的，如土地之自然力，土地改良所達到的程度及輪耕等等。但除這種變遷以外，在每國，其平均的地租卻要憑一般的原因處作用而定。

(註三三)因為土地太多，以前國家樂於耕種的瘠確土地實在用不着去耕種，故願意付相當地租而得任意使用之權。在美國，利潤及工資（即工作報酬而非工作值）都是高的，若地租高，則絕對不可能的了。

(註三四)威納在一七八三年旅行經過孟加拉之東北說：「當然的，我們想到這些地方的農人，其必需的生活費是這樣的少，這些人應該極端貧窮與痛苦將必然地活現出來了。生活所費每日不到一便士，尚可得兩磅飯，一撮鹽，油，蔬菜，魚及番薯。」（見威納著 *四藏之使 Embassy to Tibet* 第一一頁）伊本·巴圖塔（Ibn Batuta）在十四世紀時經過印度斯坦說：「我從未見過一個國家食料是這樣便宜的。」（伊本·巴圖塔底旅行記 [*Travels of Ibn Batuta*] 第一九四頁）

(註三五)華得（Ward）在印度人之概觀（*View of the Hindoos*）第三冊第二八一頁裏估計奴隸階級（*Varnas*）佔「印度人四分之一」。他們常時包括全部的勞動階級；他們所稱的「外伊爾斯」（*Valias*）不是田戶，乃是地主，畜牧之佔有者及商人。

(註三六)「或用墨刺其背部而放逐，或由國王命令在其鼻尖加以重創。」（瓊斯爵士（*J. W. Jones*）論著第三冊第三一五頁，米紐法典第八章第二八一節）

(註三七)「一個奴隸雖然被他主人解放，尚不能越出奴隸地位；因這是他本來的地位，誰能使他取消呢？」（見瓊斯論者第三冊第三三三頁，米紐法典第八章第四一四頁）

(註三八)一個智識的觀察者說：「亞洲國底人民是怎樣地不參加他們政府底革命，這很明顯，他們從未發偉大而普遍的熱情衝動領導着，且亦不與問對其本國及其自身幸福有興趣及最重要的事情。」（墨爾多底情地圖見亞洲學社雜誌 [*M. Murdo on the Country of South, Journal of Asiatic Society*] 第一冊第二五〇頁）

(註三九)但南非洲卻沒有這種樹。

(註四〇)阿拉伯人所有的食品，糧實為其所最嗜好的。

(註四一)「糧實非但是菲威（*Fesal*）沙漠沃土中底特產，且為該地居民之主要食料。成人，兒童，馬，驢，駱駝，羊，禽類以至於犬，或淨潔其

以爲生」(利查松著撒哈拉之遊 [Travels in the Sahara] 第二册第三二三頁)

(註四二)「在尼羅河山谷中樹叢旺盛地到處生長着。」(見惠更生著古埃及人 [Wilkinson, Ancient Egyptians] 第二册第三七二頁)這種樹叢可用以製成特種飲料爲某部地方所狂嗜者,此又可證明此種美麗的植物對於非洲是怎樣地重要了。

(註四三)「在尼羅河山谷中,『非登』(即一又四分之三畝)的地有時可種四百株樹」(見惠更生著古埃及人第二册第一七八頁)在毛爾蘇克 (Moorshuk) 全株樹叢價值一先令。(見利查松著中非洲第一册第一二一頁)

(註四四)兩埃及底遺蹟優越於其他埃及爲黑榜 (Hearen) 所注意。(見非洲民族 [African Nations] 第二册第六九頁)實則凡研究塞銘等紀念物者對此卻很感然的。在薩伊德,古埃及碑比較在下埃及保持得真久些。語言學家稱之爲「米沙」(Mish)。

(註四五)「通常的收穫不止二百四十倍;平均的價格是大概每『阿桑』(譯者註二)值三先令九便士,這就是不到三先令一斗。」(見哈爾爾登底埃及學第四三〇頁)在上埃及「玉蜀黍變成爲鄉村之全部食料」(前書第四一九頁)又在第九六頁哈爾爾登說:「我嘗嘗數到一個玉蜀黍的穗有三千粒玉蜀米,而每一壘卻有四、五個穗。」

(譯者註二) Ardab 是埃及和其鄰近諸國之容量單位。

(註四六)尼羅河之泛濫所形成的肥沃土地使人口激增一事實會有許多作家觀察到,但都不似馬爾薩斯 (Malthus) 來得明顯。(見馬著人口論著 [Essay on Population] 第一册第一六一至一六三頁)這部偉大的著作,其原則雖曾粗率地被誤用,但仍不失爲重要的人口問題底論著中最佳者;雖然作者常因所讀不多而致誤用例證;而尤不幸者他並不熱研自然知識各支系,豈知這種知識和經濟研究卻有很密切的關係。

(註四七)斐迪禮·什雷該爾 (Friedrich Schlegel) 真實地說:「現代對於古史底研究愈深刻明悟,則對於黑羅多塔斯 (Herodotus) 底認識及尊重愈增加。」(見史學史哲學第二四七頁一八四六年倫敦出版)他底關於亞洲及小亞細亞底精微知識無不被所有遲達的地理學家所認可;尤有進者,最近有一個博覽的游歷家即對於他底西伯利亞四部的詳明知識亦曾有很精奇的證實。

(註四八)馬泰爾 (M. Maeter) 不專斷敘述實在不必計及;(見阿力山得路學派史 [Hist. de l'École d'Alexandrie] 第二册第二八五頁參看唯知主義史 [Hist. du Gnosticisme] 第一册第四八頁)因爲關於早期希臘人游歷埃及的事,的確沒有更好記

證據，又柏拉圖會否到過埃及，還是個問題呢。不曾所著埃及（*Purman's Egypt*）一書第一册第六〇頁說：「他是會到過埃及，是個疑問。」羅馬人對於埃及也很乏興趣（見本會第一册第一五二至一五八頁）；本會又在第一五二頁說：「自代俄多拉斯起，埃及史之有系統的研究是停止了，非但關於希臘人的一部，且關於一般的古史也是這樣。」利克（Lick）在關於庫拉（*Quora*）一書論文裏有這樣的結論說自托雷密時代（*The Time of Ptolemy*）以後古人對於非洲地理之知識從未增進。（見地理學社雜誌（*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ociety*）第二册第九頁）

（註四九）約翰·赫舍爾爵士（*Sir John Herschel*）計算大金字塔重一百二十七萬六千磅。（見自然哲學之討論（*Disc. on Natural Philosophy*）第六〇頁）來埃爾地質學原理（*Tyrell's Principles of Geology*）第四五九頁內所計算的更大，有六百萬噸。照伯林（*Berrin*）以現在的石料量計算是六百三十一萬六千噸或八千二百一十一萬立方尺。

（註五〇）關於建築金字塔之目的曾有許多幻想的假說，但現在已公認不過是埃及底王陵罷了。

（註五一）假如有人怨恨說在歐洲此種階級底混淆還算遠闊的話，那麼，研究歐洲以外的古代文化便可以得到一種滿足了。

（註五二）斯快爾（*Smith*）考察尼加拉瓜時說：那些石像（見美洲第二册第六八頁）「其原料都是黑色玄武岩，非常堅硬，即以現代最優良的工作也難以奏刀。」斯提文斯（*Stephens*）（見美洲第二册第三五五頁）在巴蘭找到了「最精美的藝術及模塑樣本，以供研究。」（可再閱前卷第三册第二七六、三八九及四〇六頁，第五册第二九三頁）至關於契成（*Chichen*）地方底繪畫，他說：（第四册第三二一頁）「這些繪畫，筆端那般縱橫放恣，惟受名家之訓練方能這種結果。」說到科班（第一册第一五一頁）「用現代最優良的工具，也不能鑿成這樣完美的石。」至關於烏斯馬爾（第二册第四三一頁）「各處石之放置及磨練其完好如現代最良之石工。」我們對於中美底知識差不多完全得自以上兩作者；雖然斯提文斯底著作比較精細，但斯快爾曾說（第二册第三〇六頁）「我所信的是十分正確的——一八五三年他底書出版以前，尼加拉瓜底墓銘及紀念物等是從未給人注意過的。」

（註五三）在東西兩部河流底流域之間是有差異的，這可以表明一部分的理由，但不完全；即使解說較此滿意，可是太涉近於現象而無科學之價值，故必須歸於較高深的地質學研究。

（註五四）關於這方面底灌溉我們大概可以估計亞馬孫河沖積二百五十萬平方哩的面積；河口是九十六哩闊；從河口起可航行的有二

予二百哩。確實的，在南美之水路測量 (Hydrography of South America) 一文 (載地理學社雜誌第二册第二五〇頁) 裏說：「除三哩須由陸運外，其餘的水流行於——大部都可航行——南緯線三十五度之別怒斯·愛爾斯 (Buenos Ayres) 之間以至於特及北緯九度之俄利諾科河口。

(註五五) 俄利諾科，有時稱爲科倫比亞者，組成一著名之植物總道，這就是加利福尼亞植物區區邊界。

(註五六) 關於早期北美種族底簡陋史料曾被克洛區博士收集於其名著關於美洲之研究 (Researches Concerning America) 一書第一一九—一四六頁中。他在第一二二頁裏說：「他們沒有法律和民法地生活着。」在這部分世界裏，人口恐怕從來沒有固定的，又我們現在知道亞洲東北之居民曾不時地移居於美洲之西北部，例如兩洲都有切克斯基 (Tschuktschi) 人一點可見。多倍爾 (Dobell) 很驚奇地發見北美種族和極西的杜普母斯克 (Tomak) 底相同點，他相信他們必是同源。

(註五七) 照普通物理的設想，我們可以假設雨量和海岸線底關係，在歐洲，我們有極衆多的氣象紀錄，故此種關係已極滿意地證實了。

(註五八) 「大陸和島嶼底東四海岸底氣候差別已在南半球觀察出來了，但在南半球，西岸較東岸爲寒，而在北半球則東岸較冷。」(邁爾著植物地理學一八四六年版第二四頁)

(註五九) 達爾文——在南美發表其名著的——曾驚訝着東海岸底超越性；他提起：果類如葡萄及無花果等生長於東岸緯度四十一度者豐收，反之在本洲之對岸較低緯度中者則甚凋零。(達爾文著研究雜誌 [Journal of Researches] 第二六八頁倫敦一八四〇年版)

(註六〇) 貿易風有時達到緯度三十度。

(註六一) 「在北半球，貿易風由東北吹來，至南半球則由東南吹來。」(見邁爾植物地理學第四二頁)

(註六二) 加得納博士 (Dr. Gardner) 對於這些用了植物學家底眼光來看；他說：「近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 地方，熱和水氣已足補救瘠薄的土地了，故「光滑無泥土附着的岩石亦蓋滿着鳳梨科寄生植物，野牡丹科，仙人掌科，蘭科等植物及青苔等，全都富於生命方。」(加得納巴西之行 [Travels in Brazil] 第九頁) 又爾爾什著巴西 (Wald's Brazil) 第二册第二九七、二九八頁亦有奇特之兩季之描寫：「有幾個星期中，每天有八、九小時我都穿不着乾的襯衣，晚上脫下的衣服，翌晨覺覺非常的潮濕，若不下雨——這是很

少見的——有些地方就有烈火似的太陽；我們懶行着曠野，因潮濕被熱度所蒸發，我們也似乎浸潤在水氣中了。」

（註六三）這種異常的富饒，任何人看見了都要被驚奇所激動的。雷爾什旅行經過這些沃腴的地方說：「巴西特有的自然處過甚的富饒。」（雷爾什著巴西第二册第一九頁）還有那頁著名的自然學家達爾文說：「在英國，凡愛好自然歷史者喜歡在步行時，常有生物引起其注意以供研究；但在這些充滿着生命的富饒氣候裏，引人注意的事物太多，以至於不能步行了。」（見研究雜誌第二九頁）

（註六四）來埃爾爵士（見地質學原理第六八二頁）注意到：「那毀壞巴西穀類的駭人聽聞的昆蟲數量。」又斯汪松（Swedish）遊歷巴西時說：「巴西底紅蟻極富於毀壞性而又蕃生極速，它們常常佔了農夫底耕土，盡力展拓其殖民地而很不費力地追著農夫闢了地底耕地。」

（註六五）雖然祕魯曾以兵力伸展其國土遠達智利及巴塔哥尼亞（Patagonia）底一部，但維達加（Vieda）卻是現在祕魯海岸底真正南端。至於墨西哥呢，道國底北面邊界是大西洋岸二十一度，太平洋岸十九度（見普羅斯科特著墨西哥史（Procott's History of Mexico）第一册第二頁）

（註六六）「玉蜀黍在拔海七千二百尺本來還可栽植，但大多數是在三千尺至六千尺之間」（見林德利底植物界（Lindley's Vegetable Kingdom）一八四七年版第一二頁）這是屬於南美洲熱帶底情形；但在庇里尼（Pyrenees）山紋上的玉蜀黍種約總三千至四千尺高。

（註六七）他們最熱心的科學就是天文學，而墨西哥對此曾有相當的成功。

（註六八）「皇族貴族，以至官吏及無數僧侶之團體都可免稅，而政府開支底全部責任是屬於平民的。」（普羅斯科特著祕魯史第一册第五六頁）

（註六九）雖然在這種環境中，這種情形是很自然的，但普羅斯科特還是驚奇着，他說：「在這種異常政制之下，其人民對於生活之改善有許多進步，農工方面也很有訓練，可是我們發見他們並不知金錢為何物。他們沒有甚麼可稱為財產的。除法律特種規定以外，他們不能自由謀職業，工作或娛樂。沒有得到政府的許可，不能遷居或改換衣服。即其他各國最低限度的自由都不能得——就是選擇他們底妻子。」（見祕魯史第一册第一五九頁）

(註七〇)照普利查德 (Priehard) 說墨西哥人底性情較印第安人為苛刻；但我們現在的知識尚不足以決定是否這完全是自然底原因或社會底原因。(見自然史 (Physical History) 第五册第四六七頁)

(註七一)波斯之有等級制是佛突阿西 (Ferdousi) 說的；茲不計其敘述上是否別有所謂而作，但究較希臘史家之沈默而無所論述為貴，因希臘史家大都除其本國外，了無所知。

(註七二)「埃及人對於引用神權方面的風俗較任何種人民為獨嚴。」(惠更生著古埃及人第三册第二六二頁)本曾也注意到「埃及人對於舊禮和風俗的固執。」(本曾著埃及及第二册第六四頁)

(註七三)墨西哥人看起來較印第安人尤為沮喪。祇須看他們底巨大金字塔，其中赫盧拉 (Cholula)一座，「基礎之廣大都由埃及金字塔底兩倍。」

(註七四)普里斯科特 (墨西哥史第一册第一五三頁)說：「我們並不知道墨西哥皇室宮究佔據多少的時間；但據說力役的人有二十萬之多。」無論其事實如何，泰斯庫根 (Tezcucan) 朝底帝王實擁有很衆多的順民，且有時督役整個被征服的婦女從事於公共的工作，這一件事卻是確實的。世界著名的那個偉大的建築紀念碑決非自由人所能任的勞役。

(註七五)這一點最好拿馬泰爾底美妙的評語來例示，就是說，「埃及底王蓋一旦失位，那麼，國家便不易於重建了。」(馬泰爾著阿力山得路學派史第一册第六八頁)；在波斯也一樣，忠耿的情感一旦消滅，民氣亦同時喪失。(馬爾科姆波斯史第二册第一三〇頁)但亞洲文化最高地城底歷史和這點恰正相反。

(註七六)我所指的是關於自然和經濟方面的概說。至於文學方面，我感覺到有許多缺點，尤其是關於墨西哥和秘魯史。

(註七七)即使沒有危險發生，恐懼感覺力之強已足毀壞原有的歡樂。例如，印度斯坦底偉大的山界的搭葛 (亞洲研究第六册第四六九頁)「在人能得到風景底觀念以前，必須先置身其地。山谷之深奧，山峯之巍峨，重疊環繞的希馬拉雅山之嚴尊堂皇，構成這樣偉大的景觀，與其說深印於心中一種快樂的感覺，毋寧說是可怕。」在福羅爾 (Tyro) 地方，曾看見那處山景之偉崇使人民深印着恐懼的觀念，而至造成許多迷信的傳說。(阿利松 (Alison) 著歐洲第九册第七九八〇頁)

(註七八)「地中海底塞亞任何國為烈。」(見克洛區著地理辭典一八四九年版第二册第四九九頁) 惹提博士 (Dr. Teuchnid) 說：

利馬 (Lima)「每年平均有四十五次的地震。」(見論魯之行第一六二頁)

(註七九)有一奇特的例表示觀念之聯系能消失了慣性所含的麻木影響。楚提博士描寫這種驚駭說：「沒有人能夠看見這種現象而仍能壓制恐懼的感覺。」(《秘魯第一七〇頁)皮爾(Boale)在南海之捕鯨航行(South-Sea Whaling Voyage)一八三九年倫敦出版一書第二〇五頁內說：「據說魯普土人並不像其他常遇危險者之能慣常於其境遇；他們每次越感到地震震動，則越驚駭。要緊，故老年人遇到小地震也要發生不可支持的恐懼。」

(註八〇)斯提文斯曾深刻地描寫中美地震很有力地說：「我以前從未感覺過自身這樣地弱小。」(斯提文斯著中興洲第一册第三八三頁)

(註八一)科學界名人及事實上所有的偉大人物都是富於想像力的。但在藝術方面想像較科學為更明顯；這也就是我在這本書上所要說明的一點。羅維·布盧斯改訂士(Sir David Brewster)果然也想到牛頓是缺乏想像的，他有：「他想像力底微弱」一語。(見布盧斯或著牛頓之生活一八五五年版第二册第一三三頁)本來在註解裏要討論這樣大的問題是不可能的；但以我所見，除但丁和沙士比亞以外，沒有一個詩人底想像比愛薩克·牛頓公爵更遙遠和膽大的了。

(註八二)提克諾(Talbot)所提及的關於西班牙科學之不振的判語至今還可引伸。(提克諾著西班牙文學史第三册第三三三—三三三頁)他在第二三七頁說在一七七一年薩拉曼卡(Salamanca)大學對加設物理科學的要求回答說：「牛頓所教授的沒有一件能有裨於一個好的論理學家或形上學者之育成，而加爾提(Gassendi)和笛卡兒並不如亞里斯多德之能與顯現的真理相切合。」(註八三)蘇門答臘(Sumatra)底居民因迷信之故，雖然虎曾造成可怕的蹂躪，卻最不喜歡老虎。(見馬斯頓(Marsden)著蘇門答臘史第一四九、二五四頁)俄國對於開斯卻脫根(Kamtschatskana)敘述說「除以上所提及的神以外，他們對於幾種明知其危險的獸類也予以宗教的崇敬。」格里美(Grievé)底開斯卻脫根史第二〇五頁)布盧斯(Bruce)提及在阿比西尼亞(Abyssinia)土獺被視為「迷惑人的動物」居民不敢觸動土獺底皮除非他底皮曾受過牧師底禱告或念咒。(見麥里(Murray)底勃魯斯之生活第四七二頁)和道類似的就是崇拜熊(見扶爾曼(Fulman)底西伯利亞第一册第四九二頁，第二册第四二四三頁)還有以流行的蛇底崇拜，它那狡猾的行動很能引起恐懼而激動宗教的情感，從毒的爬蟲類所理會到的危險是利波斯古和甘底譯文有蛇。

的。

(註八四)這裏可以舉一例表明地震波及地域範圍之廣闊。一八一五年蘇姆巴瓦(Sumbawa)有一次地震及火山爆發，「其所及之地域周圍有一千哩」，「爆炸之聲遠達九百七十哩外」。

(註八五)在推論哲學影響之下，疾病之神道的理論在十七世紀中葉以前已非常地微弱；在十八世紀中葉或其後中期，它已完全在科學界中失了附和者。現在這種理論仍在一般普通人中流行着；我們可以在教士，或在缺乏物理知識的人底著作裏找出證據來。當虎列拉疫病在英國流行時，有人重提這種理論；但時代的精神已不容許這種力量成功了，且可以很當然地預料，人們決不會重溫他們以前的意見，除非他們回復到以前的愚妄境界。我現在介紹格蘭夫人(Mrs. Grant)一八三二年的一封信，它可以代表虎列拉疫病所激起一般的論調及其與科學研究之衝突。她是一個有相當成就的人，所以她底言論也很能影響於一般人。她在格蘭夫人通信集(一八四〇年倫敦版)第三册第二一六、二一七頁真說：「照我看來，大可容納人民對於這種疾病——特殊的災難，和以前絕不相同的痛苦——的考慮和臆測。」這種要限制人類思考力的觀念就是久已使歐洲處於黑暗的地步的那種感覺；因為它很有力地阻礙我們特以得真正如識的自由研究。波義耳(Boyle)對於這問題的疑惑可舉以例示十七世紀思想變動底過程及其預備下一世紀偉大解放的基礎。波義耳敘述這問題的兩方——即神道學的及科學的意見後說：「似乎這些流行而傳染的疾病並非單憑對不虔敬的人的，因為我記得曾讀過有些名著裏面說到有些瘟疫同時傷害人和獸底生命，有些又特別地損害與人無關或於人有益的畜類——如貓類等是。」

「因為這些及同樣的理由，我關於瘟疫之原因的辯論每生疑惑——即由於自然的呢，或超自然的？——兩方的爭執者都不十分對；因為很可能的，有些瘟疫若無神力之非常干涉——因人類底罪惡而起——是不會發生；可是另有些瘟疫卻不過是為了自然原因之不尋的集合而產生的。」(見波義耳論著中第四册第三八八、二八九頁之空氣之論談(Discourse on the Air)一篇)「這地方底爭執者底論調都不盡可信」——這一句話可以令我們明白十七世紀底調和精神；這就是介乎十六世紀底極信論及十八世紀懷疑論派之間底中立派。

(註八六)熱的氣候和濕氣底蒸騰以至植物之迅速腐爛當然也是不康健的原因；此外或尚可加上熱帶大氣中之電氣憤狀一個原因。

〔註八七〕同時也必增強教士底力量；因為沙爾勒夫瓦（Charlevoix）很坦白地說：「淺薄是上帝治理之收穫。」（見蘇西（Soudier），蘇巴西史第二冊第二五四頁）

〔註八八〕耶茲（Yates）說起印度底時文，謂「沒有一個民族底作品能擁有這般多的變化。希臘和羅馬之音律已使歐人震驚；但和梵文之三大韻詩品相較真是渺乎其小了。」（見一八三六年加爾略塔出版亞洲研究（*Asiatic Researches*）第二〇冊第一五九頁中耶茲著梵文頂額（*Yates on Sanscrit Alliteration*））

〔註八九〕在這本書底第六章我們可以看到在歐洲這種輕信底心理曾有一個時期也非常厲害；但那時代還是在野蠻的狀況中，而野蠻總離不了輕信。在另一方面講起來，這些從印度文學中所舉的例都是取材於那國底博學者底著作，他們底文辭是那般地優美富麗，據幾個有力的評判者底意見，以為那雖不能超越於希臘人，亦可與之相抗衡了。

〔註九〇〕「壽命底限度為八萬年」（一八二八年加爾略塔出版亞洲研究第十六冊第四五六頁）這和西塞底神對壽命底精度相差，不遠。照他們底意思，人以前是「活到八萬年的。」（見亞洲之行（*Tour in Asiatique*）叢書第二集第三冊第一九九頁一八三三年巴黎出版）

〔註九一〕在領導者（*Daibata*）第二冊第四七頁關於世界最早的居民說：「在這時代，人底生命可延長至十萬年。」

〔註九二〕威爾福（*Wilford*）在亞洲研究第五冊第二四二頁說：「當彼勒那人（*Purandis*）講他們古代底帝王底時候，也有同等熱狂姿態他們的意思，幼希斯撒王在位二萬七千年。」

〔註九三〕「阿拉加王君薩這世界祇有六萬六千年之久，着實沒有其他的君主比他更短了。」（見維什努底被勒那（*Vishnu Purana*）第四〇八頁）

〔註九四〕有時壽命還有長的。在瓊斯爵士論著第一冊第三二五頁內關於印度紀年史的短文裏有「范爾密克（*Valis*）和維爾密（*Vermis*）……兩個時人底談話，他們年齡底相距期為八十六萬四千年。」

〔註九五〕「他是第一個王，第一個隱士，第一個聖人，所以被冠上極榮譽至尊無上的稱號。他接王位時年紀是二百萬歲。他在位六百三十萬年，然後讓位於諸王子；又過了十萬年的橫暴消高的生活，乃在阿什塔巴大（*Ashtabada*）底山上大行。」（見亞洲研究第九冊第三

〇五頁)

(註九六)換爾芬斯同底印度史第一三六頁有「這個時期底年代還超過四百二十六乘四百三十二馬之數。」

(註九七)總計它底圖樣總計好像比雷爾牙連小些。(見格羅特著希臘史〔Grotes History of Greece〕第二册第三〇二頁)

(註九八)在希臘底畫歷底亞利常能使那圖受疾害的傳染病比較上極少發見。(見亞利常〔Herivall〕著希臘史第三册第一三四頁及第八册第四七一頁)這或者是由於大的宇宙律底原因,或簡單地說,就是未與東方有實際的接觸,故各種流行病未隨傳入的耳

(註九九)這就是印度神道家平常所說的,但照拉摩罕拉〔Rammohun Roy〕說來,大自在天神有兩個妻子。(照拉摩罕拉底維特〔Veda〕第九〇頁)

(註一〇〇)「希臘神底形像多作人形,富於權力及才能,假如環境相仿,那麼,行動也和人一樣,不過含有一種尊敬和能力幾等於完人罷了。至於印度底神,雖然亦賦有人底情感,卻每在形像上現着怪異的狀態,而行為也復粗野而無常。他們有各種的膚色,紅、黃、藍,或有十二個頭,大多數都有四隻手,他們底神氣也喜怒失常。」(見換爾芬斯同底印度史第九六、九七頁)

(註一〇一)「在其他信仰實多神教的主要古國裏,如埃及及神底化身大部或完全限於禽獸、怪物或其他幻想底表徵……在另一方面,希臘神底化身幾乎是精神和美德底必然結果;神祇附有着人底形像,同時也須具有人底興趣及情感。天空和世界一樣地有朝廷和宮,貿易和職業,結婚、私奔和離婚。」(見李爾〔Mine〕著古希臘文學史第一册第四七、四七二頁)

(註一〇二)這一點也適用於形式之美麗上;起初他們注意於人像底美麗,後來就移用於神像上了。

(註一〇三)在阿拉伯古代宗教上找尋不出關於英雄崇拜的證據;且這種崇拜當然是最和膜拜教義底精神相違的。

(註一〇四)對於死者的崇敬,尤以對於殉道者的崇敬是正教教會和聖先崇拜者最大的相反點;且很容易明瞭這種崇敬的舉動,必為斯異教所痛恨無疑。

(註一〇五)因此在科班的一個神像,「那雕刻家底目的似乎就是要引起恐懼。」(他們常用的雕刻模型是骷髏。)(斯揭文斯中英第二册第一五二頁、一五九頁)在梅耶潘〔Marjpan〕第三册第一三三頁裏:「有人像或可怕的形象和表現的獸類繪像,藝術家底

技巧似乎都盡於此了。」又第四一二頁裏：「那不自然和奇異的臉。」

附註

這些見解既然除它們生理方面價值外，尚另有其社會及經濟的重要性，我現在更想在這註解內證明其為穩固不移，就是說要試為表明炭化食物及呼吸功用之關係可因動物界之廣泛的考察而益明顯。

在各類動物中最普遍的腺就是肝；其主要任務是放洩膽汁——一種富於炭化的流質——以減少人體組織內的過剩炭質。這種順序和呼吸功用的關係是非常奇特的。我們如果總觀動物生命底情形，大可考見肝和肺幾乎常是互相補償的就是說，當其一之機能小而意識的時候，那麼，其他一種必大顯活動。故爬蟲類底肺是弱小的，但有相當大的肝；魚類亦然，照實際上講起來，可說是沒有肺，可是沒有肺，肝卻非常的大。另一方面，昆蟲有很大的和複雜的氣管組織；但牠們底肝是微小而功用通常亦遲慢。如果我們不去比較各類動物相互的不同，而僅比較動物本身所經過的各程序，也可證實這廣泛而顯特的原則。這一定律在動物產生以前已很適應的了；因志生的嬰孩底肺幾乎沒有甚麼活動，但有一巨大的肝，充滿了能力，傾瀉多量的膽汁。這種關係是這般的一定不易，故在人類，肝是最先組織成形的機能；在生前容量極大，但在後當肺部開始活動時即迅速地減縮而新的補償統系在人體組織內成立了。

這些事實於精通明悟的生理學家很有興趣，而於道韋所主張的理論的參考上也佔着重要的地位。肝和肺在其組織史上既皆足彼此補償的，那麼，很可以確定在功用上也起着彼此補償的效果；即其一有不活動的時候，其他一必取而代之。所以，有如化學所指示給我們的，肝盡量發洩一種炭化的流質而把人體組織內的炭質除去，肺也同樣地——雖是沒有其他的證據——有除去炭質的功用；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想到，假如我們因身體上一時過分地充滿了炭質，我們底肺必能幫助解救這種危窘。這由其他一方使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富於炭化的食物有能加重肺底作用的傾向；故炭化食物和呼吸功用的關係並非像一般人所說的是那般粗淺的假設，而是很高的科學理論，且不但在化學上得到證實，即在動物界底統系及胚胎現象觀察上也得到同樣的效果。和俾著及其附從者底見解是那般地廣博充實，又和我們所有知識之其他部分相配合，假如還有反對這種結論——自七十年前拉發因沃 (Lavoisier) 試用化學合力定律以表明呼吸功用時即已漸次積聚而成的結論——者，那祇有因頑固的深恨綜合，或無能力以研究偉大的思考的真理才可

以表明其理由了。

在這及以前的註解裏，我曾考慮食物、呼吸及動物熱度底彼此關係，但篇幅既那般冗長，對於生理學方面不發生興趣的讀者一定覺得厭煩；但這種研討是必需的，因有許多實驗者對於這問題未有了解的研究，曾提出某幾部的反對理由。現舉一顯著的例如下：那真有盛譽和能力的作者布羅提爵士(Sir Benjamin Brodie)最近發表一本書叫做生理學的研究(*Physiological Researches*)裏面包括研究大和兔底幾個精密的實驗，證明熱是由神經系所發出，而非由於呼吸的器官。這有名的外科醫生底意見，我現在不必加以深究，可是我可以說，第一，即以歷史而言，從未有因這種單獨一類的動物實驗而發現過大的生理上的真理，或破除了大的生理學上的謬說；理由是因爲一方面我們所研究的是有抵抗力 and 活的物體，粗淺的生理學上的例證是不實用的；一方面又因每一實驗必產生反常的情狀，而因此引入新的原因，其作用是無窮變的；除非在無機界裏，我們方能支配全部的現象。第二，有機界之其他一部是植物界，我們一向認定它沒有神經系，但卻有熱度；我們又知熱是氧和炭底產物。第三，遊歷者所得到的關於寒熱帶國各種食物種類及食物之量的證據，以動物熱度之來源底呼吸及化學原理來解釋是講得通的，但以熱度底神經來源理解釋那就不能自圓其說了。

第三章 形上學者所應用的方法

——形上學者用以發現思想定律的方法的考查——

我所蒐集的證據，似乎可以成立為兩個主要的事實，除非是被反駁了，否則就是一般歷史底必需的基礎。第一個事實，歐洲以外的文化，其受自然權力之支配遠較歐洲為甚。第二個事實，是這些權力會留有無窮的遺害；一方面形成財富分配之不均，他方面專注於引起想像之題材，而形成思想分配之不均等。按過去之經驗，我們可以說在所有歐洲以外之文化中，這些阻礙很難掃除；當然沒有一個國家曾經克制過這種阻礙的。但歐洲與世界各處相比起來，是建設在較小的規模上——地域較寒，土質較劣，自然底壓迫沒有這樣嚴重，自然現象所表現的微弱得多——人對於自然所暗示於其想像的迷信比較容易棄除；且容易實行一種雖不算公平，亦可謂較任何古國為接近的財富分配制。

因此，把世界史研究一下，可以概括地說，此中有一種趨勢，就是在歐洲，自然受人類底支配；歐洲以外，自然便支配着人類了。關於這一點，在野蠻國度裏，雖然有幾個例外；但在文明國裏，這個原則已十分普遍。故歐洲文化及非歐洲文化之大區分，即在乎歷史哲學底基礎，因為它暗示着重要的考慮，譬如說，我們如果要明瞭印度底歷史，必須先研究其外界，因為他們底外界對於人之影響實較人對於外界之影響為尤甚。由另一方面講來，如果我們

要明瞭倭英、法等國底歷史，那麼，我們又必須以人爲我們主要的研究，因自然底力量既然比較的薄弱，則偉大的進化之每一步伐，在在都增闢人底思想領域而克服外界底主動力。但即使人底權力達到最高點的國家裏，自然底壓力仍舊是非常大的；不過它是跟着時代底進程而逐漸地減少罷了，因爲我們所增益的知識，使我們不必支配自然，即能預測自然底活動趨向，而因此免除許多必然的禍害。我們努力的成功可以事實來證明，即平均的壽命已永常地增長，而不可避免的危險的數量也減少了；最顯著的是人底好奇心及接觸的機會較任何以前的時期都來得緊張而密切；所以表面的危險似乎在增加，可是以經驗所知，真正的危險全部講起來，卻是遞減了。

(四一)

因此，如果我們對於歐洲史作一廣汎的概觀，而專力於研究其優越於其他世界區域的主要原因，那麼，我們必須對於人底思想怎樣侵入於無機及有機之自然底力量中加以分析。其他的原因都不過是附屬的罷了。註三因我們已經見到，凡自然權力達到最高點的地方，其國家文化必畸形地發展着，而文化底進展必致停頓。故最嚴重的就是要限制自然現象底干預；這大概在這種現象最微弱及最不嚴重的地方纔能成功。歐洲就是如此情形；所以單獨在歐洲，人是真正地能夠馴服自然底能力，將其屈抑於自己之意志下轉移其普通的方向，驅迫其爲他自己底快樂及爲人類生活普通的目的來服役。

我們底週圍都是這個光榮而成功的奮鬥的痕跡。確實的，似乎在歐洲沒有一樣事人是怕嘗試的。有如荷蘭，洪水被逐退了，而全個區域從海底掌握中拯救出來；大山給人們鑿通而夷爲平坦的大道；礮斃的土壤儘因化學

知識的進步變爲肥沃了；至關於電底現象，我們發見了最精微、最迅速和最神祕的力，爲思想之中間物而受人類變化無窮的思想底支配。

在其他的例中，外界所形成的難解的結果而又是人認爲難以處置的，卻也終究被毀去了。最殘酷的疾疫，如瘟疫及中世紀底癩瘋症差不多在歐洲底文化地域都隱跡了；且永遠也許不會再發生。野獸和鷲鳥已完全絕滅，且再也不會在文明人底領域裏作祟。那些可怕的飢荒，歐洲在每世紀中都須受害幾次的，也已停止；我們已很有效地處置飢荒，絕不用恐懼它像以前一樣地復臨了。的確的，我們現在的方法既這樣多，極其量也不過受到些微小而爲時極暫的飢饉；因爲在現在的知識情況中，飢饉的禍害，一開始就可利用化學底方法來補救了。（註三）

現在並不用在許多其他的例中去注意歐洲底文化怎樣地因外界影響之減少而顯著；我當然是指與人志願無關而非人所創造的外界特殊情形而言。最進步的國家，以現在的情況看來，確是比較少受自然現狀底影響，而這種自然現狀對於歐洲以外的文化卻是施展着無限的權力的。因此，在亞洲及其他地方，貿易底路程，商業底發展及其他的同樣情況，都是視河流之數量，河流之暢通與否及附近有否多而良好的港泊而決定。但在歐洲，決定的因素卻並不在這些自然的特殊情形，而在人底處斷和能力。以前最富足的國家也就是自然供給最豐饒的國家；現在最富足的國家卻是人力最活躍的國家。因爲在我們這時代，假如自然底供給是薄弱的，我們知道怎樣補救它底缺點。如果河流難於航行，國內交通不便，我們底工程師知道如何疏濬修築而救治其弊害。沒有河流，即造運河；沒有天然的良港，便建築人工的。減少自然現象底權力，其趨向是這般明顯，即在人口分佈上亦很容易看出，

因在歐洲，最文明的區域內，市鎮底人口處處超過鄉村；且很顯而易見，人愈稠集於大城市，則愈慣於在人事中獲得他們思想底材料，而不專注於自然底特殊情形——這種情形是迷信的泉源，是歐洲以外之文化底人類底進步底阻礙。

從這些事實中，可以很公平地推知歐洲文化底進步是以減少自然定律底影響，而同時增加思想律底影響為特著的。這種綜合的論斷，其完備的證據祇能從歷史裏收集起來，所以我必須為以下的述說上保留許多這種論斷特以成立的證據。但凡是承認以下兩種前提——兩種都無庸置辯的——的人，必也承認我底意見是根本上毫無弊謬的。第一個前提是我們現在沒有自然權力能永久繼續增大的證據；我們也沒有理由想到這種權力應增大能實現。其他一前提，是我們有極足的證據可證明人類思想底原動力較前更有力、更完備，更能解決外界困難；因為每一次新知識底增益，都給予新的方法，使我們能支配自然底運用，否則亦能預測其結果，而不致於不能避免；在兩種例內，都可以減少外界動力所施佈的壓力。

假如這兩種前提都被承認了，那麼，我們可得到一個結論，於這本書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文化之估量若以思想制勝外表之主動力為定，那麼，支配人類進步之兩類定律中，其屬於思想之一類必較自然之一類為重要。固然有一派思想家會視此為當然的，但我迄今還未見他們盡力試用分析法以闡明其理論。至關於我所持論底出處問題，本來無關重要；現在所宜注意者：乃在我們研究之現階段中，我們所提出之問題已簡單化了，發現歐洲史之定律，首需變易為發現人類思想定律了。這些思想定律，若確定以後，將成為歐洲史之主要基礎；至於自然定律重

要性當較次，它們不過引起擾亂而已，其力量及其活動在數世紀中已顯然減少了。

假如我們現在考查發現人類思想定律底方法，則形上學者已預有答案；且視他們底工作為滿意的解決。故此，我們必需確定其所研究的價值，估量其研究之材料，尤宜測驗其方法之效用，那方法乃他們所常應用而視為推測偉大真理之唯一途徑者。

形上學底方法雖然必須分為兩支派，但其原始卻常是相同的，且並含有每個觀察者研究其自己之意念這用底意義。這和歷史底方法恰正相反；蓋形上學者研究一個人底思想，而史家卻研究衆人底思想。現在最應注意的，就是形上學底方法對於任何學術研究方面未有什麼發現。我們現在對於每一事物的認識都是因研究各種現象後確定的；從各種現象中將那些仍然的擾亂原因都除去了，於是乃得彰明的定律。（註四）這種研究的方法，祇有依靠多量的觀察以排除其他偶然的擾亂原因，或用精密的實驗以隔絕這些現象和其他原因混合，方能有效。這兩種條件中的任何一種對於各種推論的科學都非常重要；但形上學者於該兩種條件皆不加以注意，他以為隔絕某一現象和其他原因混合是不可能；因沒有人當其默想時能完全脫離外界事件的影響，且即使他沒有察覺那事件之存在，那事件對於其思想也必產生一種結果。至於其他一條件，形上學者是公然輕蔑的；因為他全部的思想組織都是根據於一種設想，以為研究一種單獨的思想，即能得所有思想的定律；所以一方面不能令他所觀察的和擾亂的原因隔絕，而他方面又拒絕採用謹慎的方法——即拒絕擴充他底研究以減少困擾他底觀察的擾亂原因。（註五）

這即是形上學者在他們底學說底藩籬內所遇到的最初而基本的反對聲響，但假如我們稍加深求，卻又會碰到一種新情形，雖不甚明顯，卻也相等的確定。形上學者既斷為仍由個人的思想可以發見所有思想定律，當他開始應用這種不完全的方法時，即會遇着困難。我所謂困難，在其他方面很少遇見，而對於形上學的討論不明瞭的人每每對這種困難不甚加以注意。所以我們要明白困難底性質，必須對於以上二個大的學派，給它們一個簡短的敘述，——這兩大學派，所有形上學者是必然屬於一派中的。

照形上學底方法講起來，要研究人類思想底性質有二種進行的方法，這兩種方法皆同等的顯淺，但它們底結果卻互異。照第一種方法講來，研究開始先要考察他自己底感覺。而第二種方法，則開始先要考察他自己底觀念。此二方法常引起彼此完全相反的結論。以上的理由尙顯而易見；在形上學言之，思想是一種工具所用的材料。研究這學理底方法和研究目標既然相同，於是遂發生一種特殊的困難。這困難即對於思想現象的全部不能得與一個完滿的見解；因無論這見解怎樣廣博，既然它本身在思想狀態及因思想狀態而生，則必須屏除了這思想狀態。因此，我想我們即可觀察到物理和形上學研究底根本差異點了。在物理學中也有許多研究進行方法，但各方法皆能達到同一的結果。若在形上學中總發見到兩個同等能力同等忠實的人用二種不同的方法以研究思想，那樣的結果也是兩歧的。對於這些事理不明白的人，只要舉幾個例便可使他很瞭然了。形上學者在開始研究觀念的時候，在他們自己底思想裏觀察得一種空間底觀念。因此，他們要問：空間底觀念是在何處發生的呢？他們以為空間底觀念底原始並非「感覺」，因為「感覺」所供給我們只是「有限的」和「難定的」，但空間

底觀念是「無限的」「必然的」。其所謂「無限」，因為我們看不到空間有「完結」的時候，所謂「必然」，因為我們看不到空間不存在的可能性。這就是唯心論者底意見。但所謂唯覺論者，(註六)其出發點不是觀念而是一種「知覺」，於是他所達到的結論就完全不同了。他以為：除非我們先有事物底觀念，我們便不能有空間底觀念；事物底觀念僅能由事物本身所引起的感覺底結果而生。又以為所謂空間底觀念之必然性，皆因我們看到一件事物從來皆與其他事底觀念之間有種不可分離的關連；又因我們常常得到這種關連的經驗，到了後來我們假然沒有位置——換句話說：沒有空間，(註七)我們便沒法看見一種事物。至於空間「無限」之說，我們是觀察從「線」「面積」「厚薄」底不斷的増加而來的，這就是立積底三種變化。在無數的其他方面，我們皆可發覺這二學派之間皆有這種同樣的差異點。唯心論者(註八)謂我們所提及的「因」「時間」「人底類似點」和物質，皆很普遍和必然的；又謂這些皆很簡單；又謂亦不易於分析；所以必是屬於思想底基本組織。(註九)反過來說：唯覺論者則不承認這些觀念是簡單的，以為是極端的複雜，其普遍性，必然性不過是常發生而透澈的關連的結果。(註一〇)

在採取各異的方法時，其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這最大的不同之處。唯心論者被迫着要說「必然」的真理和「難定」的真理，它們底來源是不同的。唯覺論者又不得不堅持它們是同源。(註一一)這二大派學說愈進步則愈南轅北轍。對於道德方面，哲學方面及藝術方面他們都在公開的彼此攻擊了。唯心論者謂所有的人類對於真善美之本質上皆有同樣的觀念。唯覺論者則堅持人對於真善美並無這樣的標準，因為觀念本靠感覺而發生，而

人類底感覺則靠它身體底變化之影響及外界事物對其他的身體底影響而定。這即最有力的一般形上學者因應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所產生相反的結論底一個小小的例證。我們更應該觀察到這二種方法應用以後形上學底論材顯然已達枯竭之境了。(註一三)這二派底學者則同意思想定律只有靠各個人底思想方能發現，並且在思想中無非「反省」或「感覺」的結果。所以他們底唯一選用只有以感覺的結果歸屬於自省底定律，或將自省的結果歸屬於感覺底定律而已。每一種形上學底系統皆在以上兩種方法之一種上面建立的；這種情形也必這般繼續下去，因當二種方法合用時，那麼，就要包含所有形上學現象底全部了。他們自己對於各個的進程皆異常誇美；而附和者也皆十分富於自信；在爭論的性質言之，實找不到調和的地步；也沒有人能加以裁判，因為沒有人能夠調解形上學底爭論而他自身非一形上學者；沒有人他本身為形上學者而非唯心論者；換一句話講：他所裁判決者他也必是兩派中之一員。(註一三)

我想，根據這些論點，我們即可得一結論：形上學者既然不可避免，並且在他們研究的本質上必須分立兩個完全敵對的學派，那麼，即沒有方法可以確定他們彼此底真理了。又因為他們底論材不多，而使用論材的方法並無其他科學曾使用過而生效果的——我們看到上面種種，那麼，我們不應希望形上學者能供給我們充足的材料以解決人類思想史所顯現於我們面前的那些重大的問題了。如果有人能不避艱苦，很公平地去估量精神哲學現在的情狀，那他必須承認：無論這種哲學對於一般最富於思想的人之影響，或因這些有思想的人對於社會所發生的影響怎樣大，從來沒有一種研究像這種哲學那般熱心去追求，費那般長的時間，而究其實，則結果毫無

的。沒有其他學問的研究會有費力這般多而進步這般小的。有許多世紀，每一文化國中皆有許多有能力及其偉大目的的人從事於形上學的研究；但現在他們底統系並不向真理方面推移，僅彼此分道揚鑣，其速度因知識之進步而加甚。這二勢不兩立之學派底不斷的對敵爭競，所維護之勢力及一種用獨斷的不哲學化自信心以左袒他自己底方法——這些思想底研究皆成極度混亂，真似那些道學家在宗教上的爭論一般。（註一四）其結果，假然我們除了幾個少數的聯念定律或加以現代的視覺及觸覺底理論以外，（註一五）我們即可發現在形上學範圍找不到一重要原則，同時，也沒有獨霸的真理。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得不疑惑到在這種研究之中有根本的錯誤暗伏在裏頭了。在我們自己底方面想來，我相信僅觀察我們自己底思想或竟盡我們底力量在這思想用一種簡陋的實驗法，我們還未能將心理學成立為科學之一；並且我相信形上學只有靠研討歷史至相當深切程度，因以明白支配人類活動之各種情狀，然後方能有成。

（註一）這種天災底減少無疑地是增長壽命的一個原因——這原因雖然很小，但最活動的原因是人類健康情形方面有一般的改進。

（註二）關於這方面之一般社會關係我以後即要說了；但請到經濟方面密爾曾經說過：「人類克制自然底權力永久及無限的生長乃顯著地可以表明文明國家經濟方面底進步底運動，且因經生產現象底密切關係而首先引起人類注意者。我們對於自然界事物底性質及定律底知識還未覺得其有限度的表現；知識底邁進及其研究方向之多，視以前任何時代為甚，並啓示我們許多尚未顯露的知識之開，這證明我們對於自然的察究還在幼稚啊！」（見密爾底政治經濟原理第二冊第二四六—二四七頁）

（註三）據在世的某一最大權威底意見：在現代化學知識範圍中，「一體實質可免掉。」（見辯會爾底自然哲學討論第六五頁）

（註四）當然的，演繹的科學對於這方面是個例外，但形上學全部的學理皆建設在其歸納的性質上，且以其包含著綜合的觀察而祇有由這些觀察的成立，精神的科學纔能建立起來。

(註五)這種敘述只有對於採用純粹形上學的研究方法為適用，但在少數的形上學者（其中庫威是法國最有名的）底著作中，我們發現其含有廣大一些的見解，發現他們打算將歷史的研究和形上學的研究相連起來；這樣，他們就承認了他們原來理論之待證實的，亦謂了。假然以為形上學的結論不過像一種假想，而需待證明然後乃能建立成爲一種理論的結，那麼，這種方法便無可反對，所可惜者，他們並未見到這一點；他們底墨守的成見以為這種假想是已經證實的理論，一似他們只要舉心理學家已構成之真理予以歷史上之例證為已足。這種事例與證實的紛擾似乎已成爲一般入底普遍失敗，他們和維科(Vico)及費希特(Fichte)一樣以前例來推考歷史的現象。

(註六)這種名稱是庫威給予所有英國形上學家及空德雅克(Condillac)及其在法國的信徒的一個總稱，他們底學說「可稱爲感覺主義。」(見庫威底哲學史叢書二册第八八頁)

(註七)這一點當爾在他底人類思想現象底分析(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第二册第三二九三—九五頁及其他著作中曾作有力的爭論。可比閱隨克書述中人類理解論著第一册一四七、一四八、一五四、一五七頁及其於第一九八中關於「無限空間之觀念及一個空間無限之觀念之間」的獨創的區別。又在第二〇八頁隨克說：「但到底還有人以為他自己還有很清楚而絕對、廣闊、無限的觀念，他們這般去想固然無礙，但我卻很喜歡他們能夠給我充足的解說。」

(註八)我所說的唯心論者是和唯覺論者相對的，雖然形上學者常將「唯心論者」一名詞應用於其他一種意義上。

(註九)斯丕爾特(Donald Stewart)在一八一〇年愛丁堡所出版的哲學論文(Philosophical Essays)第三頁這樣告訴我們：「人與人類似的簡單觀念」又利德說：「我知道，沒有一種觀念或意見比空間和時間的觀念再簡單、再原始的了。」(見恩德力論著[Essays on the Powers of Mind]第一册第三五四頁)而在英文形上學裏，時間是「一個獨立的因素。」

(註一〇)空間既是一個廣況的名詞包括所有的地位或同時之事物全部，那麼，時間也是一個廣況的名詞包括所有的繼續性或事物繼續性之全部。(見爾爾底思想底分析第二册第一〇〇頁，又對於時間記憶之關係可參看第一册第二五二頁)在爾爾底哲學新系統第一册第三三頁說：「時間不過是各種事件底繼續性而我們祇有靠經驗方能明瞭事件底真像。」

(註一一)爾爾底附從者都這樣說；又該學派底某最近出版物說到：「如果說必然的真理不能由經驗而獲得，那麼，不啻否認我們底知識

及理性底最清楚證據。」

(註一二)爲避免誤會起見，我現在再覆述一遍，在邏或其他地方我所說的形上學就是指那大部分的——建立在一種設想上，以爲人類思想定律祇能由個人的意識底事實中綜合起來——學問。形上學這名詞在這種意義上似乎不甚適合，但假如讀者能夠深切瞭解這個定義，那麼，也不見得有什麼紛擾罷。

(註一三)我們在這方面得到一個特異的例，就是庫威威建立一個折衷學派的嘗試，因爲這個有能力而學識豐茂的人實不能避免每個形上學者所必謹的單方面的見解，他又承認了必然觀念的主要分別點，唯心論者即因此點和唯覺論者相背離的。「今日思想界成立的最大分立，是必然的思想與偶然的思想之分。」(見庫威威著哲學史叢書二第一冊第八二頁) 庫威威反對陸克，並且說他曾駁斥那個奧深而有力的思想家；同時他簡直對密爾底議論沒有述及，密爾以形上學者底地位言之，是現代唯覺論者中之最偉大者，無論其見解合理與否，一個折衷的哲學史家對於他，當然是應該覺得可注意的。

還有一位折衷人物哈密爾登宣稱：「一種未成立的哲學我相信是建立在真理上的。我有這種的自信心，不惟從我自己底意識上的信念得來，且因爲我爲各方相對立的意見在這種系統裏頭找出一種中心及調解。」(見哲學討論第五九七頁)但在第五八九頁中他把這些哲學意義底最重要之一點總結了說：「隨克底空虛的廣度。」

(註一四)柏克利 (Berkeley) 在誠懇的時候不留意地承認他自己這種研究的名譽上的危機，他說：「總之，我不得想不到現在哲學家所遇到的困難及其知識的障礙，但大部分都是我們自己引起來的。我們自己掘起了塵土，而又去怨慰自己看不見。」(見柏克利論著第一冊第七四頁)人類知識底原理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每一個形上學家及神學家皆應牢記這句話：「我們自己掘起了塵土，而又去怨慰自己看不見」啊！

(註一五)休謨 (Hume) 及哈特利 (Hartley) 謂有幾個聯念定律可以用歷史來證明，這種證明可以將形上學的設想變爲科學的理論。哈特利底前覺說及布爾底觸覺說皆用生理學來證明過；於是我們知道什麼是我們應加疑惑的了。

第四章 道德定律與知識定律底比較

——思想定律非屬於道德的即屬於知識的，道德定律與知識定律之比較，及其各對於社會進化上所產生之影響應探討。——

在前章我相信我已講明白：無論以後情形如何，我們僅以現代我們知識底情態而言，我們必以為形上學的方法不足以擔負發現支配人類思想動向之定律底工作。所以現在只得跟着唯一的方法，照此方法，以研究思想之現象，其範圍不僅限於個人之所表現，且包括全人類活動之現象。這兩種方策底主要不同點甚為顯明：但我現在最好再舉數例，以表明每種方策所恃以研究真理的方法；因着這個目標，我且選出一種題材，可以證明在最相衝突的情形下，那些自然偉大底定律，其規律性實能指揮其動向，雖然這種題材尚未給人們詳盡地明瞭。

我所說的題材，即是「兩性出生之比例」；這種比例在無論任何國家，若是非常不平衡的話，那麼，在一個世代中，可以影響而生全社會底非常混亂，而罪惡因而激增。（註一）一向大家以為男女底出生律是很均衡的；但至最近，沒有人能說男女底出生律是否均衡，假如不均衡的話，那麼，那一性底數目較為超越呢？（註二）出生既為身體前之身體的結果，於是出生底定律必顯然地包含在這些前身之內；這就是說：兩性比例底原因全視乎父母之本身而定。（註三）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我們底動物生理學的知識不能解釋這種困難時，問題便會發生了；因為一向有很難聽的話說：「生理學既成為身體定律之研究」（註四）又既然所有的出生皆為身體之生產物，因此，

我們如果能知道身體底定律，便能知道出生定律了。」此即生理學家一向所持的見解，亦為歷史上所有形上學家庭見解。兩派人都相信以為即欲知這種生產現象是可能的，並研究出生定律即可預知出生定律之本身。生理學家說：「假然研究個人底身體而能因此確定支配父母結合之定律，那麼，我便能發現兩性底比例，因此種比例不過是結合所產生之結果而已。」同樣地，形上學家也說：「由個人思想底研究，我便能確定指揮個人行動的定律；用此種方法，我也能預知人類底行動，人類底行動很彰著的為人類行動之總和。」這即生理學家關於兩性定律所非常深信的希冀，亦為形上學家對於歷史底定律底期望。至於這種預期，形上學者完全沒有做什麼工作；生理學家也沒有成功，雖然他們底見解得到解剖學底助力，解剖學應用了直接的實驗而非形上學者所知的。但假然要解決現在的問題，這些解剖學底助力委實沒甚用處；並且生理學者尚無一種事實足能給予這問題一些曙光；男女底出生數目是否平等，抑互有偏歧？

這些問題自亞理士多德時代以至現代生理學家所有的材料都沒法回答。（註五）但現代我們因為應用一種現在似乎非常自然的方法，已得到一種真理，這種真理為以前許多卓識多能的人所曾通力合作而尚未能成功者。用一種簡單兩性出生數目註冊的方法，再伸展這種註冊以至各國而迄若干年後——於是我們便能免除許多紛擾，併且能確定有一種定律之存在，這種定律是以概數為之表明，即每二十女子中必有二十一個男子；又我們可以深信地說：此種定律固常有反常的錯亂與變化，但定律之本身既如此其有力量，使我們知道每一國家，其男性之出生量未有不超過女性的。（註六）

此種定律之重要與其保有健全之規律性，使我們覺得它還是經驗上的真理；而未能與影響此種定律之運用的自然現象發生關聯，實爲遺憾。（註七）但這一點對於我們底目的並無重要關係，因爲現在的目的只要注意發現此種定律方法而已。蓋此種方法很顯然地和我所主張研究人類思想運用底方法相同；同時舊日無成的方法即與形上學者所研究者相類似。當生理學家要試用個人底實驗以確定兩性比例底定律時，那麼，其所希冀的目的絕不會有所成就了。但常人們對於這種單獨的實驗發生了不滿，開始要搜集一種，比較上沒那麼精細，但來得實況些的觀察，那麼，自然底偉大定律在數世紀以前所未尋得者已初度顯佈在他們底目前了。同樣的，如果人類底思想僅照形上學底狹隘的膚淺的方法來研究，那麼，我們有不少理由可以想到那支配人類思想運用的定律永不會給我們發現了。所以假然我們願意真的得到真理，我們必須遺棄向日的方法——這種方法之效能假然已經由經驗及理由方面表明出來了；並且我們應廣汎地考察事實，以代替舊方法，如此，即可使我們免除許多因實驗之不可能而使我們永不能排脫的紛擾。

我因爲欲令到本章初步的見解弄個清楚，故離題太遠，這點我最引爲憾歎的，不過離題的解說雖然對於議論方面未能增加力量，但可用爲例示，可以使普通的讀者領會到以上所提方法之價值。現在只要我們確定因應用此種方法如何可以使思想進步之定律最易於給我們發現出來而已。

第一點，如果我們要問這種進步是什麼，那麼，它底回答是很簡單的：這不過是複式進步，卽是道德的與知識的；第二個對於我們底責任方面，後一點對於知識方面皆占直接的關係。這種分類法爲向所習用，亦爲人所習知

者。歷史既爲事實結果的敘述，那麼，這種分類之完全屬於正確也不容疑了。一種人民假然其能力與其惡行同時加增，或者民族愈道德化同時其知識愈愚昧，這實不是真的進步。這種道德與知識併進的運動於文化底本義上異常重要，並且包含思想進步的全部理論。願意盡我們底責任是屬於道德方面的；要知道如何去履行這種責任是屬於知識方面的了。這兩部分愈結合，則其功用愈和諧；對於這目的採用的方法愈正確，則我們生活計畫之成就將更完全，並且我們人類之進步方面能立一更可靠之基礎。

現在在這重要關頭發生一個問題：就是所謂思想進步之兩種成分孰爲重要？既然進步之本身爲這二成分聯合動作的結果，於是必須要確定那一種作用來得有力量，因此，我們可以把不重要的成分附屬於重要成分之定律中。假如文化底進展與人類普遍的快樂靠道德的感覺比較知識上的進益來得尤爲重要，那麼，我們當然可用這種感覺以測量社會之進步；同時，反過來說：假然全靠着他們底知識的話，我們又須拿知識方面底量和成就以爲我們底標準。當我們知道這兩種成分之連接的力量，我們將要採用研究真理之普通方法以爲應付；就是說：我們將要服從比較有力的作用底定律來看他們連合活動的結果，這種有力作用的定律常受比較力量較微弱而次等的定律之困擾。

此種研究一經着手，我們即遇到一個初步的困難，這困難發生於名辭之不正確。因爲「道德和知識進步」這一個名辭，在表面上暗示一種嚴重的名辭符實的情態。這名辭普通用起來含有人類底道德和知識底功能在文化進展上自然比從前來得尖銳而有價值的觀念。但這點雖或屬實，但從來沒有得到證明。或因尚有未被發現

的自然因素之故，平均的腦量假然得長時間的比較計算，或可發現腦量正在漸進增加也說不定；所以經過腦底活動，思想即使離開了教育也得增加它底敏銳及普遍地增廣它底見解。（註八）但對於這方面的自然定律我們當不大明瞭，並且對於支配性格、脾氣（註九）及其他個人特性之遺傳情形還全在黑暗中，因此，我們必須觀上述強辯的社會進步實爲異常可疑之點了；併且以我們所保有之知識而言，我們不能穩健地說，在人類道德及知識的功能上是否有永久的改進，同時，我們也不能決定說，在歐洲最文明的地域所產生的嬰孩底上述的功能是否較最野蠻地域底嬰孩爲優異。（註一〇）

所以無論人類道德及知識之進步情態如何，其進步之本身與天賦才能無關，而爲機會促成的進步；這就是環境底改進，在此改進的環境中，人類誕生以後其天賦才能即在這裏頭活動。這就是全部的緊要關頭。進步非內在的力量，而爲外來的助進。誕生在文明地域底嬰孩並非怎般比野蠻地域底嬰孩來得優異；照我們所知這兩個嬰孩動作之不同完全因受了外方環境所左右；我所謂外方的環境，係指周圍的意見、知識、聯系，一言以蔽之，就是兩個嬰孩各別所受養育而成之思想氛圍。

關於這方面，很顯然地假然從人類全部觀之，道德與知識方面的行爲是全受他們當時流行的道德及知識方面的觀念所支配。當然也有許多人能超乎這種觀念之上，但也有連這種觀念也跟不上。不過這些是例外的情形，和善惡並不顯著的大多數人比起來，實是極小的比例。大部分的人類必常在中等的情狀中，既不是十分下愚，也不算十分能幹，沒有卓邁的美德，也不會有分外的邪惡，祇是懵然生活於和平中庸的狀態中，每每不加深究

地很易採納當時流行的意見，對於恥辱及新奇的事沒有敏銳的感覺，只能與當世同浮沈，無聲無息地遵行他們的國家當時的道德和知識的標準。

現在祇須稍為獵涉歷史，即可明白這種標準是時常變換，即兩個極相雷同的國家或一國內的前後兩代也決不會恰好相同的。任何一國底流行意見，幾乎年年在各方面都在變化着；某時期曾被攻擊為僞論者，在另一時期則被認為絕對之真理；過此以後，又會有新奇的意見蔚起而取代之。這種人類行動普通標準之極端不穩定，表明其標準所持之條件本身即非常不穩固；而這些條件，無論其性質如何，顯然是大多數人類之道德及知識方面的行為底創始。

到這裏我們便有了基礎可以安然邁進了。要知道人類行為底主要因素是極多變化的，現在也只有將這種試驗應用於假想含有此種因素之任何環境之下，但設使發覺那環境並沒有多大的變化，那麼，我們自當推知那並非我們所需的因素了。

拿這種試驗應用於道德底動機或所謂道德底本能，我們立刻便會知道這些動機對於文化進步的影響是那般地微弱。因為在這世界裏，道德系統下所包含的偉大的信條皆是極少變遷，這點實是無可疑問的了。對他人行善；合己從人；愛鄰如己；寬恕敵人；抑制情感；敬順父母；尊重上峯；凡此等等皆為道德上最主要的本質，這些信條也是數千年來為人們所習知的，可是一般道德家神道學家卻從未沒法在基督底遺訓和他們底佈道當中對於這些信條有所增益。（註一一）

如果我們拿靜止狀態的道德上的真理和知識上的真理相對照，其差別之巨，實足駭人。註一三所有那些主要而曾經發生普遍的影響的道德系統，在基本上都是彼此相同；而所有的知識系統則根本實互異。至說到道德方面的動作，現在大多數歐洲文明人所熟知的原則沒有不是古代人所已知的。而知識方面的活動，現代人非但在每一個知識世界中有很重要的增益而為古代人從沒嘗試過的探討，再進一步，他們更要推翻一切向日的研究方法；他們把亞理士多德個人曾經有所發覺的所有的歸納方法結合而為一個大的研究規劃；他們創造了科學，但今日這些科學研究，就算它底微旨片影也沒有存在過古代思想家底幻夢裏頭。

以上種種皆是很明顯的，且為一般有學識的人所公認的事實；要從以上事實去加以推論，自能易於明瞭。既然文化為道德與知識作用共同的產生物，又既然這產生物常是變化的，那顯然不會給靜止的作用所支配；因為周圍的環境不生變化時，則一個固定的作用只能產生一個固定的結果。那麼，唯一的支配文化底作用，即屬於知識底作用了；這作用若說是正確的動力，現在可以用兩種彰著的方法來加以證明：

- 一、因為我們已知，能支配文化者或為道德的或為知識的，既不是道德的，則必是知識的；
- 二、因為知識底原則有一種活動和能力以適應一切，這種適應已足證明它是支配了那數世紀以來在歐洲方面繼續在邁進的非常的進步。

以上的理論便是我個人底見解之所根據；但尚有其他有關的情形亦值得我們加以估量者。第一，知識的原則非但比道德的原則較見進步，且其結果尤着有永久性。在每一文明國家，知識上之所獲得，皆在在小心於保存，

並紀錄在非常明瞭的方式中，且用專門及科學的文字以傳之永久；代代相傳，造成一種易於感受的方式，以使其影響於遠代，成了人類底傳代的寶物，為天才者底永久的遺產。但我們道德上的才能所發生良善的行為比較的，不易於續傳；這種行為多數屬於私有及隱晦的人格；至於說到它們底原始動機，本來是個人訓練及犧牲的結果，所以必本於個人的出發點以表現發露之；所以這種各個人自動發露的行為不會從以前經驗所歷的信條而得進益，也不會將他本人底良善行為搜集以備將來道德家之參證。其結果則道德上的最高成就雖比較知識的更覺可親，但我們仍須承認因曠及以後的結果，道德上的成就比較上不甚活動，其奠基亦較欠穩固，並且我可即加證明，也比較地沒有真實的結果。假然我們考查最活動的慈善事業及廣博無私的好施，我們無疑地可證明其影響所及為時極暫，且只有少數者能獲得這種恩澤；其所溥澤的世界曾不能有生氣勃勃之觀；這種慈善事業即使有了大規模而永久的組織，也時常有傾覆之虞，在始，主持的人每易流於濫用權責，次則漸至腐化，再次則終於毀滅，或至失了他們底原意，妄用其力量，或竟不欲保全其向日慈善之旨。

我這些結論，無疑地非常不受人家底歡迎，其理由是它實在難於給人家駁倒。因為對於這問題研究愈深入，則對於知識上的成就遠邁於道德方面的觀察，我們愈能清晰了。在歷來記載上，凡屬愚拙而良善的人雖有為善的決心與行善的毅力，但究其極則每致惡果多於善果。當其志願愈熱誠，其力量愈充足，則惡果愈大。但如果能低減他底熱誠，如再能在他底動機中加入其他成分，則所釀成的惡果或可見減低。假然那人是富於自利心而為人又復愚昧，亦可利用其愚昧以免除其惡行之發生，並可激動他底恐懼以阻止其作惡。但假使他既無所恐懼，漠然

於自利之企圖，而主要目的在乎利人，假然他又本其熱誠以大規模追求其行善的目的，而我又窮於術以禁阻之，於是便沒有方法以障阻在一個蒙昧世紀中一個愚黯的人所闖出來的禍害。只要我們去研究歷來的宗教壓迫史，即大可用經驗而加以證明了。爲宗教主義以刑罰個人當然是最嚴重的罪惡，不過去刑罰多數人，壓迫所有的異教徒，且盡力以圖消滅養成對方勢力底社會底意見等舉動本身實爲人類思想最足奇異最能極其能事的表現——這種舉動據我們所知不但極有害，並爲最愚的動作。但那些大多數的宗教壓迫者固爲意志極純潔、極可贖許的道德家。這又不容我們去否認。因爲他們本來不是惡人，且很要把他們認爲善的信念設法力行者。他們更不是惡人因他們不顧現世的利害，舉全力以續傳他們認爲人類未來快樂所寄託的宗教而並非爲他們自己底利益。所以他們本非存惡念而病在愚昧；他們黯於其理底性質，忽於他們自己底動作所發生的結果。但在道德的眼光看來，他們底動機本無可指摘。當然的，他們所以要出於壓迫手段者實全爲熱誠所驅動而然。這是神聖的熱心所推進的狂熱的信念而成功的一種悲慘的活動。假如你能令一個人深深信仰着某種道德和宗教教義底重要性；假如能够令他相信：凡違反這種教義者須受永久的刑罰的；假如把權力給了一個人，而因他底無知致他自己底行動成了盲目的，——他將致於虐待那違反他底主義的人；而他底虐待底限度遂受他底熱誠底限度所支配。減少了他底熱誠即可減少了虐待了；換句話說：能減低他底德行即所以阻止惡果之所由生。這是一種真理。而且歷史上已給我們無數的例示了，若要反對這種真理，則非但是表示不接受最明白最確鑿的議論，且係反對各世紀所連續表現的證據了。我只要選出兩種不同的事實，因其情形之各殊，可以供給兩種人相對的例示：第一

事實得自異教史，而另一事實則得自基督教史中；兩種事實均證明道德底感覺之沒有能力去阻止宗教底壓迫。

一、羅馬諸皇對於早期基督徒施行壓迫之事彰見史實，這種壓迫雖然未免說得太過分，但總是常見而極悲慘的事實。有些人必覺得希奇，因為施行這種壓迫的最活動者卻是羅馬諸皇之最賢明者；而沒有藉藉聲名的皇反係最能饒恕基督徒而對於他們人數之增加是最不關心的人。兩個最庸暴的羅馬皇當推科摩達斯（Commodus）及伊拉加巴拉斯（Elagabalus）。這兩位君皇皆沒有壓迫新教，當然也不採任何方法抵抗這新教。他們對於未來漠不關心，專事自利而太沈溺於不名譽的快樂裏，那裏管得一切流行思想是真理抑屬邪教；因此，他們對於人民幸福表示冷淡，他們對於信條底進步未嘗關懷，因其本身是信仰異教的君主，於是那些信條不過僅是大逆不道及侮辱上帝的謬說而已。所以他們放任基督教馳騁於它自己底大道裏，並不似那較公正而實較易犯錯誤的統治者之採用刑法加以限制。（註一三）我們同時可以發現基督教底大敵乃是馬可·奧理略（Marcus Aurelius）。他是一個性情仁厚，而大無畏，不可搖撼的忠實的人，但終其位顯著着一種壓迫空氣，如果他對於他底父祖底（註一四）宗教信仰沒有那般熱誠也決不致那樣的。今為補足這種理論計，我們可以再舉出一位最後反對基督教而最力的羅馬統治者。這就是愷撒，他是一個異常忠實的皇，他底意見常受人家底攻擊，但說到他底道徳行為就算是誹謗本身也不能對之發生絲毫疑惑。（註一五）

二、第二個例是西班牙，這個國家，我們可以承認從來沒有一國底宗教精神有它底國民感覺得那般敏銳。沒有一個歐洲國家曾經產生那麼衆多的熱誠無私的傳教者，及熱烈而自謙的殉道者，這些人很快樂地犧牲其性

命，因為要頒傳他們所認為必須普遍傳播的真理。沒有一個地方那宗教階級擁有勢力能够那般持久；沒有一個地方底人民具有那般熱烈的信仰，教堂那般地擠擁，教士那般地衆多。但西班牙人民對於宗教目的之真誠及其忠實，（整個講起來，常是很顯著的，）非但不能阻止宗教底壓迫，并且從而鼓勵之。如果這個國家對宗教比較冷淡些，便比較能够對異教易於寬容些。惟其那般地熱誠，所以視信仰底保持實爲首要之舉；爲着這個目的任何事物都可犧牲，於是這種熱誠自然地產生一種暴虐的舉動，並且在這地方異教徒裁判所也就得到了根基，從而發展茂盛。贊助這種野蠻組織並非偽善者卻是熱心者，偽善者大概總是流於卑屈而卻不致於暴虐。因爲暴虐是一種嚴正而不可抑折的情感；而偽善卻是一種阿諛而可以轉移的一種手段，這種手段牽就着人家底感情，逢長人家底弱點，以達其目的。在西班牙，民族底熱心完全集中在一個單一的問題——宗教——其他一切事物都要隨着宗教爲轉移；於是對異教的深惡痛絕遂積漸而成習慣，對異教的壓迫也視爲一種責任。爲實現其責任的一種磅礴浩翰的力量大可以在西班牙底教會史中尋找出來了。那天主堂教堂裁判者以不偏見不腐化而著名的一點可以從許多方面看出來，併可從各方面獨立的證據證明出來。這點容在下再爲詳說；但有兩種證據不容忽略者，因這點和所論的有關，實在沒從而略難的。羅朗素（Llorca）是一個研究異教徒裁判所的史家，也是裁判所底勁敵，他能接近一切裁判所底私有文件，他雖有這許多的材料，但仍不敢對於裁判者底道德人格加以絲毫諷刺的話；不過當他敘述到他們底道德行爲的暴虐時，卻不能隱言他們底動機是純潔的。三十年前英國教會中的教士道森德（Towson）印行他關於西班牙的有價值的著作，雖然他因是一個英國人和一個新教徒，

很有刻意反對那不名譽的制度的可能性，但他找不到證據去攻擊主持的人。而當他有機會去說到在巴塞羅那（Barcelona）地方一個機關——卽異教徒裁判所最重要者之一——時，他很明顯地承認在這機關裏頭的人員均屬有價值的人，而且大多數實在是存心爲善的呢。（註一〇）

這些事實那般驚人也不過歷史所包含大多數證據裏頭的極小一部分而已，並且已可證明道德的情感全不能減少宗教底壓迫。而知識上所得的進步卻真確地證明對於宗教的壓迫有減輕的力量，這點我將在本書其他部分加以討論；我們可以看到不寬恕異教徒底大敵人不是善心而是知識。只有知識底傳佈可以比較地能停止所有惡人對於其同種所施與的惡行。因爲宗教壓迫之所以比較上屬於大的惡劣行爲，其明顯之處到併不是從許多知名的犧牲者發現出來，（註一七）卻反從許多不見經傳的人尋找出來，他們身體上雖未受甚麼痛苦，而精神上卻感到異常的壓迫。我們聽見許多犧牲者懺悔者——這些人曾受死刑、火刑；但我們并不知道別有許多人們因爲怕受壓迫而致違棄他們底本來意見；因恐懼而被逼着脫離自身的宗教，於是終日在永久的虛偽中渡着餘生。這纔是宗教壓迫的真確可咒咀的事了。因這樣人既然不能不遮蔽他底本身思想，於是發生一種習慣用虛假以獲得個人底安全，以欺騙換得免災。如此，則欺騙變爲生命之必需；不真誠乃日常之風習；公共情感之全部情勢因以破壞，而大量的惡行和錯誤將無忌地激增了。當然，我們有理由可以說，和這比起來，所有其他的罪惡都是不足輕重的；又我們可以感謝知識事業底進展，牠已滅除那現在還有人打算予以恢復的惡行。

我所主張的原理於實際及理論上既是這般重要，我還可再舉一例以表明其運用的力量。人類較次的大惡

行——除宗教壓迫外，受殃最大者——當然就是戰爭了。這種野蠻的事件，在社會的進步上，已逐漸減少，即就是略事瀏覽歐洲史的讀者也覺得是明顯的事實。假如我們將各世紀相互比觀，我們將發覺在長時期中，戰爭積已減少；且現在這種減少的運動是這般地明顯，若由最後一次的對壘算起，我們已將享有四十年的和平了；這種情形即在我們本（英）國及世界各籍主國家也未嘗有過的。問題便要發生了：這種大的進步我們底道德感覺有無參與呢？如果這問題底答案非預先懷着的偏見，那麼，按着我們所搜集的證據告訴我們：便是這種感覺並沒有參與。當然我們不能故意說：現代人關於戰爭惡行底道德觀念曾有所發見。這點實是數世紀以前久已明瞭者。在這問題上只有兩個原則為道德家所能指示出來的：一、抵抗戰爭是合理的，二、挑戰則反是。這二原則在中世紀戰爭最多的時候久已著為公理，而在戰事漸少的現在，我們對這些原則也僅有同樣的感覺而已。既然人類關於戰爭底動作已漸改變，而他們關於戰爭底道德知識卻仍保留本來面目，這便很明顯了——不變化的因素絕對不會產生變化的結果。我們不會找到其他的證據比較這種論據來得確定。如果能够證明在最近一千年裏頭道德家與神道家能夠指出一個前人所未知戰爭底惡果——若果這一點能夠證實的話，我當然能放棄我所有的見解。如果照我所深信的說過的理論觀之，這一點當然沒法證明的，於是我們必須承認在這問題裏道德底量底方面本來未曾有所增加，而在道德所產生的結果也不能有所增加。（註一八）

這許多都是敍說，因道德感覺的影響增加了我們對於戰爭的厭惡。但說到人類底知識方面，在最狹義的意義說來，每一次知識活動的大的邁進實是戰爭精神底大打擊。對於這點的充足的證據，將來我要加以詳細的探

究；在本書裏，可以把幾個特顯之點舉列出來，這些因為在歷史底表面上即便可以看到的。

這些特點中最明顯的一點，是知識世界中的每一步的邁進皆因他們所用材料之增加，而增大了知識階級底權威。現在這一階級和軍人階級間之敵對是非常明顯的：這是思想與行為的對敵，內心與外界的對敵，論據與強暴的對敵，說服與強力的對敵；或總言之，即兩種人對敵，一種生活在和平的事業上，而他一種卻生活在戰爭的實現上的。所以若對於前一個階級是偏袒了，那麼，顯然對於其他一個階級是不利了。假如其餘的情形均屬相同，則一種人民其知識之獲得增加，好戰心必因而減少；又如果其知識進步遲鈍，則好戰心自必強烈。在完全野蠻的國家，知識的獲得甚微鮮；他們底腦是空虛的像荒漠一般，思想的唯一內涵僅是向外的活動（註一九）而唯一的才能便是個人的勇敢。人能把他底敵人殺掉了，那纔給人家看得起；人愈殺得多，則其名譽愈大（註三〇）這是純粹的野蠻情形；在這種情形裏，以戰事的榮耀為最有價值，軍人最能給人們看重。（註二）從此種可怕的下情形以至文化的最高潮都有一個久長而相互連接的階梯：即從強力方面所保有的力量漸漸轉移增加了思想界底權威。知識階級及和平階級日見蔚興；他們最初給武士輩非常地輕視，可是我們漸漸獲得了地位，人數與權力亦同時增加，而且每次的增加足使舊日的軍人精神漸趨衰滅，我們稍一回顧，以前所有的事業實在都給軍人精神所壓入過的。商業、貿易、工業、法律、外交、文學、科學、哲學——這些東西在以前均了無所知，而現在都已蔚成各個專門的研究，且各有其研究階級，各階級重視其自己的研究。這些階級無疑地或其他階級欠缺和平的徵象；但即使這些最不平的階級仍視那些腦海中充滿了戰爭空氣及專恃戰爭以為進身之階者，其精神尚優勝一籌。（註三）

那麼，當文化進行時，便發生了一種平行的狀態，又軍人熱也給其他的動機所減低了，而這動機只有文明人能夠感覺得到的。不過在思想並無進展的民族中，則此種平衡狀態就不會存在。關於這點我們在現代戰爭史中可得到一個極好的例。（註二）因為這種大的爭鬪底特點並非發生於文明國家底利益上的衝突，而是兩個歐洲現在僅存的最野蠻的國家俄國與土耳其底破裂。這是非常顯著的事實。當時社會之真實情形的特著點，即是這次長期的和平之破壞並非兩個文明國家底爭論，而是不文明的俄國侵略那更野蠻之土耳其。在比較早期時，知識與和平習慣的影響自是常時增加，但即使在最文明國裏頭，知識與和平底力量要去支配舊的戰爭底習慣，其力量依舊是很薄弱；因此，引起一種期求戰勝的希望，這希望且常比其他感覺熱度為高，並且引誘兩個大國如英與法每每為着小故而借端輕啓戰釁，找尋機會以互相征伐，惟恐敵國之國勢日臻興盛。但情形進展，這兩個國家放棄了舊時所縱容的器量不廣而易激發憤怒的妒忌心，因着一個普通的原因而連合起來，拔刀相向，非為自衛的目的而為文明國家抵禦野蠻人底侵略。

這便是舊日戰爭和今日戰爭底主要狀態底分野。保持了四十年之久的和平現在一旦給一時擁有強權而不文明的帝國底野心所摧殘，而並非起於文明國家底互相仇視，這也是許多例證中足以證明戰爭底厭惡僅是文明國人獨有的感覺的一個例證。因為沒有人能矯揉地說：俄國對戰爭的偏好，其理由是道德觀念之衰微，或對於宗教責任不履行之結果。所有的證據表明俄國底惡習慣並非比英國、法國來得普通；（註三）我們還可以確定俄國人民之對教會教義服從的熱誠比其他文明國人所表現者為尤大。（註四）所以俄國之所以為好戰的

國家的確地不是因地底人民之不道德，實因他們之無知識。其弊病在思想而不在性靈。在俄國，國家知識基本既失於培植，而知識階級沒有勢力；於是軍人階級遂高於一切。在社會早期，中等階級尚未產生（註二〇）於是從中等階級所產生富於思想而和平的風氣當然不會存在。人類底心意既然沒有了思想上的研討（註二七）那麼，惟有趨向於戰爭範圍之一途。因此，在俄國所有的能力皆以軍事的標準來估量。他們底陸軍為國家之最榮耀代表；一戰之勝，或以智巧敗敵認為一生最無上的成功；而一般平民無論其才能若何超邁也給那些野蠻人民輕視為完全劣等而附屬的賤民而已。（註二八）

在英國，反過來說，相反的因素適產生相反的結果。我們知識進步既如此之速，中等階級勢力既如此展擴，軍人非特於政治毫無干預權力，且在某一時期，我們恐怕倒有將這種感覺推過分的危險；併且恐怕為我們厭惡戰爭之故，遂致忽略其他國家彼此仇恨所必備的同樣軍備。但至少我們可以很穩健地說：民族所傾好的好戰心已經完全消滅了。這種大的結果，既非受道德教訓底影響，也非受道德本性底制裁，不過受一種簡單的事實底影響，即在文明底進程中，社會已蘊釀成某幾種的階級，他們有保持和平的興趣，舉他們底力量已足制裁好戰階級底野心。

引伸這種論據，當易於證明軍事方面底事業必因知識追求的傾好日增之故而逐漸退化，這非但在「名」方面抑在「能力」方面也是那般地退化。在一個退化的社會裏面，有特殊才能的人必蜂湧地投入軍事一途，並以能入軍人階級為可沾沾自喜。但及至社會進步了，新的活動便開展着，新的職業興起來了，這種活動及職業其

主要點既皆屬思想方面，於是使天才者得到成功的機會比以前來得快。結果，在英國這種機會比任何地方為多。譬如一個父親看到他底兒子底才能是特殊顯著的，他便會使他從事一種非教士的職業，這種職業加上了他自己底努力便一定會得到報酬了。可是，如果這個孩子底低能性是異常明顯的，也立刻有一個妥當的補救方法：這便是或者令他做軍人或充教士；把他送到軍隊或教會中。這一點以後就可以看到當社會進化時，宗教及軍人精神何以必趨於衰微。當一般有才能的人都不願從事的那種事業，那麼，那事業的固有光彩自然地日就黯淡了；名譽首先低減，繼而權力也被剝奪。關於教會及軍隊方面，歐洲現在的確正在經過這種進程。至於說到教會事業，其證據可以在本書底他部分說及。而軍事事業底證據也是同樣地固定。雖然這種事業在現代歐洲產生過幾個非同的天才者，但人數既這般的少，很足使我們驚奇其原來能力之缺乏。假如我們在長期加以比較，那麼，更明白這軍人階級整個講起來已有了退化的趨向。在古代，主要的領袖武士非但有重要的成就，且為政治、軍事上廣泛的思想家，併且在當時，他在任何方面係不失為錚錚有名之人物。所以——只要從一種民族裏舉出幾個例來——我們發覺到希臘自來所產生的三個名政治家即索隆（Solon）、塞密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及伊巴密農達（Epaminondas）——這幾個人都是著名的軍事領袖。蘇格拉底，古人中之所謂最負天才者，也是一個軍人；柏拉圖也是一般；安提斯善尼（Antisthenes），犬儒學派底著名創始者也不過是一個軍人。阿開塔斯（Archytas）對於「畢氏哲學」（Pythagorean philosophy）另有一種新的見解者；和美利薩斯（Melissus），他是意大利底「埃利亞哲學」（Eleatic philosophy）底繼承擴展者——這兩個學者都是著名的將軍，同時對於文學和戰

仗都有名的。在最負盛名的雄辯家中，培利克利斯（Pericles）、阿爾西拜提（Alcibiades）、安多西提（Andocides）、狄摩西尼（Demosthenes）及埃斯基尼（Aeschines）都是從事於軍事的人，又兩個最偉大的悲劇作家埃斯基拉（Aeschylus）、索福克利斯（Sophocles）也是這般。阿基羅卡斯（Archilochus）據說是發明了音韻文，而荷羅斯（Horace）所視為模範者，也是一個軍人；忒提阿斯（Tyrtaeus）哀詩底創作者，阿爾西阿斯（Alcaeus）著名抒情詩作家，也都是從事於軍事的。希臘史家中之最富哲學思想的當推修西提提斯（Thucydides），但他和塞諾芬（Xenophon）、波里比阿（Polybius）二人皆在軍事上會占有很高的職位，並且在戰陣中時常能轉敗為勝的。在喧鬧而忙碌的營寨裏，這些富有才能的人在時代知識容許之下，能夠發展其思想之最高點；其思想之範圍既如此廣大，其抒寫出來之風格也是那般美麗而嚴正，於是他們底著作曾給從來不注意戰事發展的無數論者所誦讀。

這些便是古代軍事事業底點綴品；所有的著作皆用同樣的文字寫出給同樣的讀者去欣賞。但現代世界，這種同樣的職業包含了數百萬的人員，而地域且舉全歐洲自十六世紀以來還不能產生出十個第一流的著作家或思想家。笛卡兒就是一個歐洲戰士中而能具有雙重才能的人底一例，他以著作風格美麗著名，而一方他底研究很能深造而近乎創作。這不過是一種少數的情形；我相信沒有第二個現代軍人著作家能夠這般在兩方面都有超越的成就。當然是，英國軍人在二百五十年內沒有這種成就，而事實上只產生了兩個作家，即勞利（Raleigh）和內彼厄（Napier），他們底著作之所以給人認為模範者，其意蓋僅就其本質上的價值而言。這仍舊僅從他們底

風格立論；併且這兩個歷史家無論其寫作的技巧如何，也從來沒有人認他們是難治的題材底深奧的思想家，且對於我們底知識倉庫也沒有甚麼增積。同樣地，在古人裏頭最有名的軍人，同時也是最著名的政治家，軍隊裏頭最賢明的領袖，同時也是國家底最好的管理者。但社會底進步已經做成這般大的變化了，在許久的時間裏，這種例已經非常的少。就算是加斯塔發斯·阿多夫（Gustavus Adolphus）和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他們內政底手腕皆很失敗，且顯出他們對於和平方面眼光很短，而獨表示精於戰陣而已。恐怕只有克林威爾、華盛頓及拿破崙這三個人能公平地認為第一流的現代軍人，而同時對於治國治軍尤稱能手。假如以英國為一顯著的例，那麼，我們可以由兩個偉大的將軍馬爾巴羅（Marlborough）及威靈頓（Wellington）看出和上面具有同樣的例。馬爾巴羅非但是一個最懶惰而最兇暴的人，併且那般非常的不學無術，使得他底短處成為當時人底笑柄；至於說到政治方面，他除了阿諛當時的王后以獲得君主底寵愛外，並無其他的目的，他背離了君主底兄弟，當最需要他底時候，併且後來以雙重的不忠實反叛了以後的主人，復與以前離背的人重新作一種最愚而罪惡的通謀。這些便是當時最偉大的征服者百戰百勝的英雄，及布楞寧（Blenheim）拉密宜（Ramillies）兩地方征服者之特異處了。至於其他的軍人，英國人提起了威靈頓底名莫不生成感激和敬重的意念；這些感覺當然由於他底偉大的軍事成就而起，其成就之重要本來叫我們不忍於忘記。但凡研究現世紀的英國本國史便能很充分地明白這個軍事領袖在戰爭時為戰陣上之無敵者，而具有純潔的目的，不可搖撼的忠誠，和不可及的道德上遺就者，但對於複雜的政變卻每艱於應付。很顯著的，他對於立法方面的見解常生錯誤。且在國會辯論紀錄中每一

種已見實行的大設施，大革命及每種革新的步驟，每一種適應民意的議案都給威靈頓反對過，但不管威靈頓怎樣反對說到會危害英國安全的話，也已毅然公布，而成為英國底法律了。但到了現在沒有一個英國學生不知道現代英國之鑠於穩固都是這些設施底惠。經驗——即智慧之最大試驗——已經很完滿地證明這些——是威靈頓費了他整個的政治生活來反對的——大的革新方策為事實上的必需。這雖然我還不敢說其必有利益或必可取。他常提議要拒絕民意的政策，即自從維也納會議以後，每一個君主國除英國外都採取這政策的。這政策底結果已經表現出來給我們一種教訓：它表現在民意激奮的大暴發的，這種民意在最暴激之時曾經推翻過最凍不可犯的王朝，消滅了王族，墟廢了貴族底邸第，令到繁榮的城市荒涼。如果我們採取了我們那偉大的將軍底意見，如果拒絕了人民正當的要求，那麼，那同樣的教訓又會見諸我們底編年史了；並且我們必然確定地不能逃出那幾年以前這裏文明社會充滿着執政者底愚妄，自利所釀成的災禍結局。

古代軍事天才者與現代歐洲軍事天才者，其成就之天壤判隔，可謂如此！軍人天才之所以退化誠有線索可尋；即關於知識方面事業大量地增加，於是昔日天才者所奔競蜂湧而趨赴的軍事事業之願望遂日見減少，以前的人以為入了軍事範圍為訓練個人才能之最善方策，而現代人已奔赴了較佳的途程了。這當然是極重要的變化；如此，將有力之智慧由軍事的技巧轉移而成和平的表現，已經是數世紀以來蘊釀的遲慢的工作，是知識蘊藏的積漸而永久的進行。假然我們要寫這知識的擴展史即是寫人類智慧史了；這種工作沒有一個人能單獨地擔當得起，但這問題既是這般有興趣，而甚少經人研究過的，雖我將這種分析未嘗不言逾其量，但我不能不注意到

古代戰爭精神之所以因歐洲知識進步而低減，其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是因火藥之發明而發生；雖則它是一種戰爭工具，但對於和平之促進是異常有效。據說這種重要的發明，時在十三世紀；但至十四世紀以至十五世紀初期纔始應用了它。一旦火藥應用了以後，在戰爭底方策及實際上起了極大的變化。在那時以前，爲保護國土及從事征伐，則凡公民均有當兵的義務。當時還沒有常備軍，只有一些粗莽野蠻的民軍，他們常預備要打仗而不願意從事於當時一般輕視的和平事業。既然全國皆兵，所以軍事事業並不獨立的；或較確切地說：整個歐洲形成一個大的軍隊，所有其他的事業皆爲所掩矣。唯一的例外便是宗教事業；但這僅有的事業也須受普遍的潮流所影響，并且通常大隊軍隊時常由神父牧師在戰場上司領導之責，大多數的神父對於當時的戰術都非常精明的。（註二九）總之，當時的人必須入這二途，唯一的副業非軍事即神學，假如你不願入教堂，那便必須入軍隊服務。其自然的結果，則每一樣有重要價值的專業完全被忽略了。當然的有無數的牧師，無數的軍人，許多的佈道，許多的戰爭。（註三〇）但在另一方面：則既無貿易，亦無商業工業；無科學、文學；亦全無應用的技術；即社會最高階級不但對於普通的享受無所知，即使文明生活上最普通的禮儀也不備。但自火藥發明以後，即下了大變化的根基。在舊的制度下，只要由父親傳下了一把刀、一張弓，他便可以預備上戰場了。而在新的局面下即須用新的方法，戰具比較昂貴而難得。第一，要有火藥底供給；（註三一）還要有短槍，這都是昂貴的武器，而且難於使用的東西。（註三二）又有因火藥而起的其他工具，例如有手槍、炸彈、爆炸機、開花彈、炸藥線等。（註三三）這些發明，增加了戰術底複雜性，同時增加了訓練底必需；又這種普通工具之變化，減少了大多數

人得着武器之可能。因為適應這等變化的情態，新的制度組織起來了，於是覺得專門為戰爭目的而訓練一部分的人是覺得可取的，併把他們和舊日軍人以軍事為副業的制度分開了。那麼，常備軍之組織在十五世紀時方在火藥發明以後。於是更有募兵的風習，這種制度我們本早已曉得，但迄至十四世紀後半葉纔至完全實行。

此種變遷的重要性很快地可以看出功效，因為它已把歐洲底社會立刻分了等階。這些固定的軍隊經訓練之後，對於抵抗敵人更覺有效果，而且直接在政府管理之下，於是他們底能力即刻給人發現出來，舊日的民軍制度即便推翻。因為他們早便不得到人的信用，漸至不採用此制度，而卒至明白地消滅了。同時，沒有經過訓練的軍隊減少了，亦即使國家一部分的戰爭底實力減少，因此，使國家更注意那曾受訓練的軍隊；而使他們僅限於肩負軍隊上的責任。那麼，這纔是首次大膽地把軍人與平民兩階級隔離了；到這時也纔有獨立的軍事職業（註三）這種軍事職業僅占公民全部的少數，所以其餘的公民便可以從事於其他事業。（註三）在這情形下，大多數的人民漸失了向日的軍人習慣；既然他們被逼着從事於公民生活，他們底力量遂變成極有裨益於社會底普通目的，並培育了舊日所忽視的一切和平空氣。結果，則歐洲底思想從此並不似昔日那充滿着戰爭和神道底空氣，現在他們打出了一條折衷的途徑，並製造許多現代文化所由原始的知識流派。而知識流派分類研究更依時代之遞進而益見明顯；分工底功效也很清楚地給人家認可；那麼，知識本身也得到進步，而中等及知識階級底權威也同時併進了。這種權力之每一次的增加，即減少其他兩階級底力量，並截止了那些迷信底感覺和好戰的心理，還在早期社會裏頭，所有的熱心都集中在這兩點的。這種知識原理底滋長，與傳播的證據既如此其充足及確定，我們可

以將所有的知識流派結合起來以追索它們底彼此全部的關聯。現在我們只有說，照一般的看起來，這種第三的——或所謂知識階級，最初在十四或十五世紀已經表現其獨立的活動，這雖然仍不脫空洞；在十六世紀，這活動便表現了明目張膽的方式，從宗教底步伐看出來；在十七世紀，這種力量更來得實際，轉移為攻擊政府的腐敗，形成了歐洲幾乎沒有一處地方能逃得出的反叛；最後在十九世紀，甚至擴大了它底目的而伸展至每一公共及私人生活中，如推廣教育、糾正立法人員及監視君主，而最高點為建立了民意很堅固的根基，這種民意非但立憲君主，即使最獨裁的帝王也要低頭了。

這當然是非常大的問題；假如我們對於這點毫無研究，那麼，便不易明瞭歐洲現代蜕化的情形，及對於歐洲將來趨勢之預測。但讀者已足見火藥發明本是一件微小的事，然究其極，可以因此減少習於戰爭的人數，而復因而減少戰爭之精神。無疑的，當然尚有其他情形亦趨向於同一的方向，但以火藥底影響為最有效，因增加了戰爭程度之困難，而趨勢不得不另建立了軍事獨立職業那麼也減少了軍事精神底活動，剩餘的許多人員和剩餘的力量無所宣發，於是即刻傾瀉於和平事業，而混入於新的生活，開始去制裁征服的慾望，這慾望雖然在野蠻人是很天性的，而卻是知識底大敵，併為文明國家時常感到困擾之苦的禍害。

第二個能使好戰心減少的知識運動發現較遲，這至現在還未佈露它底整個的當然影響。我是暗指着政治經濟底發現，它是一種知識，即最聰明的古人也沒有認識過，但它占有一種難以誇大的重要性，並且它底特點即在其真與尚未成立為一種科學的治國方策有直接的關係。這種高尚的學問，其實際上的價值雖然只有比較進步

的恩惠家能完全明白，但受過普通教育的人也漸漸慢悟了；但即使他們明白了，似還不去注意如何和平事業及文化事業因政治經濟之知識而得直接推進。關於這點，我就要表明一下，因為它還可供給我一種證據以支持我所建議的大的原理。

大家都知道在戰爭的各種因素裏頭，商業底競爭以前是最明顯的一種；有許多爭論的例子都是關於頒佈幾種特殊的稅則或保護幾種於國家有利的工業。這種爭論是建設在異常愚昧及異常自然的觀念上，就是說：商業底利益是靠貿易之平均，一國之所得當然是其他一國之所失。人深信財富完全是金錢底積聚；所以每一種人民最主要的興趣是輸入少數的工業品及多量的金錢。若果常是在這種情形下，據說：各種事業都可因而健全；反之，則我們國家底財源便日漸枯竭，而其他國家即顯然占了優勢，並且榨取我們而富潤了他們自身。（註三六）關於這點，其唯一的補救方法是大家議定一個商業條款，這條款必是要求對方國家多量購買我們底工業品，同時多量地把金錢輸向我們；如果對方拒絕了簽訂這條款，便必須強迫他們能自覺；因此目的，於是便須整備武裝以攻打那減少我們底財富，奪取我們用以伸展貿易於國外市場的金錢的國家。（註三七）

對於貿易底真性質底錯誤觀念，以前是非常普遍的；這錯誤觀念既為最有能力的政治家所信從，於是這非但是戰爭底直接原因，抑且加增國家仇恨的感覺，因此，大家鼓勵戰爭，各國都認減少鄰國底財富為本國當務之急。（註三八）在十七世紀十六世紀末期，確有一二卓越的思想家曾指出這種意見所根據的謬誤。（註三九）但他們底議論並未得那些能在歐洲大局的政治家底贊許。而他們底議論是否已給這些政治家知道，尚是一個疑問；但

我們可以確定即使政治家們及立法人員明白了他們底議論，亦必不免加以輕視，蓋因當局者職位之穩固，絕無餘閒來理會那些新的發現；所以當局者這個團體常常站在時代底後面。結果，他們總在黑暗中摸索着舊的途徑，謬以爲假如沒有得到他們底干涉，商業便不會興旺的，弄出許多不斷的繁瑣的規例以擾亂商業，並故意說：「英國政府底責任便是損害他國人民底商業而謀自利。」(註四〇)

但在十八世紀有許多連續的事件——此後我也還要追索的——預備了改進精神及革新願望之途徑，但這途徑在那時候世界上僅屬初見。這種大的運動在知識的每一種專門研究都已表現了它底力量；現在首次作成功的嘗試，就是把政治經濟提掣而成一種科學，要發現支配財富之規立及分布的定律。在一七七六年阿丹·斯密斯刊布了他那國家底財富一書，我們看到了這書最後的影響，它實在可算是從來沒有過的重要瓶作了，並且是就個人所能對於政治必須根據的原理建立了最有價值的貢獻。在這偉大的政論裏面，商業保護政策的舊理解幾乎弄到體無完膚；(註四一)貿易均衡政策不特被他攻擊，其錯誤抑且給他揭示出來；又幾世紀所積聚那無數的笑柄也給他一掃而清。(註四二)

假如國家底財富刊布在較早的世紀，那它會同享有斯塔福德 (Stafford) 及塞拉 (Serra) 底偉大著作底命運；雖這書所提的原理無疑地已激起理論思想者底注意，但恐怕對於實際的政治家不會發生什麼影響；或者還多也不過發生了間接的及不信任的影響而已。但知識底傳佈已經是那般普遍，即是我們底平凡的立法人員，也多少要預備接受這些偉大的真理，它在以前是給他們輕視爲空談而已。結果，斯密斯底主義即找到了它底途

徑潛入了下議院；並給幾位領袖的議員所聽取，於是遂使全院底議員都十分聳耳咋舌，全院底意見全受古人底智慧所支配，深信現代所發現者無一非古人所已知。不過這些人常常挺身而出抵抗這種前進着的知識底壓力，但這是於事無補的。沒有一種既經發現的偉大真理以後會弄到隱滅；也從來沒有一種重要的發現，在發現前，不受前驅的知識底影響。即使如此，斯密斯所提之自由貿易底原理及其所發生的結果都給上下兩院底大多數人舉全力以抵抗，但並無結果。這重要的真理一年一年地向着前進；也從來沒有退縮。註四三最初少數有能力的人和大多數人背道而馳，弄到後來，一般人也和這多數人意見相左，於是前所謂大多數人漸成少數，抑且逐漸地消滅了；在斯密斯這本書發行了八十年，我們找不到一個受完美教育者會接受斯密斯以前所流行的意見而不覺得有些難堪的。

這便是大思想家能夠統制人事之道，因他們底發明便可支配國家底前進。這種歷史上的成功的確已能壓制政治家與立法人員底意見了，這些政治家與立法人員誇大他們事業之重要，於是他們將那些偉大的成就驕驕然歸功於他們那轉移不定的方策。不過他們之所以自翊的知識果何所本呢？他們怎樣獲得這些意見呢？他們怎樣得到他們底原理呢？這些便是他們成功的成分了；這些，他們只有從那些偉大的學者得來的——這般學者因着他們天才底感應將他們底發現營養這個世界。我們很可以大膽地說這位孤獨的蘇格蘭人——斯密斯——自從刊布他那獨一的著作以後，對於人類底快樂比歷史上所載的所有的政治家立法者底全部力量影響尤為偉大。

這種偉大的發現底結果，除了關於它有幫助減弱戰爭精神之力外，在這裏我不用贅說。這些發現怎樣去影響戰爭精神一點是很容易表示的。如果照通常所信以爲一國之財富只包含金錢，那麼，當然也相信貿易之主要目的即係增加寶貴金屬之輸入；因此，政府自然希望採取一種政策使能獲得這種輸入，但如果這樣辦下去，也只有吸乾他國底金錢了，而其結果倒是他們自己本身基於同樣的理由而要拒絕的。因此，彼此純正的互惠便不可能了；每一商約均是一國要嘗試取勝（註四）其他一國的企圖；每一種新的稅則也是仇視底表示；稅則本應是各種規定之最和平者，不料竟成爲國家嫉視仇恨原因之一，於是戰爭悉本此而鼓動起來了。（註四五）但當我們明白了金和銀并不是財富而僅是財富之代表；當人開始明白財富之本身是完全包括有「技巧」「勞力」及其所加於「原料」之一種價值，併且金錢除了計算國家底富足外，別無其他用項；這些偉大的真理給人家明瞭以後，那麼，所有關於貿易均衡的觀念及寶貴金屬之重要性即覺消失。大的錯誤既已消滅，貿易底真確的理論即不難於開發出來。我們已見到如果商業是自由的，凡加入國際貿易的國家皆可分有其利益；既無壟斷的情形，於是貿易底利益必是互惠了；當我們不靠所得來的金錢底數量，則互惠的利益便可很取巧地得來，即是一個國家輸出本國能以低廉的價值製成的工業品，同時需要輸入所費極昂製成的工業品；後一種工業品在其他國家或因工人之擅有特著技巧，或因天產之豐富，所費很微便能製成，基於以上理由，用商業底眼光看來，如果要使和我們貿易的國家財源日漸枯竭，豈非一件笑話！這等於一個商人願意富有的老主顧破了產一樣。結果商業之精神以前是戰鬪式的，現在變爲和平了。（註四六）雖然非常真實的，一百個商人裏頭沒有一個明瞭這些經濟發現所由起

立的證據，但不能阻止這些發現對於他們思想上的影響。比如說，所有無數保護政策之反對者確是沒有幾個能善用有力的理由以表明其反對的。但這不能阻止反對的進行。因為有大多數人常是絕對順從當時的精神；而當時的精神不過是知識及其所取的方向而已。在日常生活之普通副業裏頭，每一個人都因許多的技巧及科學之進步而增加他底安樂及安全，恐怕他對於這些技巧及科學的名辭也舉不出，就好像商業階級也那般受經濟發現之利澤一樣。這種大的經濟發現在近兩世紀間已經使我國商業立法有了整個的變化，其變化現在漸進中，並足以直接迅速地影響其他歐洲底國家，這些國家，其民意既然沒有那般有力，便很難建立偉大的真理而消滅舊有的腐敗。所以在商人中有比較少數是對於政治經濟明白的，其所得到大部分的財富也實在是靠政治經濟家而來；這般政治經濟家既除去了舊日政府因愚昧而對於貿易所施與的障害，於是對於商業的興盛立了堅固的根基，這也是我國很大的光榮。我們也很可以確定，同樣的知識運動已減少了戰爭底機會，確定一種必須能支配我國和他國商業關係底原理；證明假如要干涉商業底進展非惟無利，抑且有害；最後揭發以前所有的錯誤，這錯誤引人相信國家彼此是當然的敵人，鼓勵仇視的感覺，而結聚國際的嫉忌心，其力量之所自來，則軍事精神仍不為重要的鼓勵者。

第三個減少好戰心的大原因即關於蒸汽對於旅行目的底發明，這發明能引起各國之交通，並幫助毀滅了國際的愚昧的輕視。比如說；以前有大部分的英國著作家曾經故意侮辱法國人底道德及私人人格，尤可恥的是侮辱到法國女人底貞潔，致兩大國間底憤怒情感非常地激增，引起英國輕視法國人底惡行，同時，也使法國人講

勝英國人。同樣地有一時間凡忠實的英國人自己深信能够力敵十個法國人；以爲法國人是他們最是輕視的人類，以爲他們是最弱最矮小之民族，他們飲冰紅酒而不飲白蘭地，他們是絕對厭惡蛙類動物的；他們是可憐的不懂新教者，他們每星期與彌撒會奠祭時跪拜偶像，並且崇拜教皇。在他一方講起來，法國人也受着輕視我們的教育，以爲我們是粗野而無文字的野蠻人，既鮮感覺，也不大近乎人情；是一種暴燥易怒的民族，生活在最多霧而不見陽光的惡劣空氣之下，受着深而永在的愁慘的天氣，使一般醫學家稱爲英國人底愁悶；在這種奇虐的不愉快之下，自殺常會發生，尤以十一月時大家都知道我們有千人以上的自殺或自行鎗殺者。（註四七）

凡多讀英國或法國舊文學者皆知道上述是這兩國因其彼此愚昧及思想簡單相互對待的意見。但因蒸汽發明之進步能使這兩國得到密切的接觸，已經消滅了這些愚昧的偏見，並使兩國人民彼此贊揚，益進而爲彼此敬重。接觸的機會愈多則彼此敬重之心愈增。無論神學家怎樣說，大多數的人類也總是善行多於惡行，每一個國家那良善的動作總比惡壞的動作來得多。如果不是的話，把這些惡行積聚起來，人類早便整個毀滅了，並且沒有一個人會存在這世界來悲痛他底同種底滅絕。還有一個證明，即國家底接觸愈多，則同類舊日的仇恨愈易於消滅。這因爲許多的經驗可以證明人類並非似我們幼時得到的教訓所說那般壞的。但如果惡行真確的比善行爲多，結果，社會底混合機會增加，則我們對於他人底惡劣印象也增加；因爲我們雖然會掩飾自己底惡行，卻不會容認人家底惡行。可是這並不是真實的情形，常發現凡依自己廣闊的知識以認識人類活動之通常路程的人即是最能對人類懷抱着好感的。最大的觀察者及最深刻的思想家總是最寬恕的判決者。只有最孤獨的厭世者養成

個人幻想底錯誤常不能體認我們本性之優良之點，並過分地誇大惡劣的性靈。或只有那些愚昧而無知識的騷擾者每每夢想生活在慵懶而孤清的境界裏，誇大他們自己底謬妄，並斥責人家底惡行；因此，他們反對生活之享受，惱恨因他迷信而離開的社會。這些人就是最有力地堅持我們本性腐敗及我們已經退化的人。凡通曉某一國家底歷史者當能明白這些意見所發生的惡果。由知識底前進中所獲得的無量的利益鮮有能與交通改良（註四）的所生的便利還來得重要的，交通之便利因其增加國與國間、人與人間底接觸次數，所以在非常的範圍裏已糾正了他們底偏見，提高了他們相對待的意見，減少彼此間的仇視，因此，將我們普通的本性分佈了一個有利的見解，激起我們人類底諒解性底無量的來源，這種諒解性在從前曾給人認為邪說的。

這即是現代歐洲所遭遇的事。法國與英國底人民僅因接觸之增加，彼此已有較佳的印象，並且彼此都放棄了從前兩民族間愚昧的輕視。在這一點及其他情形中，一個文明國家與其他一個文明國家愈能互相地認識，愈能相親敬及愈謀接近。在所有國家仇恨的因素裏，愚昧實最占勢力。當接觸增加了，愚昧自然可以掃除，仇恨也可以減少。（註四）這是慈善底真確的保證，比較所有的道德家及一般聖哲底教訓還來得有價值。他們追求他們底事業已經有幾世紀了，對於戰爭次數減少的企圖也沒有絲毫的效果。但我們並沒有言過其辭：每一鐵路線底新完成，每一艘經過英國海峽的汽船卻都是長期不斷的和平新保證，這種和平在四十年內已經把世界兩最文明國家底財富及事業發生了密切的關繫了。

以上依我底知識所容許，我已將減少宗教壓迫及戰爭底原因試為表明；這兩個大的惡行，人類現在還想用

以摧殘他們底同類的。關於宗教壓迫之逐漸減輕的問題我不過是很簡單地說過罷了，因為在本書底後半部尚須加以充分的解說。但以現在我所說的已大足以證明對於知識進程是怎般的重要，道德情感底運用對於宗教壓迫的問題其影響是怎樣微弱。

好戰精神所以減弱底原因，我已經够絮絮不休的了，讀者或以爲所論述的冗長得可怕；關於這點研究的結果就是好戰精神之減少，實因知識階級增加之故，而他們卻爲軍人階級不得不敵視的。再深究這問題，仔細分析以後，我們已經確定有三種大的副因存在，因其存在，於是此種運動因而激起。這些副因即——火藥之發明，政治經濟學之滋長及蒸汽動力之發現是也。此即知識進步對於減少好戰精神之三個大的方式及路程；至於這路程之發現怎樣影響到好戰精神我已詳加說明了，我所提出的事實與證據，我能够平心地說是曾經仔細及反覆的研究過的；我十分不明白還有甚麼根據能反對我所論據的正確性？我很明白這些論據及事實當然爲某幾個階級所不滿；但一種不痛快的著述實不能認爲錯誤的證明。我所得到的證據底來源我已詳加表明了；我希望我底證據或尚不失爲公平敘述。從這些論據中發生了重要的結論。由這些論據中即推知那兩種最爲最大、最穩固、傳播最廣的惡行——即宗教壓迫及戰爭——已逐漸地減少，雖然整個說來，其減少還屬漸而緩；惟其所以減少，實無與於道德感覺，道德教訓，卻是全受人類知識活動及數世紀以來人類所成功的發明與發現底影響。

既然在社會進步表現的兩個最重要的現象裏頭，道德底定律一定永恆不變地服屬於知識定律下，便發生一種強有力的斷定，在比較不重要的事件也逃不了這一途。如果需要充分地證明這一點，並將以上的斷定成爲

絕對的確定，那麼，我們便不須寫歷史底引論，而寫歷史底本身了。所以讀者現在必須要滿意這不過是初步的說明；全部的說明必須留爲本書下兩冊分述；在那兩冊書裏頭，我將要表明歐洲之所以由野蠻進而爲文明之域，皆因知識活動爲之推進；現在主要的國家，幾世紀以來，其進化已足脫離了自然主動力底羈絆，如果在早期，它們底境遇也許要受其困擾；雖然道德底主動力仍舊糾纏着不休，不過這是反常的，如果我們拿長時期比較起來，這些反常的事便會彼此平衡，在整個講起來，實在便消失了。所以用廣義的眼光衡之，每一種文明民族底變化從積聚方面說來，完全是靠三種原因：

一、他們底最有才能的人所含的知識量；

二、這種知識發展所取的方向，就是說：知識是關於什麼題材；

三、知識底分布怎樣廣闊和它怎樣自由地透入社會之各階級。

這些便是每一文明國家之三種大動力；雖然這種動力之運用常給有權力的個人底惡行或德行所困擾，但這些道德的感覺總能彼此糾正着，而在長時間說來，並不發生很大的影響。道德底內涵無疑地常會變化，因爲有許多因素我們至今尙未明瞭；所以在一個人或一代，時時會有過分純良的意念或過分惡劣的意念發生。但我們沒有理由可以想到善惡的意念底人底比例上有任何永久的變化。至所謂良知良能，我們知道本來是沒有所謂進步的。在我們與生俱來的衝動裏面，有些時候很占優勢，而有些則別種衝動占了優勢；但經驗告訴我們，這些衝動時常是相反的，因此，常常給反對的力量平衡了。一種動機底活動常被其他動機底活動所糾正。因爲每一種惡

行總有連帶的善行跟着。暴虐之反面是慈悲；同情是痛苦所激起的；少數人之對人不公平，遂引起其他人底憐憫心；罪惡之發生卽有補救的方法，並且最大的過惡從來不遺留下永固的印象。國家底衰弱與人類底殘殺，所發生的損失從來都會得到補救。並在數世紀以來，這些損失底遺跡已經踏淡下去了。亞力山大帝及拿破崙底大的罪惡經過了若干時已成了夢幻，而世界底一切事件已恢復向日的水平線。這就是歷史底陸替似水一般流轉的狀態底表現，其永久的變遷是我們因本性底定律之存在，遂受其支配。但所有這些以上，還有一種更高的運動，當那潮流激動起來時，有時前進或會後退，於是在那不斷的變遷中，只有一件事是有永久性的。惡人底動作只能產生暫時的惡果，善人底動作也只能產生暫時的善果；善果與惡果當然一起地消失了，給繼來的世代消滅它們底勞力，給以後的時代底不斷的運動所吞沒了。但偉大人物所發現的一切從來不會離開了我們；它們是永久的，它們包含那些永久的真理，引起了帝國底震動，消滅了對敵的信條底爭鬪，並且證明了宗教連接不斷的衰落。所有以上的種種都有不同的標準與方策；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自身的意見。這些意見像夢一般地消逝了；它們像幻燈底編織物，至今連一些迹像也不遺留了。只有天才的發明單獨能够傳之永久，我們現在所有的一切也皆由此而來，它們是爲所有的世紀，所有的時間而存在的；它們播下了它們底生命底種子；永不會太幼稚，也不會衰老；它們是永不斷和不息的川流；它們天然地累積起來，並且因其能增補上許多新的發現，以故，能影響到最遠的後代，經過了世紀底奔馳，其影響之大較其初發現之時爲尤可觀了。

〔註一〕因此，我們發現十字軍戰役以後，歐洲男女之比率失了均衡，即增加了淫亂之風。在翰卡坦（Holland）地方，常有過剩的婦女，結果

引起這種觀念底惡化。(見斯提文斯中美洲一書，第三册第三八〇及四二九頁)

(註二)關於這問題，我們可在舊著作家中見到許多衝突的敘述。古德德 (Goodman) 在十七世紀早期以為出生之女性較男性為多。

(見西書平凡的書 (Commonplace Book) 第三集，第六九六頁)

(註三)當然問題便要發生，當淫慾極盛時期思想感情所發生的影響是怎樣的，但無論影響如何，只能經過身體前進而影響新生命的發。這種前身在任何情形之下，必被認為最直接的原因。所以假如說這種影響顯明是存在的話，那麼，我們仍須搜尋自然底定律；雖然這些定律當然只能當它作次要的定律，而融化於比較高的週則裏頭。

(註四)有幾個著作家認生理學為研究生命定律底一種學問，但以現在的題目看來那就走的太快了，而且有幾種學問在生命現象能採取科學化的研究以前，必須由現在的經驗底狀態中提高起來，以生理學與解剖學為相關連的學問似乎比較來得合理的說法；前一種學問屬於有機組織研究底動力一方面，而後一種則屬靜止的一方面。

(註五)我們想到生理學已經過那般長時期的研究，而生理學者對於所有的科學最重大而最終的目的——即預測將來事件變化的力量——極少貢獻。照我想起來，有兩個主要原因之潛在一：為化學底退化，二即解剖之未臻完備，它既是一種不正確之工具，假如我們有發覺困難的研究，我們便不能靠它了；比方我們在考查精子時已發生最相反的結果了。關於化學，羅平 (M. M. Robin) 和維迪 (Vardi) 在他們最近的偉大著作裏，很有力地證明在化學與我們動物體結構底知識底未來進步上有複雜的關係；雖然我大膽地以為這些卓越的著作家常常表現一些沒理由的傾向以限制化學定律對於生理學現象的應用。

(註六)常有人以為東方有幾個國家對這點是例外的，但比較正確的觀察已與早期旅行家隨意的敘述是相反的了，且以我們現在的知識範圍而言，世界沒有一地方女性的出生率多於男性的，同時在世界各部分所搜集而來的統計，表明男性的出生是比較地多些。

(註七)在李勒 (Miller) 底哲學一書——一部權威的著作——第二册第一六五七頁裏說：「決定兩性胚胎底因素未曾發現，雖然早父母底相關年齡對於子女底性決定有些影響而已。」父母底相關年齡能影響其子女之性決定一點，可以根據現有之大數據，認為確實；但李勒不應以上述歸功於生理學者作家而應提及以上的發現是由統計家獲得的。

(註八)人類底體之自然力量因其能受遺傳而能進步的一點意見是高爾 (Gal) 信徒所主張的學說，且為孔德 (M. A. Comte) 所採用。

(見實驗哲學 (Philosophie Rowtve) 第四冊, 第三八四及三八五頁) 不過孔德承認此點從未充分的表證明過: 一然而也無充分的事實以證明之。[普利查德博士具有不同之思想習慣者, 似亦有同樣的意見, 因他對於頭蓋之比較的研究使他有以下的結論, 即使英國現代居民「或因數世紀之偉大知識營養的結果, 或因其他原因, 我不得不信其腦量較其祖先為廣大。」(見普利查德博士人類體質史 (Physical History of Mankind) 第一冊第三〇五頁) 即使這點是確實的也不能證明體質是否有變化, 雖然這也可以成爲一種假定, 所以我想普通問題仍舊不能解決, 除非布盧門巴赫 (Blumenbach) 所開始及庫爾香 (Cuvier) 現在所繼續的研究, 其進行能夠比舊日的來得更廣泛些。

(註九) 最近我們注意到血底質地對於各種不同脾氣的變化, 這方法比舊日僅就脾氣表面感微研究的來得滿意。

(註一〇) 我們常聽到遺傳的才能, 遺傳的惡行, 善行等; 但凡能具有批評的眼光來研究這些證據者將要發覺它們處存在是沒有證明的。普通所證明的皆十分不合邏輯; 通常的著作家皆從父母及其子女搜集到同樣的思想習慣性推論這種特性是屬於遺傳。用遺傳推論的方法, 實可使我們任意下斷論; 因為在各種大的研究中總有許多經驗方面的偶然相同點, 於是每每給人家利用附會以補益他自己的論據。但這那裏算得是真理發現的方法? 我們不但應該要研究那種種是遺傳才能的例, 並須研究那些是不能遺傳的例。除非是遺傳的研究, 否則我們便不能由推論而解決上面的問題; 同時, 除非生理學和化學非常進步, 否則我們也便不能由演繹方法明白遺傳問題。這些考慮應該阻止我們接受那堅持遺傳的瘋狂及遺傳的自殺底存在底理論; 關於遺傳的各證據也可以應用遺傳說; 至於關於遺傳的善行及善行更應遺傳者去; 倫理學底現象, 其研究或不如在生理學上的現象研究來得詳細, 所以我們關於倫理現象方面的結論便沒有這樣確定了。

(註一一) 凡讀者皆能明瞭那在新約聖經裏面所說到的道德系統, 其中的格魯沒有一項非前人所遺傳的, 並且在使徒行傳裏頭有最美麗的章節都是由教外的著作所摘錄出來的, 有些人以為遺傳足以反對基督教, 而不知事實是在是補足基督教一點強有力的意義, 因為它能夠說明基督教與各時期底人類道德底同情心有密切的關係。但如果說基督教所宣傳的道德真理是前人所未知者, 這話, 若非要讀者太糊塗, 就是他意在狡猾的欺騙。

(註一二) 馬金托什爵士 (Sir James Mackintosh) 對於道德原理固定性之發現頗爲震異, 所以他非但反對了它們進步底可能性,

大膽地說在道德方面不會得再有新的發現了：「道德不容許新發現……自從『彭塔丟克人協定』(The Composition of the Peace of 1016)以後已歷三千年之久，無論何人能否告訴我們自從那時到現在我們生活底規則有任何重要的變化呢？讓他用同樣的眼光去研究米紐法典；那麼，我們將要達到同樣的結論了。我們翻閱假的宗教書籍看看我們要發覺其道德系統在大的結構方面都是相同的……事實上很明顯，在實際的道德上從沒有過改進……造成道德規則的事實是可以見得到的，並且對於最簡單的野蠻人及很聰明的哲學家都能明白……自然科學和思考上的科學是直接相對者。在這方面其事實是遠遠而離看得到……從這些科學所保全無量數的事實裏，我們沒法可以看到將來它們進步到甚麼地步。道德方面底情形則適與相反。它現在既已是固定的，在我看起來，將來也必繼續是那般的固定。」(馬金托什底生活 [Life of Macintosh] 第一冊第一一九至二二頁，一八三五年倫敦出版。)

(註一三)科摩達斯皇帝位底元年必是基督教寬教的時期。按所有名家底意見，科摩達斯是一個例外，他於即位底元年就停止了基督教底壓迫……沒有一個作者，無論是外教者或基督教徒，認科摩達斯是一個宗教壓迫者。(見莫爾 [Moyle] 著第二冊第二六六頁中的關於神威古羅馬步兵之書信 [The Letters Concerning the Thundering Legion]) 「伊拉加巴拉斯 [Helioabalar] 在其他方面雖是諸王中之最不名譽者及最可惡的人，但對於耶穌底信徒未嘗表示厭惡及悲慘的行為。」(摩斯海姆 [Mosheim] 底宗教史 [Ecc. History] 第一冊第六六頁及密爾曼 [Millman] 底基督教史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倫敦出版第二冊第一五九頁)

(註一四)「馬可，一個最嚴厲的哲學道德學派中的無可實踐的信徒，在其輕視基督教對於生命之恩摺及乖離的觀念中，其嚴正的態度適可與基督徒相敵對；但其本性之仁慈卻未因其哲學之嚴正與驕傲而趨於堅信。可是基督教卻發現馬可非但是支配人類思想之唯一公正及卓越的競爭者；非但是擾亂人類靈魂至較高的見解及嚴正動機底一個對敵；且是一個威猛的和不完恕的壓迫者。見(兩冊受底基督教史第二冊第一五九頁)

(註一五)尼安得說最賢明的君主反對了基督教，而最糊塗的卻對於它底侵入反是漠然的。(見教會史第一冊第一二二頁)底蓬 (Griha) 對於馬可及科摩達斯都有同樣的意見。(見衰頹與傾側 [Decline and Fall] 第十四章第二三〇頁一八三六年倫敦出版)

版)其他不同性質的某一著作家將這些特殊點歸因於冤鬼底故意作祟。在原始時期諒設有幾個最好的王給冤鬼所引誘而為教會最悲慘的壓迫者。」(見哈欽松參將言行錄(Memoirs of Colonel Hutchinson)第八五頁)

(註一六)「可是一般歐美巴塞羅那底軍隊者都承認裏面的人員是有價值的人，併且大多數以合於人情著名的。」(見道孫羅一七八六及一七八七年間西班牙底旅行(Journey through Spain in 1786 and 1787)第一冊第一二二頁一七九七年倫敦版)

(註一七)在一五四六年威尼斯派到英王查理十五世底宮廷裏的使臣阿蘭時，在其對於政府底官式報告裏說：「在荷蘭及夫利斯蘭德(Friesland)有三萬多人都因為洗禮上的錯誤而被判死刑。」(見威林·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調查理士五世與其使節底通信集[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V and His Ambassador]第八冊第四七一頁一八五〇年倫敦版)在西班牙，託爾馬達(Torquemada)治理之下十八年間，天主教裁判所以最低限度計算曾經判罰十萬五千人以上，而其中有八千〇八十人是被燒死的。(見警察斯科特底斐迪南及伊羅塔拉史(History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第一冊第二六五頁)在安達盧西阿(Andalusia)一個地方一年之間裁判所曾教二千猶太人於死，「除此以外，還有一萬七千人，其所受的刑罰略比火葬為輕耳。」(見提克爾爾底西班牙文學史(History of Spanish Literature)第一冊第四一〇頁)

(註一八)除非更大的熱心表現在道德及宗教原理之分布上；在道情形之下原理是可以固定，不過其影響是進步的。但至此為止，在中世紀時，按人口上的比較，教會的確比現在為多；精神階級者既見激增，而宗教改革的精神也較熱烈，併且有比較堅強的意志以阻止純粹的科學論議之侵入倫理方面底論議的確，在中世紀道德及宗教底文學超過其他傳尊宗教底一切整個的文學，非但在景方面，即在修學者能力方面也超過。但現在道德家所歸納的結論已不能干預列入底事件，而讓給那比較重大而有利利益的主義，這主義包含所有的事業及階級。道德方面底有系統的作家到了十三世紀已經達到最高點；但過此以後，有如科爾利治(Coleridge)所說因給了「新教底天才者」所反對，遂急速地降落了；在十七世紀底末期，即在最文明的國家差不多也消滅了。斐羅(Jeremy Taylor)底 Doctor Divinitium 是一個天才者最後的廣泛的嘗試，想完全以道德家底語言來規範社會。

(註一九)所以無疑地在早期的社會裏，其感覺當然的及必須的尖銳化，並因沒有了反應官能溫和低等動物相差無幾矣。

(註二〇)在某個種屬其種族中，凡沒殺過敵人的，必須以獲尋的標記來表明他。」(見格羅特底希臘史第六冊第三九七頁)在亞歷

洲 (Borneo) 代阿克 (Orak) 人中，「一個人不能夠結婚，除非他得過一個人頭；假如他得到了幾個，那麼，他便可以有驕傲及高貴的表態來表彰他。」(見安南與婆羅洲紀述 [Earl's Account of Borneo] 載亞洲雜誌第四册第一八一頁)

(註二) 馬爾科博關於韃靼人說：「只有一條路可以享到盛望，這就是在軍事獲得了名譽。」(見馬著波斯史第一册第二〇四頁) 在結木兒法典 (The Institutes of Rimour) 一書裏第二六九頁也說：「只有權力與尊嚴的地位操能和他相對等，他對於軍事底技巧及勝敵各種兵法皆非常地熟悉。」這種同樣的思想時常也很明顯地表現在荷馬所敘述的戰爭裏頭——這種特點在李爾底希臘文學第二册第六三、六四頁曾注意到，在那書裏他已將一種嘗試轉移為論證明荷馬底詩是一個人著作寫成的，雖然比較合理的推論即說這些詩都是一個野蠻時代所寫成的。

(註三) 說到個人之所以顯著，財富與動也有關係的；在歐洲中世紀時候，戰爭是一種很發財的職業，這是源於俘虜以重金贖取自由的風俗。(參看巴林登 [Barrington] 底法典底觀察 [Observations on the Statute] 第三九〇—三九三頁) 「在查理二世 (Richard II) 一代中，和法國打一次仗，給人贖為一個英國紳士底唯一的發財之道。」歐洲底俘虜取自由的風俗在中世紀是非常流行，並且只自明斯敦 (Münster) 和約以後，一六四八年這種風俗纔停止。

(註三) 這本書是我在一八五五年寫成的。

(註四) 的確有人以為俄國之不道德比西歐來得少，但這觀念恐是錯誤的。(參看斯威林 [Swiffin] 著俄國一書第百九六〇頁—八四一年倫敦版)

(註五) 俄國底人民對於他們底教士之尊重曾引起許多觀察者底注意，這點既然那樣地明顯，實在無須加以證明。

(註六) 一個觀察精明而聰慧的著作家說：「俄國只有兩個階級——最高和最低的。」(見由波羅的海來的書信 [Letters from the Baltic] 第二册第一八五頁—一八四一年倫敦版)

(註七) 最近一個女著作家，她有可羨慕的機會研究聖彼得堡底社會情形，且她能夠運用一個成功的婦人所有的機智以從事於研究，她在那著華而富足的階級中發現這種情形實在覺得很驚奇了：「完全沒有理智的觀感及文學底題材……這裏完全沒有興趣來討論那理智的問題——所研究的只是衣飾、跳舞等等。」(見由波羅的海來的書信第二册第二三三頁)

(註二八) 照什尼茲勒 (Moritz) 講起來，在俄國只有軍事等效能得到顯達，如果一個貴族在軍隊裏並沒有註冊，或沒有軍事等地位的一個民兵可以得到他底優先權。(見克洛區底地理辭典第二册第六四頁一八四九年版) 在亨利 (Henry) 一八三三年出版的俄國一書第三二〇頁裏也是這般說法。實門曾經游歷俄國之大部分地方說：「在聖彼得堡底現代語裏，而人們可以常常聽到關於教育階級個人的重要的詢問，他是穿平常衣服還是制服？」(見埃爾曼西伯利亞第二册第四五頁) 阿利松爵士在歐洲史第二册第三九、三九二頁裏面說：「俄國全部底力量都傾向於軍隊、商業、法律及所有的公共事業都不覺得重要的，所有有為而年富力強者皆從事於軍事事業。」同書第十册第五六六頁補錄布勃納 (Bubner) 底話：「沒有一樣能使俄國及波蘭貴族那般的驚奇如英國對於公共事業看得那般重的，尤以對於律師辯護事業為然。」

(註二九) 這種敵人是最可怕的，因為在還快樂的日子，一個教外的人傷害了一個神父，他即有種種的阻礙。在一〇九五年教皇召集了一個會議宣布稱：「因此，凡身為監督者應預知取締無法紀的人。」(見馬泰荷伊著巴黎史第一八頁) 這宣言底上下文對於這點並沒有限制，這樣所以如果一個人拿神父作為囚犯，雖然為自衛起見，精神上也是犯法的。

(註三〇) 有如忒納說到英國在盎格羅·撒克遜政府管理之下：「戰爭和宗教是這時期最能使人沈迷的一個問題。」(見忒納著英國史第三册第二六三頁)

(註三一) 頗許多著作家說，英國直至伊利莎白女王時代纔有火藥之製造。但忒納受理查三世底命令在哈連手冊 (Harleian Manuscript) 說明英國在一四八三年已有火藥了。(見英國史第六册第四九〇、四九一頁) 埃克爾斯 (Eckers) 說：英國在一四一一年已有火藥之製造及輸出。(見英國掌故 [English Antiquities] 第一八二頁一八四七年倫敦版) 據之，在很長時期內，火藥久已認為貴重品，即使在查理士一世朝代裏，我已發現了德根火藥昂貴的記載：「軍隊在他們練習時均表示非常的失望。」(見國會史第二册第六五五頁) 一六八六年在克拉林敦通信集 (Clarendon Correspondence) 第一册第四一三頁說到其批發價為每桶銀二鎊十先令至三鎊之值。

(註三二) 短鎗是那般沒用的器具，在十五世紀中葉要費一刻鐘纔能放出一彈。(見哈拉姆中世紀 [Hallam's Middle Ages] 第一册第三四二頁) 格羅斯 (Gros) 說：「在英國第一次說到短鎗的是在一四七一年，這種東西直至查理士一世時代纔廢止不用。」(見

博著古兵 (Military Antiquities) 第一册第一四六頁第二册第二九二頁及三三七頁) 在近列塔克曼底發明史 (Beckmann's History of Invention) 一八四六年倫敦版第二册第五三五頁裏面很奇怪地說：短鎗是「在巴維爾 (Bavaria) 之魏機 (Wehr) 初次使用的。」

(註三三) 據蘭手鎗是在十六世紀前期的發明品。火藥是在一四八七年第一次被用以開掘城壕。丹尼埃爾 (Daniel) 既炸彈直至一五八八年方發明。(見法國軍隊 (Milice Française) 第一册第五八〇及五八一頁) 在世界傳記 (Biographic Universal) 一書第十五册第二四八頁也有此一說。但照格羅斯在古兵第一册第三八七頁裏說：在一四七二年伏脫李納斯 (Valerius) 也曾提及。至關於大炮發明之確實時間尙有疑問，可是當然在十四世紀以前已應用於戰爭了。

(註三四) 格羅斯說：直至十六世紀英國士兵還沒有規定的制服；「其分別只靠他們將官底武器，像現在的海軍一樣。」又在十六世紀底初期，兵營纔有獨立的研究。(見古兵第一册第三一〇、三一二頁)

(註三五) 喪凡不務專業者皆是兵的時代以來，情形之變遷確是很明顯的。阿丹·斯密在國家賦財第五册第一章第二九一頁裏說：「在歐洲文明國家裏，任何國通常可徵募其居民約百分之二，而其國不致於傾覆。」

(註三六) 這種一時好尚的運解是見諸一五七八年斯托著倫敦 (Stow's London) 一書用新奇的言論表達而出。他說：如果我們底輸出超過輸入，那麼，我們底貿易便勝利，反之，即失敗了。(見倫敦第二〇五頁一八四二年湯姆士公司版) 這問題一失了平衡狀態，那麼政治家便感到恐慌。一六二〇年詹姆士一世 (James I) 在他底長篇演辭之一裏說：「我總覺得這八九年來我底造幣廠沒有枯竭是一樁奇怪的事，但我以為金融枯竭之弊是在貿易之失其平衡。」(見國會史第一册第一一七九頁並參看辯論金融恐慌問題第一一九四—一九六頁) 一六二〇年下議院在一個最嚴重警告之下，通過了一個「西班牙煙草之輸入實為我帝國金融枯竭之源」的決議。(見國會史第一册第一一九八頁) 在一六二七年下議院為着尼得蘭因與東印度通商之故，金融輸出而致地方衰敗一問題曾有切實的爭論。(見國會史第二册第二二〇頁) 其後五十年，泰姆塔爾 (Sir William Temple) 在他底通信集及聯省觀察 (Observations on the United Provinces) 中也表示贊成這個原則。泰姆塔爾論文集 (Temple's Works) 第一册第一七五頁又第二册第一一七、一一八頁)

(註三七) 一六七二年名魏羅的沙夫茲巴利伯爵 (Earl of Shaftesbury) 當時為主管大臣，宣佈英國和荷蘭底不可避免的戰爭時

期已到了，因為雙方同時站在均等的地位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不能左右他國底貿易，那麼，他們必左右我們底了。他們或我們必須有一方屈服纔可。一方必須支配其他一方。在全世界貿易底競爭裏頭是沒有和解的可能性的。」（見薩麥斯短論文集（*Of Home*）行第廿五）第八册第三九頁）數月後，仍堅持競爭之論調，其另一理由即「為英國底貿易起見，在東印度必須有一公正的商船規定。」（見國會史第四册第五八七頁）斯泰爾尼（*Steuart*），一個外交家及貿易大臣之一，在一七〇一年發表一篇文章堅持與法國交好的結果將是：「我們貿易之整個要領頹及毀壞。」哈得維克勳爵（*Lord Hardwicke*）為當時最卓著的一人，一七四三年在上議院說：「如果我們底財富減少，此時即宜將奪取我等在大陸之市場底國家底商業傾覆了——掃除他們在海上行駛的船隻並封鎖其港口。」（見卡姆培爾著極要底生活一書（*Campbell's Lives of the Chancellors*）第五册八九頁）

（註三八）布利斯托爾（*Bristol*）伯爵，一個有相當能力的人，在一六四二年對上議院說，如果其他國家彼此交戰，對於英國是非常有利的，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他們底金錢，或如彼所謂：他們底「財富」。

（註三九）據說塞拉是第一人在一六一三年著作證明阻止寶貴金屬輸出之可笑。但我相信最早提及現代經濟發現底驚人文字是一一八一年斯塔羅維德所發表者。這篇文字可以在巴克（*Bark*）編輯的哈連雜誌（*Harleian Miscellany*）第九册第一三九—一九二頁看到。又他所寫的英國政策之概觀（*Brief Conception of English Policy*）一篇對於當時視為最重要的政治理論大部分評為滋養不充足。因該作者非但能深究前人所未知的價值與價值底性質，且能清楚地指出包圍制度（*The System of Enclosure*）之原因。該種制度乃是伊莉莎白女王時代之主要的經濟事實，且與「貧民救濟法令」（*Poor Law*）之興起有密切之關係者。脫維斯（*Twain*）博士曾對於上述那篇文字有所敘述，原文很容易得到的，凡研究英國史者都應閱讀一遍。在其他提議裏面，這篇文字還主張廢除底自由貿易。

（註四〇）關於英國立法底干預一點，克格區憲下議院一個委員會資格說在一八二〇年以前，「各時期間約有二千個關於商業的法律通過。」我們很可以自信地說，這些法律，每一個都是不穩的惡果，因為沒有一種的貿易及任何事業給政府保護而不使其他不受保護的事業及貿易受極大的損失者；如果保護政策是普遍的，那麼，損失也是普遍的。的確，人人皆以為歷屆議會皆應加以補救；又據威士

他在他底演說裏頭說：「我請求找個簡單而完善的議案以改造本國底實業……那麼，上帝便會爲議會祝福了。」（見國會史第四冊第二九一頁）

（註四一）關於這點，其唯一的例外，即刺塞重利的法律所持的見解，這種法律幸而給邊沁（Jeremy Bentham）所廢止了。

（註四二）在斯密以前，最大的勞績應歸功於休謨；但邊深奧的思想家，因其著作過於零碎，不能發生大的影響。但且不計休謨底成就之如何大，其淵博及努力實較斯密爲過。

（註四三）一七七九年巴爾特尼（Paltény）在他底經濟演講中，將這點「歸功於斯密，他很給人承認爲有動服了現代，而支配後一代的動力者。」（見國會史第三十三冊第七七八頁）一八一三年斯密阿特宜稱：自由貿易主義「現在我相信已變成全歐洲底有思想的人底流行信條了。」（見人類思想哲學第二冊第四七二頁）又一八一六年李嘉圖說：「支持自由貿易底理論是那般有力，所以每日皆可得到附和者。我很引道大的主義已深入於頑固者底心爲快慰。」（見李嘉圖著第四〇七頁經濟流通的建議（Proposals for an Economical Churnacy））

（註四四）戎松爵士（Sir Theodore Janson）在一七一三年發表的貿易普通須知（General Maxims of Trade）一文中，認：「所有歐洲國家，大家都爭競於貿易方面如何取勝一途；他們有同樣的信條，以爲購買他國底貨物愈少，則對於本國愈有利。」這一點爲普運所承認的原則。（盧麥斯著經濟文集第十三冊第二九二頁）又在一七〇〇年出版的一英人與一荷人之對語一文中，商人代表駭俄方面，以爲他底政府有商業上的「有力的條約非其他國家所能參與的。」（見同書第十一冊第三七六頁）斯托利博士（Dr. Stoll）在他底名著法律之衝突（Conflict of Laws）第三二頁（一八四一年版）說：「這種商業條約爲「最狹隘自利的制度。」

（註四五）「確實，我們不能否認商業上的錯誤見解，有如宗教上所常犯者，曾爲許多戰爭與流血底原因。這種錯誤的見解使每一國與鄰國底幸福不能與本國底比較；因此，彼此希望互相損害，互令鄰國日趨貧窮；商業競爭精神亦因以發生，這種精神即現代戰爭底最近因由了。」（見克洛著政治經濟原理第一四〇頁）

（註四六）「這種流行在各國的商人底敵對的情感已支配了十七世紀底普通公共利益所有的意義，這種利益，商業國家乃由共存共榮而獲得的，而且荷蘭商業精神今爲戰爭之強有力的阻礙，在歐洲史之某期中，實曾爲戰爭底主要原因。（見荷蘭底政治經濟第二冊第二

二一四九九年版)

(註四七)通常以爲在天氣惡劣的地域底自殺者較天氣清明的地域爲多，這並且是法國底聰明人所喜引爲談柄的題材。他們每倡英國人之好自殺及自殺與陰沈天氣關係之論而不覺厭倦。不幸這種普通議論在事實上恰相反，並且我們有確實的證據，夏天底自殺者比冬天爲多。

(註四八)關於那一點，我只須說明我剛底一件事實就夠了。據貿易局底報告，每年鐵道底旅行者在一八四二年一年中達一千九百萬人，但在一八五二年已增加至八千六百萬人以上。

(註四九)關於這點斯提文斯說過一個有趣的例，說到一個特著的人卡李拉(Carlier)說：「他對於外國人底觀感，確實已經改變了；這是一件個人間底接觸對於免除個人及階級偏見底影響底一個很好的例。」(見斯提文斯底有價值的著作中洲第一冊第二四七—四八頁)揆爾芬斯同說：「凡能夠和印度人做朋友時間愈長，則對於印人愈有好感；但這與其說這是對於印度人的新觀，毋寧說是對於人底本性的新觀，因爲任何民族都是如此的。」(見揆爾芬斯底印度史第一九五頁)

第五章 宗教文學及政治底影響

——宗教文學及政治所產生的影響底研究——

關於人類史應用其他知識流派已得到好果的研究方法，同時拋棄了所有先入而無同樣效果的觀念，我們已得到某幾種結果，其大綱我們不妨再述一下。我們已經明白我們底動作全是內心及外界主動力底結果，則必須採用這些主動力底定律來解說。我們也見到思想定律在歐洲比自然定律較為有力，並且在文化底進步裏，思想定律超越性常見增加，因為進步的知識累積了思想之源，而使舊日思想底來源固定了。因此，我們以思想定律為進步之最偉大支配者；我們以為自然定律不過占有附屬的地位，併且不過表現它們自己在偶然的擾亂中，而這擾亂力量及次數早便漸見減退，現在若整個講起來，已失其運用力了。用此方法既將所謂社會動力底研究溶化於思想定律底研究裏面，我們亦可以後一種定律作同樣的分析；我們發覺它們包含着兩部分，即：道德定律及知識定律。把這兩定律比較一下，更可以清楚地確定知識定律底博大的超越性；我們已見到文化底進步一方面既因思想定律之優越於自然定律，同時，知識定律也勝過道德定律，二者同為顯著的現象；這種重要的推論依恃着兩種明顯的論據。在始，道德底真理既屬固定，而知識底真理是進步的，那麼，持社會進步是靠道德知識而非靠智慧一說便不可靠了，因為道德知識幾世紀以來仍舊是一成不變的。其他的論據包含在以下的事實裏面，即是

人類底兩種大的惡行，併未嘗因道德之改進而有所輕減，但已經繼續着受知識進步底影響了。從這點講起來，即可知如果要確知支配現代文化進步的情形，我們必須在知識底量及其分布的歷史上搜尋之；而且我們必須要以爲自然底現象無疑地會在短時期內發生大困擾，但在長時期內，即會彼此抵消及糾正了，而使知識定律之活動不受這些低劣及附屬的作用所支配。

這是我們由不斷的分析而得的結論，現在我們便站在這立場上。個人底動作是很受他們自己底道德的感覺及衝動的影響；但這些既對於他人底衝動及感覺有了衝突，於是便彼此相抵消，所以他們底影響以人類底事件之通盤計算起來是看不出的；且人類底全部行爲整個講起來是要受人類所有的全部知識所支配。在個人情感及個人之反覆性之相吸收，互抵消中，我們找到了關於罪惡史——以前曾提過的——底清楚例證。因爲這些事實已確實地證明每一國家所發生的罪惡量逐年產生了非常可驚的均等性，而非絲毫因受這些一向與人變動作有關的反覆及個人的情感底影響。但如果我們不拿年數而以月數來考查罪惡史，則其規律性自較低；又如果再改以鐘點來考查，那麼，規律性簡直找不到了；我們若不知道一個國家底罪惡紀錄，而所達的範圍僅限於知道一條街道或一個家庭，那麼，它底規律性也看不出了。這一點的原因，因爲支配罪惡的大的社會定律只能經過觀察大的數目和長的時期纔能看得清楚；但在少的數目短的時期裏，個人道德原理便得勝利，而擾亂那比較大的知識定律底運用。所以當道德感覺——人因其引誘而犯罪或因其感動而阻止其犯罪者——將對於他本人底罪惡量上產生極大的影響，而不會對他所屬的社會罪惡量上發生影響；因爲在長的時期裏，它們一定會被

相對敵的道德感覺所抵削，而後一種道德感覺轉令其他的人發生相反的行為。同樣的，我們都感覺到道德原則確是幾能影響我們動作底全部；但我們有確實的證明如果我們用充足的時間及廣闊的範圍來研究社會現象使超越的定律能自由地運用，那麼，它們對於人類底全體或大集團的人羣不會產生絲毫影響。

人類動作底全部從最高的見解看來既然是受人類知識全部的支配，那麼，搜集知識底證據及把這些證據綜合起來以確定支配文化進步底定律底全部是一件很簡單的事。而且這是自然會得成功的，我對這點也並沒有絲毫的懷疑。但不幸歷史卻給那些不能擔當這偉大工作的人去執筆，於是必需的材料很少給他們搜集得到了。並沒有告訴我們那些唯一有價值的事物，——併不給予我們關於知識進步的材料及人類如何因知識之進步而受影響底消息——大多數的史學家在他們底著作裏充滿了最不重要最無用的詳細敘述；帝王及朝臣個人的軼事；政府要員間底言行記述，而尤為惡劣者，便是戰爭底詳細記載，這些記載對於那些有關係的人自然覺得有興味，但實無與於我們，因為這不能給予我們新的真理及其發現的方法。這是停止我們進步的眞阻礙。就是這種判斷力底缺乏及選擇力底愚昧奪取了我們久應積聚，編製及留爲將來應用的史料。在其他知識的流派中，觀察自應在發現之前；事實被搜集後，定律纔能被發現。但在研究人類史時，重要的事實被忽略了。結果凡現在要綜合歷史現象的人必須蒐集事實，同時還要下綜合的工作。他找不到現成的材料。他必是一個泥水匠，同時也是個建築師；他非但要計畫大廈，還要去挖掘石鑛。這種必須擔任的雙重工作使那哲學家作這種重大的枯燥的事，即使窮一生之力也擔任不來了；歷史底研究尙沒有達到它本身應有的成功，以供我們作一個完全及深入的綜

合研究，即使最堅定最忍耐的努力都不能使任何研究者——即在兩世紀短時間內——明瞭人類底真的重要動作。

因着以上所述的問題，我早便廢了我本人底計畫；我會勉強決定寫一部非普通的而為一個民族底文化史。可是因用這種方法我們便會斷割了研究底範圍，而不幸即減少研究所包含的材料。人類動作底全部如果以長時期計算之，是靠人類知識全部的，這一點雖是非常的確實，但我們也須承認假然應用於一個國家便失了一些它原有的價值了。我們底觀察愈減少，則平均量之不確定性愈大；換言之，即是比較小的定律底運用愈有機會去困擾比較大的定律底運用。外國政府底干涉；異國人民底意見，文學及風俗所發生的影響；他們底侵略或至於克服了我們；以及新宗教、法律、習慣等之強制侵略——所有這些都是自然進化中之一種困擾，在普通的歷史看來，是可以互相抵消了，但在一個國家裏頭即能困擾了她自然的前進，因此，使其文化底運用更難加以估量。我如何嘗試解決此種困難，現在便要加以敘述了；但我首要指出那令我選定英國史的理由，因我以為較編輯其他歷史更為重要，因此，英國史是值得作一個完全及哲學化的研究。

現在就可明白，當研究過去的事件的優勝點在於確定，此件事務所被支配的定律底可能性，那麼，任何民族底歷史其活動如果比較少受外來主動力底困擾，便比較地有價值了。任何外國或外來所對於自國的影響，即是對於自國自然的進展底阻礙，所以便使我們所從事於研究底狀況更形複雜。使這種複雜性簡單化實是各種知識流派中之成功的重要條件。這點對於治自然科學的人是很熟悉的，他們常能因一個單獨的實驗發現了即費

了無量數的觀察也找尋不到的真理；理由是，現象之實驗能使我們在其複雜性中將其分解出來；因此，在將它們和隱昧的動力底干涉隔絕了以後，我們便能令它們走自有的路程，而表現自身底定律底運用。

於是這便是我們必須用以估量任何國歷史底價值底真確標準。一國底歷史底重要性并不靠其事業之宏偉，而在那國底活動受其本身所發生的原因底干涉底程度如何而定。所以假如我們能找到幾個文明民族，他們底文化完全是他們自己去發展的；他們已避免了所有外國底影響，他們也不因統治者個人底利益及特殊種底影響而獲得利益或退化——這種民族底歷史實是最重要的，因這種歷史將表現正常的及本有的發展底情況；它將要表明一個進步的定律在單獨情形中活動；事實上它是一個現成的實驗且完全具有自然科學所依賴的人為的方法底價值。

要找到這種民族，顯然是不可能；但是哲學史家底責任就是要選擇一情形最相近的國家以供其專門的研究。現在非但我們自己，即是有知識的外國人也將首先承認在英國最近之三世紀中，此種情形實較其他國為尤永常而成功。我不必講到我們底發現如何之多，文學之如何璀璨，及軍器製造之如何進步，這些是招人嫉妒的題材；其他的國家恐怕要不承認我們可以合理的宣傳底優越的才能。但我提出這單獨的一點，即在所有的歐洲國家裏頭，英國是在最長期中，政府最平穩，而人民最活動的一個國家；公共的自由是立在一個廣大的根基上，而個人可以享有思想底自由及去做所欲從事的事業；每一個人能夠隨其所向而傳佈自己底意見；宗教壓迫在英國甚少見，人類思想之流轉，很清楚地可以看到，不受其他地方所受到的阻礙；在英國，異教底事業沒有危險發生，

而不信從國教也是一件普通的事在英國那敵對的信條可以同時流行其升降替並不受甚麼困擾而視人民底所需而定，不受教會教義底影響，也不受政府權力底制裁；在英國，所有的事業及階級無論是宗教方面抑非宗教方面皆是順其所向而自由地滋榮；在英國，所謂多事的保護政策已首先遇到攻擊，且以其在英國之故，纔能廢去了；總而言之，在英國，凡因障阻所發生的危險底極端性既經免除，所以獨裁及叛逆絕少發生，互相諒解既然認爲政策底基本原素，所以國家底進步極少受階級底權力及特殊宗教團體底影響，專制治理者底暴虐等底困擾。

以上所述的英國史底特殊點已是人所共知的了；這在一些人固然可引以自豪，但也有引爲遺憾的。而在這些環境之上，英國還因着它底國土之孤懸海外，（註一）因此，直至上世紀底中葉，外人到來訪問的還是很少，而我們底進步便很明顯地不受那其他民族所同感覺到的政府權勢，外力影響兩種主要原動力底干涉。十六世紀時，英國貴族中，海外觀光之習很是流行；（註二）而外國底貴族卻沒有這種風習。及至十七世紀爲娛樂而旅行的風習是那般風行，英國貴族及有閒階級中幾乎人人都走過英倫海峽了；而其他國家底同樣階級卻一部分因爲沒有那般富足，或缺少了航海底習慣，所以除有特別的任務外，很少到我們這個島裏來。結果，在其他國家，此中尤以法國與意大利大城底居民更慣見外國人，且如所見的人類一般，無形中便受所見的事物底影響。但在我們底大城裏，除了自己的英國人外，卻很少有外國人插足其間；即使都會裏居民，畢生也許除了見過幾位冷淡而驕傲的外國使節踴躍於泰晤士河兩岸外，簡直沒有見到一個外國人。雖常說：在查理十二世復位後，我們底國民性開始受法國人底影響，但這點我將充足地證明是僅限於範圍極小的官僚社會裏；對於知識及工業這兩種重要階級

實沒發生重要的影響。這種接受法國影響的潮流是僅見於我們底文學之最無價值的部分中——在巴金干 (Buckingham)、多爾塞特 (Dorset)、挨瑟累治 (Etherage)、基利格盧 (Kilgrew)、馬爾格累夫 (Mulgrave)、羅徹斯忒 (Rochester)、塞德利 (Sodley) 等各無恥的作品中。但在當時及以後各時期，我們底偉大思想家中，實在沒有一人曾受法國底知識底影響；(註三)反之，我們在他們底思想及其風格中找到粗率及著有土俗的色彩。這些雖然不給那些斯文的鄰國所歡迎，但至少也不失為我們本國底特色。(註四)以後所產生的法國和英國底知識，其原始及其底布的關係，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但好像其他的真有價值的事物一樣，完全給史家所忽略了。在現在這本書裏，我要嘗試補充這缺點：現在我可以說雖然我們在欣賞上、風雅上、儀容上以及所有的生活之符適上，其進步一向受惠於法國，但我們實未曾從法國得到能令我們國家底命運可以永久受其變化之最重要影響。在其他方面講來，法國非但採用了我們許多的政治制度，並且法國史最重要的史蹟都受了我們底影響不少。一七九八年法國底革命大家皆知為幾個偉大的人物所鼓吹而成的，因着他們底著作及其演辭乃能引起了人民對於政府底反抗；那裏曉得那般卓越的領袖本來由英國學得了許多哲學及原理回了國，因此，遂產生那樣可怕而有益的结果了。

我希望勿以為我故意講許多話，想對於法國——一種偉大而可贊許的，在許多方面說起來超越於我們，而我們尚須待以借鑑，其缺點不過僅因專制統治者底長期壓迫而發生的民族——下一些反應。但從歷史眼光看來，我們發展我們底文化確很少得到他們底助力，而他們卻反自我們得到極大的幫助。同時，我們必須承認法國

政府之干涉他們比我們底來得利害。但關於那一個國家較為偉大一點上，我本絲毫沒有成見，不過根據以上的立場，我總覺得我國史實較為重要而已；我之所以選集了英國文化進步來作一個專門的研究，不過因為它少受外來動力底影響，因此，我們能夠更清楚地，在文化底進步中看到社會正常的進行，及人類命運所被支配的那些偉大定律底自由運用。

經過法國與英國相關連的價值底比較以後，似乎不必再去研究其他國家底歷史了。當然還有兩個國家我們可以稍為一說的：大體上言之，我是指德國和美國。說到德國人，自十八世紀以來，確實地他們曾經產生了舉全世界之數猶不足與比倫的那麼多的幽深的思想家。但我們以前所對於法國底反對點以之加於德國則更為適合了。因為保護政策之在德國一向比在法國為尤強有力。就算是德國最賢明的政府也是時常對人民加以干涉的，決不任他們自由自在的下去，時常注意到他們底興趣，即使日常生活最普遍的事件也強加干涉。除此以外，德國底文學雖然現今在歐洲占了最高的位置，但我們以後可以看到，德國文學實淵源於足以促成法國大革命底偉大的懷疑運動。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德國人中除了著名的如開普勒及來布尼茲（Leibniz）數人外，實在沒有真價值的文學；而且德國人第一次所接受的文學刺激是源於和法國知識界接觸及受那卓越的法國人底影響。這些法國人在斐迪禮大王時代羣聚於一向所認為科學及哲學所應集的大本營——柏林。從這點便發生幾個重要的情形，我現在只能簡單地加以說明而已。德國底思想自從受了法國思想底影響而驟然蓬勃起來，它底進展是畸形的；因此，其活動之急驟溢乎德國社會通俗之所需。結果，我們在歐洲再找不到一個國家在思想最

高超者及最低者之間有那麼廣闊的鴻溝存在。德國哲學家底深詣能使其占有文明世界之最高位置。德國人民不管他們底政府如何留心他們底教育，他們總比英、法二國人民來得更迷信、更偏見、更不適合於領導他們自己。（註五）以上兩階級之分離是那種不自然的刺激的當然結果。這種刺激乃在一世紀以前刺激了其中一階級，因而困擾社會底正常分配者。因此，在德國，其最高的思想已超越其國底普通進步，所以在兩階級間便沒有了同情心；現在也沒有方法可使這兩派人有接觸。他們底偉大的著作家無與於國家，而僅為個人間的研究而已。他們確是特出的有學問的聽衆，寫出有學問的文字；將國語製造為術語，流利而有力，但難解而曲折，充滿了複雜而倒置的句法，他們本國較低下的階級聽了是完全不明白的。（註六）從這點便產生了德國文學最顯著的特殊點。因為既然離開了普通的讀者，它便與一般的意見隔絕了；因此，它表現了研究的勇敢性，追尋真理的鹵莽心而不顧一切傳統的意見，這幾點使它能够獲得最高的讚美了。但反過來說：同樣的情形，發生了實際知識底貧弱，及對於實質及自然興趣的漠視。這兩點是德國文學所應受的指摘了。當然的，所有這些都已加闊了原有的隔核，併且增加了德國偉大思想家與愚昧的一般人底距離，這般人雖直接在他們之下，但仍舊沒有受到他們底知識底影響，而且不因他們天才者底蓬勃的光綫而活躍起來。

另一方面，在美國，我們看見一種恰是相反的文化。我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國家，像美國這樣缺少最有學問者及最愚昧者的一種現象。在德國，思想家及一般實事求是的人是完全分離的；但在美國，他們便完全混合在一起了。德國每年間皆有新的發現，新的哲學及推廣知識範圍的新方法。而在美國，這些研究幾乎全被忽略了；自從

愛德華 (Jonathan Edwards) 底時代以來，從未曾有偉大的形上學家出現過；對於自然科學方面很少注意，并除了法律學以外，(註七) 像德國所不斷工作的那些大的題材從來沒有甚麼成就。美國底知識底積量是異常的少，但已分布于各階級，德國底知識底積量甚豐足，卻只限於一個階級而止。這兩種文化方式那一個來得有益，這問題我們現在無須去決定。我們僅須知道：德國在知識分布一點是非常地失敗了；但美國，知識聚積底失敗也同樣地嚴重罷！文化既然受知識之聚積和分佈之支配，顯然一個國家如果它在單一方面有過分的發展，而忽略了其他一方，那麼，這國家便難作一個完好的規範。美國和德國既然在文化底兩種要素中皆失了平衡性，當然便發生大而相反的惡果，這惡果恐怕不易補救的；而且除非有了補救，否則終為兩國進步之障害，雖然一方努力的尚不失為暫時的利益。

我已經非常簡單，但仍希望公平地——當然並無故意的偏袒——試估評世界四個領袖國家底歷史底相互的價值。至關於這些國家自身的真偉大，恕我不參末議了；因為每一國家都以為自己是高於一切的。但除非我所做的事實能够被人家駁倒，否則當然英國底歷史在哲學家眼光看來，比任何國家為有價值；因為他能够在英國清楚地看到知識底積聚及分佈的並行兼進；因為英國底知識很少受外來的動力底影響；因為它是不論好壞方面極少受那些有權力但常是無能的人——主持公共事業者——底干涉。

因了以上所述的觀點，而非由於愛國的動機，我纔特擬為英國寫一部歷史；且擬以現在已甚豐富的材料盡量應用，力求詳盡完美。但以上已經說過僅靠研究一個國家底歷史實在不易找尋社會底定律，所以我所寫這

一部書實所以免除這大題材所包含的困難。在最新的幾章，我已指出這題材底範圍，同時並將它固定在一個最廣大的基礎上。因為既有這見解，所以我將文化分爲兩大部：歐洲部分，人比自然爲強有力；歐洲以外部分，那裏便是自然比人來得強有力了。這使我得到一個結論：即國家之進步從大眾自由而言，除了歐洲以外，別處地方不會發源出來的；所以只有在歐洲，我們能研究其真文化之蔚興，及人類思想之所以克服自然的力量而已。思想定律之超過自然定律既視爲歐洲史之基奠，第二步便要將思想定律分化爲道德及知識定律，而證明知識定律在推進人類進步上有優異的影響。這種綜論，若認歷史爲一種科學，那麼，在我看來這便是歷史底最重要的開端；因爲要將這綜論和英國特殊歷史發生關係，那麼，我們現在只須確定知識進化底條件。除非這些條件已確定了，否則每個民族底編年史給了不同的作家照他們個人的原則將史實錯誤地及偶然地綴拾起來，一定只能以經驗的方式來表現而已。這本書其餘的部分便完全是要把我所提要的計畫來完成——即是研究各國歷史中之知識底特殊點，這特殊點，若僅靠我國史是找不到充分的材料的。譬如說在德國，知識底聚積比英國來得快得多；因此，知識聚積底定律在德國史研究起來比較來得方便，而然後可以演繹地將定律應用於英國史。同樣的，美國人在知識底分佈上比我們做得較爲完成，所以我主張用此種分佈的定律以解釋幾部分的英國文化現象，這種分佈定律在美國文化中，最容易見到它底活動，而且也比較地容易發現出來。又法國既然是保護精神表現的最有力的一個文明國家，我們可以研究法國這種顯明的趨向以循索我國這種精神底隱沒的趨向。因着這種見解，我因爲要例示這種保護原則，所以我要敘述法國史以表明這種原則對於一個聰明而有能力的民族所發生的損害。

并且在法國大革命這種偉大的事件怎樣是那保護精神底一個反動；同時這種反動其根據既來自英國，於此便可看到一個國家底知識怎樣影響及於他國；而且我們對於那最重要地支配着歐洲事件的思想交換得到一些結論。這點對於國際間思想底定律給予了不少光明；同這點相關的以下還有兩章專門述及「保護精神底歷史」的，並且研究到英、法兩國這種精神執為緊張。但法國底民族自十七世紀初期以來已顯明地越出了迷信的範圍了；不管他們底政府如何費力，他們是非常厭惡宗教底權力；所以雖然他們底歷史在政府底方式上還保有保護底原則，但在宗教方面我們着實找不到甚麼證據；在我國，這種證據也不見得多的。因此，我主張參看一下西班牙史，因為在那裏我們可以循索那宗教階級常時要文飾過惡的保守性底結果。西班牙底教會在最早時期已占有很大的權力，而教士對於人民和政府底影響比其他國家為甚；所以在西班牙，要研究宗教發展定律及這種發展影響於國家事業底狀態實在來得方便。支配國家知識進步底另一因素即國內最有才能的人一向所採用的研究方法。而所採用的方法，非「歸納方式」即「演繹方式」。兩種方式各屬於不同的文化方式，又常附有不同的思想風格，尤以關於宗教及科學方面為然。這些差異點是這般重要，除非他們底定律已被發現，否則我們不能說已明瞭過去事件底歷史真際。現在這兩種差異的極端，無疑地是德國和美國了；德國人是非常能用演繹方式，而美國則獨擅歸納方式之運用。但德國和美國在許多方面俱是很背馳的，我想還是拿兩個相類似的國家以研探究繹及歸納的精神底運用為較有效；因為兩國底相同點愈大，則我們愈易於循索一個單個的分歧點底結果，而分歧點底定律將更為顯著了。這種研究底機會可以在蘇格蘭及英格蘭史相比較而得。這裏有兩個民族，邊界相

鄉，實語相同，文字相仿，興趣並趨而膠結。但在最近三四十年間蘇格蘭底知識完全是屬於演繹方式的，較英格蘭之屬於歸納方式爲尤甚，爲確斷不移的事實，此後我將充分地加以詳盡的證明。英國人思想上的歸納傾向及我們對此傾向所緊緊的迷信的尊敬，曾經被很少數有才能的人（註八）所注意而表示遺憾。反之，在蘇格蘭，尤以在十八世紀間，大的思想家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以外，都喜歡採取演繹的方式。演繹方式底特點當其應用於未經成熟的知識流派時，即增加假定的數目而從此假定再向下搜集事實，遺棄了歸納研究所特有的遲緩而忍耐的上進之路。這種用幻想及先入爲主的結論以緊握真理的希望，常可以走到那偉大的發現的路上去；沒有人既受正當的教育以後會否認它底偉大的價值的。但當普遍地應用這方式時，便有了極大的危險，恐怕完全基於經驗上的均等性底觀察便會被忽略了；恐怕有思想的人要變成不耐於小而較接近的綜論——這種綜論，以歸納的方法來說，是必須先於那較廣而較高深的綜論的。當這種不耐果然發生，便產生一種嚴重的禍害。因爲這種較低下的綜論造成了只憑空想及現實思想所共有的中立的基礎，在這基礎上它們能够相遇合的。如果沒有這種基礎，那麼，這種遇合便不可能。在這種情形下，於是科學階級中人便對於常人憑經驗所下的及定律似乎也難加以解說。的推論表示了不合理的輕視，同時在現實階級中，對於那般廣闊而堂皇的空想每不理會到，而這種空想之中段及其開始的步驟在他們眼光裏頭也看不到的。在蘇格蘭，這種結果是非常的奇特，並且在某幾方面中我們在德國所發生的一樣；因爲兩個國家其知識階級久已以其研究之勇敢及能脫離偏見底纏絆著名，而且大多數的民衆也同等地因其迷信之多及其偏見之堅強而著稱。在蘇格蘭，這點比較德國更來得驚人；因爲幾個尚未

甚經人研究的原因，蘇格蘭在實際上非但是努力而能綢繆於未雨，並且異常的精明。但這點在比較高的生活階段中，對他們並無補助；同時既並沒有一個國家有蘇格蘭那般的瓶作，好研究的及革新的學問，也沒有一個同等文明的國家似蘇格蘭那般具有流連於中世紀底精神，許多可晒的事仍然在保守，而宗教不寬恕的舊感情底活動也是那般容易被引起的。

在空想與現實兩階級間所生的這種分歧點——當然是敵對的——是蘇格蘭史最重要的事實，併且一半是演繹方法占優勢的原因及其結果。因此，這種由上向下既然反對了由下向上的歸納方式，於是遂忽略了那底下的綜論。惟有這種綜論是兩種階級皆能明瞭，及皆能在這一點上互表同情的。這種由培根所廣佈的歸納方法使這低下而較接近的真理得到較高的地位；雖然這點常使英國知識階級過於求實利，但總可以使他們從那孤立的地位解救出來。但在蘇格蘭，這種孤立性幾乎是十分完全，而演繹方法差不多是普遍的。充分的證據將在本書第二冊中搜集；但我不能令這題材擱起來而不加以例示，所以我將簡單地敘述在蘇格蘭底文學達到最燦爛之點的那三世代中所發生的主要例證。

在這時期幾乎占有了一個世紀，且有了一種在人類思想年史中造成可驚的現象的趨勢。第一個大的徵象即是由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西姆生教授（Prof. Simson）所開始，並由愛丁堡大學斯雲阿特教授（Prof. Stewart）所繼承的一種運動。這些有能力的人，費了很大的力量要恢復純粹的希臘幾何學，並輕視代數或符號底分析。因此，在他們或其門徒中發生了愛好那最精細的解答方法，而對那由代數得來的較「吞

易而較不甚精密的解答方法便輕視了。到這裏，我們很清楚地看到這種方法之孤立及其性質之深奧，這種方法輕忽了那普通瞭解所能遽下判斷的方法，並且它底進行與其說是從實際以至於理想，不如說是從理想以至於實際了。同時，在其研究範圍中，同樣的精神由哈徹松（Hutcheson）表現於另一種研究中。他雖然是生長在愛爾蘭，但在格拉斯哥受教育，以後並在那裏掌教的。在他著名的道德及審美學研究上，他以由不明顯的原則得來的演繹理解代替了由明顯事實得來的歸納理解；他不顧知覺所給直接及實際的暗示，並相信用某種定律底假設的斷定，他能夠由先定原則然後搜集事實以得這種定律，而非先由事實之搜集得之。（註九）他底哲學對於形上學家發生極大的影響；他底由上向下的工作方法，即是從抽象以至具體，被其他一個更偉大的蘇格蘭人即那著名的斯密斯所採用了。斯密斯如何愛好這種演繹方法底研究，可在他底道德情感論（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這本書看出來，同樣的又可在論語言（Essay on Language）（註10）一文及在他天文史（History of Astronomy）各段中看出來。在天文史中，他以普通的見解試為證明天文發現之進程必是如何的，而不先確定它原有的進程是怎樣的。又國家底財富一書完全採用了演繹法，因為斯密斯在這書裏不由財富底現象及統計底敘述以綜論財富底定律，而從人類底自私之現象得之；因此將一組底思想原則演繹地應用於經濟事實的全體。（註11）這本偉大的著作所舉的例示沒有一部分是真確的論據，它們是隨意念而起的，假然沒有這些例示，這種工作雖然比較地沒那般有興趣，或沒那般地發生影響，但以科學的眼光看來，是同等地有價值的。其他一例：休謨底著作，除了他底形上學方面的論文以外，完全皆屬於演繹的；他底深奧的經濟的研究，在主要點上皆是先入

爲主，併且他寫這本書可以不必熟悉貿易及金融之詳情，而照歸納方法說來，以上的詳情卻極須先事綜合一下。
(註二)他又在他底宗教自然發達史(*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裏頭試嘗單用反省而不用證據對於宗教意見底源始作一個純憑思考的研究。(註三)同樣地在英國史裏，他並不先搜集事實然後下推論，開始他便說：
英國人民與政府之關係必跟着某種的順序，而他忽略了不顧那與他那種假設相反的事實。(註四)這些不同的著作家雖然在他們底原則和在他們底題材方面有些異趨，但在方法一層，他們都是同意的；這就是說：他們大家同意了研究真理與其用向上方法不如用向下的方法。這種特點之社會的重要性我將在下一冊研究之，在那裏，我要嘗試確定它怎樣影響國家底文化，並造成那和這相反的，比較來得實際的英國文學底奇特的不同點。同時，我再加一句——以後還待證明的——演繹的方法非但給卓越的蘇格蘭採用了，且給福開森(*Ferguson*)引用於他底僅憑思考而成的公民社會史(*History of Civil Society*)，又被引用於密爾底立法研究；馬金託引用於他底法律學底研究；哈頓(*Hutton*)引用於地理學研究；布拉克(*Black*)及雷斯利(*Leslie*)引用於熱力圖靈學；罕忒(*Hunter*)及窩刺(*Alexander Walker*)；貝爾(*Charles Bell*)引用於生理學；及卡楞(*Cullen*)於病理學；布郎及卡利(*Currie*)於醫學中。

這便是我想在此書中加以申述的一個方法底大綱；我且因此希望能得到幾個具有永固價值的結果。因爲在那些原則最發展的國家裏頭，研究各種不同的原則，那麼，這些原則之定律將比在那些原則不甚明顯的國家研究起來得容易見得出。既然英國底文化其途徑比較其他國家爲順序，及不受困擾，那麼，在寫它底歷史的時

候，尤須用我所提議的幾種方法。什麼使英國史那般有價值呢？這就是，沒有一個地方，其國家之進步無論在好或惡的方面會這般地少受干涉。但我們底文化因這種關係保全在較自然及健康的狀態中，只此一點的事實已經使我們義務上應該要觀察其他社會流病較多的國家來研究我們所難免的流病。文化之安定及其永久性必須要著它底文化分子相結合的規律性，並靠這些分子活動的融合性。如果有一個分子太過於活動，那麼，全部的組合便會發生危險了。因此，雖然分子組成的定律我們能够在一個分子組合最完全的地方確定之，但當我们能够找到分子本身最活動的地方，那麼，我們必須搜尋每一單個分子底定律。於是我一方面選擇英國史，因為在英國史裏面各種原則底融合性是維持得最長久，一方又因為那個原故，想着最好分別研究各原則最占勢力的國家，並且在那國家裏頭，其全部底組織底平均性會因着反常的發展而致擾亂的。

有了這些戒心以後，我們卻可以移去了許多對於歷史研究仍舊存在的困難。但在踏入了當前廣闊的闊地以前，最好清理幾個初步的論點——這些我們未曾注意過的，但其討論可以免除某種或須提出的反對。現在我所示的題材就是宗教、文學及政治；三個最重要的題目，在許多人的意見裏頭以為是人類事件底主要的推動者。這種意見全是錯誤的，我現在便要加以證明了；但這種意見既是那般廣布及那般容易地給人深信，所以我們必須對它有些瞭解，並要研究這三種大的力量對於文化進步所施的影響的真性質。

現在，第一點，若果一個民族隨他們自己去發展，那麼，很明顯的，他們底宗教、文學、政治，不是他們文化底因素，而是文化底結果。由某種社會情形之下，必自然地隨着產生某種結果。這些結果當然無疑地要為外來的動力所

調和；但如果不是這樣，那麼，一向是習於理解及懷疑的一個高深文化的民族決不會得保留一種常與理智及宗教挑戰的宗教。有許多例可以表明國家改變它們底宗教，但進步的國家卻沒有自動地去採用一個退步的宗教；而退化的國家也不會改良它底宗教的。一種好的宗教當然和文化能和諧，但不良的宗教便和文化極不和諧了。除非有了外來的干涉，否則一個民族非等到他們底理智把他們宗教之不良點啓示了出來；便不會發現他們底宗教之不美善，但如果他們底理智是不活動的，知識是固定的，那麼，便永久不會發現宗教之不良了。一個國家繼續了向日的愚昧，常會保持他們底舊的宗教。一個很愚昧的民族，會趨向於一種充滿了神怪的宗教；這宗教誇大了許多的神，並且將每一種發生的事都納於那些神底直接權力之下。在另一方，一種民族，他們底知識使他們成爲證據的較好判斷者，而且他們是能慣於擔當艱苦的工作——這就是指能「慣習於懷疑」——則需要一種少神怪，少衝突及不甚迷信的宗教。但難道你便說前一種宗教之不良會形成愚昧；而後一種宗教之良好是否造成了他們底知識呢？你是否要說當兩個事件前後相接時，前一事是「果」，而後一事是「因」呢？人們對於生活之普通事件，並非用這種理解方法的；我便不明白，爲甚麼關於歷史的過去事件，要這般去理解呢？

其實，在某一時期所流行的一種宗教，便是那時期底顯著的徵象。當這些宗教意見已深植了根基，無疑地會影響到人底行爲；但在它底穩固以前，必先有知識的變化。我們可以得到這種種子必會很快地入了不毛的岩石裏，有如一個平和而合理的宗教一定要在愚昧而兇暴的野蠻人中間建設起來。這點已有了許多的實驗，且常常得到了同樣的結果。有高邁的意志及充滿了懇切而誤用熱情的人，而每欲嘗試要繼傳他們底宗教在野蠻國家

底人民中用一種努力而不停止的活動常時給人家一些恩惠，或禮物，他們在許多情形中便勸服了野蠻社會從事於基督教底事業。不過凡以教士底勝利的報告和許多的旅行者所供給的連續的證據作比較的話，便會發現這種佈道事業非但名不符實，抑且愚昧的民族只採用了新宗教的虛儀而忽略了宗教底本身。他們僅接受了外表。他們給他們底小孩行浸禮；他們可以受聖餐；他們可以到教堂禮拜等作表面工夫而已。所有那些，他們都可以做，但他們離開基督之遠有如他們當時跪於偶像之前的時候一樣。一種宗教底禮儀及其形式乃是表面的東西，這些一切立刻可以看得見，也是立刻可以學得到，並且容易給不能深入教義的人所模仿的。只有較深入的及內心的改變，纔能含永久性；而這些野蠻人久已沈溺於獸性的愚昧中，永不會體會到這一點。移去了這些愚昧，宗教纔能滲入。只有這條途徑，方能獲得最後的勝利。經過仔細地研究野蠻民族底歷史及狀態以後，我極自信地說：沒有一個好例可以表明有任何民族能永久地信從基督教，除了極少例裏，教士是很有知識，同時是很誠敬地使野蠻人能熟悉思維的習慣，激起其智慧以預備接受宗教底教義——這教義如果不因刺激，從來不會使野蠻人明瞭的。

就是這樣，將一切事件在大的範圍看來，人類底宗教是他們底改進的結果，而非改進的原因。但如果在小的範圍，或在短的特殊時期中，實際上看來，便時常會有擾亂這種普通秩序的情形發生，而顯然違反其自然的進程了。但這點擾亂常序的情形與其他例一樣，只能因個人底特殊點而發生；這種人給了支配人類動作的一種次要定律所左右，是能夠用他們底天才及能力以干預支配廣義社會那些較大的定律底運用。因為有些情形還沒清

楚，時時便有偉大的思想家爲一種單獨的目的，窮其畢生之力以從事預測人類底進步，而產生一種宗教或哲學，於是自然的效果便能因此而發生。但假如我們在歷史方面看來，我們將要清楚地看到雖然新的意見底剝始是屬於個人的，但其意見所產生的結果必須視所繼傳的民族之情形如何而定。如果一種宗教或哲學，其進步之速非那國家所能接受，那麼，暫時不會有甚麼效用，但必須等候時機，直待這民族底思想已充分地成熟纔能接受。關於這點，有許多證據，爲大多數讀者所常遇見者。世間每有爲一種科學及信條而殉身；人受警罵或竟至於死，因爲他們比他們同時代的人所知爲多，且因社會之進步未足以接收真理。照普通情形而言，等到幾個時代既過去了，於是來了一個時期，這種真理遂被視爲平常的事實了；過後，又入了其他的時期，那麼，以前所視爲尋常的真理，到了這時，即被認爲必然的，而最庸愚的人也以爲是絕對不可否認的了。這些情形之發生，即表現了人底思想在知識發展及分佈上已能自由地抒發他們自己底意見。但假如用一種勉強的力量及人爲的方法，這同一的社會在知識發展上便要受到阻礙，於是這種真理無論怎樣重要，也不會給他們接受了。但爲什麼有些真理，在一個時候既被反對，卻在其他時期復會給人們接收的呢？真理是永恆不變的，而最後的承認，必是社會有了變遷，遂使他們能接受那以前所輕視的理論。確實的，歷史竟充滿了證據，證明高深原理傳入於最愚昧的民族中的完全無效。因此，一神主義傳入古代希伯來人中，許多世紀還不發生甚麼影響。這種民族還沒有離開了野蠻的本色；所以他們不能提高他們底思想以接受那般高深的觀念。像所有的野蠻人一樣，他們追求那能爲他們底輕信上供給不起的神奇的宗教；這種宗教不把神當作單獨的神靈，加增了許多的神，竟至充滿了每一塊田地，羣聚於每一個樹林

中。這便是愚昧的，當然的結果的偶像崇拜，這便是希伯來人永久信賴的。他們非但有嚴厲及不斷的責罰，且在每一機會中，都捨棄了他們退化的思想所不能接受的純粹一神論而重墮於他們較易明瞭的迷信中——崇拜金牛和尊敬銅蛇。現在，在這個時代，他們久已沒有這種舉動了。何故呢？並非是他們底宗教情感較易喚起，或他們底宗教恐懼常被激動。且從此，他們不信奉他們舊有的聯念；他們已永久忘失了那些能左右人們底觀念。他們不再被那些有時激起恐懼或感謝心底情緒所影響。他們不再明證白天裏的雲柱，或黑夜中的火柱的存在；他們不再看見西奈（Sinai）所賜予的法律，亦不聽見由荷恩（Horeb）轟然而來的雷聲。在這偉大的顯現的前面，他們底心裏常有偶像之存在，當遇有機會時，這種顯現便實際上成了他們底偶像了；他們之所以如此，因為他們是在野蠻的狀態中，而偶像崇拜是當然的產物了。但何以他們變換了觀點呢？那不過因希伯來人像其他民族一樣，當文化進步時，即開始將他們底宗教抽象化及精美化了，並且看輕了舊日的多神的崇拜，而漸漸提高了他們底思想以接受這「獨一的偉大造物」底觀念。在早期，這種觀念是沒有法子可使他們有這種印象的。

一個民族底意見和知識之關係有那般地密切；因此，以一國而言，其知識之活動必在宗教改善之前。假如我們再需要這種重要的真理的一些舉例，我們可以在基督教傳佈以後在歐洲所碰到的事件中找到來。羅馬人——除了極少的例外——是愚昧及野蠻的民族；最兇暴、淫佚而殘虐。這種民族，多神教是當然的信條了；我們讀史看到他們實行偶像崇拜，而只有幾個偉大思想家敢對這點表示輕視的。及至基督教傳入以後，發覺他們不能了悟它底神聖及可讚許的教義。以後當歐洲充滿了新的殖民——即侵略者——較羅馬人尤為野蠻，輸入了一

種迷信剛剛適合了羅馬底情形。因這兩種的原因，所以基督教現在便需做它底工作了。結果是非常明顯的。因爲當新的宗教似乎可以向前而獲得歐洲最文明地帶的崇拜時，即刻發覺在實際上並沒發生任何影響。即刻發覺社會尚在早期時代，迷信還是不可避免；在這早期社會裏頭，人們如果不採用一種的迷信方式，即要採用其他一種了。基督教播揚那簡單的教義，宣傳簡單的崇拜是沒用的。人底思想太過於退化未能接收這偉大的步驟，並且需要較複雜的方式和信仰。以後情形如何，研究宗教史的人自會明白。歐洲底迷信非但沒有減少，抑且轉入新的途徑。新的宗教給舊的愚昧所腐化了。偶像底崇拜接着便是聖哲底崇拜；母神(Cybele)（註一五）底崇拜代替了聖母的崇拜；異教底禮儀在基督教會裏建立起來；不但偶像崇拜爲可笑的事，即教義一點也同樣急速地增加，並加入而活動於新宗教精神裏；直等到幾個時代過了以後，基督教表現了那般奇異而可怕的形式，以至最佳的本來面目也失掉；並且最早時期最可愛的容貌也全部毀壞了。

幾世紀以後，基督教漸漸地由腐敗裏浮現出來；許多的那種腐敗，現在即使許多文明國家還未能洗刷了去。（註一六）即改良的開端也確然地不可能，直等到歐洲底知識在某種程度下從昏沈的狀態甦醒起來，纔有可能。人底知識漸漸地前進，使他們對於以前他們所讚美的迷信表示憤怒，其憤怒之如何加厲——在十六世紀爆發爲大的史事即所謂宗教改革——成爲近代史最富興味的題材是。但爲現在的目的起見，我們只須記得一個可紀念而重要的事實，就是基督教在歐洲地域建立了，以後數世紀，未曾收得它底自然之果，因爲它所傳入的一種民族因其愚昧，遂釀成了迷信，而又因其迷信，便不會傾向於接受基督教原始的純潔的制度。

的確，在每一頁的歷史裏我們可以碰到宗教教義對於一種民族發生影響的新證據之少，除非在先有一種知識文化。新教所發生的影響和天主教相比對於這方面供給了一個有趣的例示。天主教對於新教的關係便大似黑暗時代對於十六世紀一樣。在黑暗時代，人是輕信的、愚昧的；所以他們產生一種宗教需要較大的信仰，對於知識的需要反不甚重要。在十六世紀，他們底輕信及愚昧雖尚占有相當地位，但很急速地便減少了，所以因此必須要組織一種宗教以適合於他們底改變的情形：即一種宗教合乎自由研究；這種宗教較少神奇，及聖哲傳說與偶像；其禮儀較少而不繁複；它不鼓勵懺悔、節食、自首、獨身及一向普遍的其他一切苦行。這些皆由於新教之建立而起；新教是一種崇拜的方式，因能適合於當時底時代，故有非常疾銳的進步了。若果這種偉大的運動進行無阻，那麼，在幾世紀中或者能够推翻舊的迷信而建立一種較簡單而不甚繁雜的信條；這種進行底速度當然和各國底知識活動成了正比例。但不幸歐洲政府干預和他們無關的事件而以保護人民底宗教興趣為他們底責任；並且和天主教教士發生諒解，在許多例裏頭他們強逼停止這種異教底播傳，因此障害了時代底自然的進展。這種干涉在各例裏本來是懷着好意的，乃全因管理者昧於自己權力發揮底限度，於是其結果便不敢恭維了。差不多在一百五十年間，歐洲飽受了宗教戰爭、宗教流血及宗教壓迫底痛苦；這些事件，如果他們能够明白一種大的真理便不會發生了；即使政府對於人民底意見是沒有利害關係，最低限度，政府沒有權力干涉他們所採納的崇拜方式。但這原則以前是不知道的，不加注意的；直等到十七世紀中葉，大的宗教戰爭纔結束了，並且各國皆安於他們底公共信條；這種信條，其重要點從來沒有改變過的；二百年以來，再沒有一個國家因宗教而戰爭了；同時所

有信仰天主教之各大國及信仰新教的國家仍能保持其信仰不改。

從這點便發生，在歐洲幾個國家裏頭宗教底進展，不依自然的程序，而被逼着入於不自然的途徑裏。照自然的順序，最文明的國家應該都是信從新教，而最不文明的國家也應保持着天主教的。按例證底平均數來說，這確是真實的情形；所以許多人誤以為所有現代底開明現象完全是受了新教底影響；而他們忽略了一重要的事實，即，除非開明的現象已經開始，否則新教是完全不需要的。但雖然按事情底常規，這種宗教改革底進步可以作先於這進步的知識底測度及表徵，可是在許多情形中，政府及教會底權力時常是阻止及擾亂宗教底自然進展。經過「威斯特發里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將歐洲底政治關係固定了以後，神學方面底鬭爭的愛好心差不多全隱沒了，人再想不到值得去發起一個宗教革命，並犧牲他們底生命以推翻其國底信條。同時，政府本身也特別不喜歡革命，所以便促成了這種靜止的情形；很自然的，以我看起來，他們很聰明地不發生大的變化，而任他們底本國底宗教制度保留其原有的狀態；這就是說：新教及天主教各自保留他們底原狀。因此，現在，無論那一國家，其所信的信條，並不是該國底現在文化之的確的標準；因為固定其宗教的一切環境早便發生，而其宗教之建立不過乃以前一種動力底繼續而已。

我以上所講的是歐洲宗教建立底原始。但在它們實際的結果裏，我也可以找到幾個很可借鑑的結果。因為有許多國家，它們底國教非自然地產生，而為幾個有力的個人底權力發揮的結果，那麼，我們便會發現在這些國裏其信條不會產生那我們以為必然的結果，這結果照理講來，是應該產生的。譬如說：天主教比較新教來得深信，

來得不納異見；但並不是拿前一種信條爲國教的國家一定比較後一種信條的國家來得迷信及不納異見。其實，法國非但很能像最文明國家底新教徒同樣地擺脫了那些可憎的風習，並且更能超過於幾個信仰新教的民族，如蘇格蘭人、瑞典人等。受高等教育的人姑且不論；但在教士及一般人中，我們一定要承認蘇格蘭人比法國人迷信較深、較固執，及對於其他的宗教比較的更爲輕視。又在瑞典——這是歐洲信從新教最早的國家（註一七）——非偶然的，而是習慣上有不納異見及壓迫的精神，這在一個天主教國家是一件不名譽的事；從一個以宗教信仰基於自斷的（註一八）權力的民族而發生這種情形當然是不名譽的了。

這些情形——很容易用比較廣闊的歸納法來證明的——表明，當無論那種民族因特殊或偶然的原故相信一種超越於其本身的宗教，即不會發生合理的結果。（註一九）新教之所以優越於舊教者，在其能減少迷信，容納異見，及限制宗教權力。但歐洲底經驗告訴我們，當新教一傳入劣等民族中，其優點便失了踪影了。蘇格蘭人及瑞典人——或再可加入瑞士底數縣——是比較沒有法國那般文明，所以比較的迷信。既然這樣，那麼，雖然有比法國更良好的宗教也是無益的。在三個世紀以前，因着某種情形——這久已成爲過去的——採用了一種信條。這信條因習慣底力量和傳統底影響使他們不得不緊握住的。實在對於他們沒有好處。凡曾遊歷蘇格蘭而充分地注意到其人民觀念及其意見者，凡能深究蘇格蘭神道學及讀蘇格蘭刻爾克人歷史及蘇格蘭會議及異教裁判所之進行方法者將明瞭這個國家受其宗教之實益是如何之少，且在不納異見的精神及宗教改革底新進向之間其鴻溝是怎樣地廣闊。反之，凡以法國作同樣的研究者將發現一個不自由的宗教附有了自由的見解，並且

一個充滿了迷信的信條而被一個迷信成分較少的民族信從着。

簡單的事實，便是法國人所信的宗教其程度實較他們本身為低微，而蘇格蘭人底宗教反較其本身程度為高越。法國底自由是不適於天主教的，有如蘇格蘭底固執是不適於新教的一樣。在這些及同樣的情形中，信條底特質便被其人民底特質所克勝了；國家底信仰在重要點上完全失其效用。因為這是信仰不與那國家底文化相融合的原故。假如把文化歸屬於信條之下，你說是多麼不適宜呢；政府嘗試要保護宗教，那豈不是更甚於愚蠢；而況這種宗教如果適合於人民，便無所用其保護，反之，保護也有甚好處呢！

假如讀者已經摸索到以上論據底精神，便將不需要把第二個擾亂的因素——即文學——加以同等精細的分析。很明顯的，在上所說關於一個民族底宗教，在大體講起來，也適於他們底文學的。文學（註三〇）當在一個從容的狀態中不過是記錄一個國家底知識的方式，也即是傳播知識的工具罷了。在這一點上，有如我們在其他情形中所想的一樣，各個人當然可以大踏步地前進，並且可以遠邁於他們時代底水平線上。但如果他們之進行超過了某一點，那麼，他們底現在的效用便會減少；如果他們再走前一步，則其效用便至於毀壞了。（註三一）當知識階級和現實階級之間底分隔太大，那麼，前一階級固然不會占勢力，而後一階級也是沒有多大益處。這便是古代所遭遇的事情，那時，人民愚昧的偶像崇拜和哲學家精密的系統之間底距離是完全不能通過的（註三二）而這便是希臘人及羅馬人何以不能保持其短時期所曾擁有的文化底主要原因了。同樣的程序現在在德國進行着，在德國有許多有價值的文學做成了祕奧的系統，這系統在本國本身找不到共同之點，所以對於本國底文化不產生

甚麼影響了。其實，雖然歐洲從它底文學接受了大的利益，但這並不是由於文學底剝造而來，乃是由它所保存而來的。知識必先得到了，纔記載下來；書底唯一的用處須視作一個倉庫，在那裏面，知識底寶藏很安穩地存儲和可以很方便地找出來的。文學在其本身不過是一件很小的事，其價值不過是一軍械局，在裏面，保貯着人類思想底兵器，待需要時，兵器便可在裏面找尋出來。凡要舍本逐末，凡希望保護軍械局而遺棄其兵器的，凡要毀壞其寶藏，因以改良其寶藏底倉庫的，都是不足取的理解者。

這卻是一般人所容易這般做的。而我尤以在治文學的人底語氣中，聽到了不少必須保護及報價文學的話，卻極少聽到文學必須有自由與果敢的主張，因為缺少了後兩點則雖最璀璨的文學也整個地沒價值了。確是有一種普遍的趨勢，不去誇大知識底利益——因為那是不可能的——而會誤解了那知識所因以存在之物。真的知識，即所有文化持以根據的知識，完全包含一種事物與觀念彼此的關係及其各自底關係的認識；換句話說：即認識自然定律及思想定律。如果所有的定律都已被人家明瞭時，人類底知識固於是纔能完成；在知識未完成之前，文學底價值要視乎它對於定律底認識及定律因以發現的材料底相通的程度如何而定。教育事業即是要促進這個大運動，及增加人們原有的知識來源，藉以增進人們底完美性及才具。按此目的，將文學當作一種副的力量來看，是非常有用的。但若把它當作教育中之一種目的，便會顛倒了事件底秩序，而把目的屈服於方法之下了。因為如此，我們常發現到所謂受過高深教育的人，其知識底進步，真因了他們教育底活動而致於退步。我們常常發現他們給偏見所牽累，他們底進修使其偏見更來得固執而不會減少。因文學既是人類思想底倉庫，非但是

充滿了知識，並也充滿了可稽考的事。所以，由文學所得的利益並不十分靠文學底本身，而須靠研究文學的技巧及選擇文學的判斷力而定。這些是成功的初步條件；如果不履行這些條件，則一國書籍底數目和其價值就變爲無甚重要了。即使在文化進歩底階段中，也常常有一種傾向讚許古時偏見所祖談的文學部分而不讚許那反對他們底部分；在這種趨向甚強有力的例裏，一種偉大的學術底唯一結果是要供給迴護舊的錯誤及堅持舊的迷信的材料。在我們底時候，這種例子實在不少；我們時常遇到那些人，其淹博每反爲其愚昧所驅使，所讀閱的愈多，而所知也愈狹。在有些社會情形中，這種傾向是很普遍的，於是文學底流弊也比它底利益來得大了。譬如，從第六世紀至第十世紀之間，在歐洲沒有三幾個人敢自動的去思考的；就是這幾個人也不得不用隱昧及奧秘的文字以隱蔽其意見。社會底其餘的部分在這四世紀裏，深深地埋沒在最低下的愚昧中。在這種情形之下，少數的閱讀者將他們底研究限於鼓勵及堅強其迷信於其著作中，有如，聖賢底傳說，長老底說經是。從這些來源裏，他們取出了當時神道學所完全包含的（註二三）說謊而粗莽的寓言。這些醜陋的故事很廣闊地流傳出來，一時並視爲不能搖動的及最重要的真理。這些文學愈成爲大眾讀物，則其故事更爲人所深信了，換句話說：其傳播愈廣，其愚昧愈甚。我並不疑惑的，如果在第七、八世紀——這種文學流傳最盛時期中最壞的部分（註三四）——文字失傳了，人不能閱讀所喜愛的書籍時，則歐洲以後的進歩恐怕比它本來更來得快呢。因爲當知識進歩時，它底主要的敵人卽是文學所孕育出來的「輕信」。並非因較良好的書籍之缺乏，而是對於這種書籍之愛好心消滅了。當時有希臘及羅馬底文學，而這些文學，修道士非但保藏了，並時加瀏覽及抄寫的。但對於讀者有何裨益呢？他們既不能認識

古代著作家底才能，不能欣賞到他們底作風底美麗，只有震驚着他們研究底果敢而已。初次給他們底著作底強烈的光輝所中，這班可憐的讀者已頭昏目眩，不知所可了。他們翻閱到異教底著作底一頁書，莫不呆立證目，驚奇着當日作者取道之危險；而且時常怕會吸了古代作家底意見，而致他們自身也蒙了極大的過惡呢。結果，他們十分情願地拋卻古代偉大的傑作；而代之以劣等的叢著，這些書籍蒙惑了他們底鑑別力，增加了他們底堅信心，堅固了他們底錯誤，並將每一種的迷信以文字表達之，因此，延長了歐洲底愚昧性，延續了它底影響使到長遠的後代底理解力亦為所蒙惑。

那麼看來，所重要者，乃是某種民族對於其所閱讀的文學傾好在那一方，而不在其所有文學底性質如何。我們之所謂「黑暗時代」裏，有一種文學，在裏面可以找到有價值的材料；但沒有人知道怎去利用這些材料。在相當長久的時期內，拉丁文字本是一種土語；假如人是願意的話，他們或會研究過這些偉大的拉丁著作家；但如果這樣，那麼，他們必須生活在一種和現在所生活的社會狀態迥然相異的社會狀態中。他們似其他民族一樣，文學底評價以其時代底普通標準而定；照他們底標準，五金底渣滓比真金為尤可貴。所以他們委棄了真金而遂傳藏了渣滓。在小的範圍裏，以前所遇到的事現在也是一樣。每一種文學固然都包含了一些真理，而同時也存在了不少謬見；文學所產生的效果如何，完全視能將真理從謬見分辨出來的技巧如何而定，新的觀念，新的發現對於將來之能否占有重要性，是不必加以誇說的；但除非這些觀念和發現被人家接受及採納了，否則便不會發生影響，因此也不會有甚麼好處。沒有一種文學能對於人民會發生利益，除非它發現了這些人民已在開始要接受它底

狀態中。在這方面講起來，文學和宗教底意見是相類似的。假如一國底宗教及文學不適合於國家底需要，那麼，它們便變爲沒用的了，因爲文學將被忽略而宗教將被毀壞。在這種情況下，最有用的書也沒有人研究，最純粹的教義都被輕忽。這些著作給人忘記，而信仰即給異教所腐化了。

我所指的另一種意見，即以爲歐洲底文化全由於各政府所表現的能力及由於立法方面通過的法規對於減少社會底罪惡之有效而來。凡研究過純淨的史料的人對於這種觀點必定覺得太過分，很難用適宜的嚴正態度來斥駁它的。確的，在所有已經宣布過的社會底理論裏，沒有一種似它那般完全不可維持的，沒有一種似它在各觀點上那般不完全的。第一點，我們很明白一個國家底統治者以普通情形而言本來是那國底公民；他們本來給那國文學所陶冶而成，給那國傳統觀念所育化，並吸收那國底偏見。這些人最好也不過是時代底產物，而絕非時代底製造者。他們底計畫是社會進步底結果，非社會進步底原因。這一點，非但可以用思考的論據來證明，併且可以用實際的考慮來解釋，這種考慮每一個讀史者都能證實。沒有一種偉大的政治改進，沒有一種偉大的宗教革新在立法方面或執行方面是由任何國之統治者之所擬始。這種步驟的最初的提議者當然是勇敢而有才能的思想家，他們認定這些惡俗而加以反對，指出了補救的方法。但他們底意見雖提出了許久，即最賢明的政府也繼續着把持那些惡俗而反對補救的方法。以後如果情形較優，外來的壓迫既那般堅強，政府不得不放手；於是改革完成之後，人民必會讚美他們底統治者之明察，因爲一切都是他們所舉辨。這種便是政治改進的途徑，凡研究各國底法律及其以前之知識進步者必能明瞭。充足而確實的證據，我現在就要提出了；但爲要舉例起見，我現在

可以連帶地講到「穀物法」(Corn Law)底廢除，無疑的，這法律在現世紀裏頭是英國史中最顯著的事實。其廢除之合理及其需要，是現在每一個有充分的知識的人所共同承認；問題在於這法律怎樣提出的。少讀本國史底英國人便會說：其真因乃是國會底明察；其他眼光較遠的人會把這原因歸功於「反穀物法同盟會」底活動及其對於政府所施的壓迫，但能够仔細循索這大問題繼續經過的各階段者將要發覺政府立法機關及那同盟會是一種具有最大權力而卻不善於運用的工具。它們不過是一世紀以前關於這種題材的公共意見進行中的代表而已。這種大運動底步驟，姑待以後再加以研究；現在只須講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商業保護政策之可憎已經給政治經濟學者充分地說明了，使明白他們底證據的人，都承認了這點，並且能够通曉和這些證據有關係的證據。從這時候起，取消穀物法不是政黨底問題，不是利益底問題，而不過是知識底問題。凡明瞭到這些事實的人，即反對這法律；而不明瞭者即會贊許了它。所以很清楚的，凡知識分布達到某一點時，那麼，法律必會傾廢了。同盟會底事功在幫助知識之傳佈；而國會底事功即在向知識屈服了。但我們可以確定，同盟會及立法機關底人員極其量也不過稍為促進知識進步所形成的必然趨勢。如果他們生活在早一個世紀，他們便無所表現其事功，因為時代尚未曾為他們底工作而成熟。他們是一種運動底產物，而這種運動在他們有生以前早已開始的了；他們極其量只能實施前人所垂教的東西，並且把他們從先覺所得到的教訓高聲地複述一遍而已。因為不能故意說——即使他們也不能故意說——在他們底候補人席上所傳播及廣佈及於全國的主義會含有甚麼新穎的意義在。這些發現早已存在，並且逐漸中還在工作着；侵入於舊的錯誤裏並且在各方面造成了許多新教徒。我們時

代底宗教改革者蜂湧於這川流中；他們助進那不能再加拒絕的趨勢。他們所服務的，我們不能便視爲輕小而可妒忌的一種贊許。他們所遇到的反對仍是很大；並且我們常要記得雖然自由貿易底原理建立起來差不多已有一世紀了，其連續的論據，堅固有如數學真理所根據的一樣，但到了後來，還是很有力地給人家反對，這一點便是政治知識退化及政治立法者之無能；經過最大的困難，國會纔被引誘地允許人民所決定的要求，而這種要求底需要早已祇有能力的人在三個世紀以來證明了。

我所以選擇這個例，因爲和它相關的事實既不容爭辯，而且在我們底記憶裏也是很新鮮的。因爲這個事件在當時並沒有隱蔽，而且後代應該知道這種偉大的議案，除了「改革議案」以外，算是英國國會所通過的最重要的一件案件，也是同「改革議案」一樣地受着外力底壓迫而由立法機關底強逼而通過；這件議案並非由心悅誠服的答允，卻因逼於恐懼而在不得不然之中認許了；這種議案是由那些畢其一生之力以反對而現在所忽然提倡的政治家所施行。這便是這些事件底經過了；並且這也是所有的改進底歷史，所有那些改進底歷史其重要很可認爲現代立法史底重要的時期。

除此以外，還有其他情形值得那些著作家底注意，他們將歐洲文化之大部歸源於歐洲政府所創始的那些政策。這種情形就是，凡是每一個大而已生效力的改革，都每是毀棄舊的成規而非創始新的施設。立法裏頭所有新的有價值的改良，都是毀壞以前的立法而來的議案；所通過的最良的法律，皆是以以前法律底復現。在剛纔所提過的「穀物法」例裏，事實即是將舊的法律重新施行而任貿易自由地發展。當大的改革成功時，其唯一的結果

是把事件恢復原狀一似立法者未曾干預過一樣。同樣的看法亦可應用於其他歐洲立法底主要改進上，即宗教壓迫底減少。這無疑地是一種大的愉快；雖然不幸，即在最文明的國家現在尙未臻完美之境。但顯然的這種讓步不過是這樣：立法者重頭走他們原來的途徑，而解除了他們自己底工作。如果我們考究最人道最開明的政府底政策，那麼，便會發覺這便是他們所尋求的途徑了。現在立法底目的及其趨向即係恢復事件自然的軌道，在這自然的軌道中，他們會給舊日的立法的愚昧所驅逐出來。這便是現代最大工作之一；如果立法者善於處理，他們當然便值得人類底感激。但雖然我們可以因此感激各個立法人員，不過對於立法者那一階級我們卻無所事其感激。因爲，在立法當中，最有價值的改進既然都是毀壞以前立法的工作的，那麼，這顯然不是他們底功勞了。文化底進步也很清楚地不能歸功於那些在重要的事情上曾經貽禍不淺的人，他們底繼承者被人視爲施惠者，不過因爲他們反變了政策而將事物恢復其原狀，假如政治家任憑他們走社會所需要的路程，他們也便會仍舊生活在那種原來的狀態中。確然的，統治階級所干涉之限度及其干涉所產生的禍害是那般明顯，使得有思想的人很驚奇地以爲在這反覆的障礙中，文化如何能進步呢！在幾個歐洲國家裏面，這些障礙在事實上證明是不易免除的，而國家底進步也到這裏便停止了。即使在英國，因爲由於幾種原因——這些原因我現在將要說——其較高等的人有幾世紀雖較其他地方底同等等級的人權力爲小的也都會令社會受到相當的弊害。這些弊害雖然較其他國家所遭遇者爲較輕，但其嚴重性，已足使在人類思想史中造成悲慘的一章了。將這些弊害總集起來，便可以寫成一部英國立法史；因爲可以廣闊地說：除了關於秩序之維持，罪惡之責罰底某幾種必須的議決案以外，幾乎

每一樣所作的事都是錯的，那麼，只要將這些不容爭辯的明顯的事實看來，我們可以確定所有最重要的事業每因立法者之援助而逆生效果。在現代文化底附屬事業中，沒有比貿易底時機更重要的了，貿易底分布恐怕對於增加人類底安適及快樂比任何其他的動力底影響爲大。但每一個關於貿易方面立法最多的歐洲政府，其所施行的主要目的似乎即在壓制貿易而摧殘商人。不令國家底工業走它自己底途徑，而將無限的規例縛束工業，所有的規例，其原意都是不錯，而結果乃發生極嚴重的遺害。這些既然做得那般過分，於是在最近二十年來，英國因以著名的商業改革完全都是在解脫這種有害而闒莽的立法。從前對於商業方面所議決的法律至今尙有效力者，是很可以給我們驚奇地加以深思。並不需誇大地說：歐洲底商業立法史表現出每一個可能的謀畫以摧殘商業的確的，一個研究這問題的權威者最近說：假如私運之風消歇了，那麼，貿易或致不能立足，因爲自來已受着不斷的干涉了。這種說法，無論其是否怎樣似是而非，但凡知道貿易曾經怎樣地式微，及反對貿易之阻礙是如何地強有力的，那就必不會反對這種理論了。在每一刻鐘，每一時間，政府底暴腕總可看得到。進口有稅則，出口也有稅則；對那衰落的貿易加以津貼，對於獲利的貿易又重稅以摧殘之；禁止這種工業，而又鼓勵那種工業；有種商業品禁其興旺，因爲在殖民地裏頭已蔚盛了，還有其他的物品可以任其興旺，可以買收，但禁止其再賣出，及其他第三種物品，可以買收，但不准其出口。於是我們又發現調整工資的法律；調整價格的法律；調整利益的法律；調整利息的法律；一種最令人惱恨的海關底設施附着一種複雜的所謂按情形而變動的計算表——用那悖理的智巧的方法，其稅則在同樣物品上常有改變，令到沒有人能在事前預估其所納的稅率。在這種不確定的稅則外——其

本身即是所有商業的大禍根——還加着了實施的嚴厲性，這是出產者及銷費者都覺得到的。這種雜稅既是那般地繁重，以至加倍及常至四倍其出產品底原價。有種制度建立起來，並嚴厲地施行，干涉市場，干涉工廠，干涉其所用的機器，而竟致於干涉到店戶。城鎮中也都有抽國產稅的人員在那裏嚴伺着，又海口裏蜂湧着貨物裝卸監視員，他們底唯一的職務是要偵察國內工業之每一次的起落，每一個包裹都要經檢查，每一件物品都要抽稅；這種可笑的事可以任他們做到什麼田地，而這事之所以雷厲風行完全是保護政策爲之作祟；他們似乎說：金錢之公認地聚積起來及人民受不方便的痛苦並不是爲政府底用度而實爲人民底利益；換句話說：工業階段之被剝削或可令工業興旺起來。

這些便是歐洲商業所受到歐洲底立法者底慈母愛般的恩澤的利益。但是弊害還隱沒在後面。因爲這已經很可怕的經濟底弊害還不似這種制度在道德方面所產生的弊害爲烈。第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在歐洲底每一部發生無數及強有力的武裝私運團體，這些人靠着觸犯他們底愚昧的統治者所設置的法律以爲生。這些警不畏死而習於犯法的人沾污了周圍的居民；在和平的鄉村裏引入了以前他們所想不到惡行；使舉國慮舍爲墟；凡他們所到之處，他們便把酗酒、偷竊、淫佚傳播下來；令到他們底同伴者都沾染了粗鄙的敗德事，這些敗德事是流浪者及目無法紀者底生活上（註二五）自然的習慣。因此而生的無量數的罪惡應直接歸咎於惹起此種事件的歐洲政府。這些犯罪事件是由法律而來的；現在這些法律已經廢止了，於是罪過也匿跡了。但我們仍不能說：文化底事業是因這種政策而得到前進。我們也不能說：這種制度給與我們甚麼利益，這種制度引起了新的犯罪

階級以後，到底還是向後轉了；並且雖然罪惡給它停止，不過也是毀壞他們以前所開始的步伐。

不必說的：這些話並不影響到每一個組織完好的政府對於宗教所施的真服務。在所有的國家裏頭，責罰罪犯權及組織法律權必須有所付托的；否則這國家便成多頭的行政狀態了。但歷史家對於每一政府不得不予以指摘者，因為那政府超過了它原有的權責，而每一部都釀成無量數的遺害。發揮權力的愛好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沒有一個階級，既獲得權力之後，而能避免濫用的。要維持秩序，扶助弱小，對於公共健康採取某種設施皆是每一政府對於文化事業所能做的唯一事業。這些服務，有異常重大的價值，沒有人能加以否認的；但不能說文化及人類的進步乃因此而促進。所有這些服務也不過予進步以機會罷了；進歩底本身必須別有所賴。這種立法上的健全的看法，更可以因以下的事實而益明顯：即是知識傳佈更廣，而經驗之增加使每一代的人更能瞭解生活底複雜關係；還有同等多的人堅持着要廢去這種保護法律，這些法律之制定曾被政治家視為政治眼光的極大的勝利者。

所以當看到歐洲政府底力量對於文化方面的贊助即在其最成功的時候也完全是屬於相反的；又當看到這些力量更甚於相反時，便是有害的——因此，所有凡以歐洲之進步歸功於其統治者之明察的念頭，實在顯然都是錯誤了。這種推論非但基於上述的論據，而且是根據每一頁歷史裏頭所倍積的事實。因為既然沒有一個政府能够知道其本身權力底限度，結果，則政府令到它底人民受到不少的損害；而這損害之起因卻本是始於良好的動機的。這種保護政策對於損害貿易的影響，剛纔已經說過了；除此以外，還有許多其他的例可舉。如此，在許多

世紀內，每一政府都以為鼓勵宗教底真理及阻遏宗教底錯誤爲其義不容辭的責任。這一點所產的禍弊真是無窮。祇須指出兩種主要的結果就夠了；即是，虛僞和濫誓的增加。虛僞的增加乃是由於迫人公認某種特殊意見，否則則予以種種懲罰的必然結果。個人底應付方法姑置不論，可是大多數人對於永常的引誘是很難拒絕的。當引誘來到而用一種尊榮及報償的方式以表達其引誘的時候，他們常時預備去公認這種占優勢的意見而廢棄——當然不是廢棄他們底信仰——人所共見的信仰底外表，凡採這種步驟的人，便是一個虛僞者了；凡一個鼓勵這種步驟的政府即是虛僞的煽惑者及虛僞人的製造者。所以我們可以說：當一個政府以某種利害爲餌以引誘人民信賴其政策時，它有如一個惡魔，拿世界上美麗的東西卑辭厚禮地去引誘人們變換他們底崇拜及否認他們底信仰。同時妄誓之增加也附着虛僞的增加而來。因爲立法者明白看到從這樣而來的新教徒是不可靠的，於是用非常的預防方法以對付這種危機；並且強逼人民一再發誓以堅定其信仰，因此以保護舊教條而反對新的信徒。這種對於他人動機之懷疑，在各方面發生了各種的誓願。在英國就算是學校裏的學生也須被逼着對許多事發誓——這些事情他也不大明白的，就算思想比較地成熟得多的人也沒法決定。假如他將來做了議員也必會因宗教而發誓；在每一個政治階段裏，他也必要從新發誓一次，其誓辭之嚴正和其職務之微細適成相反。每一件事都要做一個對於神底嚴正的誓文，於是——我們可以想到的——誓願在最初本視爲當然的事，到了後來便僅退化而爲一種儀式了。既容易於發誓，也容易於破約。最有眼光的英國社會觀察者——還有許多不同性質的及持反對意見的觀察者——大家都同意於以下一點：即在英國習慣上實施的及政府直接製造的濫

誓是這般地普遍以至成爲國家腐化的淵源，減少人類證辭底價值，而搖動了人類對他們同類自然（註二）的信義。這種公開的惡行及這種更屬危險的隱藏的腐敗被基督教統治者底愚昧的干涉所栽植於社會中者，實在是一個沈痛的題材；但在分析文化底因素時，我對這點實不能忽略過去。將這種研究再事伸引，而表明立法者怎樣在其嘗試要保護某幾種特殊事業並堅持某幾種特殊原則時，非但失敗，並發生了和他們原意適見相反的結果是很容易的事。我們已經看到，他們底法律本來要袒護工業的，而反損害了工業；他們底法律原要袒護宗教的，也反而增加了虛偽；他們底法律原要保持誠信的，也反而鼓勵了濫誓。同樣地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打算防止重利，而使利息減低；結果，卻變了加增重利而提高利息。因爲既然沒有一種禁制——無論如何嚴厲執行——不能毀壞了求與供底當然關係，於是當有些要借款而其他人要借出時，兩方都願找一個方法以躲開了干涉他們彼此權利的法律。假如兩方都能自由處置他們自己底交易，那麼，重利便要視貸金底情形而定；譬如抵押品底數目，及償還的日期。但其自由的措施已給政府底干涉所複雜化了。既然有些人不服從法律，常時要受到危險之威脅，於是重利者非常合理地反對貸出，除非他能得到因其受法律限制底補償。這種補償只能取之於借款者，於是他在事實上必須付雙重的利息：一種爲貸金之受到危險而付的，他種則爲補償法律之危險而付的。這便是歐洲底立法機關所常自置俎上的情形，議決要取締重利，乃反而增加其猖獗；它頒布那些法律，而那法律每因人民之被遏的需要而不得不干犯；同時，以整個情形看來，這種干犯的責罰倒反落在取款人底身上——即落在政府所擬議的階級上了。

以同樣干預的精神，以同樣的錯誤的保護觀念偉大的基督教政府曾經做出其他更生損害的事情出來。他們用了強勁及不斷的力量以摧殘出版的自由，而阻止人民對於政治及宗教之最重要的問題表白他們底意見。在幾乎每一國家裏頭，它們得到教會底幫助曾經組織一個大的文字檢查制度；它底主要目的是要廢除每一個公民發表意見底絕對的權利。在少數的國家裏，他們曾經停止了這些極端的步驟，它們沒有那般暴虐，但同等都是不合理的。即使他們不是公開地禁止知識自由傳佈，也已盡力阻止知識底傳佈了。他們在所有的知識工具上，在所有傳播知識方法上，譬如報紙、書籍及政治的雜誌等等，他們課稅之重，即使他們是慈民政策底提倡者也不會做到這般地步。的確的，看到他們在事實上的成功，我們可以着重地說：他們抽稅簡直抽到人類思想的稅了。他們使人類思想也付納雜稅。凡願意把他底意見傳達於他人，而盡其力量以增加我們知識底存儲，必先要傾盡他底金錢於皇室底財庫。這便是因教訓他底同類而獲得的一種責罰。這便是政府對於文學的勒索；接受了這種勒索以後便賜給他恩赦了，並答應不再加苛求了。而最難容忍的便是這些和同樣地勒索之及於每一種的努力——無論在身體或精神方面的。這真是可怕了，知識被阻礙，而一切忠實的工作，沈耐的思想，以及高深的天才底過程皆蒙障害，以至他們低微的收入之大部分都沒入官家，而去增加了顛頂而愚昧的皇庭底豪侈，助長少數有權力的人底任性以及時常不絕供給他們以壓迫人民一切思想的方法。

這些及以前關於政治立法對於歐洲社會所發生的影響的敘述，並非可疑及假設的推論，而為每一讀史的人都可以自行證明的。確實的，有幾種在英國仍屬有效；而在其他國家裏頭還可以見其全部充分地施行着。假如把

它們放在一起，便會做成一個可怕的聚積，使我們驚異在這些聚積前面，文化那裏會有它進步底分兒呢！在這種情形之下，而文化竟然進步了，這是人類底非常能力底存在之確實證明；並且證實一種信心：即是當立法減少，人類底思想少了一種障害時，那麼，進步將會加增速率地繼續邁進了。如果立法對於進步是有功勞，或者希望除開解除前人障礙底那種利益以外，從以後的立法者獲得利益的話，便是可笑的事，也是所有健全理解上的笑柄了。這點便是現代所要求於立法者的了；而且我們必須記得，前一代所乞求的恩典即是下一代所要求的權利。當權利固執地被拒絕的時候，那麼，以下任一件事件便會發生了：不是這國家日趨衰落，便是人民起來反抗了。如果政府堅持着，而人民即在兩難之中。他們要服從的話，便會損害他們底國家；如果他們反叛，那國家底損失更大了。在東方古帝國裏，他們平常的方法是屈服；在歐洲底帝國裏卻是反抗。因此，在現代史中，作亂及反抗的記載占據了極多的篇幅，而且那些不過是舊事底重現——壓迫者及被壓迫者往復的關爭。但如果我們要否認，有一個國家其致命的危機幾世紀以來很成功地已經避免了的話，是不公平的。在歐洲的一個國家——也只是一個——其人民那般強有力，而政府底力量那般薄弱，其立法史整個講起來除了一些反常的事以外，即是一部漸緩而永常的讓步史；其中的改革——或許會不願爭議而拒絕的——已因恐懼而屈服了；同時，因為民主意見底不斷的增加，使得在我們底時候，保護政策及私有特權，一一都被廢除了；直等到舊的組織雖然還負着空名，卻已失了原來的力量，我們再也不用疑惑它們最後的命運是如何了。也用不到我們再說：在這個國家裏面，其立法者較任何國為多，不過皆是民意底代表及公僕，基此之故，其進步比任何地方為純正；既無擾亂，亦無革命；世界皆因此而明

白偉大的真理，即是民族興旺的一個主要條件便是他們底統治者占有很小的權力，而施行得很寬大，一方也不必把他們自己提高而為國家事業底最高判斷者，或斷定他們自己已有權力以打消那些以國家付托他們的人底願望。

(註一)科爾利治很愉快地說：「我們最可慶幸的事是由於我們國家底島嶼底性質及環境能令到我們底社會一切組織之建立本若我們底特殊需要和興趣而形成的。」(見科爾利治著教會與國家之機構 Coleridge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第八册第二〇二一頁一八三〇年版)

(註二)在本書他都可以把十六世紀底人對於旅行興趣之激增的事實彙集起來，但到了那世紀之後半葉，我們纔有延聘導遊者以導的風習，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註三)在這個時代英國底天才作家中僅有德萊登 (Dryden) 是受了法國思想底影響，但這在他底戲劇中色彩最為明顯，而這些作品底全部現在都給人們當然地忘卻了。他底偉大的著作，尤其是他底朱未那爾 (Trojan) 以外超出於一切競爭者之上的奇異的詩是絕對的含有國家色彩，且以我個人底評議，其在英國文學標準方面，成就僅亞於莎士比亞而已，在德萊登底作品裏頭，表面上無疑地含有不少的法國色彩，不過沒有什麼法國底思想，而我們估量外來影響底真實的積量卻須重乎思想方面了。司各脫爵士 (Sir Walter Scott) 曾那樣過分地說：「曾否有一個法國字融會於德萊登底作品中實還是一個疑問。」(見司各脫著德萊登底生平第八册第五二三頁一八〇八年版) 這話實不愧為一個勇敢的確定。

(註四)能夠保持英國文學底獨立性和增加它底價值的第二種環境是沒有其他強國有我們底文士那般少和政府發生關係及得到它底願望的。至於戴維本來是正確的政策和那所謂保護文學適足以摧殘之等等的論據都在本書第十一章路易十四底制度一章中說。同時，我要把一個有學問的——不如說有思想的——作家幾句說話引在下面：「凡懂得英國典章制度的人必不可遺漏了那由英國思想界底向上的力量所促進的那一種持久的工作底性質底觀點。文學一向是隨它自己去發展的，奧蘭治 (William of Orange) 不懂得它，安妮 (Anne) 不去理會它，喬治一世不懂得英文，二世懂得也不多。」(見班克洛夫 [Bancroft] 著英國國家史)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第二册第四八頁)

(註五) 一般人對於德國所建立的國家教育制度底意見可以在開伊 (Hay) 底歐洲人民底社會情形及教育 (Social Condition and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of Europe) 一書第二册第一一三四頁看得到。開伊和大多數的文人一樣，過於着重文字技能底利益，而忽略了普本和學校力量所不及的那般無權享受公民和政治權利之人民底教育功能。將來觀到和法國有關的保護精神史時，我再討論這題目。(見本冊第九、第十章) 現在我必須反對開伊所逃的強迫教育底結果——這是一個可觀而聰慧的作家所描寫的一個令人遺憾的圖畫，但對於他底不正確，我有限可靠的證據。我所述的只有兩點：

第一、一個彰明較著的事實就是，德國人雖然受了這種教育，卻不適合於參加政事，並且對於政府之實際及行政方面不發生情緒。第二、對於研究這題目也顯出一個事實，即是，普的迷信程度在普士——德國教育程度最高的一部分——較英國為尤甚。在普士，人對於迷信之固執性也較英國為大。

(註六) 關於這一點，蘭格 (Lang) ——一個最富力量的游歷家而曾發表對於歐洲社會之考察的著作者——說得很好：「德國之哲學或文藝方面的著作家，其所欲表達之公眾對象遠較我們底公眾讀者為尤富於智慧及受教育……在我們底文學裏，最無名和最不週達的形上學或哲學的作家視一般人底思想程度尤見低劣，只須粗陋文字和有普通的理解力即可……結果，德國文學底社會影響力只限於一狹小的團體內。它對於低級的人底思想毫無影響，即使對於有職業的中等階級也如此，因為他們沒有機會或餘閒去深究他們偉大的作家底才能底最高點。公眾的讀者必須要去許多時間以獲得知識，感覺性和悟力幾能追隨得上一般作家底思想。社會經濟家也會發現在德國有一般水平線之下的異常愚拙、思想遲鈍和無知識的大衆，而在他們之上的人卻發現着迅速的進步，學問與天才。」(見蘭格旅行者底插錄第一集第二六六—二六七頁) 他又在第三集第八册第一二頁裏說：「這兩種階級用不同的句語來表示兩底思想。受教育的德國人應語言——即德國文官——不是一般人應語言，也不是中等階級及其以上的知商人、店主或農人應語言。」

(註七) 這種例外的原因，我將在本冊第二册中加以研討；但在這裏可以很有趣地指出，當一七七五年那樣早的時候，柏克 (Burke) 已說：歐美各國人從事於法律研究者之多。他說：「恐怕世界上沒有一國，法律曾這樣普遍地給人研究，法律者底本身也這樣衆多而滋榮，在

許多書份內，法律研究佔首要的地位。派到國會去的代表大多數是律師。但許多讀律的人——大多數都讀的——只求得些皮毛。一個有名的書商曾告訴我，在他所有的生意中，沒有法律書籍之能得到恆久的熱烈歡迎及運售到美洲南部、四印度羣島之多的了。殖民地人民也竟能自行付印。我聽說他們在美國售出之布拉克斯同之詮釋 (Blackstone's Commentaries) 其冊數幾與英四相 埒。在這種情形之下，後來的賓德 (Bentham) 和斯托利德 著作，當然是自然的結果。

(註八) 尤其是科爾利治 和密爾。但除了對於密爾 在論理方面的精深著作表示極度尊敬外，我敢說他過於培爾納 的精神歸因於培爾 影響，而太不注意於盧生培 哲學的其他種種情形——此種情形乃助成培爾 哲學者。

(註九) 馬金托什 爵士對於哈徹松 曾說：「關於他，我可以說他偏喜於人類天性中增加許多最後的和原始的原則。在蘇格蘭 第二次對於形上學之思考消遊其熱烈性以前，這種偏好是蘇格蘭學派特有的現象。」

(註一〇) 他底辯言論 在一八二二年併入道德情感論 裏，共二冊。亞諾爾特 (Dr. Arnold) 很輕視這種研究方法。他說：「試將語言現象表明為 a priori 者，我以為不甚聰明。」(亞諾爾特雜著 第三八五頁) 這一點將引起了冗長的討論，誠非道短篇幅所能包含；但我覺得，這些 a priori 底推論之對於語言家卻如假設之對於歸納法底自然科學家；若果如此，則它們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沒有真的有結果的實驗可以做出來，除非先有明晰的假設。沒有這樣的一個假設，人將在黑暗中摸索數世紀，堆積着許多事實而得不到知識。

(註一一) 密爾 和雷依 (Ree) 對於政治經濟學家所必採用的方法曾作最深切的研究。(見密爾 底政治經濟學未決問題底論文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一八四四年出版第一二〇—一六四頁及雷依 底政治經濟新原理 (New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三二八—三五二頁一八三四年出版) 雷依 在他底名著裏反對阿丹·斯密 斯以為他越出了培爾 哲學所用的方法，因此使他底推論失去了價值。如果用歸納法 來研究他底問題，那結果必不如此。但米爾用極大的理解力來證明政治經濟 只有兼演繹 的方法纔能成爲一種科學。他在第一四三頁裏說政治經濟 完全是一種抽象的科學，它底方法就是 a priori 的方法。又在第一四六頁裏說 a posteriori 的方法是完全無效的。「關於這一點，我可以加上一點意見，政治經濟 之基石的現代的地租論 並非綜合經濟 的事實而成，乃是用幾何學家底方法由上而下理解而得的。當然，反對地租論 者常以為地租論 是與事實 相反，但因完全不明哲學的方法而堅持該理論到底是錯的。」

(註一)最近發現一可堪注意的例示表明休謨很巧妙地應用這種方法。可參閱柏吞底生活及其與休謨底通信(Burton's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with Hume)第二册第四八六頁；在那裏面，我們可以看見當休謨繼承國家底財富後，即觀察到新斯賓一地和租爲價格之一成分」的錯誤；故現在在意義上說來似乎休謨是第一個有這種大發見的；雖然李嘉圖證明這點是很有功。

(註二)他所引用的歷史事實只能作爲例證罷了，凡讀過休謨底哲學著作內的宗教自然史，沒有不看到這一點的。我可以說，在這種名著內所持的見解與孔德實驗哲學內所說的宗教階段頗有相似之點；因爲休謨所說的多神教底早期形式即是孔德所說的拜物教。他們都相信一神教乃是後來興起的一個較後而複雜的抽象。他說這是人類思想所採取的途徑，且是很可能而又曾被格羅特底精密的研究所確定。阿格羅特著希臘史第一册第四六二—四九七頁，第五册第二二頁。可是大多數早期名作家卻持反對及較普遍的意見，即是一神教本產生於偶像崇拜之前，現代人大都維護此說，休扶爾博士亦很肯定地表示同樣的主張。見布拉治論文(Boyle's Paper Treatise)。

(註三)這就是說，他說歷史事實不過是表明某種普通而不用事實證明的原則，所以像什羅瑟(M. G. Ross)說得好：「歷史之在休謨眼底僅是一種附屬的事業，不過是用以介紹其哲學底一種方法而已。」當時還沒有發現所謂社會及政治底變遷底原理，無怪休謨對於這種方法之應用尙屬幼稚了；但不能說這種方法是不忠實的，因爲他底歷史目的不是在證明結論，而側重於表明；故他自以爲選擇例證時並無失差。我現在不過是解明他底見解，誠非有意維護他；且我深以爲在這一方面，他是極端錯誤的。

(註四)這可以拿事實爲之表明，就是三月二十五日，現在羅馬通告節以敬禮聖母馬利亞者，在異教時代則稱爲海拉里亞(Hilaria)用以敬獻於母神的。

(註五)在每一基督教區內，大量異教之仍然存在可以作爲一論據以反對邊沁對於宗教及語言變遷之智巧底分野；他以爲，一個宗教底變化當較一種語言底變化來得愈驟一些。(見邊沁著埃及第一册第三五八—三五九頁)

(註六) 路德底教義在一五二九年始傳佈於瑞典；一五二七年宗教改革底原理始由路士脫勒斯(Lutherus)省底省議會正式採用。這件事使華利(Gustavus Vasa)能擷取教會底財產。

(註七)關於一八三八年底這些情形，可以參閱蘭杜著瑞典(一八三九年倫敦版)第八册內的幾個奇特的及可恥的記載，蘭杜雖然

本身是個新教徒，可是真實地說，在信奉新教的瑞典國內，「有天主教所似的法律，為路德派之國家教會所施行，其嚴厲不下於羅馬天主教會之於西班牙及葡萄牙。」（開爾格著瑞典第三二四頁）在十七世紀時，這種法律被瑞典教會所頒布且為政府所贊助而申明說：「如果有瑞典人民改易其宗教者，必被逐出王國以外，而失去其自身及其子孫底遺產授受權……如有介紹其他宗教教師於本國，須罰款或逐出境外。」（見柏昏日記第三册第三八七頁一八二八年出版）關於這點，還可以說：直至一七八一年羅馬天主教徒能宣傳其宗教於瑞典。

（註一九）我們可以在崇拜基督教至數世紀之久的亞比西尼亞人中看到好的例，因為從未對於他們底智慧方面下過啓發的工夫，故他們覺得基督教對於他們似嫌其太過於單純，所以倒把基督教腐化了，故迄今未見有絲毫的進步。布盧斯對於他們底敏達是人人皆曉的，又有一游歷者，在一八三九年游歷該國時有一絕妙的評語：「沒有比這不快樂的國家底形式上的基督教更為腐敗了。它和猶太教、回教、偶像崇拜都混合起來，成為不足以裨益心性的儀式和迷信。」（見地理學社雜誌第十册第四八八頁克拉克底海安科巴日記）（Krafft's Journal at Ankober, in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ociety）

（註二〇）我用文學這個字，並非和科學相對的，乃是在較廣汎的意義上，包括筆戰的每一事物——將文學這個名辭用在它最原始的意義上，即應用文字去記載事實或意見。」（見牟爾著希臘文學史）（Mure's History of the Literature of Greece）第四册第五〇頁）

（註二一）對於歷史意見方面研究很有名的哈密爾頓爵士說：「在比例上，若一個作者底思想超乎當時的時代性，那他底著作也會為人家所注意的。」（見哈密爾頓著哲學底討論）（Discussions on Philosophy）第一八六頁）又關於藝術方面，畢諾爾茲（Dr. Jochna Reynolda）也說：「現在和未來可以視為兩個對敵者，得勢於其一，必可料到將被棄於其他之一時代。」

（註二二）知識方面底獨佔權也是這樣，譬如尼安德很恰當地稱為「古代底貴族精神。」（見尼著教會史第一册第四〇及九七頁，又第二册第三一頁）凡對於民主主義一辭不慣於用的作者，往往忽略了這一點；他們忘記了在同一時代內政治上的民主主義也許很普遍，可是思想上的民主主義卻很少見。

（註二三）這種文學底統計，將證明是個很新奇的研究題目。我相信沒有人以為值得把它們統計起來；但基佐（M. Guizot）計算詩劇底

徒集傳 (Bollandist Collection) 中含有二萬五千個聖賢底生活。(見基佐著法國文化史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en France) 第二册第三二頁) 據說德蘭於柏屈克哲人 (Saint Patrick) 在佐靈林 (Joelme) 以前已有六十六個傳者了。(見李維達著愛爾蘭底古代 (Lodwich's Antiquities of Ireland) 第六二頁)

(註二四) 格索在法國文化史第二册第一七一—七二頁裏以為維希起來，第七世紀底情形較第八世紀為尤惡劣；但對於二者之間的問題去取是很難的。

(註二五) 下面的敘述是近如一八二四年之英法底社會情形，由艱難的工作而後得到的材料：「當道寧在英國海岸上遠行的時候，海岸底販私者更努力，更冒險，更大規模地用欺騙和造謠的計劃把英國底羊毛品偷漏許多關卡而私運於各鎮市。在這兩個國家裏面都隱伏着種種些事件相關的道德解體的現象。在這種舞筭的計畫中，欺騙和造謠是主要的成分，附帶着的是狂飲，輕視所有為這種舞筭而設的法律誠實的關繫因此委靡不振，而謀殺案卻又充滿着各處。」(見馬提奴著三十年和平中之英國史 (Mathew, History of England during Thirty Year's Peace) 第一册第三四一頁，共八册，一八四九年出版)

(註二六) 惠特利 (Whateley) 大主教說：「如果發誓的習俗廢除了——而保留假作證見的刑罰(是我們擔保方面的重要部分)——我相信大體上體辭當必較為可靠。」(見惠特利著修辭學要旨 (Elements of Rhetoric) 第八册第四七頁一八五〇年出版)

第六章 歷史文學底起源

——史底起源及中世紀歷史文學底性質——

我已將普通所公認的促進文化進步底昭著情勢加以研討以供讀者之參閱；我又曾證明，這種情勢本非文化之原因，窮其究竟，亦不過文化之結果而已；且宗教、文學及法律雖然無疑地可以改變人類底情狀，但它們受文化之影響卻更甚。確實的，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即在它們最燦爛的時候，也不過是一種副的作用罷了；因為無論它們外表的影響是如何有利，它們底本身究竟是前於它們底變化底產物，而它們所生的結果也將因它們所從事的社會底變異而改變其形態。

經不斷的分析後，我們現在研究的範圍已漸趨精約，直至我們能尋得理由，相信歐洲文化之發長全由於知識之進步，而知識之進步則全恃人類知識發現真理之數量及其分佈之廣汎而定。在支持這種意見方面，我僅能舉出建立其強有力的可能性之普通的論據；若欲確定此可能性，則必須以最廣大的意義來領會歷史。因此，我當竭其所知以詳述最重要的特殊事實來證明思考上的結論；但在前章我已簡單地把研究的方法說明了。除此以外，我又覺得我所例舉的原則還可就我未經提及而於現題很有密切關係的方法來試驗。這就是參合人類史底進步底研究，和歷史底本身的進步底研究。用這種方法，在社會動態方面可以得到極大的光明；因為在人類觀察

過去及預計現在之兩種途徑中必常有其聯繫之點；而這兩種觀點在事實上是同一思想習慣中的各種不同的方式，因此，在每一個時代中，彼此都表現着某種同情和類似點。且又可以發見這種我所謂歷史的歷史將建立兩個有相當價值的主要事實。第一事實即是在最近三世紀以來，歷史家——視為一種階級——曾對於人類知識表示一種永常增進的敬視及對於以前縛束人類思想的那些無數策劃表示厭惡。第二事實就是在同時期中，他們表示一種繼續滋榮的趨勢，即遺棄以前所視為非常重要的事件，而傾好於人民情狀及知識傳佈等問題。這兩種事實將在本章裏得到確定的證實；且必須承認，它們底存在與我所陳述的原則是相符合的。如果能夠確定，當社會改進時，歷史文學常趨向於某一已規定的方向，那麼，便會產生一種有力的或然性，顯然地接近那些見解的真理。確實的，就是這種或然性能使任何特殊科學底學者以必須認識其所研究的科學的歷史視為要著；因為常有一種動聽的臆說，以為當普遍的知識進步時，其任何一部分，如果有適宜的人去研究，也是進步的，即使其結果過於藐小，不致受人注意。因此，我們在繼續的時代裏必須去觀察歷史家怎樣變易其立腳點；我們可以發覺在長時期裏這種變易時常指着一個同一的方向，而且實在講起來，這變易不過是人類底智慧基於不斷的努力來擁護他們自己底權利，並且漸漸從久已阻礙其動作的固執的偏見裏頭所解放了出來的動態底一部分而已。

因為基於這種見解，我們現在似乎應該當我們考察歐洲各大國底不同文化底分歧點時，也應該把每一個國家怎樣寫出它底歷史底方法來說一下。用這種材料的時候，我完全根據於一種願望，這就是要例舉一種民族底實在情狀和其過去的意識底密切的關係；並且因為要留心着這種關聯，所以我便不視歷史底文學為獨立的

題材，而視為造成每一個民族底知識史底一部分。現在這本書即要觀察到法國大革命以前底文化底主要的特質；因此，我們同時要述及法國歷史家及其對於其自己底知識部門所介紹的顯明的改造。這些改造對於當時的社會底情狀底關係是非常的顯特的，並且我們應當對此更加以注意；而在第二冊中，其他主要國家底文化及其歷史文學亦當以同樣的態度來研究。但在我們探討這些不同的題材以前，我似乎覺到將歐洲底歷史起源作一個初步的研究是很有趣的，因為它能供給那些還不甚給人們明瞭的史實，並且亦可以使讀者明白歷史進步底歷程之極度困難，而且現在還在發展未臻完美的情態中。歐洲底遠古底材料早便已湮沒了；但我們現在所搜集到的關於野蠻民族底廣汎的材料倒可以供給我們為可用的資料，因為在他們之間，有許多情形是相同的；極端的愚昧的意識，實在無間於今古及地域，除非自然之在各地有互異之處，纔會改變了人們底意識。所以我現在並不疑惑地要應用經驗豐茂的旅行家所搜集的證據，並且要從這些證據裏推測我們找不到直接資料的當時歐洲思想。這種結論當然是屬於想像方面；但在最近一千年之內，可以不適應這種結論，因為每一個大國，在九世紀以來，它們都已有自己底編年史家，而法國人從第六世紀以降也已有不斷的記載了。在這章裏我要例舉在十六世紀以前最大的歐洲權威者在習慣上是怎樣寫他們底歷史。至於在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之間的全部改進將要按各個進步的國家以項類分述；歷史在改進以前，其貌小既不過像整個錯誤裏頭的細胞，那麼，我在第一步要考察歷史底普遍的腐化底原因，並且要指出歷史之所以失其原態的步驟，以至在幾世紀裏面，歐洲沒有一個人能夠用批評的態度以研究過去的事實，以至能夠把當時的事實正確地去記載。

在遠古民族進化歷程中及其未有文字以前，他們覺得需要一種在和平時候可以特爲消遣而戰時可以刺激勇氣的資料。歌謠的發明便是應付這種需要了，這種歌謠造成所有歷史知識基礎，而歌謠之各種抒表格調都是在世界上最粗鄙的種族裏面找出來。這些歌謠大部分被一種階級的人所歌誦，而這些人底專業就是要保存這整口碑的確的，對於過去的好奇心是那般自然，各個國度中很少沒有歌人的。今試舉一些例示，這些流行口碑的保存者非但在歐洲，即在中國本部，西藏及韃靼；以至印度、辛德、俾路支、西亞、黑海羣島、埃及及西部、北美及太平洋羣島亦所在多有。

在這些國家裏頭，很遲纔有文字；當時因爲除了口碑以外，沒法去保存他們底歷史，於是便選擇一個最好的方式以幫助他們底記憶；我因此相信可以發現到最初步的知識常常包含韻文和詩。（註一）韻文、詩在野蠻人是覺得最悅耳不過，所以他們能够傳於其子若孫，而一些也沒有錯漏。（註二）錯漏底保障更能加增歌謠底價值；這些歌謠，其效用不僅限於娛樂，且一躍而尊爲不成文法律的權威了。（註三）歌謠裏頭所含的暗示即是解決部落間爭端及劃定領域的最滿意的證據。所以我可以發見歌謠底傳授者及剽作者給人家認爲所有爭端底公斷人，因爲他們也常司領主祭的職務而又給人們視爲可以從他們而獲得靈感，所以我們當中常有一「詩底來源是神靈的」的觀念，說不定也是導源於此。（註四）這些歌謠當然因各民族底風俗性情及當地底氣候而具其風格。在南方，它們表現着熱情、淫佚的格調；在北方，則顯着悲酷和戰鬪底性質。但無論其分歧點怎樣，所有的產品皆有一點是相同的。它們非但建築在真確上，即使在詩底潤飾上也能保持其真確於不墜。人們既常反覆背誦他們所

聽到的歌，而又視權威的歌人爲解決最後紛爭底裁判者，故他們對於事實的正確活躍興趣使他們不易有錯誤。

這是歷史所必須經過的各階段裏頭之最早及最簡單者。但在時間底過程中，除非受了不良的環境底干涉，社會總是進步的，而在社會改進中，卻有一點最關重要：這就是說，文字底發明這僅在數百年的短期中必已把民族傳說底本質完全改變了。照我所知，這種改變的發生從未給人說過，所以我試要循索其詳細改變之迹也是很有趣之舉。

第一點——或可以說是最明顯的考慮，是文字底發明可使民族底知識含有永久性，而因此減少了口碑——這便是無文字民族底全部知識——底效用。因此，一個國家進步了，口碑底影響即減失其效力，而口碑底本身也成爲不可靠的了。而且在這種情形下，口碑底保存者也失了他們底聲價。在一個完全無文字的民族中，歌人是史實底主要儲藏所，而他們底酋長底名譽及財產皆靠着這種史實。但當這民族有了文字以後，他們實不願將名譽財產付託於巡遊的歌人底記憶了。於是用新獲得的技術把這種史實保存於固定的及物質的方式裏。這種情形既發生作用以後，民族口碑傳述者之重要性便合理地減少。他們漸沈淪而爲一種劣等的階級，因爲既失了以前的聲價，便不會再產生那獲得以前那般聲譽的超越的人才。所以我們明白雖然沒有文字決不致產生重要的知識，但文字之發明也對於歷史上的口碑確有兩種明顯的加害：第一、減弱了口碑底價值，第二、減失了那以保存史實爲專業的階級的人數。

抑有甚者，文字非但減少了口碑底真實量，抑且直接助成說謊的傳播。這就是受了所謂聚積原則（Principle of Accumulation）——所有信仰系統皆基於此原則——底影響。比如在古代許多殘酷的大盜也有幾個叫做「赫耶利斯」（Heracles）一名，這些大盜如果他們所犯的罪惡是順利而巨大的，那麼，他們死後必被入崇拜為英雄。（註五）這種名稱其起源何自，至今還未有確定；但恐怕起初是給一個人的，其後與其成功相同的也享受同一的名稱了。這種同一的名字的廣泛的採用在野蠻民族（註六）裏頭是十分自然的事，假使一個國家底口碑傳統在本土及不與其他發生關係時，便不會發生什麼混亂。但當口碑用文字來固定了以後，於是口碑之榮或者給同樣的名字濫混以後，便搜集所有分布的事實而將那些聚積的功績集合在一個人底身上，以致把歷史底地位降為怪異的神話了。（註七）同樣的在歐洲底北部，用了文字以後，薩克索（Saxo Germanicus）便寫著名的拉格那（Ragnar Lodbrok）底私生活了。這個北歐底偉大的武士曾威震英倫，不料以後在偶然間或文字中給人家認為是一百年前日德蘭（Jutland）底王子了。這種偶合，如果任一個地方皆能保存其明白而獨立的拉格那敘述，那混亂便不會發生。但有了文字的資料以後，人遂能够集合各種不同的事實底連串，因此，將兩個其實混合而成了一個錯誤。以上的事實便是這樣發生的。這位輕信的薩克索把兩個拉格那底不同的事實混合在一起，而歸屬於他心意中的英雄。因此，將歐洲底古代史最有趣的一部分隱蔽了。

北歐底編年史也供給一個關於這種錯誤底顯著的例。芬（Finn）族裏頭有一種種族叫做關斯（Quens）據佔據了波的尼亞（Bohemia）灣東海岸許多地方。其國家名為關蘭（Quensland）；但這名稱便發生了一種傳

說，以爲波羅的海底北部有一個阿美松（Amazons）底國家。這一點很容易根據本土底知識而加以糾正的，但因爲文字底應用使得這種流言即刻固定了；而這種民族之存在，在有些歐洲古代史裏面已經絕對的給它們確定。又如芬蘭底古都阿波（Abo），後來被稱爲土枯（Tukku），它在瑞典文底訓釋，是有「市場」的含義。阿丹（Adan of Brenar）因爲種巧要研究波羅的海（註八）沿岸底國家，於是便給土枯底名稱所誤引，以爲芬蘭（註九）曾有過土耳其人底足跡。

此外尚有許多其他的例表明就是名稱也足以濛混了古代史家，並發生了完全錯誤的關聯，而這錯誤或者可以在當地證實的；但因爲文字底作用，把這些名字傳佈到很遠的國家去了，因此，便沒法證明其矛盾之點。在同樣的情形裏，我還可以在英國史上再舉一例。理查一世——是我們王子中之最野蠻者——當時人私號之爲「獅子」；此私號之所由生，乃因其人之大無畏及其性情暴虐之故（註一〇）；因此，遂有人說，他有獅子底心腸；勇士底稱呼非但和他底名字結了不解緣，而且竟然產生一無數作者爭相傳說的故事，以爲他曾在單獨的比武中手刃一獅。名與故事互爲因果與參證，複糅合了其他的假託，遂使中世紀底歷史充斥了虛偽的事實。

歐洲歷史底腐敗現象除非文字之引用所形成之一原因外，尚有其他一因素相助爲虐。文字之應用大都攙和着基督教底知識；這種新的宗教不但毀滅了許多純真的口碑，而且混入許多寺院底稗史，使其餘僅存的口碑都失卻本來的面目。這種情形的普遍性很可以拿來當一新奇的題材來研究；但舉一二個例，恐怕已足使讀者感到滿意了。

在北方諸大國之古代史中，我們很少有絕對確實的證據；但有北歐詩人底幾首敘述他們祖宗或同時代人底功績底詩歌尚保存着；且不管這些詩歌以後如何給人加入攪雜的分子，精確的批評家卻認為確含真實和歷史的事實的。而在第九和第十世紀中，基督教底傳教士輾轉而越過波羅的海，將他們底宗教知識介紹給北歐底（註一）居民；不多時，史底資源，就因此而受了毒害。在十一世紀末葉時，有一個基督教牧師叫做珊墨（Saemund the Younger）的，將北歐流行而未入史冊的史事編成一書名為長愛特（Elder Edda）；他又很自滿地將一契合的基督教（註二）聖詩加入他底編纂裏。一百年以後，又有第二次集成的北歐史；因時間長久的關係，其影響更為明顯。在第二集內——即幼愛特——含有不露痕迹的希臘、猶太及基督教各種寓言底混合體；我們是第一次在北歐底年史中遇着脫勞埃（註三）傳下的廣汎混合的杜撰的事實。

如果我們轉視世界其他部分以求例示，則我們將發現許多組例的事實以證實上面的見解。我們將發覺宗教未曾變易過的國家，其歷史較宗教會有改易的國家為真實可靠而有聯繫。在印度，今仍被人崇信的婆羅門教，其建立時期甚為悠久，因此，該教底起源早已湮沒不可考了。（註四）結果使印度編年史從未受過新迷信的腐化作用；而印度人所保有的歷史口碑遠較任何亞洲民族來得古遠。同樣的，中國人會保持其神怪的宗教垂二千年之久。故在中國，雖然文化不能與印度儕於同列，但其歷史卻可溯源以至於公元前數世紀而絕無間斷。又如波斯人，其知識之進展固遠邁於中國人，但關於他們古代王朝底早期政事（註五）未有確實的記載。我以為唯一的理由，就是波斯受到可蘭經之傳佈後，立即給回教徒所征服，這些回教徒完全抑止了原有的拜火教，因以中斷了波

斯口碑底川流。註一六故除了珊大伐斯他 (Zendavesta) 底神怪談外，我們找不到有任何價值的波斯史底道地的權威，直至十一世紀，纔出現夏·納姆 (Shah Namah) 一書；在這本書中，佛獨西 (Ferdousi) 將波斯相繼信仰的這兩種宗教很神異地聯合在一起。註一七如果以後沒有那些已被發現的碑碣、銘刻和銅幣來作參考，那麼，恐怕我們勢必至於信託希臘著作家對於亞洲這個重要的王國。註一八底簡陋而不正確的史料了。

即使在更野蠻的民族中，我們也能發見和以上同樣原則的作用。據人種學者所知道，馬來亞、坡里內西亞 種族 (Malayo-Polynesian Race) 充滿了大小無數的羣島，由馬達加斯加島 (Madagascar) 直伸展至澳洲 以內的美洲西海岸。註一九這些距離很散漫的人民，其原始的宗教是多神教，其最純粹的一種形式好久還保存在菲律賓羣島 中。註二〇但在十五世紀時，許多玻里內西亞 民族都改信回教了。註二一於是在這些民族中也發生了以上我所說的其他國家同樣的作用。這新侵入的回教改變了當地普遍的民族思想而因此腐化了當地歷史底純粹性。在印度羣島 (Indian Archipelago) 中，以爪哇 底文化程度為最高。註二二但現代爪哇 人不但已經遺忘了他們歷史上的口碑，而且在他們綿延的帝王系統表內插入了許多回教聖徒底名字。註二三可是在另一方面，在相近仍保存着原始宗教的巴厘島 (Bali Island) 中，我們發現爪哇 底傳說還給島人記憶着和懷念着。註二四

關於在半開化的民族中，新宗教之建立將如何影響於該地早期史之正確性，實在不用多舉例證。我只須說明，由以上的情形，基督教底牧師怎樣把信奉該教的各個歐洲民族底年史隱蔽了，而且進而破壞毀滅了高盧人、

歐爾士人、愛爾蘭人（註三五）盎格羅·撒克遜人以及北歐民族、芬族或竟至冰島人底口碑。

除以上的情形外，尚有其他方面亦趨於同一的方向。由於某種原故——此後我將要解明的——歐洲底文學，在羅馬帝國最後一次解體後，即完全爲久被尊爲人類之主要導師的教士所支配。差不多在數世紀中，很不易遇到一個能書寫的普通人，當然更不易遇到一個能擬作的人了。文學既被一個單獨的階級所把持，故表現着一種只適宜於它底新主人（註三六）的特殊點。至於教士，以一團體而言，常以文學是他們傳佈信仰的工具，而並非用以鼓勵研究精神者，故在他們底著作中，有表現着他們職業上慣有之精神者實不足怪。故我曾說：文學在許多時代中並無淨惠於社會，且更增加人之妄信而摧殘之，因此反截止了知識底進步的。確的，那時人對於虛僞是這樣地合乎口味，幾乎什麼都覺得可信的了。沒有一樣事物會逃過了他們底貪望和輕信的耳朵。預言史、奇異的事物、鬼魅、奇怪的惡兆、天上可怖的顯示及最漫長而最不連貫的各種荒誕不經的事物都仔細地被反覆傳遍或彼此抄襲，成爲人類知識底至寶。歐洲能從這種情形中自救出來，實可說是人類底非常能力底一個鐵證，因爲沒有一個社會在進步上會比它遇到更多的阻礙。但是很明顯的，在這種情形解放以前，普遍的思想上的妄信和鬆懈，實使人不適合於研究的習慣及不能從事於過去事件的精切研究，或竟不能對於週圍的事實作一正確的記載。

故如果憑藉以上的述說，我們可以說，除了幾個附屬的原因外，有三大因素破壞了歐洲中古史。第一因素是文字之驟然引用及其後之各地口碑之混合，這種口碑分開來都是真實的，合起來就是假的了。第二因素是宗教底改變；這方面起有兩種作用，非但絕止了原有的口碑，且令其互相混合。第三因素——可說是最有力的一個因

素——就是歷史之被某一階級的人所把持，他們底職業令他們容易妄信，且歷史既是他們權威造成的基礎，故又設法增加一般人底妄信程度。

因這些因素底作用，歐洲史在這時期之被破壞，至我們不能再覺得相等程度的時期。老實說，沒有歷史倒不覺得什麼不方便；最不幸是，人類對於真實之不存感覺到不滿足，而造謠些虛偽來代替。在無數這種例示裏面，有其他一種方式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它們可以證實當時寫史的那些階級的顯明的特性——卽好古心。我例示着關於各種民族起源底假託事實，在所有這些民族中，中世紀底精神都是非常顯見的。每種民族都相信他們是從脫勞埃團攻時之祖先所傳接下來，這種信念幾保持着數世紀之久，而沒有人會發生過疑問。他們所爭議的問題僅是關於這燦爛的宗系底傳世的詳細過去情形而已。關於這點，倒有許多不同的意見；譬如——劣弱的國家姑不具論——說法國人是從凡人皆知的黑克托（Hector）底兒子佛蘭克斯（Franks）傳下來的；又如說英國人是從伊尼阿（Aeneas）底兒子勃魯脫斯（Brutus）傳下來的。（註二七）

至關於各地方底歷史文學底原始，中世紀底大史家底意見卻都有相通的地方。他們對於寫史方面或敘述偉大底生活史等等，常喜歡溯源於很古的時代；又當敘述關於某題材之事蹟時，亦常不斷地追溯到諾亞（Noah）離開大船的時候，或竟至亞當經過天門的時候。（註二八）有時他們指示的古代事物或不多，可是所取的史料底範圍卻非常的奇異。他們說法國京城底名字是根源於普賴阿姆（Paris）底兒子巴黎而來的，因為當脫勞埃被推翻時，他正逃到今法國京城的原故。他們又說都爾（Tours）地方是因為曾是脫羅納斯（Turonus）——一個脫

勞埃族人——底葬地而得名；同時，脫勞埃城確是脫勞埃人建造的，因為可以在它們底字原上清楚地推證出來。又羅恩勞連堡 (Nuremberg) 是因尼祿 (Nero) 而得名；耶魯撒冷 是因琪濟斯 (Jehus) 王——他是中世紀一個羅曼薩盛 的人，但後來的史家對於他底存在問題，已無法證明了。——而見稱恆伯河 (River of Humboer) 一名之由來，是因匈奴 (Huns) 底王曾在該河溺斃之故。有人以為高盧 人底名原於高勒非亞 (Galatiae)——傑非脫 (Japhet) 底一個女裔；但有人又以為是由於傑非脫 底兒子高末爾 (Gomer) 而來者。普魯士 底名亦基於奧格 (Angustus) 底兒子普魯塞斯 (Prussus) 而生。這倒顯然近乎近代的了；但西利亞 是得名於預言家依利西亞 (Eliada)——西利亞 當然是由他傳下來的；至於祖利克 (Zurich) 城呢，雖然建立的確實日子還在爭論中，但無論如何，總是亞伯拉罕 時已有了建造。(註一九) 傑普塞人 (Gypsies) 也似乎是直接由阿伯拉罕 和塞拉 (Sarah) 繁衍下來的苗裔。(註二〇) 薩拉森人 (Saracens) 底血統比較駁雜不純，因為他們不過是從塞拉 傳下來——至於如何傳下來卻沒有說到；但或因她底再婚，或因她和埃及 人私通而得到的結晶。無論如何，蘇格蘭 人確是埃及 人底遺裔；因蘇格蘭 這個字導源於蘇格她 (Scot)，蘇格她 是埃及 王底女兒，而蘇格蘭 一名為她所賜與。(註二一) 關於幾種同樣的事件，中世紀供給我們同等有價值的資料。最家喻戶曉的是那不勒斯 (Naples) 城是建在雞卵 上面；(註二二) 聖·邁克爾 (St. Michael) 關則是天使長親自設置的，他是第一個武士，而事實上，武士制也就淵源於此。(註二三) 至關於韃靼人 (Tartars)，那便當然是從地獄 (Tartarus) 而來；據幾個神道學者說，上面所說的地獄是低等的地獄，但有幾位又說，這便是地獄 本身。(註三四) 但無論如何說法，韃靼人 底誕生地是本

於下面的事實，無可爭議；而這事實可拿許多表現鞏粗人所施的致命的和神祕的影響底事情來證明。土耳其人又和鞏粗人相同，很明顯的，自從十字架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以後，所有的基督教徒子孫比以前少了十個牙齒；這是一個普遍的災害，似乎沒有法子可圖補救。

對於基督徒之早期史，中世紀底大著作家都是特別的好奇；他們將記憶中的史事保留下來，否則我們將完全茫然無所知了。在夫拉薩特 (Froissart) 之後，十四世紀之最負盛名的史家當然是韋斯敏斯德 底瑪太 (Matthew of Westminster) 了，他底名字至少有許多讀者是知道的。這個卓越的人轉移他底眼光於猶大 (Judas) 底歷史，因為他想發現那造成一個譎詐的叛教者的環境是怎樣的。他研究的範圍似乎很廣闊；但研究的主要結果卻是當猶大 嬰孩時即被其父母遺棄於斯加里奧斯 (Scythia) 島中，那時他即名為猶大·伊斯加里奧脫 (Judas Iscariot)。這個史家又說猶大 長成以後，在犯了許多罪惡以外，又殺了他底父親而娶了他底母親。在另一部分猶大史中，復舉出一事實為研究神聖羅馬教皇 之遺風者之好資料。關於親吻教皇底足趾 底習俗，曾有許多疑問發生，就是神道學家 對此禮儀也未免有所懷疑。但這個困難點已被瑪太 解決了，他解明了這習俗底始原。他說以前本來是吻教皇底手的，但在八世紀之末期，有一個淫蕩的女人當獻禮於教皇時，非僅吻之，且表露其熱戀之情。那時的教皇——他底名字是黎奧 (Leo)——見到這種危險性，因而斬去其手以消除所蒙上的玷污。此後，大家留意吻教皇底足趾 以代替吻手之習；又瑪太 恐怕有人疑惑這件事底正確性，故又堅決地告訴我們，這係五六百年前所割去的手現在尚保全於羅馬；且確是一種奇蹟，因這手還能保持其原形於勒脫蘭 (Lateran) 中。

而不腐爛。有些讀者也許對於勒脫蘭本身有所詢問，故該史家又於其他一大著作中考查勒脫蘭之意義，而追源於尼祿皇。因為據說有一次這個基督教信仰底邪惡壓迫者曾吐出一個滿沾血漬的青蛙，他相信這是他自己的後代，因此把它關在地穴裏，以至有好久的時間。在拉丁文裏「勒單脫」(Latente)底字有「藏」義，而「蘭拿」(Rana)底意思是「青蛙」，所以把二字連接起來即為勒脫蘭一字底原始，事實上，勒脫蘭即建立於發現青蛙的所在地。

和以上同樣的觀點很多，真可以連篇累牘地寫出來；在這些黑暗時代中——或可說是相信時代中——都被人們虔信而不置疑。那些時代當然是宗教事業底黃金時代，因人們底輕信心達至如此高度，似乎可以保險教士們有一個長期和普遍的領治權。至於以後教會情景之如何漸形衰落，及人類理性之如何開始反叛，將在本章底後段敘述，在那裏，我將循索現世及懷疑精神——為歐洲文化之始原——的興起。但在本章結束以前，不妨將中古時期所持的意見多舉幾個例證；為着這個原故，我也要選擇兩個最普遍而影響最大和最被人深信的歷史事實。

我所選的史事，就是關於亞塔爾(Arthur)和查利曼(Charlemagne)的；這些包含教會中顯達的人物，且因是名家所作，故甚為人所敬視。關於查利曼底歷史見脫炳(Turpin)底編年史，而脫炳所以著作的意趣是因他是查利曼皇底朋友，戰爭時的伴侶，李姆斯地方(Rheims)底大主教。從這部史內的幾段看起來，頗有理由可以證明是十二世紀初葉底作品(註三五)；但在中古時代，人們不善於認識這些事情，因此也沒有人為這史底真確性

而去爭辯。確實的，蓋僅藉李姆斯底大主教這個名稱固已足號召的能事了；同時，我們發現，在一一二二年時，這本史會得教皇正式的讚許；又十三世紀時一個最負盛名的作家是路易九世底王子底師傅善未（Vincent de Beauvais）會稱該史為有價值的著作，而視為查利曼時代之一主要的權威。

這本書這般普遍地給人誦讀，而又受經驗豐富的批評者底讚可必定可以拿來作為測驗那些時代底知識和意識的一個正確標準。關於這一點，現在可以稍加敘述，以便使我們明白歷史改進之絕端滯緩性以及其前進時渺不可即的步伐，直至十八世紀時，方有偉大的思想家為之樹植以新的生命。

由脫炳底編年史裏，我們得知查利曼之侵略西班牙是受了聖·約翰底兄弟聖·詹姆士（St. James）底慫恿。這個門徒既是攻擊西班牙之主動者，乃採用了可以達到成功之目的的方策。當查利曼圍攻潘潑盧那（Pamplona）城時，那城會極力頑抗；但當侵入者共同禱告之際，城牆驟然坍塌下來。自此以後，查利曼王即能迅速地把全城臣服了，幾把所有的回教徒竟數歸化，而建造無數的教堂。可是魔鬼底手段是無窮盡的。在敵人那方，忽然出現一巨人叫作番納克脫（Fenacote），是從古歌利亞（Goliath of Gath）而來者。這個番納克脫是基督教徒，從未遇過的最可怕的敵人。他能力敵四十人；他底臉有一肘之長，而手臂和腿則長達四肘；整個人復有二十肘之高。查利曼差遣最有才能的武士去抵禦他；但瞬息遂為巨人所敗，那巨人手指竟有他們三個手掌那般長，可知他底力量是怎樣的大了。這些基督教徒都嚇得驚惶失措，二十個精選的武士猶不足以抵禦之，設有一個能從戰場上回來的，番納克脫便把他挾在臂中俘虜而去。後來，名聞遐邇的奧蘭多（Orlando）上前和他作殊死戰。一個燦爛的

爭鬪開始了；這個基督徒看看不能如他所期望的得到勝利，於是就和他底敵人作一神學上的討論。用這方法，這個異教徒很容易地失敗了；奧爾多乃乘辯論勝利之餘進逼他底敵人，用劍撲擊而重創了他。自此之後，回教徒底最後一線希望纔消滅了；基督教軍隊最後得到勝利。查利曼乃將西班牙裂土分封於這次有功的勇武諸臣。

關於亞塔爾底歷史，中世紀也有同樣確實的史料。以前也會有許多關於這個有名的王底敘述；（註三六）但它們各個的價值尙未有定評時，這個題材忽然被十二世紀早期蒙穆斯（Monmouth）地方底大主教名哲夫利（Geoffrey）者所注意。這個名人在公元後一一四七年將他研究的結果印行一本書名英國人史。（註三七）在這本書裏，他把整個問題用一種廣汎的看法；非但敘述亞塔爾底生活，且追考此偉大征服者之所由造成的環境。至關於亞塔爾底行爲一點，該史家獨幸能獲得牛津大主教窩爾忒（Walter）所收集的適當的資料。窩爾忒是哲夫利底朋友，對於史底研究也含有極大的興趣的。所以這部著作就是兩個大主教底合作品；這本書之值得重視，非僅爲這個原故，也因它是中世紀出品中之最普遍者。

這本偉大歷史底前部分都是述說蒙穆斯大主教所研究的亞塔爾接位以前的英國情形。這點，我們反不十分重視；雖然也不妨提到：這大主教曾確定說自脫勞埃之虜掠一役後，亞斯塔尼斯（Ascarinus）因逃亡而得一子，即勃魯脫斯底父親。當時的英國曾擠滿了巨人，可是都被勃魯脫斯所殺；事定，乃建造倫敦，銳意圖治，而以其名建國號曰「不列顛」。這個大主教繼續又說勃魯脫斯以後的幾代君王大多數都是因其才能之高邁卓越著名，而其中也有幾個是因當時怪異事件之發生而成名的。即如，在李伐羅（Riva Illo）統治時代，有三天不絕地天雨血；

又當木爾維特斯 (Morvildus) 在位時，海岸邊忽為可怕的海怪所擾，它損害了許多人民以後，並把國王也吞嚥了。

蒙穆斯大主教所述的這些事件即是他所研究的結果；但在以後說到亞塔爾時，卻得其友人牛津大主教之相助。這兩個大主教告訴他們底讀者說：亞塔爾王是因着著名的男巫墨林 (Merlin) 之魔術而生存；他們將各跡敘述得非常詳盡，以這兩個人格高崇的歷史家而有這樣的寫作不得謂非怪事。據云亞塔爾後天的活動並不辱沒了他超人底本原。他底力量是所向無敵的。他曾殺戮了許多薩克遜人；他侵略那威，遠征高盧，而莫都於巴黎，並準備去威服所有歐洲底征服者。他曾單獨和二巨人交戰而並殺之。其中一巨人住於聖·邁克爾山 (Mount of St. Michael)，是全國底恐怖，除了幾個預備要生剝活吞的俘虜外，曾經殘殺所有和他對敵的兵士。但他到底做了亞塔爾神勇之下的犧牲品；至於其他一巨人，叫李索 (Rise)，更為可怖了。因為李索還不願和人類作平庸的鬪爭，故他所穿的衣服完全是被他所殺的帝王底鬚髮所製的。

這些敘說，就是十二世紀時的所謂歷史了；況且這些並不是無名的作者底作品，而是出於教會中最榮譽的人底手筆。並為當時環境所助成的成功品。它底保證者是蒙穆斯大主教，和牛津大主教；它之所由作是要敬獻於格羅斯忒伯爵 (Earl of Gloucester) 亨利第一 (Henry I) 底兒子羅伯特 (Robert) 者；而它又這般給人重視為英國文學之重要貢獻，故其中主要的作者即因而得陞充亞薩 (Apsa) 地方底主教——據說這是對於他研究英國年史成功底一種加獎。這樣備受讚美的一部書拿來測量那時代當然不是一個壞的標準。確實的，當時人

讚美它的情感是這樣地普遍，以至幾世紀中對於它底真確性（註三八）底評論竟找不出兩三個例外來。名史家阿非利德（Alfred of Berberley）曾把它作一拉丁文摘要印行出來；又因欲使其更爲普遍，故復由拉雅蒙（Layamon）譯爲英文（註三九）給蓋馬爾（Gaimar）和瓦斯（Wace）先後譯成盎格羅·諾曼（Anglo-Norman）文。這些都是熱心的人，焦急地要將這書包含的重要的實情盡量地廣佈於世界之故。

在中世紀時，歷史之如何編纂，似乎不用再加以證明了；因爲上面底例證不是隨便摘錄的，乃是由才高望重的作家之所選擇；這些很可以顯示當時歐洲底知識和判斷力了。在十四、五世紀時纔第一次顯現些微隱約的變遷（註四〇）但這種改進要到十六世紀末葉或竟至十七世紀初葉纔有明顯的輪廓。這種有趣的變動底主要的步驟在本書底其他一部分加以追考，那時，我將表明雖然在十七世紀時，這種進步是確在進行的，但對於歷史未曾有一廣泛的見解，除非直至十八世紀之中葉。那時歷史先有法國偉大的思想家加以研究，繼之者有二、三蘇格蘭人，其後數年復有德國學者參加。這種史底改革是和既與史相契合而又影響於歐洲各主要國底社會關係底其他的知識變遷相連繫的。但在未述寫到本書底其他部分時，我們只須說，在十六世紀末葉以前，非但沒有歷史底寫作，且在當時的社會情形中實不會有一部歷史底著作。歐洲底知識實未成熟使其能成功地應用於本事件之研究。因我們並不以早期史家之拙劣爲由於天賦才能之缺乏。人類智慧底平均率恐怕常是相同的；不過社會對於他們所施的壓力常有變異罷了。因此，前代底社會普通的情形竟逼迫最有才能的作家去相信最幼稚的悖理的事情。直至這種情形改變了，歷史方有存在的可能性，因爲找到了一個人知道去述說，剝削或相信最重要的事

物。

結果，歷史即使被有卓越才能的人如馬基雅弗利 (Machiavelli) 和菩丹 (Bodin) 所研究，他們也不過將它來當作政治理論底載運工具；在他們底著作裏，我們找不到他們一些嘗試要將歷史作一廣泛的研究足以概括所有的社會現象。這一點也可用以評定科明 (Comines)，他雖然較拙於馬基雅弗利和菩丹，也不失為一精確的觀察者，且對於各人物的評論實具鮮有的聰慧。但這都是由於他自己的智慧所使然；那時的時代卻令他迷信和對於歷史較廣義的目的方面所見不廣。他底淺見可以在他對於偉大知識運動儼然無所知的這一點上彰著地顯示出來。這種運動在當時很疾迅地傾翻了中世紀底封建組織；對於這一方面，他從不提，卻將他底注意力着重於那些瑣屑的政治陰謀，以是這便是歷史底內涵了。(註四)至關於他底迷信一點，多舉例證乃不啻虛費時間；因沒有一個人生在十五世紀而其思想能不受普遍的妄信所薰陶者。他雖然和政治家、外交家都有私誼，又有充分的機會可以看到很有希望的事往往都因主持者底無能而歸失敗，但他在各重要點上卻將這些失敗不納入真的原因而視為神底直接干涉。十五世紀時這種思想傾向既這般明顯和不可遏止，以致使這個卓著的政治家自信地說：戰爭之失敗不是因為軍械不足，不是因為出征時期之失算，也不是因為將兵者之無能；乃因其人民或君主之無道，遂致造物者設法責罰他們的。科明說：戰爭是個極大的神祕；因為上帝既用以達到他底願望，故他有時將勝利賜與一方而有時又賜給其他一方。因此，一國內之擾亂亦本出於神底意向；這些擾亂永不會發生，除非那國底君王在其繁榮以後，忘記了繁榮所由來的源流。

欲將政治學變爲神道學底支派（註四）底種種嘗試，是當時特有的現象；如果這些嘗試是由於有能力的人或對於公共生活有經驗者所主持，則當更爲有趣了。當這種觀念不出於僧人在他底修道院內的提議，而出於一個長於處理公共事情的著名政治家底主張，我們實易料想到，遠遜於他的那些人底平均知識程度是怎樣的了。這是很明顯的——我們不能在他們那裏希冀什麼；在歐洲能從它已陷入的迷信中解脫出來，和擊斷那阻止其未來進步的可悲的羈索以前，還須經過許多階段呢。

雖然尚須經過許多的步驟，但無疑的這種變動一直不斷地向前邁進，即使在科明著作的時候都已經有了這種偉大及確定的變遷底清楚的象徵。但這些象徵不過是正欲變動的表示；約在科明逝世後一百餘年，這種進步纔顯現其全部的結果。因爲，雖然新教改革是這種進步底結果，可是有一個時候曾經違反這種進步而鼓勵有才能的人去討論不及人類理性的問題，而因此使他們不能對於文化底普遍目的盡其力量。我們便發見在十六世紀末葉以上，真的成就是不多。在十六世紀時——可在以後兩章中看得到——英國及法國，對於神學底熱誠便開始漸漸消滅了，於是乎爲純淨的哲學開闢了光明的大道，這種哲學培根和笛卡兒是代表者，但說不到是製造者。這個時期是屬於十七世紀，並且我們在裏頭可以找到歐洲知識復興底年日；有似乎我們在十八世紀可以指出它底社會復興年日一般。但在十六世紀底大部分裏頭，妄信仍舊是普遍的，因爲它不但影響到一般的階級，即使受高等教育者也不能免。關於這一點，可以舉出許多的證明；現在爲簡明起見，我只舉出兩個例，這兩個例底本身由其對於不似受騙的人底影響看來是特別引人注意的。

在十五世紀末葉十六世紀初期，司多福 (Stoeffler) 是一位卓著的天文學者，他在杜平根 (Tübingen) 地方任算術教員，這位有名的人對於天文有很大的貢獻，也是指出朱理安 (Zigler) 日歷——那時底人慣於採用這種日歷以爲計算日子底工具——底錯誤底救補方法的第一人，但他底能力和知識到底有限，還不能抵禦那個時代底思潮。在一五二四年，他發表了幾個可笑的計算底結論——這是他研究了很久了——他並確定當時底那年世界將被巨大底洪水所摧泛。這種宣布經這般有名的人這樣確定地說出以致發生很活躍、很普遍的驚惶。洪水將要到臨的消息很快地傳播出來，歐洲於是充滿了恐慌。因爲要避免初次的震懼，在海邊或河邊居住的人皆棄其屋舍遁去；其他的人還以爲這種辦法不過是暫時的，乃又採用其他更爲有效的辦法。有人提議，第一步應由查理士五世派人考察全國，而將離水較遠的地方加以標記，以爲避難處所，這是御林軍某將領底主張，那時他駐紮在佛勞倫斯 (Florence)，因爲他有這主張，於是當時也有一本著作專述之。但人底思想還不適合於這種精細的方法；且水能浸漫的高度也屬難定，說不定它會達到最高的山頂。種種計劃方在莫宗一是中，那災禍底日子卻漸近了，卻還沒有比較好的方法之決定以圖避免。如果我們要將所有的避禍提議載述起來，那便盡數十紙也難以畢罄。但此中有一個提議似乎值得注意，因爲當時人已用了極大的熱心來進行，又這種提議在那時候也是時代底特色。當時有名阿理兒 (Aurilio) 教士者，爲土魯斯 (Toulouse) 大學教會法規底教師，他底腦中縈繞了許多避免宇宙間底災禍的辦法。到了後來，他想到最實際還是仿效諾亞在同樣危險裏頭所採用而成功的方法。這種意見還沒十分給人們明瞭便去實行了。土魯斯底居民大家都幫忙他；諾亞避難式的船立刻建造起來，希望

雖少有幾部分的人種可以得到保全在水退了及陸地再行現出以後繼續他們底種族從新在世界上繁榮起來。這種驚恐經過了七十年以後，其他事件又發生了。這樁事曾經有一個時候使到歐洲某一個主要國家中之著名的人也受到了相當的煩擾。時在十六世紀底末葉，西利西亞地方有一個小孩忽然在牙牀內發現了一只金齒，這種報告引起了可怕的激動。但其後這謠言經過考查以後，一般人認為非常確鑿。沒法可以遮瞞了衆人底耳目；於是奇蹟立刻傳遍了德國，他們視為神秘的預兆，多數人都焦急着這預兆底意義。傳佈這消息的第一人是何斯博士（Dr. Horsch）在一五九五年這位有名的物理學家發表其研究的結果，這是說：當這小孩出生的時候，正是太陽和木星在黃道十二宮上相碰。所以這件事實雖然屬於超自然的，但也沒有什麼可驚奇的了。金齒即是黃金時代底預兆，在那時，國皇將要把土耳其人逐出基督徒領域以外，並於以建立一個皇國底基礎以至於數十年之久。何斯說：這一說已經給丹尼埃爾在他底名著第二章裏很清楚地暗示出來了——就是這位預言者在那裏曾提到一個黃金人首的塑像。

（註一）這是一個新奇的證明，證明對於野蠻民族史研究上的疏忽，以至作者常認韻文為比較後起的作品；即使是平刻吞在一七九九年致奧蘭格的時候也說：「韻文一直至第九世紀時方纔發現於歐洲。」（見平刻吞著文學通信集（Literary Correspondence）第二册第九二頁）事實上，非但古希臘人和羅馬人已經知道用韻文，即在平刻吞所說的年日以前，便早已為亞格羅·撒克遜人、愛爾蘭人、波斯人以至不列顛人所應用了。

（註二）這種獲得的習慣久已保存着它必需的地位。在許多世紀裏，時的愛好心是這樣的普遍，以致韻文底著作幾乎包括全部的民族，且更遠至歐洲；這種顯示韻律的優越性的著作是偉大的印度文化底特色。至於這種文化在理解的立場上卻不見得十分高明。

(註三)埃利斯(Elis)一個南海羣島底傳教士，關於該地底居民，他說：「他們底傳統的詩歌是他們用以解決歷史上的紛爭底標準及權威應屬之紛爭者。」當懷疑發生時，「因為他們沒有當時所要應用的文字記載，故彼此以口碑底傳說以相互攻訐；這樣就不可避免地使兩方捲入於長期及固執的辯論中了。」(見埃利斯著多神教之研究(Polytheism Researches)第一冊第二〇二—二〇三頁)

(註四)詩底靈感常因其自然之流露而表現出來，而且無疑的，我們對於偉大詩人之崇拜，其中一原因，不外是他們盡量因其個人之意向以感情流露其思想。又我相信可以發現凡在知識為歌人——這些歌人或是牧師或是史家——所把持的社會中，以詩為神道的藝術這一種觀念必最盛行。(見庫威著哲學史第二集第一冊第一三五—一三六頁)

(註五)波羅(Varro)曾指出四十四個遺址無賴之徒而稱之為精叩利斯。(參閱斯密斯底傳記及神話[Smith's Biography and Mythology]第二冊第四〇一頁共八冊一八四六年出版)

(註六)我以為名字混用的習慣當先於較進步社會中之人底統合現象而存在。如果這種議論是普遍的、真實的，那麼，我可以說，它對於名目論及實體論之爭辯史上更會放一異彩。

(註七)在埃及，從前那裏曾有五十五個城市是用着同一名稱的，因這一點便使我們對於「錯誤」之所由滋長得到一個概念了。

(註八)納納(Sharon Turner)稱他為「波羅的海底斯特拉寶(Stasabo)」(見脫著英國史第四冊第三〇頁)中世紀底大多數地理學家所有關於北歐底知識未嘗不是由他得來的。

(註九)「芬蘭人之稱該城為士枯，是基於瑞典脫爾(Tor)——市場——這個字一音之轉而來。這字底發音使阿丹誤信以為芬蘭為土耳其人底營遊地。」(見庫利(Cooley)著海外及內地發見史[History of Maritime and Inland Discovery]第一冊第二二一頁一八三〇年倫敦出版)

(註一〇)他底十字架底史家曾謂他之所以被人稱為雄獅是因為他從不寬恕罪犯之故而得名，但此外卻有幾個埃及古帝王乃「因其曾有英雄的事業底表現而接受了雄獅的名稱者。」

(註一一)第一個傳教士是愛寶(Ebbo)，時約在八百二十二年。繼起的是安斯卻(Anschar)，他在後把他底事業遺留於瑞典，可是

這種步驟進行得很慢；直至十一世紀底末葉，基督教幾堅固地建立在北歐。常有人以為有幾個在愛爾蘭底丹麥人在愛伐一世（1118）時代已是基督徒了；但這是李維爾僅持一個銅幣的憑證而弄出來的錯誤，其實這個銅幣本屬於愛伐二世時代者。

〔註二〕惠存（Whiston）說：附錄「不過僅因加入了他自己所作的一首關於含有道德及傾向基督的歌，於是遂得參加於腐化異教的團體裏頭了。」（見北歐人民史第六〇頁）

〔註三〕這些穿插既是道慢地多，無疑地，使早期的德國考古家都相信愛特一書是北歐僧侶底偽作品——這些近似偽作的著述，牟勒（Müller）曾在四十年前予以痛斥。

〔註四〕關於這一點可由精於東方文字及語言學者之相反的敘論而予以證實；他們對於波羅門教之原始都各有其特出的假說。我們可以說，沒有波羅門教，那就說不到有印度之存在。至關於印度底真歷史除非對於支配宗教意識的滋長的定律能作更進一步的綜合研究外，似無從下一真確的判斷。

〔註五〕「從亞力山大之死以至薩薩尼（Sasanids）朝代之建立者爾佩金（Ardeshr Babegan）止——占有五世紀之久的時期——的波斯史簡直是空白」（見恩勞埃著對於領導者的初步討論（Troyer's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Dobbsian）第一冊第五、五六頁，共八冊，一八四三年版）

〔註六〕關於回教和古波斯史底敵視，可參看格羅特著希臘史第一冊第六二、三頁。即在現世紀的現在，波斯底良好的教育還包含着阿拉伯文法摘要、邏輯學、司法、預言家底口碑及高麗記載等等的研究。（見肯內提著波斯文學（Persian Literature, in Transc. of Bombay Society）第二冊第六二頁。）同樣的，回教徒也忽略了印度史，且無疑地曾毀壞了它，乃至亂加更改；但他們從未能把持印度有似把持波斯一樣，且他們不能改換其本來的宗教。可是，他們一向的影響是不好的，而且埃爾芬斯同曾在印度史第四六八頁裏說，直至十六世紀止，沒有一個例可以表示會精研印度文學的。

〔註七〕有一個很高的權威者以為波斯楔形文字銘刻將使我們得到在夏納姆內所包含的神話和口碑底年日底真確統系。（見勞林著（Rawlinson）著巴比倫及亞述底銘刻（Inscriptions of Assyria and Babylonia）戰亞洲學社雜誌第十二冊第四四六頁）

〔註八〕關於希臘人之對於波斯史的盲目，可以參閱肯內提所著論文載於邦比學社會編第二冊第一一九—二七—二九、一三六頁。

的確的，這個有學問的作者說，他懷疑着「沒有一個希臘底著作會從波斯本都——就是說從幼發拉斯河以東之地得到他底材料」。

(註一九)就是說到依斯德島(Easter Island) 這似乎是最近的界線了。

(註二〇)薩塔加羅格語(Tagala Language) 的地方也是這樣，據洪保德(William Humboldt) 說，那地方算是馬來亞羣島中波倫尼島中底一切宗教形式上之最稱完整者。

(註二一)見馬斯頓(Marsden) 著蘇門答臘史(History of Sumatra) 第二八二頁得圖(De Taon) 以為爪哇人直至十六世紀纔變為回教徒。(見宙史(Hick Dutt) 第十三冊第五九頁) 但現在已經發現他們之改變他底宗教至少還早一個世紀，而舊教在一四七八年纔最後廢除的。

(註二二)洪保得在他底名著關於「加威」語言(Teher die Kawi Sprache) (一八三六年柏林出版) 裏對於爪哇文化曾作長篇的研究。由最近出版的幾個中國早期著作裏的證據，我們很可以相信印度殖民地在耶穌實天後第一世紀時伸展於爪哇。

(註二三)即在西利伯島，在回教徒入以前，年日是很確實地就保全着，大可與這點相比較。(見克勞福(Crawford) 著印度羣島史第二冊第一九七頁)

(註二四)的確的，爪哇人似乎沒有方法可以獲得卡威(Kawi) 古代底口碑，這除非由巴里底土人學得來。參閱亞洲研究(Asiatic Researches) 第十三冊第一六二頁(一八二〇年加爾喀塔出版) 內巴里島一文之摘記。拉夫爾斯(Sir Stamford Raffles) 爵士說：「我們必須完全在巴里找到了古代爪哇人底情狀底例證。」(見爪哇史第一冊第四〇〇頁)

(註二五)這種對於威爾士及愛爾蘭底歌人所傳下的口碑底損害曾在普利直德博士有價值的著作人類自然史內提過。(第三冊三一八四頁共八本一八四一年版)

(註二六)對於遺快樂時代常存留的樂歌的陶林(Doric) 說：「作家幾乎普遍地是神道學家。文學簡直就是宗教底一種活動。這樣研究的事物都是以崇拜宗教的原故而研究。故寫史者即是寫神道史者。」(見陶林著神道史之批評的研究概論(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cal Study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第五六頁一八三八年出版共八冊) 這本是具有相當才能的著作，但不適因對於某一種活動團體發生興趣，而遂為一般人視為一種宣言罷了。

(註二七)據一般人底意見以為勃魯脫斯或勃魯脫(Boars)乃是依尼阿底兒子；但有些史家卻堅持說是他底曾孫。

(註二八)在一〇八九年至一四八三年底倫敦年史之摘記一書中(參看該書第一八三—一八七頁)有一譜系將倫敦主教史非但道派至於勃魯脫斯之出脫勞埃爾徒出來一事，且一直說到傑亞利亞亞。

(註二九)六〇八年科爾雅特(Cortrat)在耐利克地方的時候聽到淹博的羅斯并(Hopelien)對他說，他們底城是建於阿公出拉底時代者。(科爾雅特著清淺的見識(Ordines)第一冊內與讀者的情一篇)我常常我最近所得的例證以為在歐洲思想之內，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中世紀之精神在各國內究竟活動到多少時候。

(註三〇)他們是阿伯拉罕和塞拉底「合法的子孫」(見蒙普兒著各國法蘭西人史 [Montesquieu's Histoire des Français des divers États] 第五冊第一九頁)

(註三一)在十四世紀底初葉，這件事曾筆之於書，遂與基督教視為影響的史實。(參閱林加德著英國史 [Lingard's History of England] 第二冊第一八七頁)「他們是從埃及及公主蘇格而來的。她移居於愛爾蘭後，其子孫即用武力從勃魯脫底後代手中強行奪取了不列顛底北部地方。」

(註三二)來特(Wright)在邪術誌異(Narratives of Sorcery)第一冊第一一五頁裏說：「那不勒斯城之建於雞卵上，及該城之遷命亦繫於雞卵上之說，似乎是中世紀時常流行的傳說。」

(註三三)「聖·邁克爾團」(Order of St. Michael)在法國設是為邁克爾天使長底嫡系所有的，據法國考古家底明斯以為邁克爾天使長乃是世界底最初的武士，他在天國中也建立了最早的武士團。(見密特著武士制史 [History of Chivalry] 第一冊第三六三—三六四頁)

(註三四)普利查德底自然史第四冊第二七八頁裏以為雞一名的源於「地獄」一字乃始於聖·魯易斯(St. Louis)但我似乎覺得在他以前已有這些字發現了，可是我現在已不能將原文電述出來。最早的出现我記得是在一二四一年，那時聖·魯易斯不過二十六歲。自十三世紀以來，這個問題即引起英國神道者底注意，而風靈的神道家惠斯吞(Whiston)曾說：「我最後著名的發現，或可說是由佛羅倫斯博士(Dr. Giles Fletcher)那著名的發現而重新獲得注意者，乃是雞即以色列之十種種族之說；——這十種種族

實久爲人探索而不可得者。」（見惠斯吞之生活及著作傳記（Memoirs of Whiston's Life and Writings）第五七五頁）

（註三五）威納在英國史第七冊第二五六—二六八頁真擬證明開力克斯脫斯二世（Callixtus II）所著他底證據雖然博學和精巧，惟是在失實。湯吞（Watson）則以爲是一二一〇年所成（見英國詩史第一頁第一二八頁）

（註三六）但這個威納士人歸咎於枝達斯（Guides）將其歷史「付於海中」（見巴爾格累夫著英國底盎格羅撒克遜共和國（Early-revets Anglo-Saxon Commonwealth, England）第一冊第四五三頁）精勤的威納曾蒐集許多關於亞塔芬的證據說到亞塔芬底存在問題，他當然是沒有疑問的，確的，在英國史第二九二頁他曾敘述在十二世紀時亞塔芬遺體之發現一事。（見英國史第一冊第二八二—二九六頁）

（註三七）在威納英國史第七冊第二六九—二七〇頁裏說，這書在一二二八年出現，但來特似證明真實的年份乃是一一四七年。（見英國文學傳記（Biogr. Brit. Lit.）第二冊第一四四頁）

（註三八）來特說：「在這本書印行一世相間，作家當將其採納於英國史內，幾個世紀中，只有二人具有結構其真確性的膽識。」（見來特著英國文學傳記第二冊第一四六頁）又埃利斯關於浮吉爾（Polydore Vergil）——十六世紀早期底作家——曾說：「因排斥曾夫利那本歷史，浮吉爾一時曾給人視爲沒有理性的人，這就是當時的偏見」（見埃利著浮吉爾底英國史（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第一冊第一〇頁，一八四六年出版。）十七世紀時——在歐洲第一個懷疑的世紀——人們纔開始對於這些事展開其眼光，譬如波義耳將關於赫印利斯底「無稽之穿插及英國亞塔爾帝底功業變爲一書而分述之。」（見波義耳論著第四冊第四二五頁）

（註三九）來特說這是由瓦斯處轉譯而來，但可以更準確地說與其說拉雅翻譯那本書，不如說他是因曾夫利底無稽而建立其著作的根基的，因他不過把斯布盧特（Brut）一書之一萬五千行引伸而爲三萬二千行的他自己的胡說罷了。我不能不證明拉雅底著作在語言學上具有偉大的價值，因這部書印行以後，這個成功的作者曾對於英國語言史之研究作一重要的貢獻。但以拉雅而論，我們只能對於當時視彼爲裝飾品的一時代，暗裏失笑而已。

（註四〇）在這種騷亂裏面，夫拉德特是最早的一個例；他既是第一個對於事情發生懷疑見解的人，那麼，在他以前的史家都是神道學者。

在西班牙也是這樣我們考見在十四世紀時，歷史家中已開始有政治精神了。

〔註四一〕關於這一點，亞諾爾特說得很真實：「科明底自傳（Memoirs）之特點，即是完全不明白白當時代的偉大的知識運動中，科明底已經墮了，而科明除了他所已培育的意見，並沒包含着其他任何的觀念，他描寫當時的事情，人物和他們底關係，似乎這些都將繼續以至於無數世紀。」（見亞諾爾特現代史演講 [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 第一一八頁）關於這點，我還可以說，科明底提到下層階級的時候，他總是表示極度的輕視的。

〔註四二〕林加德博士在英國史第一册第三五七頁裏說：「從主客底信條中，我們底虔誠的祖先曾下一種率而易的推論，以為『成功就是神底意志底表現，於是反抗勝利的征服者當然即是違反上天底判決。』」這實屬行一時的意見之最後的孤跡，即是對戰神崇拜的表現——這種表現，現在已經漸漸失其效用力了。」

第七章 由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的英國思想

——自十六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末葉間之英國思想史大綱——

託生在十九世紀中葉的一般讀者對於何以在他們誕生以前之三百年中一般人底思想會像前章所述的那般愚昧一點必覺得難以明白。而且更難明白的是，非唯具有普通教育程度的人是在這種黑暗當中，即使有相當才能而在每一方面都是時代底先鋒者也如此。這種讀者也許因證據之確鑿不可爭辯而感到滿足；也許能證實我所提出的論述而認為無可置疑；但他看到何以會有那種社會對於這樣可憐的悖理的事情還會恭維為端嚴而重要的真理並以爲可以組成歐洲知識普通庫藏之主要部分這一點仍然覺得費解。

但如再加以研究以後，這種當然發生的疑惑自可消除了。苟按之事實，則反覺不以此等悖理之事之能獲信爲可異，而轉怪人之不信了。因爲在那時候一如以前時代，每一事物都只有片斷的瞭解。不但在歷史文學上，即在各種文學，各種題材上——在科學、宗教、立法上——其前定的原則乃是盲目及不猶疑的妄信。對於十七世紀以前的歐洲史愈加以研究，則這種事實愈能得到健全的證實。偶然間常會有一二偉大的人物起來，對於這種普遍的信仰發生懷疑；他對於三十尺高的巨人，有翅膀能飛的龍，和空中飛行的軍隊之存在曾佈展了他底疑雲；他以為星相學也許是一種欺騙，魔術也許是一種騙人的事業；他有時竟提出溺斃所有的巫人及摧滅所有的異教爲合

理之輩。無疑的，的確會有少數這樣的人，但他們是終於被人輕視爲空想家，爲惰性的幻想家，不珍於實際的生活。雖然以其自己的理由違反了前代人底智慧者。他們託生在這種社會情狀下，決不能留下什麼永久的印象。固然他們還須爲自己打算，爲自己的安全着想；因爲直至十六世紀之後半期止，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其人民能公開地表示其對於同時代人底信仰底懷疑，而不受到極大的生命危險。

除非懷疑運動開始，否則進步是決無可能。因爲我們很清楚地看到，文化之進步完全有賴於人類知識上之獲得及其分佈地域之廣大如何而定。如果人們對於其所保有的知識表示躊躇滿志，則決無意於增加其知識。如果完全相信其意見之正確，則亦決不願費時費力去研究其信仰底基礎是否穩固。他們對於與他們前人不同的見解常常表示驚奇或恐懼；當他們在這種的思想情態中，是決不會接受與其原來結論相扞格的真理。

因爲以上的原因，雖然新知識之獲得是社會進步中之每一步的必需的引導，可是這種知識之獲得以前必需有愛好研究和愛好懷疑的精神；因爲沒有懷疑，便沒有研究心，沒有研究心也就沒有知識。知識並非是一個惰性和被動的原理，來去不由我們自主；它卻是必須有特於找尋而後被獲得的；它是極大的努力底產品，是偉大的犧牲底結果。如果說人將爲其已經瞭然的問題去努力，去犧牲，豈非笑話！凡不感覺黑暗者，決不會去找尋光明。假如我們對於某一點已得其真確，則對於那一點決不會再事研究；因爲研究不再有用，或許反有危險。在研究開始之前，懷疑必須先事活動。這裏，懷疑的動作就變成所有進歩底開始者，或必須底前提。這裏，就有所謂懷疑主義，即其名稱對於愚昧者也是深惡痛絕的；因爲它擾亂他們那懶惰而自以爲滿意的思想；因爲它妨礙他們底活躍的

迷信；因為它加增了研究所得的疲倦；又因為它竟引起緩滯的理解力去詢問事情是否是普通所設想的一樣，或他們自動受訓而信仰的事物是否真實的。

我們對於這個偉大的懷疑主義底原理研究愈深，則對於其在歐洲文化進步上所演的廣大的部分愈看得明顯。把本章所要充分證明的概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我們是從懷疑主義裏得到那種研究精神，那種精神在過去之兩世紀中會漸漸侵入於每一題材之可能範圍內；會改造實用及思維知識之每一部分；會減削權利階級底權威，而將自由置於更堅固的基礎上；會譴責帝王底專制政治；會約束貴族底傲慢；且會減少教士底偏見。總之，就是那種精神，補救了往昔的三個基本的錯誤：那些錯誤使人民對於政治太過深信；對於科學太過妄信；對於宗教太過不容納異見。✓

將懷疑精神所引起的影響作這般急速的概論，恐怕對於不明瞭這樣廣汎的研究的讀者要感到驚奇。但這種原理之重要性，在其出發點上是這樣的大，我打算在這一篇概論中將歐洲文化所有之特著方式作一研究而證明之。這種研究將引伸而為一種明顯的結論，就是，沒有一件事情會廣汎地影響及於各國，有如其懷疑精神底久長 (Duration)、總量 (Amount) 及分布 (Diffusion)。在西班牙，其教會因異教徒裁判所底輔助，曾時常強有力地實罰懷疑派作家，非但阻止懷疑意見底存在，且滅絕其傳佈。懷疑精神被這種方法消滅後，知識在幾世紀間幾乎在靜止和固定的狀態中；而文化乃知識底結果，也變為固定了。但在英國和法國——我們現在將知道是懷疑主義最先出現及傳佈最廣的國家——結果就完全不同了；且好研究的心既受鼓勵，永恆進步的知識乃因以發

生，這就是英、法兩國所因以隆盛之本。在這本書底餘部，我將循索英、法兩國這種主義底歷史，研討其所表現之各種方式，及這些方式之如何影響於其國家事業。在研究之順序上，我要先述英國；因按以上所述的理由，它底文化必較法國為合乎常軌；因此，雖有許多缺點，總比其偉大的鄰國所能蘊育而成的文化來得近乎自然。但因英國文化底詳細情形將包含在我這部著作底主幹部分中，故我現在在概論內只留一章以為討論，且僅由懷疑主義運動底直接結果一點上來察看我國國史；至於那些不甚廣汎而仍屬很有價值的支節事情則留備以後的討論了。又因宗教自由空氣之發長亦富有重要性，故我將先述其出現於十六世紀時的英國底情況；我更將指出其他連帶發生的事件也是在同一進步中的一部分，且在各方面的確也表現了同一的原理在發長。

對於宗教自由史加以精細的研討後，可證明在每一實行自由政策的基督教國內，其自由政策之採用完全是由於非僧侶階級底權威（註一）強迫教士而行者。在現代，宗教自由在神權高於政權的國家仍舊對此不甚明瞭；這是許多世紀中的普通情形，故在歐洲早期史中不能發見這樣聰明而仁慈的意見底些微痕跡，實不足為奇。但在伊利沙白女王登極之際，我國平均分為兩派敵對的教義；而女王在某一時期曾運用其驚人的能力籌謀這二種敵對權力底平衡而不致生固定的偏重。這是歐洲政府能擺脫宗教權威底活動參預而處置宗教事件的第一例；結果，仍未完全給人明瞭的自由主義在數年中竟向前推動而致使這樣野蠻的（註二）一個時代真確地或倒驚愕。不幸，沒有多時，各種環境——以後我將有適當的時候加以敘述——使伊利沙白改變了這種政策，這種政策她竭盡思慮恐怕也會認為是一種危險的實驗，而當時這國家底知識也未到採行此種政策的成熟期。但

總之允許新教徒對於舊教徒任意施其仇恨的對待策，可是在他們以後所造成的殘酷景象中，卻有一件事值得注意。有許多人無疑地都是僅爲了信仰而被處罰，但沒有人敢說他們底宗教即是他們得到處罰的原因。（註三）最野蠻的責罰加到他們底身上；但他們被人告訴說：如果他們能放棄某幾種據說有害於國家安全的（註四）主義，那麼，也許可以避免責罰。可是沒有一個舊教徒能廢棄這些主義而不同時放棄其宗教者，因這些主義都是他們宗教內的主要部分。僅這一件事——用狡猾的手段以行施宗教壓迫——已足表明時代所造成的大進步了。最重要的一點當然是迷信者之變爲僞信者；教士們因欲靈魂得救而焚斃人類，卻不得不借助於他們所認爲不關重要的謊虛來掩飾他們底暴虐。（註五）

當時進行的這種變遷的顯著證據可以在伊利沙白時代英國出現的兩本最重要的神學著作內找出來。呼克爾（Hooker）底教會制度（*Ecclesiastical Polity*）在十六世紀末葉（註六）出版，且仍被認爲我國教會中最偉大的堡壘。如果我們將這部著作和比它還早三十年的朱挨爾（Jewel）（註七）所著的爲英國教會申辯（*Apology for the Church of England*）一書相比較，則我們將因這兩位卓著的作家所採用的不同的方法而驚異。呼克爾和朱挨爾都是有學問和有天才者。他們對於聖經、早期宗教作家和教會會議都很熟稔。他們都爲保護英國教會底顯明目的而著作；而兩人對於神學辯論方面的普通戰具也都是善於運用的。但他們底類似點也就止於此。他們底這些固然很相同，而他們底著作卻完全二致。在那三十年中，英國底思想會造成極大的進步；在朱挨爾時代認爲完全滿意的論據，在呼克爾時代未必得人信賴。朱挨爾底著作充滿了由早期宗教作家和教

會會議所得來的引語，只他們不與聖經相抵觸的述說，他都視為絕對的證據。呼克爾雖然對於教會表示尊敬，卻不着重早期宗教作家，他並顯然以為他底讀者決不會對於他們底無根據的意見加以注意。朱挨爾諄諄然以信仰之重要為教誨；呼克爾卻堅持着理性底運用。（註八）朱挨爾用他所有的才能來蒐集古代底斷語和決定其所含的意義。呼克爾則引用古人之語來表明他自己的論據，而他之所以出此卻不因敬視其權威而然。譬如呼克爾和朱挨爾都說君主有權干預教會底事情。但朱挨爾以為當他指出摩西、約書亞（Joshua）、台維斯和蘇維門底執行這種權利，即已證明了君主能有這種權利了。反之，呼克爾以為這種權利之存在不是因為古代即有，卻因其施行之有利之故；而且因為強迫非教會中人去服從教會所定的法律（註九）是不公平的。這兩個偉大的作者用同樣的相反的精神來維護他們自己的教會。朱挨爾像他那時代所有的其他作家一樣，運用了他底記憶力超越了他底理性；並且他想集合了聖經中所有的題材及註釋者所加上去的意見來解決全部的爭論。而生當沙士比亞及培根時代的呼克爾卻感覺到不能不取一遠較廣汎的見解。他底衛護教會，並非藉口於傳統觀念，也非憑依註釋者，更非為着神底啓示；他卻以為敵派之要求權利須看他們能否適應當時社會迫切的需求及能否順利地適應他們自己於平常生活（註一〇）底普通目的而定。

無待乎深究便可看到這兩個作者所代表的變遷的重大。凡神學上的意見被舊的獨斷的方法所維護時，如果我們要攻擊它，那便沒有不給人認捏為異教徒了。但當它一旦為人類理智所維護，則其支持力將轉成異常薄弱。因為在這樣情形中，不確定的因素就可以攙加進去了。我們或許可以辯說，每一宗教派別底證據都是同樣地

有力；我們不能確定我們底教義底真實性，除非我們已審知別派底教義是怎樣。按照舊的神學上的原理，可以很容易地指摘其最野蠻的壓迫。如果一個人知道唯一的真的宗教就是他所信的宗教，如果他也知道因與他底宗教上意見底歧異而被處死的人是判定了要永久滅亡的——他若知道以上兩點都是無絲毫疑義的話，那麼他必定會很公平地辯說，刑罰肉體來救靈魂使超生者得到將來的救援是一件慈悲的事，雖然他們所用的補救方法竟嚴厲得有如絞刑或焚刑（註二）；但如果同樣一個人，被人教導以為宗教上的問題是理智和信仰所同時解決的，他每不免有一種反想，覺得意志最堅強的人底理智也不是沒有謬誤的，因為理智竟能使最有才能的人採取最背馳的結論。當這種觀念傳佈於一民族中，那便會對於他們底行為發生影響了。沒有一個具有普通常識和忠實的人敢因他人底宗教關係而引用最嚴厲的法律，當他知道也許他底意見是錯誤的，而被責罰者底反是正當的；又當發現了宗教問題開始離開信仰底判決而服從於理智的判決時，壓迫便變成了最深刻的一種犯罪行為。十七世紀時的英國就是這樣。神學愈變得理智化，乃愈不為人所深信，因此也愈顯得仁惠。在霍克出版其偉大的著作後十七年，有兩個人因持異端（註一）而為英國底主教公開地焚死。但這是將滅絕的迷信底最後殘喘；從這個可紀念的日子以後，英國底泥土從未被一個因宗教教義（註一三）而遭橫死的人底血所染污。

這樣，我們已看到懷疑主義底興起，它在自然哲學上常是科學底開始，在宗教上常是宗教自由底起頭。固然無疑地，在上兩種情形中思想家可以運用他天才底偉大力量從這個定律底作用裏解放出來。但在民族底進步中，這種解放是不可能的。當人將慧星底運動歸原於上帝底手指底作用的時候，當他們相信日蝕、月蝕是神表示

實怒底一種方式時，他們決不敢冒大不韙而作預測超自然現象底靈瀆之說。在他們敢研究這些神祕現象底原因以前，他們必須相信，或竟懷疑這些現象底本身是能由人類思想來解明。同樣的，除非人能稍容許他自己的理智來接近他底宗教，否則他們從不會明白何以必須有許多不同的教義，或是何以人能信仰其他的教義而不致於冒極大和極不可饒恕的罪呢？（註一四）

假如我們繼續循索英國一般意見底進步，我們將看到以上這些述說底全部表現。一種普遍的研究，懷疑以及反抗的精神開始佔據着人們底思想。在自然哲學中，這種精神輔助他們——來得似乎很乾突——捨棄古代底桎梏，產生不建築在舊的觀念上而在個人觀察和個人實驗上的科學。在政治學上，這種精神刺激他們起來反抗政府而必然地將他們底帝王帶到斷頭臺上。在宗教上，這種精神立出盈千的派別，各個宣布或常過譽他們個人判斷力底功能。（註一五）這種大變動底詳細情形組成了英國史中最有趣的部分；但在未能預知我此後之一切變通以前，我現在擬只舉一例，這個例從它底情形看起來，實是那時代底特色。契林渥斯（Chillingworth）底著新教（Religion of Protestants）普通每認為宗教改革者用以攻擊羅馬教會的（註一六）最好的維護工具。這書在一六三七年出版，以這個作者底地位來看，我們意料中必以為可以找到與當時時代精神相同的固執性底充分表現。契林渥斯最近捨棄了他現在正擬加以攻擊的教義；因此，我們意料他必不會免除了叛教者所特有的獨斷的自然傾向。此外，他是勞德（Laud）——在他們記憶裏，他還是主教中的一個最鄙賤（註一七）最殘酷和最狡詐的人——底信徒和親密的朋友。他也是牛津大學底研究員，而且是那裏底一個常駐人員，那裏固常被入視

爲迷信底避匿所，而且至今還保存着這個不容嫉妒的名稱。註一八）如果我們翻開在這種庇護之下所寫的著作，我們必難相信這本書會在二十六年前會因與教會意見不合而公開的被判焚刑而死的兩個人底同時代，同一國中出現。這的確是現在正在進行的偉大變動底巨大能力底最顯著的證明，它底力量乃須在絕對相反而難能的觀察底情況中察覺出來，而勞德底朋友，牛津底一個學員乃在嚴正的神學論中寫出完全足以傾覆奴化歐洲數百年之神學原理。

在這偉大的著作裏，所有關於宗教方面的權力完全公開地被藐視。呼克爾固曾倡議將教士底裁判移爲理智的裁判；但他也曾謹慎地加以說明以爲個人的理智必須附從教會，因爲我們可以在大的教會會議裏和教會傳說底註一九偉大聲中發現出來。但契林渥斯卻不管這些事。他將不承認有這些保留的條件可以限制個人底斷力底神聖權利。他非但連勝呼克爾以至忽視早期宗教作家且竟敢輕視教會會議。註三〇雖然他著述的目的在乎解決基督教會所分裂的兩派派別底紛爭，可是他從不引那紛爭所由起的教會會議爲權威。註三一他底強有力的精密的智慧透入了每個問題底深處，而輕視那種常會擾亂人類思想的辯論。在討論舊教和新教所爭論的各點時，他不問所要討論的教義是否合乎早期教會底原義，他只問這些教義是否合乎人類底理性；而且他毫無猶疑地說：無論這些教義底真確性怎樣，如果有人覺得是不合於他底理解力的，他決沒有義務要必須相信它們。他也決不容許信仰可以代替權威，就是這一個神學家所擁護的主義也被契林渥斯壓置於人類至尊無上的理智（註三二）之下了。他說理智給我們以知識；而信仰只給我們以信條，信條僅是知識底一部分，故究不達知識也。

我們是必須用理智而不是用信仰來分辨宗教底問題；我們只有靠理智纔能分別出真與假來。最後，他嚴正地告訴讀者，在宗教事情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從不完全的假定裏定下強有力的結論，或依據簡陋的證據來保持他不確實的敘述；他說更不應希望人類用必然的信仰去相信他們不能用正確的證據（註二三）來證明的事物，因以污辱他們底理智。▽

沒有一個具有普通反省力的人會忽視了這些意見底明顯趨勢的。但是更須知道的是，在文化進程中，人類思想在達到這樣超絕的見解以前所必須經行的過程。宗教改革毀壞了教會底專斷後，當然的就減弱了對於教會傳統觀念的尊敬心。可是舊觀念底力量還是很大，使我國人很久還尊敬他們久已滅失欽仰心的東西。這就是朱埃爾雖然承認聖經底無上威權，有時反因聖經底沈靜和含糊，而急於附會以前的教會，他以為什麼困難都可以因其決定而解決。所以他只用他底理智來確定聖經和傳統觀念底差異；但當聖經和傳統觀念不相衝突的時候，他就對於傳統觀念表示現在所謂的迷信的敬服了。三十年以後呼克爾出來了；他更進一步，提出那也許會使朱埃爾退縮的主義，減少了許多那以後將要完全為契林渥斯所毀壞的事物。這三個偉大的人物即代表了他們各自所生活的三個繼續的世代的三個明顯時期。在朱埃爾，理智是——如果我可以這樣說——制度底上層機構；但權威卻是上層機構底基礎。在呼克爾，則權威不過是上層機構，理智始是基礎（註三四）但在契林渥斯——他應看作是未來怒潮底先驅——權威完全消滅，宗教全部的組織卻以人類那毫無援助的理智如何去解釋萬能的上帝底判決一點為基礎。▽

莫林渥斯這種偉大底著作卓著的成功必會助進了這個大的變動，而這本書底本身也就是變動中的一個證據。(註三五)它成爲反對國教的一個確定的擁護論；因此證明了同時代人所眼見的英國教會分裂之爲正當。它底基本原理被十七世紀中影響最大的作家如黑爾斯(Hales)、奧文(Owen)、泰羅(Taylor)、柏內特(Burnet)、提羅特松(Tillotson)、陸克(Locke)還有那謹慎和時代典型者泰姆培爾等所採用；他們都堅持着個人判斷力底權威，好像造成一種法庭而沒有人有權力可以干涉。從這樣的情形中所推想的結論便很清楚。如果真理之最後測驗是屬於個人判斷力，又如果沒有人能堅持常常矛盾的人類判斷力能永久不謬誤的話，那麼，在宗教真理上也必然地沒有確定的標準了。這是一件不幸的事，且我堅信是一個不正確的結論；但這是一個國家未完成其偉大的容納異見的工作以前的必然情狀，就是在我國和我們底時代也還未曾達到成功的地步哩！人們在開始容納異見以前必須先學習懷疑；在他們尊敬反對者(註三六)底意見以前，必須先認識自己的意見底謬誤之處。這個偉大的過程在任何國家內，離開其完成的時候尚遠；而歐洲底思想方亦赤裸地從以前的妄信及傲慢自信的信仰中浮現出來，也還仍舊在一個半途的或可說是不確定的階段中。當這個階段快要逝去的，當我們知道完全以人格和行爲估量人們而不以神學底專斷爲重時，我們纔能用純粹超絕的思想過程來組成我們宗教底意見，這種思想過程底暗示會在每個時代表現於一、二個天才思想家身上。凡研究現代文明進步者必明瞭這就是現在各種事情急速進行中的方向。在三個世紀的短期中，舊神學精神非但被迫着從它建立悠久的尊貴地位上降下來，並且要廢棄它在前進的知識前所欲恃爲屏蔽的根據。它所有最愛好的權利要求都被迫着漸漸地放棄

了。雖然在英國最近曾對於某種宗教討論給與暫時的顯著地位，但在討論中的各種情狀已表現着時代性的變遷。在一世紀前也許能引起全國狂熱的辯論，現在大部分受教育者對此都冷淡下來了。現代社會之意見複雜，及其事業之日益繁多，往往分引了思想而不容其專注於較閒階級所視為必然的重要問題。此外，科學底積量遠較前代爲多而又暗示着這樣超越的興趣，以致我們所有的偉大思想家都以其全部時間專心於此而不以僅僅空想的信仰以自相煩擾。結果，通常所認爲最重要的問題現在都被捨棄而由較庸劣的人去研究，他們摹仿那些真正偉大的聖哲——他們底著作在我們早期文學中佔着榮顯的地位——底熱心而沒有影響的力量。這些騷擾的論戰，當然以其狂烈的呼聲引起了教會底注意，可是絕未對於龐大的英國知識界遺留下絲毫的印象，而且國內絕對的大多數都顯著地反對現在試欲重建的通世與絕慾的宗教。原因是那種情形下時代已經過去了。神學底事業久已失去它底至尊無上的地位；國家底政事再也不憑教會底見解（註二七）而處置了。在英國這種進行較任何地方爲急速，故其變化非常明顯。我們在每一部門都連續着有幾個偉大的和有力的思想家，他們對於國家都有極尊榮的貢獻而得到人類底讚美。可是在一百多年中，我們在辯論的神學範圍內卻不曾產生過一種傑作。因爲一百多年中對於這個問題底冷淡既是這般明顯，以致對於這神聖事業底巨大容量上價值絕無增加，而這種事業反而每一代在思想階級中失去了它以前的興趣。（註二八）

以上這些都不過是無數迹象內的幾個例，凡不被不完全的教育底偏見所蒙蔽的人，都能看得出的。有一部分的教士——有些是由於野心底衝動，但大部分我相信是由於天良底動機——想阻止現在正當每一方築

中於我們底懷疑主義。現在已是這些居心良好——雖然是錯誤的——的人應察覺他們自己所努力的謬誤的時候了。他們所認為驚異的正是由懷疑主義達到容納異見地步的中間階段。較高的思想程序已走過這個階段而正要達到人類種族宗教史之最後的方式了。但大多數的人以及幾個普通認為受教育者現在不過正進入以懷疑主義（註二九）為思想機構底早期時代罷了。故自這種急速發展的精神激動了我們底覺悟以後，我們應用全力來鼓勵那神益及於全人類——雖對於少數人不利——的主義；因為只有它纔能將宗教底拘泥性有效地毀壞了。我們也不必驚奇，在這種事業完成以前必須先受到相當的痛苦。（註三〇）如果一個時代底信仰過強，則適足以促成另一個時代不信仰的自然反應。這實由於我們本性底缺陷所致，我們是被進步的定律迫着要經過普通人認為民族衰落及民族恥辱底懷疑主義及思想痛苦的機運；但這些不過是煉金時必須要經過的火力罷了。譬如一個擔負着重重迷信的可憐的香客是必須奮鬥的經過失望的陷阱和死亡的山谷纔能達到那個閃耀着黃金和珠寶的光榮的城，看到這城的第一瞬，已足補償他蘊積了許久的所有的辛勞和恐懼了。

在十七世紀底百年中，懷疑主義和宗教自由主義底兩重運動繼續着向前進行；雖然這種進步常常被伊利沙白以後的兩位承繼者所阻礙，這兩位嗣君在任何事件上都和那個偉大的女王底開明政策相反。他們竭盡了力量來摧殘他們所不能明瞭的時代趨向；但尚幸他們所欲滅絕的時代精神卻達到了非常的高度以致竟藐視了他們底支配。同時，英國思想更因着這種爭論——指分裂英國思想為二部分者——而加速其進行。在伊利沙白朝代時，大敵對不過是教會及其反對者，正教及異教徒之間的事；但在詹姆士和查禮士時代，神學便轉入政治

底變壞了。它不再是教條和教義底爭鬪，而是維護王冕者及主持國會者間底爭鬪了。人類底思想就這樣地專注於真正重要的事件，而輕忽了那會佔據他們先祖（註三一）底注意的較遜劣的事業。及後，當公共的事情已達到危險的時候，這君主底惡劣的命運——最後對於王室反為有利的——對於教會裏的人卻最生損害的。確，沒有疑問的，查理士之薨及其當時的情景對於教會權威全部制度實是一大打擊，至今尚未能復原。這個君主底橫死曾激動了人民底同情；因此增強了王族底勢力而促進了王室底恢復。但僅是這個漸得權力的大黨派底名稱在宗教底意義上已足暗示着人民思想底變化。英國之被自稱為獨立教派的教友（Independents）所管理不是一件輕微的事情；這些人在這種稱呼之下非但要剝奪了教士底權利，且對於教士於數世紀以來所積漸（註三二）而生的禮式和教條表示着無限的輕視。這些獨立教派底教友確還沒有常展拓他們底教義底結果（註三三）至最大程度。可是要這些教義被國家底憲法所承認卻是一樁很重要的事。此外，很重要的，就是這些清淨教徒底狂惑較迷信為尤甚。（註三四）他們對於政治底真正原理是這般開味，簡直要用刑法來處置私德，以為不道德可以藉立法（註三五）而遏止。不過雖有這種大錯誤，他們卻常常反對他們自己教士底攻擊；舊的教會制度底毀壞雖則未免過於靈速，但必曾產生了許多有益的结果。當以上這些事件所賴以成功的大黨派完全失勢以後，進步仍然向着同一方向進行。王室恢復以後，教會也雖回復了從前的舊觀，可是顯然已失了它原有的權力了。（註三六）同時，這個新君迷困了他底輕浮而不由理智之故，輕視所有的神學爭論並以其所謂哲學（註三七）的冷淡來對付宗教的問題。他底朝臣跟着他底榜樣，惟恐不能維妙維肖。其結果，凡是英國文學之最廣淺的讀者恐怕也都知道罷！包圍着這

位君主的人都不够資格來解決這些疑難的問題；他們卻想用蠻橫而不可救藥的欺誑的侮辱表現來鞏固他們底疑難堡壘。幾乎找不到例外，查理士所寵信的作家們都極盡其卑鄙的方策來藐視他們毫不了解的宗教。這種不虔敬的滑稽事件對於時代性當然不會遺留絲毫印象；不過到也值得注意，因為它們就是一般趨向中的腐敗及誇大的代表。它們是不信仰精神及反抗權威——這是十七世紀時有名的英國人底特色——中的幾個不健全的結晶。就因為這一點，遂使陸克改變了他底哲學而信一神教。也就因為這一點，使牛頓成爲索星尼派（Socinian）；追密爾頓（Milton）成爲教會底一個大敵人，這件事非但把這個詩人成爲反叛者，而且故圖認陷，硬要玷污這個不幸的人，說他是阿利阿教徒。總而言之，他們對於傳統的見解具同一的輕侮心，同樣地要堅決擯絕這些約束。最初是被培根把這種精神引入於哲學，以後給克林威爾（Cromwell）施之於政治；而同在十七世紀又給林澤斯、奧文、黑爾斯實施於神學上；用於形上學者則有霍布斯（Hobbes）、格蘭微（Glauvill）；用於政治理論者復有哈林頓（Harrington）、悉德尼（Sydney）和陸克。

現在正在擺脫古代迷信的英國知識界（註三八）其進步上更又得到自然科學之努力所表現的非常熱心的幫助。這和所有的偉大社會運動一樣，是可以很清楚地追循其進行的程序的。它一部分是時代正在繼續增長的不安信底趨勢底原因，一部分也是它底效果。知識階級底懷疑主義使他們對於無所根據的舊有的意見表示不滿意；這種不滿就產生了一種希望，要確定這些舊觀念究能用實在事物來證明或駁斥至何程度。這種精神之勃長可以在當時一個有名的文人底著作裏找到顯著的例證。當內戰隱伏，查理士王被殺的前三年，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印行了他最負時譽的著作普通一般錯誤的研究 (Inquiries into Vulgar and Common Errors) (註三九)這部淹博的作品已能預測現在研究者所探討的許多結果；但它之所以顯著就是因為它在英國是對於當時流行的自然界之迷信觀念有一個最有系統最精密的猛烈攻擊。更有趣的就是各種情形顯然表明，作者原是個博學的天才者，可是他對於一般信仰所發生的懷疑卻是受時代底壓力而然。

大約在一六三三年，當王位仍舊是一個迷信的君主佔據着；當英國底教會仍舊施展它底大權的時候；當人們仍不斷地爲宗教底意見而受刑罰的時候——同時這位布朗爵士寫他底美提契王朝的宗教 (Religio Medici) (註四〇)一書，在這本書內我們可以找到後來他所寫的各點，可是就缺少了懷疑的確的，在美提契王朝時的宗教一書內所表現的妄信必會得到當時握權的那般妄信人底同情。所有當時定爲公共教條中的偏見，布嗣沒有一點敢于以否認。他宣布他底信仰在哲學家底基石上；在鬼怪衝護的天使，和紋相之學上。他非但專斷地確定巫人底真確而且他說凡否認巫人底存在者非僅是反上帝者而且是無神論者。 (註四一)他很慎重地告訴我們，他以爲他底誕生不是由於孕生，乃是由於受過洗禮而來的；因未受洗禮以前，他還不能算是生存。 (註四二)他在這些聽覺之上更說了任何問題，愈能確定，則他愈願認爲真確；但如確不能確定時，則他必因此原故而預備去相信它。 (註四三)

以上是布朗爵士在他貢獻於世的兩本大著作的第一本中的意見。但在普通之錯誤的研究一書中，卻表現着完全不同的精神，如果沒有確實的證據，我們幾難相信是同一個人的作品。事實就是社會及思想的大革命在

這兩部著作前後所經過的十二年中已經完成了，教會底傾覆和英王底被弑不過是其中較小的事情罷了。我們從文學、私人通信及當時的公共行動中即可看到，當時最有思想的人也難逃避一般人所中的毒害的影響。無怪蒲朝一個較遜於其時代的作家，要受到他們也無能力抵抗的運動的影響了。如果他獨能不受懷疑精神的影響，那倒反為覺得可異了，因為這種精神，久被武斷地抑制，已迸裂了所有的索縛而立刻掃除一切強欲阻礙其進途的制皮了。

就是從這一點看起來，這兩部著作的比較觀是非常有趣而確又很重要的。在他後一部著作中，我們不再聽見有因不可能而信仰的事了；我們卻知道有「真理的兩大柱石，經驗與堅實的理智。」我們又被告訴，錯誤之最大原因就是固信權威 (adherence unto authority)；第二就是忽略研究 (neglect of inquiry)；而實覺可異的，第三原因乃是妄信。所有這些和舊的神學精神是不很符合的；故我們不必驚奇，蒲朝不祇暴露教士的無數謬誤，且述說一般錯誤以後，復簡約地說：「還有許多錯誤，我們把它們歸入神學範圍內，那恐怕便失去歷來爭論底立場了。」

這兩部著作的不同點，實是十七世紀中葉在實際及思想生活各方面都可覺察出來的大大的變動底。速度底絕對測量標準。培根逝世以後，波義耳當然是最顯著的英國人中的一個，與他同時代的人相較，可說祇在牛頓之下，雖然在思想創作方面他當然是遠遜於牛頓。關於他在知識上的貢獻，我們立刻不能看到；但可以說，他是對於亞和熱的關係作準確實驗的第一人；因此，他非但確定了幾個很重要的事實，並且為光學及熱學之混合研究

上下一基礎，這種混合研究雖然還未完成，但也不過只待偉大的哲學家找出一廣大的綜合性足以包括之，而將這兩種科學混合在一個系統下研究罷了。對於我們現在有的液體靜力學，波義耳之功較任何其他英人爲大。（註四四）他是那個精美的富於有價值的效果的定律底原始發現者，照那定律講起來，氣體底壓力是隨其密度而生變化。（註四五）據近代一個有名的自然學家的意見，波義耳是開始化學研究的人，直至一世紀以後，這種研究纔繼續滋長而使拉發西埃（Lavoisier）及其同時代人固定化學底真正基礎，第一次使它在自然科學中得一適當的地位。

這種發現之應用於人類享受方面，尤其是在所謂文化底物質興趣上，將在這部著作底另一部分探索之；現在所欲述說的，是這種發現如何與我所描寫的變動相融合的情形。波義耳在他全部的自然研究中，常常堅持兩個基本的原理：就是，單個實驗的重要及古代相傳（註四六）的事實的不重要。這就是研究他底方法的兩個大樞紐；這些見解是他從培根那裏接受下來的，也是最近二世紀以來對於人類知識有所貢獻的人所持的見解。先懷疑（註四七）而研究，再後繼續到發現，這幾乎是我們偉大的學者普遍所採用的方法程序。波義耳對於這一點感覺是如此地強烈，雖然他是一個卓越的宗教家，他卻稱他最普遍的科學著作爲懷疑的化學家（The Sceptical Chymist）；意思是暗示着，除非人對於當時的化學懷疑，否則不能令那橫在他們面前的事業有所進展。我們更能發覺這種懷疑觀念的名著是在一六六一年，查禮士第二接位的後一年出版的，在他底朝代中，不妄信的傳佈力雖是快得很，因為非但在知識界裏是如此，就是王室底親信及貴族中也一樣。在當時社會情形下，這種傾向雖被

認為是忤逆和退化的現象。但這種變動必不是平常的力量的一種變動，因為在這樣早的時期中已能深深侵入王宮底隱蔽處而激動了朝臣底思想；他們是一班懦弱，因為習性輕浮的原故，在普通情形之下，常易趨向迷信而信仰前人所遺與他們的智慧。

這種趨向在每種事物裏都可以看到。每種事物都顯着一種繼續增長的決心將舊的觀念附屬於新研究之下。恰當波義耳從事於他底工作的時候，查理士二世組織了那個王家學社（Royal Society），其所公佈的目的即是要以直接的實驗來增加知識。這裏值得說明的就是，第一次賜與這個有名的組織底敕書，宣布這個學社底目的就是反對超自然（註四八）底知識而廣展自然底知識。

我們很容易可以幻想到這些事情對於那些絕對讚美古代事物的人是如何地恐懼和厭惡！他們完全被崇古的觀念所佔據着，是決不會重視現在或希望未來的。這些對於人類底大阻礙在十七世紀時所演部分恰和它們在現代所演的一樣，即是棄絕各種新奇的事物而因此也反對種種的改進。兩派人中所產生的仇恨底競爭及首次對於有明顯的進步的觀念底組織——王家學社——底敵視佔據了我們歷史上最開明的部分，關於這點，我將另給以相當的敘述。現在祇須說，那反應的一派人，雖然由絕對多數的教士們所導領着，卻完全在人們意料中失敗了，因為他們底敵方幾乎佔有全國所有的知識而且更受到朝廷底幫助得以積極前進。這種進步在事實上，是這樣地急速，竟將從事於教會事業底幾個最有才能的人也同化了；他們的知識慾是這樣地強烈，遠非他們營養滋長的舊習俗所能移動。但這不過是例外的情形，普通講起來，在查理士第二朝代時，自然科學和神學精神

底數對竟令全體教士聯合以反抗科學，極力設法使去失了信用，卻是無疑的。我們對於他們之要採取這種途徑，也不必表示驚奇。他們所要制止的那研究及實驗的精神，非但對於他們底偏見方面是違抗的，並且對於他們權力方面也有損害。因為第一、研究自然科學底慣例，教人需要絕對正確的證明，這一點教士發覺在他們自己的研究部門中感覺到無法應付。第二、自然知識底增進開了思想底新園地，更局部轉移了人們對於家教問題的注意力。這兩種的結果當然祇限於少數對於科學研究發生興趣的人，但我們可以觀察到這些研究的最後效果必會概括着更大的面積。這可以說是它們底較次的影響；至於這種影響之作用是很值得我們底注意，因為明白了這一點就可以解說在迷信與知識中所常存在的顯明敵對的原因。

這是很明顯的，一個對於自然定律完全愚昧的國家必將周圍所環繞着（註四九）的自然現象歸原於超自然的因素。但當自然科學開始其工作時，立刻就發生了大的變化。每一種新的發現，確定了支配某一事件的定律後，即被除了該事件以前所包圍着（註五〇）的神祕性。好異心是比較上減低了；又當一種科學，其進步使擅長該學者能預言其所研究之事物時即可立使該事物退出超自然之權限而被置於自然力權威之下。自然哲學底職務就是以預知的眼光來解明外界的現象；每一被人承認的新的成功的預知即可使繁合幻想與玄妙渺茫的世界的一個連環分裂。因此，如果沒有其他的原因，一個國家的迷信必常和它對於自然知識底分佈量上成爲絕對的正比例。這一點有時可以人類底普通經驗來證實。如果我們拿各種階段的社會作比較，那麼，我們將發現，他們底迷信必與其所接觸之自然現象之會否以自然定律來解明一點成爲正比例。水手們底妄信已屬盡人皆知的事實，

而且每種文學裏都包含許多關於他們底迷信以及他們對於這些迷信的固執性。這一點很可以用我所說的原則而加以解明。當氣象學尙未成爲一種科學；當支配風和暴風雨的定律尙未發現的時候，當然最易遭到危險的人們是最迷信（註五二）底一種階級了。在另一方面兵士生活在較服從人底原質上，而又不像水手之難免於蔑視科學計算的那些危險。故在兵士方面，很少引誘使他們將事物歸原於超自然底干預；並且普遍地都可看得出，以一個體而言，他們確沒有水手那樣迷信。又如果我們拿農人和工匠來比較，我們將看見同一原則的運用。對於土地耕種者，其最重要的環境就是天氣，假如天氣不適宜，他們所有的計劃也就要完全失敗了。但科學還未發現雨底定律，人們現在在任何相當時期中尙不能夠預測雨底下降，故鄉中的居民祇有相信雨是超自然底作用底結果，而我們仍可以在教堂中看見祈禱晴雨的奇觀；這一種迷信在未來的時代將顯出和我們前人對於彗星和日月蝕一樣地幼稚。現在我們已經明白決定彗星和日月蝕底運動底定律；當我們能預測它們底出現時，我們就不再學前人那樣禱告了。但適因我們對於雨底現象底研究未有成功（註五三）故我們只可退而求助於神以補救由我們底情息所釀成的科學的缺陷；而我們更不覺得羞恥地在公共教堂中利用宗教的儀式如一件外衣似地將來掩飾我們應該坦白承認的愚昧。（註五三）農人就這樣將他所看見的最重要的現象歸源於超自然的作用；沒有疑問的，這就是那些迷信感覺中的一個原因，鄉村居民就因這點不幸與城市居民不同了。但工匠——確可說是每一個從事於城市職業者——底職業，其成功完全受其自己的能力來支配，而與混亂耕種者底幻想底不可解釋的事件沒有連繫。他用他底機智把原料製造物品顯然比較原料所由出的人少受到不能統制的事件底影響。

無論晴雨，他底工作得到同樣的成功，而習知完全去倚賴他自己底能力和他自己手臂底技巧。水手所應付的是較不固定的成分，故自然地較兵士爲迷信；同樣地，農人較工匠爲迷信，因爲他時常並嚴烈地受到愚昧使有些人們認爲無常及有些人們認爲超自然的事情底影響。

如將以上這些說明申述下來，很容易表明工業底進步在增加國家財富以外曾因激發人們對於他們自己的才能的信心（註五四）對於文化盡了極大的義務；並因產生了新的職業種類，轉移了常易引起迷信的景物。現在因限於篇幅不能將這一點再加探討；可是以上的例證已足表明神學精神之必須因愛好實驗科學之慾望而減低了，這種實驗科學是查理士二世時（註五五）之主要特點之一。

現在我已將所得的見解，即我們應該重新用一種眼光來看那個被誤解底時期底眞性質底見解，公布於讀者之前。那些不以知識進展來評判事件——它們不過是知識進展中的一部分——的政治作家將在查理士二世一代中找到許多絕無可取而只可咒罵的事情。他們必將譴責，我已超越了歷史所限的狹隘範圍。但除了採取據途徑以外，我真不知怎樣能明瞭這表面充滿了可恥的矛盾的一個時期。如果我們將查理士二世底政治性質和在這種政治下所和平獲得的偉大事業作一比較，這種困難將更爲明顯。在因果上講起來，從來沒有像這樣的缺少明顯的關聯，假如我們只看到統治者底個人及其對外的政策，我們必以爲查理士二世底一代是英國史中最黯淡的時期。在另一方面，假如我們把觀察僅限於當代所通過的法律和所建立的原理，我們將必須承認這個時代實是我國年史中最光榮的一個時代。在政治及道德上講起來，這個政府中實蘊藏着所有的混亂，軟弱及罪惡。

的成分。查理士底本身就是一個卑鄙而無精神的酒色之徒，缺乏了一個基督徒的德行，且幾乎沒有人底情感。他底大臣除了克拉林敦（Clarendon）——他底品行是他所深惡者——以外，沒有一個具有一種政治家底德行的，且幾乎都私受法國國王底津貼。稅的擔負是增加了，而王國底安全只有日見動搖。城鎮底憲章被追取消，使我們底地方權利受到威脅。封鎖國庫使我們國家底信用也毀壞了。（註五〇）雖然化費了大宗的款項來維持我們陸海軍底力量，我們仍舊覺得毫無抵抗的能力，一旦戰事——久已預伏着的——爆發，我們似乎立刻覺得驚奇。這就是當時政府底可憐的情形，荷蘭底海軍非但能環繞着我們沿海岸線慶祝勝利，且竟直駛泰晤士河上，攻擊我們底兵工廠，焚燒我們底船隻，並侮辱英國底都會。（註五七）但是在查理士二世這個朝代中，所採取的正當的步驟比較自我們佔據不列顛土地後的十二世紀中的任何一同等的時期來得多，卻是一件可無疑義的事實。英王於無意識中所維持的這種知識運動底力量在數年中產生了許多改革，改換了社會（註五八）底外觀。這個國家一向所遇到的兩個大阻礙，就是精神和土地底兩種壓制；亦即教會底專制和貴族底專制。當時擬設法來補救這種害處；並非用減輕的方法，卻是用直接攻擊作惡的那些階級底權力底方法。有一種法律通過了取消使主教及其代表者能特以焚斃不同宗教的人底著名的敕令。教士被剝奪了自行徵稅的特權，被迫着服從普通立法所定的課稅額。又有一種法律通過禁止任何主教或教會法庭採用發誓的形式，以免教會得有權力強迫一個可疑的人自認其罪惡。至關於貴族，在查理士二世時，上議院經過一次激烈鬭爭後，不得不放棄其對於民事訴訟方面所要求的司法權；因此永久損失了伸展他們自己勢力底重要原素。（註五九）就是在這一朝代中，人民完全按代表而賦

稅的權利纔規定了下議院從此就有全權議決預算及支配稅捐；只待貴族院底通過罷了。這些就是用以鉗制教士及貴族底權力底嘗試。但同時還產生了其他同樣重要的事情。自毀壞了那可惡的供給糧食及先買權底特權後，便限制了王室煩擾其頑強的人民底權力。「出庭狀法令」(Habeas corpus act)通過了後，凡英國人民底自由有如法律上所訂的一樣的確實；如果他被告犯罪，法律擔保他不致於被繫於獄中——當時的常情是這樣的——而乃是受一公平而迅速的審判。通過了欺騙及誣誓之罪的條例後，私有財產從此得到了向所未聞的安全了。消除了普通的詰責後，使專制底無限的機能停止了作用，這種專制底機能是有權力和不法的人常用以傾覆他底政治(註六〇)仇敵的。限制出版自由的那些法律廢止了以後，卻爲那大的「公報」(public press)立下了根基，這較任何因素爲重的「公報」在人民中傳佈着他們自己權能中的知識，而因此在幾不可置信的範圍內幫助着英國文化底進步。(註六一)最後還毀壞了我們底諾曼征服者所建樹的那些封建附屬的制度——如「軍役之土地保有權」(military tenures)、「警護的法庭」(court of wards)、「割讓的罰錢」(fines for alienation)、「爲軍役而藉沒婚姻權」(the right of forfeiture for marriage by reason of tenure)……以及其他許多有害的詭譎的事情，它們底名稱在近代人聽起來不過徒覺得其爲粗野的胡說，而在當時的人卻視爲真正嚴重的禍害。(註六二)

這些就是查理十二世在位時所做的事，如果我們想到他底懦弱無能，朝臣底惰逸放縱，大臣底寡廉鮮恥，以及一切內憂外患；如果我們想到除此以外，還有兩種最可慘的天災——一種是滅弱社會各種階級底人民及羣

難其紛擾於王國各處的大瘟疫；一種是增加疫癘後的死亡率，瞬息毀壞了那些工業本身特以興盛的工業建設的大水災——如果我們將這些事情放在一起，那怎樣能把這樣明顯的矛盾點互相融合呢？在這樣巨大的災禍之下，怎樣能蔚成這樣驚人的進步呢？在這種環境之下，這樣的人，如何能達到這樣的改進呢？這些是我們底政治方面的編纂者所不能解答的問題；因為他們過於注意個人的特點而忽略了個人生活着的那時代底時代性。這樣的作家並沒有觀察到，凡文明國家底歷史即是它底知識進展史；國君，當政者以至立法者大都是阻礙這種進展的；因為無論其權力如何大，至多不過是當時時代精神底附屬的及無能為的代表；因為他們非但不能支配國人民思想底運動，而且他們自己本身反是運動中的一部分，而在人類進歩底眼光中看起來，他們就像是在小戲臺上趾高氣揚，大打大擂的傀儡一樣；可是在他們之外，環繞他們的左右而為其所不能明瞭的各種意見和原理都蜂湧起來，成爲人類一切事件整個途徑的最後支配的力量。

事實上，在查理士二世時代時，這樣明顯的立法大改革不過是那運動中的一部分罷了，這個運動雖然可以追溯到較早的一個時期，但其明顯的作用卻只有三個世紀。這些重要的改進是現在包圍我們底神學、科學及政治三大部門的那大膽懷疑、探究及改革底精神底結果。關於習俗、權威及專斷的那些舊原理已漸漸減弱其影響力；當時主持這種原理的那階級底勢力也因而退消了。當社會上特殊階級底人底權力衰落以後，一般人民底權力當然增大了。向來掩沒了國家事業的迷信一旦消滅，則國家底真事業可以觀察出來。我相信這就是我們底問題——這就是說像這樣的改革怎能在這般不良及從多方面看來皆認爲腐化的朝代中產生——底真正的解

決。這些改革當然全是那時代底知識進步底結果，國君底惡德非但不能障礙改革底成功，抑且確實助進了它們底進展。除了那些擁塞於朝廷上的貧而無恥的人之外，舉國之士莫不輕視這一個嗜酒、縱淫、偽善、無恥、寡情在這德上，不足與最鄙賤的人民並肩的獨夫——國君。以這樣一個人而能攘竊大位至二十五年之久，那得不令那常因其忠君之切而犧牲個人私益的元元之民減弱了對於他的忠愛之心。從這一點看來，因他底人格之墮落，正足以反應了民族自由思想（註六三）底發長。可是利益還不止此。查理士因其個人行為之極端放縱，對於一切牽掣的事情轉生憎恨；因此他不喜因着職業上的關係而行為較為檢點的那一階級。結果非因政策之開明而因他個人之任性放縱之故常常厭惡教士；非但不增加他們底權力，反時常公開地表示輕視（註六四）。他底最親信的幸臣用着粗陋而放任的嘲謔語來取笑他們，而這種諧謔還佔據了當時文學底一個位置，而且在他底幸臣底眼光中看來，這還可以列為人類智巧之最高標準。他們底話固不足代表教會；但那樣的文字及當時所受到的歡迎確是一個部分的徵象可供我們研究當時底時代性。大多數的讀者也許還可以看到許多例證；但我只須舉一個例，這個例與一個卓著的哲學家有關，故更覺有趣。在十七世紀時，教士們最危險的一個對數當然是霍布斯，當時底一個精敏的論理學家，也是一個簡潔的作家，在不列顛形上學者中地位僅遜於柏克利而已。這個深奧的思想家發表了幾種很不利於教會的理論而且直接反對教會權威中的重要原理。當然他便給教士們所痛恨；他底主義被宣布為最有害的言論；他被認為有意傾覆國家宗教及敗壞民族道德的人。在他生前及死後數年中凡信仰這種言論者皆被人辱稱為「霍布斯底朋黨」。這個教士方面底明顯的仇敵卻反受查理士底歡迎。他在登極以前已學

習了霍布斯底許多原理；在復辟以後，他對於這個著作家表示了所謂誣醜的尊敬。他維護他；他好像故示榮寵然把他底像片挂在「白殿」中的私室裏；他並且對這反對教會改制的一個極利害而未之前聞的人給以恩俸。

如果我們再對於查理士所委派的教會人員一點上略事考查，那麼，更會找到同樣的證據。在他朝代時，教會最高地位時常給予一般無能力或不忠實的人們去充任。若說查理士有意借此來降低主教監督地位底聲價，卻似乎有些過分；但這是確實的，如果他確採取這一步驟，那麼，他必按着這個途徑以完成他底目的。我們說得並沒有過分，在他一生中，英國底主要教長一概都是無能或不忠實；他們不能對其信仰加以維護，或者就算他們自己所公開宣揚的主義也並無確切的信心。英國國教事業底保護力之脆弱於斯為極，抑亦前所未聞者也。查理士所擢派的第一個康忒培利（Canterbury）底大主教就是查克松（Turon），他底缺點已為衆目之所彰見；且其為人就是他底友輩也都認為他底才具之不逮只有拿他底良心底忠實來補償了。（註六五）他死以後，查理士委前任倫敦主教的舍爾頓（Sheldon）繼續他底位置；他非但因他底極端的不納異見失卻一般人底信用，並且他非常地不顧他底地位尊嚴，常常在他自己的屋裏佈置着仿倣長老會教友底講道儀式來娛樂他底同伴。舍爾頓死後，查理士派桑克羅夫特（Sanvoft）繼主教的後任；他底迷信底幻像暴露了人們對於他不勝任的輕視，以故，他之被人輕視恰如舍爾頓之被人痛恨初無二致。而以下的教會諸人也是在同樣的腐化情形之下。約克地方底三個大主教在查理士二世朝代時是佛魯溫（Frewen）、斯騰（Stearn）和陶賓（Dolben）；他們既是那般無能的人，以至雖然擁了高位，卻完全給人們忘記了，千個讀者中幾乎沒有一個聽到他們底名字的。

委派這樣的人去做大主教的確非常可異；尤其是因為這樣的委派是不需要的；當時既沒有朝廷中的陰謀，強迫着查理士去任用他們，更不是沒有適當的人選。其原因似乎是查理士不願將教會底重要地位賜給任何其能力足以增加教會權力恢復教會以前的卓越的優勢的人。在他登位時，兩個最有能力的教士當然是泰羅和巴羅士 (Isaac Barrows)。兩個人都是以忠誠著稱的；他們都是純潔無瑕的人，其所遺留的令譽在英國言語一日未發遺忘，即一日永不會消滅。但泰羅雖然和王妹結了婚，卻受到意外的苛待；自被放逐至愛爾蘭底一個主教轄境以後，即度其後半生於當時視為野蠻的區域中。(註六六)至於巴羅士在天才方面恐怕較優於泰羅。(註六七)也只有駭視着最無能的人在教會中得到最高的任務，而他自己反不為人所注意；非但他底家庭因王室之故而受到極大的痛苦，他自己也沒有得到任何的升遷，直至他逝世之前五年纔由國王賜他主持劍橋特林尼提學院 (Trinity College) 底職務。

現在更無須再說明如何這些事實必致令教會底權力減削而促進了查理士二世時代很明顯的那個偉大運動了。(註六八)同時，還有許多其他情形與普通的反抗性具同樣的反抗古代所遺傳的威權的力量者在這個發凡的大綱裏也無法加以述說。這須有待於次册底研究了。因為那時可以有較長的篇幅將所有的證據提出討論，這般長的討論在現在這本引論中是無論如何不足以包括的。以上所說已足表明英國思想底進行而使讀者得到一個線索以明瞭自十七世紀以來所叢集於我們的一切較複雜的事件了。

查理士二世逝世前數年，教士曾努力重新提倡那些忍耐服從及神聖權力的教義來恢復他們向日的力量。

這些教義當然是很有利於迷信之滋長。但當英國底知識正蓬勃蔚興而足以抗拒這種專斷的主義時，這種無效的嘗試反足以增加人民團體利益及教士階級利益間底敵視而已。他們這種尚未全告失敗，忽值查理士薨逝，而嗣君卻是一個最願恢復舊教會要重新設立那公開壓服人類理性的有害制度的一個君王。這種變化若就其最後的結果而言，可說是我國最僥倖的一件事。英國底教士雖然和詹姆士（James）宗教信仰各異，卻常對他表示敬仰，而同時詹姆士對於教士們的敬視也是他們所最引為快慰的；當時他們很焦急地願意他底愛護熱誠應對英國教會而發，不應浪費在羅馬教會身上。他們也感覺到如果他底虔誠能轉移到新的途徑，查六九那麼，對於他們底聖職必能加增許多利益。他們也深曉他必須為他底利益關係能廢棄他底宗教信仰；他們也想到這樣暴虐而卑劣的人是最為自己的利益着想的。（註七〇）結果在他一生最關緊要的時候，教士們為他盡了極賣力而極順利的義務；他們非但用全力以推翻那個拒絕他繼位的議案，且當那議案被否決以後他們竟上呈查理士慶賀這個結果。當詹姆士真正登位以後，他們仍舊示好於他。是否因他們仍舊希望他大澈大悟，或因急於壓迫違反國教者，因而忽略了對於他們教會本身底危機也難確定；不過歷史上的事實顯然，就是新教執政者和一個羅馬教（註七一）底君主曾有一時保持着密切的契合。這種契合所形成的可怕的罪惡是太顯著了。但尤值得注意的，是分解王與教會間的黨合底情勢。其爭執點即王擬對於宗教實行相當的自由。以前的著名的試用法及法人法（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會規定凡受政府任用的人皆須被迫按英國教會底儀式接受聖典，否則應受重罰。詹姆士底屬犯過失就是他所發出我們現在所謂的教罪宣言（De Claration of Indulgence）在表面上他

宣布他要停止以上那些法律底執行。(註七二)從這時候起，這兩大黨派底地位是完全變換了。這些主教很清楚地看到他所欲廢除的法律正是對於他們自己底權力最有利的；因此，依他們底意見來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憲法中之最重要的部分。當詹姆士幫忙他們壓迫用不同方式(註七三)來崇拜上帝的異教徒時，他們會很願意地和他合作。這種契合能維持下去，於是他們對於他們認為不重要的事件，遂不加以注意。當王積極預備希望將自由的政府變為一個極端專制的王國的時候，他們靜默着觀望。(註七四)他們看見哲夫利斯 (Jofers) 和刻爾克 (Kilke) 酷待他們底同胞，他們看見牢獄裏擠滿了囚犯，斷頭臺上流滿了血。他們覺得非常快樂當王國中最高貴、最有才能的人們很野蠻地被慘殺；(巴克斯忒) (Baxter) 應該關在牢獄裏，何伊 (Howe) 應該遭放逐。他們很安然地看着那些不堪入目的暴虐殘殺，因為被犧牲者都是英國教會底反對者。雖然人們底思想都充滿了恐懼和憎惡，主教們卻毫無怨言。他們積極保持他們底忠心於不替，並堅持對上帝有謙卑屈服的必需。(註七五)但當詹姆士建議反對對於教會的仇敵施行壓迫時；又當他宣布要破壞主教久為己黨把持的那職位及榮譽的專權時；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宗敎執政者立刻感到這個國家受到這樣專制的一個君主底強暴的危險。他竟干預了諾亞避難之舟，廟宇底保護者都攘臂而起了。他們怎樣能饒恕這個不許他們刑罰他們底敵人的君王呢？他們怎樣能擁護一個寵幸違反國教者的君王呢？他們立刻決定應行採取的行動。且幾乎一致地拒絕服從命令他們在教堂中宣讀的那宗敎寬赦(註七六)的諭旨。其行動還不止此。他們竟至求助於一般反對國敎最激烈的人，而在幾星期以前，他們還很嚴厲地壓迫他們呢；現在卻用甘言來拉攏他們會欲置之死地(註七七)的異教者。最明達的違反國

教者當然遠非此等意外的親暱所可欺惑。但他們對於羅馬教的深恨，對於王室以後的政策之恐懼，超過了其他一切的顧慮；因此就產生了從未再現的國教教士和違反國教者底單獨的聯合。這個聯合受民意底擁護立即傾覆了王座而因此產生了英國史中一樁重要的史實。

這次犧牲了詹姆士王冠的大革命，其近因是因為他下了宗教自由的諛旨及教士對於一個基督教君皇下這樣謬妄的法令的憤怒。當然若無其他原因，單是這件事決不足以釀成這樣大的變動。不過這件事無疑地是一個直接的原因，因為它是王和英國教會的分離，及英國教會和違反國教者的連盟的原因。這是一個永不能忘記的事實。我們從難忘卻英國教會第一次，且祇此一次，和英王交惡的時候，亦即當王宣布他宗教自由的意志而對於國教以外（註七八）的宗教稍示保護的時候。當時所發出的敕罪宣言自屬不合法，且被人視為含有一種陰詐的用意。不過在昔同樣不合法、同樣陰詐，或尤為專制的宣言固曾由英王發出而未嘗激怒教士。（註七九）這些事情都值得我們參證思考的。這些對於得有機會稍能轉移——當然稱不起是指導——公共意見的進行的人是極有價值的教訓。至於一般人民，他們是不能過於誇張一六八八年的革命對於他們和我們大眾的恩澤的。但是讓他們注意，他們底感謝並沒有摻入迷信的成分。讓他們讚美民族自由的莊嚴的大廈，它屹立在歐洲好像水中的燈塔一樣；但不要讓他們以為他們應感謝那些因要實現自己的私利及期求那久欲達到的宗教權力之團結而促成這次革命的人。

斯圖亞特家（House of Stuart）之放逐所給予英國文化之充分的動力此際恐難觀察出來。在其最直捷

的結果中，我們可以論述的是王族特權的限制；宗教自由所採的重要步驟（註八〇）司法行政上的明顯而永久的改遣；出版檢查之最後廢除；及未曾引人注意的那些重大的金融事業的迅速的發長，這些金融事業我們此後可以看到會極度減削了（註八一）迷信階級底偏見。這些就是威廉三世（William III）朝代時底主要特色；這是個常常被醜聞而不引人注意（註八二）的朝代，但如果對於當時的困難點細加考量，我們確實可以說它是任何國歷史所載的朝代中之最成功最偉大的一個朝代。但這些題材倒應於次冊中討論；我們現在祇須循索關於這次革命對於教會權力所發生的影響罷了。

教士們剛驅逐了詹姆士，他們底大多數人中對於他們這次的行動即有悔意的確的，即在他被逐以前，已有許多事件令他們懷疑他們所採取的政策了。在事變前之數星期他允諾繼位之際，還對於英國教會政體表示預釋的尊敬。約克地方底大主教職位會空虛着很久，一般人以為王或想位置上一個舊教徒或者竟想奪取稅收。不料詹姆士現在竟起用了藍潑勒夫（Lampugh），一個出名的忠實教士和教會權益的熱心保護者，來充斯職令教士們非常的歡樂。剛在這件事以前，他又會取消倫敦主教停止行使職權的命令。對於一般主教們他曾允諾他們許多未來的好處；據說有幾個竟被請參加他底密議；同時，他還取消那限制教士權力，因而激怒教士們底教會律令。除此以外，還有其他的情勢令他們焦慮的。當時謠傳，又一般人相信威廉不是教會事業底一個大的讚美者；他既是個傾向於宗教自由的人，與其說他會增加英國教會底政權（註八三）不如說祇有傾向於減少。又大家知道他為個祖新教徒的，這些新教徒是英國教會很有理由地認為是它最激烈的敵人（註八四）且當威廉僅因策略的

關係，取消了蘇格蘭主教統治權的時候，就顯然他是要棄絕神聖權利主義而預備給英國教會權威（註八五）所根據的那些意見一個大的攻擊了。

當這些事情擾惑了一般人思想的時候，人們的目光自然地轉向於那班主教。他們雖然已失了從前的權力，但仍舊還被大部分人民敬視爲國家宗教底保護者。但在這個重要的關頭上，他們是這樣地給野心和偏見所蔽，他們竟採取了一種最足以損害名譽的途徑。他們忽然取消了他們自己是主動的那個政治運動。他們這時候的行爲恰可證實以上所述的他們底動機。如果他們是被解脫國家專制政體的願望所感移而助成革命，那麼，他們必將很熱誠地歡迎這個偉大的人，他降臨會使那個暴君震懾而出走的。如果他們愛國家甚於愛教團的話，他們必會這樣辦，但是他們恰走了相反的路；因爲他們視他們一個階級底些微的幸福，其重要甚於人民底整個團體，他們寧願國家受到壓迫而不願教會屈服下來。祇幾星期以前，當他們在教堂中宣讀宗教自由底諭旨時，差不多全體的主教和教士一致以堅毅的精神來反抗他們底君主，而且有七個地位最具勢力的主教也因同樣的原故，願意冒險受國家法庭底公開審判。他們曾宣示其採取這種勇敢的途徑，並非因爲他們不贊同自由，而是爲着他們深恨專制。但當威廉來到英國，詹姆士像賊一樣地夜遁而去國的時候，同是這一班從事教會職業的人卻極力反對這個不經戰陣僅得其降臨已足將英國從奴隸制度的恐嚇中拯救出來的偉大的人物。我們將不容易在近代史中找到這樣矛盾的一個例，或者，讓我們說，這樣自私自利不顧危險的野心。這種改轍易轍的事這般公然演出來而不可掩飾，其目的又是這樣的明顯，於是他們底醜惡完全暴露於全國。他們朝秦暮楚，不過是數星期之

內的事。第一個背信的就是康忒培利大主教，他曾因急於保留他職位，允諾迎候威廉。但當他看見情形不對，就取消他底諾言而不承認一個對於神聖教團表示冷淡的君王。他在盛怒之下竟嚴斥爲威廉和瑪利（Mary）作惡的他底牧師，雖然威廉和瑪利曾得到全國底同意，而王冠也是由全國議會所通過的莊嚴正大的決議奉送給他們的。（註八六）當全國最高之主教這般地行動而他同僚在他們命運受到同樣危機的時候，也免不了走同樣的途徑。當時非但康忒培利大主教拒絕舉行忠順的誓禮，就是巴斯（Bath）和韋爾斯（Wells）主教，徹斯忒（Ches-ter）主教，契徹斯德（Chichester）主教，伊里（Ely）主教，格羅斯忒（Gloucester）主教，諾利治（Notwich）主教，彼得堡（Peterborough）主教，和武斯忒（Worcester）主教皆如此。至關於較低級的教士底表示，我們底史料還不正確；但據說約有六百個教士都效法他們底上級教士不承認他們國家所選舉的國君。（註八七）這個擾亂黨派中的其他分子不願用這樣激烈的手段，深恐因此喪失了威廉也許爲他們保留的生計。他們於是採取了較平穩而尤爲不光榮的反對方法，用了這種方法他們能困迫政府而不致於損害他們自己，又能得到信奉正教的名譽而不致引起殉道的痛苦。

所有這些事情對於整個國家的調整上所產生的影響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問題現在已縮小成爲各個平常人都立刻能明瞭的爭論了。在一方面有絕對多數的教士（註八八）在另一方面，有英國所有的知識和她所有的最可貴的事業。兩方底對立這樣地利害而不致於引起內戰實可表明人民繼續增長的知識已經減少了教會職權底威權。且這種對敵非但是無謂的，並且對於引起這種對敵的那階級反爲有害。（註八九）因爲現在可以看到，教

士祇有在人民敬視他們的時，他們方關切人民。這些不顧國家利害的憤怒（註九〇）的人底暴動很清楚地證明他們以前傾全力以攻擊詹姆士的熱烈純係出於自私自利。他們繼續希望詹姆士回國，用陰謀聯絡他，有時竟和他通訊。雖然他們很明白他底復出將會引起內戰而且他這樣地被人普遍地懷恨，當然不敢露面於英國，除非受到國外或具敵對力量（註九二）的軍隊底保護。

但在這焦急的時候，教會為其自身所引起的危害尚不止此。當這班主教拒絕對於這新政府舉行誓禮的時候，他們都被免職；而且威廉並不遲疑地用法律的權力驅逐了康忒培利底大主教和他五個同僚。這些主教在受辱傷感之餘，籌辦非常活動的方策。他們大聲疾呼久已日漸削落的教會權力現在已臻絕境了（註九三）他們否認立法有權通過反對他們底法律。他們否認王室有權將那個法律施諸實行（註九三）他們非但繼續自稱為主教，並設法延續他們底暴動所產生的宗教分裂。康忒培利大主教，當他堅持着這樣稱呼的時候，將他幻想的權利正式拋棄，而賜於勞合（Lloyd），勞合那時雖被威廉驅逐解職，還仍舊以為他自己是諾利治底主教。這些教士底擾亂的計劃那時通知了詹姆士，他很願意擁護他們在英國教會中建立一永久的采邑的計劃。這些反叛主教和這詹姆士底合謀的結果就是派出許多人自行組織一個真的教會轄境，並且受每個贊成教權高於政權的人尊敬。（註九四）這種滑稽的主教底幻想繼位繼續了一百多年；因欲分離教士對於政府的誠服心，反而因此減小了教會底權力。（註九五）有時竟發生兩個主教同時被派於一個地方的奇觀；一個是由宗教權力所派，另一個乃是政治權力所派的。認教會高於政府的人當然依附於這些僞的主教；同時威廉所委派的卻為視現實利益重於教會理論

的那個迅速擴大的黨派所承認。(註九六)

以上就是在十七世紀末期擴大國家利益及宗教利益(註九七)之間久存着的裂痕的幾件事情。還有其他的情勢也相當地增大了這種離異。許多英國的教士，雖然留戀着詹姆士，卻還不願激怒政府，或冒險失了他們生計。爲避免這種結果及調和其良心和利益計，他們把擁有權力的王和己所隸屬的王(註九八)作一個假設的分別來自慰。結果，他們口上是對與威廉立忠誠的誓言，心裏則對詹姆士表示尊敬；當他們在教堂中爲一個王禱告，不得不又在他們底私室中(註九九)爲另一個王禱告，這種可鄙的遁辭使大部分的教士立刻成爲隱匿的叛徒；據一個同時代的主教說，這些人所犯的詭辭的罪更助成了懷疑主義，他對於這主義的進行是非常感覺痛傷的。(註一〇〇)

當十八世紀前進的時候，偉大的自由運動也迅速地進行着。從前教會最主要的權力之源就是教士會議；在會議中，教士以一團體的關係，能够很用顯赫的態度反對任何對於教會不利的事件；並且還有機會——他們有意地利用着——計劃有利於教權(註一〇一)的方策。但在時代的進步中，他們這一種的武器也被拿走了。革命後數年教士會議普遍地被人輕視；(註一〇二)一七一七年英王下令停止這個著名的會議，很確當地認爲國家無須再用着它。(註一〇三)自從這時候起，英國教會底這個大會議從未因考慮其本身事件而得招集之允許，祇有前幾年，在一個微弱政府默許之下，纔許從新招集。可是當時國風底變遷是這樣地明顯，這個原很可畏的團體卻也不備再實它從前的一線勢力；它底議決再也不令人恐懼，它底討論再也不引人研究；國家底事業繼續不顧數世紀

諸政治家認為非常重要的那些事業而進行着。(註一〇四)

的確的，革命以後，最廣淺的觀察者都很明白時勢底趨向。國中才能之士再也不羣集於教會中，大家都喜歡能力容易得到報酬的實在的事業。同時，這個大運動的一個自然的結果就是教士看到他們所常佔有的權力及有薪俸的職位都漸漸從他們手中喪失了。非但在黑暗時代，即近在十五世紀時，他們仍舊霸佔着全國。(註一〇五) 最榮尊及最優的職位。在十六世紀時，反對他們的潮流急轉直下以致自十七世紀以來沒有一個教會中人能上購首相之位。(註一〇六) 並且自十八世紀以來，沒有一個會接受到任何外交上的委任，或主持國家的任何重要職務。(註一〇七) 非但在政府的行政方面有這種傾向。反過來我們在國會之上下議院也發現同樣的趨勢。在我們歷史中的早期和野蠻時代，上議院底半數是貴族；其餘半數則屬於宗教方面的人物。(註一〇八) 在十八世紀開始時，宗教方面人物非但不能在上議院維持半數，反減削為八分之一；到十九世紀中葉則竟降為十四分之一了。(註一〇九) 這就是教會權力減少——現代文化所必需的——的一個顯著的例。同樣的，教士們已有五十餘年不能得到為人民作代表的職位了；下議院在一八〇一年就正式取消了教士參與民政的職位，在從前就是最高傲、最享有獨權的會議也認許教士參與政事的。在上議院裏，主教仍舊保留着他們底位置；但是他們權力不穩固到處顯現着，人民思想進步常常暗示着不久貴族也會效法下議院使立法規定取消上議院的宗教分子；因為他們底習慣、特性和習俗都顯然不適合於應付政治生活(註一一〇)中的危急事件。

當迷信的機構因其內部的衰壞而動搖，曾喧嘩一時的教會權威不得不讓知識底進步佔先的時候，忽然

生一樁事情。這種事情雖然是意料之中的事，但也不免令當時對於這事含有興趣的人感覺驚奇。我所指的當然就是很適宜的繼政治革命而來的宗教革命。因詹姆士被逐而得到勢力的遠反國會者從未忘記英國教會在執權時對於他們常常所施行的殘暴刑罰；他們覺得他們應該鞏固他們前線的時候已經到了。（註一一）且在那時他們還得到新的挑撥的機會。我們偉大的王威廉三世薨逝後，嗣君乃是一個愚闇的女子，她對於教士的敬愛在較迷信的時代或許會使她做出危險的結果來。（註一二）就是在當代也已經發生了一時的反應了，她在朝時對於教會的順從真是威廉所不屑為的。新的壓迫方法計劃出來，新法律通過了來反抗不從英國教會（註一三）底教義和訓練的新教徒。但安娜（Anne）逝世以後，遠反國教者立刻重振了，他們希望死灰復燃。（註一四）人數增加，且不顧教士底反對重新恢復不利於他們的法律。（註一五）當他們這樣地佔優勢，而又對於最近所受的創傷餘痛未已的時候，當然兩黨底大鬭爭是不可避免的。（註一六）因為那時英國教士底積極的專制完全毀壞了人們對他們的尊敬情感，這種尊敬的情感即在仇敵之中也還常留連着的；如果這種情感還存在的話，這次的鬭爭恐怕不會發生。但這種自制的動機現在已被人輕視了；這些遠反國教者被不斷的壓迫（註一七）所激怒已決定棄教會權力衰敗之際利用他們底機會。在教會強固的時候，他們會抵抗它；現在在它式微的時候，當然不見得會繞過它。一個大的宗教體系在十八世紀時的兩個著名的人——一個是第一流的神學辯論家（註一八）惠特菲爾德（Whitefield），另一個是第一流的神學政治家（註一九）韋斯利（Wesley）——名下組織了起來。它對於英國教會的關係，就好像英國教會對於羅馬底教會的關係一樣。這就是隔二百年後在我國所發生的第二次宗

教改革。十八世紀時的威士萊信徒對於主教好像十六世紀時的宗教改革者之對於羅馬教皇。(註二二〇)當然英國教會底違反者沒有羅馬教會這反者底卓越，他們立刻失了他們從前的知識力量。自從他們偉大的領袖逝世以後，他們沒有產生過一個創造的天才者；自克拉克 (Adam Clark) 以後，他們中也沒有一個名聞全歐的學者。這種思想底窮乏恐怕不是由於他們底教派底特殊情况使然，而基於宗教精神衰落的原故。這種精神之衰落，使他們和其敵派都減少了吸引的力量。(註二二一)雖然如此，他們對於英國教會所予的損害卻遠非人們所能設想。我且以為和十六世紀之新教徒對於羅馬之教義及習俗所施的損害不相上下。英國教會教友減少之確實的數目今姑不計。(註二二二)就是新教徒黨派能不受政府反對而成立這一點已是對於英國教會有害的一個先例；我仍從當時的歷史中已知道有許多贊成新教黨。(註二二三)之成立者都是這樣想的。此外，韋斯利教徒底組織是這樣地優越於他們底先進清教徒，故他們立刻變成英國教會底敵派所賴以為重振的中心。其尤主要者是他们辦事步驟的有秩序、有準則，和公開使他們和別的教派分別出來；同時興起而為敵對教派底一個堅固的組織，勞力減少人們對於英國國教團所釀成的迷信而獨享的尊敬。(註二二四)

這些事情雖然很有趣也不過是那大的進程中的單個階段，宗教權力因以減削，國人因以獲得宗教自由——雖然不完全，卻較任何民族為優越——罷了。在這大變動的無數表徵中，有兩點是特殊重要的。其一就是神學先和道德學分離，其次是和政治學底分離。它和道德學底分離是發生於十七世紀底末期，和政治學底分離則表現在十八世紀之中葉。這兩種大的改變都開始於教士中人，這就是舊教會精神衰落地一個絕好的例證。彼特

錫地方主教卡姆柏蘭德 (Cumberland) 即是第一個嘗試要不假助神學而建立一道德學體系的人。(註一三二) 格羅斯忒地方主教窩柏吞 (Warburton) 是第一個人以為政府必須為應急需的目的而重視宗教，而不應因其為神底啓示遂加以着重；政府之偏袒於某一種教義亦不應因視其較為真實而定，卻應完全以其普遍的效用為目標。(註一三六) 這些並不是以後的研究者所不能施諸實行的空泛原理。卡姆柏蘭德思想被休謨所發揚光大，(註一三七) 以後立即為培利 (Paley) 施於實際行為。(註一三八) 為邊沁和密爾應用於法理學。(註一三九) 同時窩柏吞底思想傳佈得尤為迅速，曾影響於我們底立法政策，這非但為進步的思想家所承認，就算是普通人——如果他們生活在五十年前，對於這些意見一定會驚駭卻步的——也這般想。(註一三〇)

在英國，神學就是這樣最後和倫理學及政治學兩大部門分離了。可是因為這種重要的變化，起初不甚實際而完全屬於知識的性質的，故在許多年中其作用只限於少數人，尙未能產生我們所能預料的完全結果。但還有許多為任何深通的人都知道的趨向於同一方向底其他環境產生了更直接——雖然缺乏永久性——的影響。這些我將在本書他冊中詳為討論，並揭出彼此間的連繫性：現在我只能指出其主要的大綱。其中最卓著的是惠斯吞、克拉克和華德蘭 (Waterland) 所激起的「大雅利安族 (Great Arian) 之討論」之分佈懷疑於各階級間；關於教會訓練方面能道人所未道的「班哥討論」 (Bangoin controversy) 之使教會底權力受到威脅；(註一三一) 布拉克本 (Blackburne) 關於懺悔室底偉大著作之幾形成懺悔室本身之潰裂；(註一三二) 休謨、卡姆柏蘭、陶格勒斯 (Douglas) 對於密德爾吞 (Middleton) 教會和陶維爾 (Dodwell) 等關於奇蹟的討論之大為

發揮；教士們可笑行爲之暴露——這是達利(Dallie)和巴培拉克(Barbeyrac)所開始，繼之者爲開夫(Oava)、密德爾吞和佐爾丁(Torin)、歧蓬在第十五及第十六章中的重要而顛仆不破的敘述；得維斯(Dava)、齊爾納(Chelsum)、惠推克爾(Whitaker)和窩宗(Watson)等片面的攻擊對於這兩章所反增的力量。(註一三三)其他較不重要的事件姑不計及，這個世紀在波爾松(Porson)和屈拉佛斯(Travis)對於天堂人證(Heavenly Witnesses)一書之討論底混亂中閉幕了，這種討論引起了很大的注意，繼着就有地質學底大發現，非但摩西雷創始說之迷信受到反駁，且其正確性亦視爲不可能了。(註一三四)這些洶湧澎湃而來的事情搖撼了人們底信仰，移動了他們底妄信，且在公共思想上產生了只有研究當時純粹歷史的人視爲有價值的效果。可是這些事應在其普通的意義上都不容易明瞭，除非將這大進步中的其他密切有關的情形亦加以相當的研討。

因爲在當時非但在思想家底中間起了極大的變化，就算在人民中間也是如此。懷疑主義底勃興和繼長刺激了人民底好奇心；而教育底普遍則更從而促進之。故我們發現十八世紀之主要特點及其和以前的世紀之分別就是知識不開的人民對於知識之渴望。在這個偉大的世紀裏纔初次建立學校爲低級的教士團在他們惟一有暇的一天——星期日——得以讀書閱報。(註一三五)(註一三六)那時在我們國內也纔第一次有流通的圖書館；(註一三七)也是那時，印刷術纔不僅限於倫敦，而得普遍地通行於各村鎮。(註一三八)也是在十八世紀纔有系統地努力於寫出明易而不專門的科學文章使科學普遍化，使它底普通原理容易明瞭；(註一三九)同時百科全書底發明復將科學上的結果冶於一爐。又那時我們纔初次見到文學定期刊物；因了這種定期刊物，大部分的職業階級

籌賴以獲得知識，雖然簡陋，總也較以前的愚昧為勝一籌。(註一四〇) 讀書會社之組織也漸普遍了；而且在這世紀底末葉時，我們還聽見在工業界中有讀書會底組織。這種熱烈的好奇心在知識底每一部門都顯現着。在十八世紀中葉時，商人中還興起了辯論會底組織；繼着就有一更大膽的改革，因當一七六九年，在英國招集了初度的公共集會，首次擬啓發英國人對於他們政治權利的觀念。(註一四一) 同時，人民也開始研究法庭上的訴訟事件，而法庭亦將司法消息公告於日報中。(註一四二) 略前於此，政治新聞報也應運而生。(註一四三) 且曾因發表辯論權一點和兩院起了極大的鬭爭；結果，兩院雖然得到王底幫助，卻終於完全失敗；於是人民纔能研究國家立法事件，而以稍能明瞭國家(註一四四) 底大政。這個勝利方完成以後，又有一種大的政治主義之傳播所謂「個人言論自由」而產生的新激動。(註一四五) 這種主義當早已傳佈；其種子或可追源於十七世紀末期，那時個人主義底真觀念纔開始種根而發揚。(註一四六) 最後這問題由十八世紀在人民對於那些嚴正的宗教問題之裁奪下纔開一空前討論的規例，雖然現在已普遍地承認在人民底蓬勃發長的知識一點上來，這些事情是必須給他們與聞的。(註一四七)

和以上有關的，就是在文學底格式和寫作上也有同樣的變遷。我們底大著作家以前所習用的嚴厲而迂腐的作法，現在已不合於那渴求知識不安於隱蔽的猛烈而愛好研究的新進者了。因此，在十八世紀底早期，我們底近古作家所善於應用的有力而笨重的語法及累贅複雜的句子無論其怎樣美麗，至此遂驟然給人輕視，而新學者乃是一種較輕妙而簡單的風格，因為較易明瞭，故頗合於時代底需要。(註一四八)

知識傳佈方法之繼續地簡單化自然便提高了文入底獨立性而增大了文學研究底勇敢性。凡書籍因文字艱深或因民衆無普通好奇心的原故而缺少讀者的時候，那麼，作家必須依靠着公共團體或富有爵位的人底賜顧了。人既常喜阿諛其所依附的人，則我們偉大的著作家也不免常曲附他們保護者底偏見而濫用他們底才能。結果是，文學非但不能活動古代底迷信和激起新的研究思想，且常表現着文學附有的膽怯而諂媚的態度。現在的情形大不同了。那些奴性而可恥的奉獻（註一四九）那卑鄙而屈服的精神，那對於地位和門第的不斷的崇拜；那威權和利祿底永常紛擾；崇古賤新的心理——所有這些情態都漸漸消失了；而著作家因為要倚靠民衆底願盼的原故，本着他們從來未曾嘗試過的勇氣開始把他們底新同盟底要求提倡起來了。（註一五〇）

從這些事情中於是產生了非常重要的結果。因為知識之簡單獨立與普遍的原故（註一五一）自然地就使我說的那些大的爭論在十八世紀時較在任何以前的世紀爲普遍。那時知道神學和政治學常會起紛爭，一面是天才和博學，另一面是信奉正教和傳統觀念。又知道討論之點非僅限於各種特殊的妄信事件，且及於與人類興趣及幸福有關的那些普通原理底真實性。以前僅限於少數人底爭論，現在開始廣佈遠被，暗示着國家底思想賴以興起的懷疑。結果，研究的精神之活動和普遍與年遞增；改革的希望永常地策進着；如果事情任着自然的途徑走，那麼，十八世紀必不會悄然地過去，而沒有在教會或政府中發生確切而有利的變遷。可是在那世紀中葉以後，不幸在政治上發生了一連串錯綜複雜的事件，障阻了事情底進行，結果產生了極大的危機，這個危機如發生在其他的民族中，其結局會不是自由底喪失，便是政府底解體。這個剛復原而不幸的反動——英國實際上所受到的

——從未受到它應得的注意；的確的，它既是那般少人知道，簡直沒有一個歷史家會對於我剛纔所舉述的那偉大知識運動和這反動之間底對立加以研討。因為這個原故和充實本章底內容底目的起見，我擬考察這種對立的最重要的期間而盡我能力指出其彼此底關係。按照這本書底格式來說，這樣的研究當然是非常粗略的，因為它主要的目的就是為那些普通的原理立一基礎，沒有那基礎，歷史將僅成為實際觀察底堆積，沒有連繫且因此陷於不關重要了。又我們必須注意的是，現在所要討論的情形都是關於政治的而非社會的，故易於下錯誤的結論；這一部分是因為一個民族底歷史材料較為廣汎，較為間接，故不像政治史之易於改竄；一部分是因為一種小團體底人如重臣及君王等底行為常是反覆無常的，這就是說比較上不若大團體如社會或民族之受顯明的定律底支配。（註一五二）現在姑以此點為前提，僅以政治的眼光來試考英國史中之反動及退步的時期。

自從安娜女王薨逝以後，其繼位者是兩個非英國籍而習慣不同的君王，一個能講英國語，但他對此並不十分重視，一個則簡直不能說。（註一五三）他們在位約五十年，這時期應視為最僥倖的一件事。喬治三世（George III）以前的兩個君王都是這樣地踴躍而不諳民情。（註一五四）故無論其性情之如何專斷總不必患其能組織政黨以伸張王族特權底範圍。（註一五五）因為他們是外國人，所以對於英國底教會從未給以多大的同情足以幫助騎士們恢復他們所願望的原有的權力。此外教吏團底難駁而不忠誠的行為必也減少了君王對他們底眷愛心，他們原也因此而失卻了人民底愛戴的。（註一五六）

這些情形，其本身雖瑣屑而浮淺，但實際上卻非常重要，因為它們能使國家底研究精神得以進展，如果君王

和教會一旦聯合起來，那麼，他們必致設法制止這種精神之發長了。雖然如此，也還常有制止的情形發生，但這罕見，而且也缺乏政治和宗教威權相聯合的雙重力量的確，當時的情勢非常良好，舊的保守政黨（Old Tory faction）為人民所壓制，為君王所遺棄，於是幾在四十餘年間未能在政府內有所活動（註一五七）同時，我們以後可以看到在立法方面也有相當的進步；那時的法律書籍包含着許多的證據可以證明這個會管領全英的強有力的政黨底衰落。

但自喬治二世逝世以後，當時政治底情形就立刻改變了，而君王底慾望也常和人民底利益發生相衝突的現象。最不幸的就是那膚淺的觀察者常視喬治三世底登極為最僥倖的一件事。這個新王是生長於英國的，其英國語之純熟和他說本國語（註一五八）初無二致。又據說他視漢諾威（Hanover）——即德國——如異國，視該國底事業為附屬的。同時，斯圖亞特家底最後希望已經毀滅了（註一五九）那已退位的君王——指詹姆士——本人在意大利很沮喪地留戀着，不久也就死了；而他底兒子，一個邪惡的奴隸——這似乎是他家底遺傳性——卻虛度他一生於不屑憐惜而不名譽的灰暗中（註一六〇）

這些表面似乎很順利的情勢必然地就包含着非常有害的結果。因為王座爭奪的障礙既已移去，那王就得以壯膽一意孤行，否則他也許不敢嘗試的。所有我們以為那次革命能毀滅的那些關於王權底擴張主義都立刻復活了。教士們都拋棄了他們對於那現在無希望的僞君的想頭而對漢諾威家表示熱心有如他們從前對於斯圖亞特家所表示的一樣。教堂底講壇上都響應着稱美新王的聲音，讚美他底私德，他底虔誠，尤其是他對於英國

教會之克盡厥職。結果是在這兩者之間建立了自查禮士一世以來未曾有的密切聯合。(註一六)在王底眷顧之下，這舊的保守政黨迅速地重振旗鼓，而且立刻奪取他們敵黨治理國政的地位。喬治三世個人極力地幫助這反動的運動；因為他既專制，又復迷信，同樣地急於要伸張特權而鞏固教會。任何自由的意見，任何近乎改革的事端，以至僅是研究兩字之提及，這個狹隘而愚闇的君王底眼底也是疾首痛心的。他沒有知識，沒有鑑別力，對於科學簡直未加一顧，對於藝術毫無感覺，教育從未在這個天資低下的腦質上加以開導。(註一六)他完全不諳別國歷史或情況，也不知它們地理上的地位，至對於其轄下的人民，他也未見得有較為廣大的認識。在現在所有的豐富的證據中——即包括私人通訊，私人談話和公共行動的記錄等——找不到一線的證明可以證實他知道一些統治國家者所應知道的事情；或認識在他底地位上應負的一切責任，他所知道的祇是些普通政事底呆板工作，恐怕在他王國中之最小的辦公室中的最微末的書記先生也能克盡厥職的。

這樣一個君王，他所採取的途徑是很易察料的。他在王座底週圍，聚擁着一個大政黨，他們緊抱着古代傳統觀念而常以阻礙時代底進步為能事。他在位六年除彼特(Pitt)以外，從不願引用一個大才的人；沒有一個大臣底名字在內政或外交上佔有相當的地位。就是彼特也是因為忘記了他有名的父親底教訓，拋棄了那些自幼薰染而特以進身的自由主義，纔得維持其地位的。因為喬治三世痛恨改革的觀念的原故，彼特非但拋棄他從前認為絕對必需的意見(註一六三)並且不猶疑地把他從前曾合作以達自由主義目的的政黨處死。(註一六四)因為喬治三世視奴隸制是前人意智所賜的最好的舊風俗的原故，彼特就不敢用他底權力廢除這個制度，祇可讓他

底繼續着光榮地去毀壞喬治三世所堅持保存的不名譽的貿易（註一六五）因為喬治三世厭惡法國人之故——儘管對於法人的認識和他對於卡姆乞卡人（Kamtschka）或西藏人的認識不相上下——彼特不惜違反他自己的判斷力和法國開戰，這一戰使英國大蒙損害而英國人民乃因此擔負了後代難以償還的國債（註一六六）雖然如此，在彼特逝世之前幾年，當他表示愛爾蘭人應得的一些權利和決定加以承認的時候，喬治就停了他底職務；而且所稱爲王（註一六七）底朋友的那些人都對於他表示憤怒，以爲他不應該有違反這樣仁愛而溫良的君王底建議。當這個偉大的人決定要恢復他底權力底時候——對於他名譽上不幸的一件事——也祇有承認他底建議收回成命然後纔能復職；因此就開了一個自由國家底重臣爲君主底偏見而拋棄其主張的惡例。

因爲不能找到許多像彼特這樣有才能而甘於屈服的重臣，所以無怪乎高的職位常常都充滿着著名的「長者」（註一六八）的確的，這個王對於每種偉大和高尚的設施都似乎有一種天然的厭惡。在喬治二世朝代時，拿破特會爲其自身博得世界的榮譽，曾爲英國博得空前的光彩。但他是一個公共權利底公認朋友，曾極力反對王朝底專制；因此他爲喬治三世所深恨，其深恨之程度簡直可以比之瘋狂（註一六九）福克斯（Fox）是十八世紀底一個最大的政治家，他最明瞭與我國利益相關的各國底國情（註一七〇）除富有這種鮮見而重要的知識以外，他還有一種令政治上的敵人每讚美的那溫和歡恭的性情（註一七一）但他也是政治和宗教自由底一個堅強的擁護者；他也是這樣地爲喬治三世所痛恨，以至喬治親手將他底名字在私人顧問名單上除去而且宣布寧願退位而不願他參與政事。

當在君王和其重臣中有這樣的不幸的變化的時候，立法方面也有同樣不幸的變化發生。在喬治三世朝代以前，以自由主義和議員底一般成就而言，上議院確優越於下議院。固然兩院皆盛行着一種精神，若以現代較大的標準衡之實為興隆而迷信的。但在貴族議員中這種感覺還被教育的作用所調節，使他們較下議院中的鄉愚或愚昧的獵戶式紳士優越得多。因為他們知識之卓越，自然地策勵他們底思想較所謂人民底代表——卽下院議員——為通達而自由。結果舊的保守精神在上院漸漸削弱而留存於下院；在革命後之六十餘年中，高級教育黨和斯圖亞特家底朋黨曾在下院組成了危險的聯盟。註一七三譬如，對於漢諾威王朝貢獻最大的——也可說對於英國之自由貢獻最大的——兩個人就是薩麥斯(Somers)和窩爾波爾(Walpole)。他們兩個皆以自由主義著稱，卻兩個都因上院底出力而得到安全。薩麥斯在十八世紀早期就得到貴族底保護，而免除了下院對他的侮辱的刑罰。四十年以後，下院因要置窩爾波爾於死地，就通過了一個議案減輕了反對窩爾波爾的人應付的罰款，因以鼓勵他們反對的行爲。這種野蠻的政策在下院毫無困難地通過了；但在上院卻是二對一的完全否決。那分議決案(The Schism Act)，教會教友用以苛害違反國教者的也同樣地在下院受到絕對多數的通過。可是在上院，票數就幾乎相等了；雖然這個議案是通過了，但曾加以修正，使內中暴虐的條款稍為和緩。

上院對於下院底這種超越性在喬治二世朝代時大體上堅固地維持着；大臣們不急於在上院中鞏固高級會黨底勢力而王底自身也很少有關於這方面的新政，故相信他實也不喜歡增加他們底分子。

直至喬治三世繼濫用他底特權，完全改變了上院底性質，因此立下了以後貴族常蹈覆轍的不名譽的根基。

他底新政很多都是空前的；他底目的顯然就是要壓制當時盛行的自由精神而以上院爲拒絕民衆願望及制止改革進步的機關。這種政策之完全成功是各個英國史底讀者都深知的；看他所升擢的那些人底資格就可知他是必臻成功的了。那些人一共包括兩種階級：一種是鄉愿，他們所以顯著的就是他們底財富和他們賴財富而獲得的投票權（註一七三）；還有一種就是律師，他們之能得到立法上的官缺，一部分是他們底專業使然，但大部分卻因爲他們熱烈地壓制民衆自由而偏袒王族特權的原故。

凡一查喬治三世所升擢的新的貴族名單，必不以吾言爲過分。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對於公共事業非常有功而不得不給以報酬的人；但除了幾個強迫喬治三世承認的貴族以外，其餘的——當然是絕大多數——都是非常偏狹而鄙吝的人，這點實使整個議院被人輕視的唯一原因（註一七四）；沒有偉大的思想家；沒有偉大的作家；沒有偉大的演說家；沒有偉大的政治家；沒有一個真正高尚的人——可以在喬治三世所造就的貴族中找出來。國內的主要利益也沒有在這個奇怪的組織中佔有相當的地位。那些從事於銀行事業和商業的人在英國重要人物中佔據着很高的地位；自十七世紀末葉以來他們底勢力迅速地增長；同時，他們底智力清楚而有系統的習慣和對於事情的普通知識都使他們優越於重振上院勢力的那些階級。但在喬治三世朝代時，對這方面的要求是不甚注意的；而且對於這個問題維持其權威的柏克也曾說從來沒有一個時候商業方面的人之升擢而爲貴族的是這樣的少（註一七五）。

如果要將這個時期英國政治上的退化表徵聚集起來，真是恆河沙數；這是一種較重要的退化，因爲它違背

時代的精神，因為它不顧那偉大社會的和知識的進步而起來。至這種進步如何必然地停止了這種政治的反動而強迫它退回至原來的階段，將在這部著作底其他部分研討；但有一樣事情我不能不稍加述說，因為它供給我們一個關於公共事情底傾向底最有趣的例證，而同時也表現着終身專注於英國政治學實施底一個最偉大的人及最偉大的思想家——培根除外——底性格。

如果我們遺漏了柏克(Edmund Burke)底名字，這一個喬治三世朝代底簡略記述更顯得殘缺不全。對於這個非常人物的研究，非但包括政治研討底全部，(註一七六)並且遍及於許多與政治學似絕無關聯而其實乃其重要之附屬學問等題材中；因為在平常較遲達的腦中，每一支派的知識都能啓迪引發着其他最不相關的知識流派。對於他這樣的頌揚是出於一個精明的評判者，(註一七七)可以從他著作中的片斷文字和當代名人底意見裏(註一七八)證實出來。當他對於法律哲學的洞察明見受到了律師(註一七九)底頌揚的時候，他對於藝術全部範圍及理論的認識也贏得藝術家底讚美；(註一八〇)這是兩種常常被視爲——雖然是錯誤的——不相容的學問兼備於一身的奇特的例。同時，我們由精確的證據知道，他雖然在忙碌的政治生涯中，也曾對於言語底歷史和系統研究作極大的努力；這是個大的題材，在最近三十年纔成爲人類思想研究底重要資料，但在廣義上講起來，它底真意義祇有在少數孤獨的思想家身上開始微露曙光。尤爲顯特的就是當阿丹·斯密斯到倫敦來滿載着使他大名永不消滅的發現的時候，他驚奇地發覺，柏克已預知那些使斯密斯費多年的焦急和無間的工作所得來的成熟的結論。(註一八一)

除這些與社會哲學底根基有關的大研究以外，柏克還對於自然科學有相當的認識，並且還知道一些關於機械工藝方面的呆板工作。所有這些都在他腦中溶冶於一爐，且隨時可用以應付一切，並不似普通的政治家底知識之片斷而無用，而卻是一個天才者不懼枯燥無味的研討而混合成的博通的知識。這確是柏克底特點，在他底手中是不會有荒蕪之地的。他底智慧是這樣地有力量 and 豐富，以至在每一方面都結着果實，而且對於最小的題材都能力放光華，表明它們與普通原則的關係及其在人類事件的大計劃中所必須參與的部分。

但我以為柏克個性中之尤爲顯特者是他運用他非常的才藝時之唯一的嚴肅性。在他一生最得意的時期中，他底政治原理並非空想而卻是實際的。這實在可覺得奇怪，因爲各種關係都可以引誘他採取相反的途徑。他所有的資料之豐富可以使他較當時任何政治家易於作綜合的結論，而他底思想習慣又特別近於作廣泛的觀察。常常，確可說凡有機會，他都發展他底才能有如一一個創作的和思維式的思想家。但一旦當他踏到政治論點的時候，他就改變了他底方法。當論涉到關於財富之積聚及分配的問題，他以為可以根據幾個簡單的原則，建立一個對於國家底商業和經濟利益有效用的演繹法的科學。可是他就止於此了，因爲他知道，除了這個單獨的例外，政治學每一部門都純粹是根據經驗的，而且似乎將永久是這樣。所以，他深深地認識了那個偉大的主義——這個主義即在現代也常常被忘卻的——即是，立法底目的不在真理而必須在乎它能適合於勢情與否。當他觀察到我們知識底實在的情形時候，他不得不承認所有的政治原理都是由於以有限的事實作急速的歸納論而後成立的。因此，聰明的人當他想加增事實來鞏固那些原理時，應該重新改正那歸納論，而且與其犧牲了實際設

施來遷就原理不如改變了原理以便改良設施。或換句話說，他以為政治原理最好也不過是人類理性底產物，而政治設施卻和人類天性、人類情感發生關係，理性不過是天性和情感中的一部分而已；（註一八二）因為這個原故，一個政治家底專業就是去計劃可以達到某幾種目的底方法，而讓國家底一般主張來決定那些目的應是什麼，至於他自己的行為也不當照他自己的主義而孤行，因為他既是為人民而立法，故應以人民底願望為中心而服從人民底主張。（註一八三）

就是此種見解和倡議這些見解底非常能力使柏克底出現成為我們政治史中的一個可紀念的時期。（註一八四）無疑地，在他以前我們也有其他的政治家否認普通原理在政治學中的效用；但是他們底反對是基於由感觸而發生的樂觀的猜度，而且他們反對一切他們未曾深研的理論。柏克之反對這些理論卻是因為明瞭了它們最顯得他有能力的一點就是，他無論情勢怎樣地引誘他去依靠他自己的概念，可是他總拒絕這種引誘；雖然他富於各種的政治知識，他總憑着事件底進行來組成他底意見；他認識政治底目的不在保存特殊的法典，不在宣傳特殊的主義，而在於大多數人民底快樂；最重要的是他堅持要服從公共的願望，這一點，在他以前的政治家沒有一個會注意過，而自他以後大多多的政治家中也大多把這點忘記了。我們底國家確實還充滿着許多柏克所高要反對的那些平常的政治家；他們是柔脆而膚淺的人，費了他們微弱的力量來反對改革底進步，可是倒底發覺自己被迫着要屈服；於是當他們已竭盡了他們微弱的計劃的詭計而因遲緩卑陋的讓步種下了將來不忠的種子的時候，就轉過來咀咒阻撓他們的那個時代；他們憂傷着人類底退化；悲哀着民衆精神底衰落；他們為一種人

民底命運而哭泣，這種人民是這樣地輕忽了他們祖宗底聰慧，以致擅行更改無數世紀以來法令所彙集的憲法。凡曾研究過喬治三世底朝代的人都很易明白，有像柏克這樣的一個人來反對這些可憐的迷妄是一種極大的利益；這些迷妄對於許多世紀都是致命傷而也會不止一次的幾乎毀壞了我們自己的世紀的。（註一八五）他們也明白以這個王底意見看來，這個偉大的政治家至多也不過是個善於辭令的演說家，有類於福克司或查塔姆（Chatham）；三個都是正直坦白的人，不過不安全、不可靠，十分不適合於重用，更不能予以這樣的尊榮，以之參加王室底會議。事實上，柏克三十年中都從事於公共事業，從來未曾在內閣得到一席地位；（註一八六）唯一的一個機會——他還祇是占着一個附屬的位置——就是在很短促的一個時期內，當政治底波動迫着這個由自由內閣所產生的委任的時候。

的確的，柏克在公共事業中所參與的部分實足使一個以為凡古代的都是好的，已成的局面都是對的忘懷了憎惡之念。（註一八七）因為他既是這般地超越於他底同時代人，以致現代所有的大計劃，大多是他所預知而熱烈地辯護着的。他非但攻擊阻止那些可笑的佔先着及居奇的法律，（註一八八）而且在自由貿易的建議上，痛擊所有其他一切的禁令。（註一八九）他擁護在他生時曾嚴受拒絕的那些舊教徒底正當要求；可是在他死後許多年，這些要求纔都被認為保持這個王國的唯一方法。他擁護違反國教者底請求，就是他們要免除為英國教會底利益而必須受的限制。在政治底其他方面，他也具有同樣的這種精神。他反對那些對付破產者而設的苛刻的法律，這些法律在喬治三世底時代還玷污着我們底法典；他又力竭聲嘶地要減輕刑法，刑法底加重實是這個不良的

制代底最惡劣的現象。他願意廢除徵募終身兵役的舊方法；這是個野蠻而失策的設施，數年以後，英國底立法也漸漸能看到這點。他攻擊奴隸販賣；這是個古代底習俗，而為這個君王所願保留為不列顛憲法之一部者。他駁斥——但因時代的偏見底原故，不能推翻——法官所施的危險的權力，他們在罪犯者反訴時，將陪審員底權力僅限於形式上將判決書公告而已；因此將真的判決權擺在自己的手裏，而使他們自己成為那些不幸而置於他們法庭下的人底判決者。（註一九〇）而且——有許多人並不以為是他底才能——他是經濟改革者之人叢中的第一個為我們深深蒙到恩澤的。（註一九一）他不願當前所有的困難，在國會中通過了許多議案，有幾個無用的職位都因此完全廢除了，就是僅在一個主計官長底官府裏已經為國家每年節省了二萬五千鎊了。

單是這些事情已足夠表明一個會誇說他將不損分毫地把政府傳給他底繼承者的君王底憤恨。可是還有其他的情形使他底感覺更受痛傷。他對於壓迫美國人底堅決心是這般地明顯，以致當戰爭真的爆發時，就被稱為「王底戰爭」；而且凡反對戰爭者都被視為王底私敵。（註一九二）可是在這一點，有如在所有其他問題一樣，柏克底行為不是像喬治三世似的被傳統觀念和原理等所支配，而是被普通適合於情勢的大的見解所支配着。柏克為這一項不名譽的爭鬪考慮其意見的時候，拒絕以關於兩方權利的論據來作嚮導。（註一九三）他並不討論母國是否有權利徵收她底殖民地底稅，或殖民地是否有權利可以自己統治稅則。這樣的論點，他都讓給那些假託按原理而行，其實是屈服於偏見的政治家去討論。（註一九四）至關於他自己的部分，他是安於將所值和所得作一比較的。柏克就以為，考慮到我們美洲殖民地底權力，考慮到他們和我們相距之遼遠，考慮到法國給與他們的助

力底可能性，施行權力壓迫這一件事是不適當的，所以談到權利的問題，實是無用。因此他底反對徵稅於英國，不是因爲未有前例的原故，乃是因爲不適合於情勢之故。自然的，他也就同樣地反對「波士頓港議案」和那個禁止與美國交通的可恥的議案，這個議案實在可稱爲自絕生路及苛暴的政策，而爲這君王希望用以壓制殖民地，和挫傷那些他深爲痛恨的貴族底精神者。（註一九五）

像柏克這樣一個人，其對於政治方面所貢獻的能力是這樣地大而三十年中未能得到君王底重視或酬勞，實是那個時代底一個明顯的特殊現象。可是喬治三世也是一個喜歡拔擢謙卑和恭順者的君王。他底朝代確是機具庸劣者底得勢的黃金時代；一個小人得志，賢者被擠的一個時代；那時像阿丁吞（Adolphus）這樣的人卻給人捧爲政治家而博提（Beattie）也被視爲哲學家而獲得恩俸；而且在公共生活的各方面，升遷的先決條件是能頌揚古代底偏見和擁護既形成的惡俗。

對於這個卓著的英國政治家底輕忽實在是非常的好教訓；但以下所敘述的情形，雖然絕端可痛，卻更含深長的意味而值得一般慣於研究偉大人物底智力特殊現象的人底注意。

因爲隔了這樣久的時間，當他底最近支的親屬都已死去的時候，在他最後的數年中，他曾墮入於完全幻覺的狀態裏。這點我們不能矯作否認，當法國大革命爆發時，他底腦力已經在不斷的工作底重壓之下消退了，那能再受得了這樣空前的、可怖的、恐嚇的結果，蔓延得這樣廣大的事件底深思焦慮呢。當那次大革命時的罪惡非但不見減少而祇是繼續加增的時候，柏克底情感纔最後支配了他底理智；那時情感與理智失了均衡；他底偉大的

智力底均衡受到了騷動。在這個時候起，他對於當前的痛苦底同情心是這樣地緊張，他完全忘記了這種痛苦所由產生的專制。他底思想，曾經是這樣地堅固，這樣地不受偏見和衝動底搖動，現在卻在轉變千萬人腦筋的事件底重壓之下而昏亂了。（註一九六）凡將他最近的著作和其出版的年日作一比較觀者都能窺見他這種可憐的變遷是由於其愛子被奪後積鬱所致的，這件事他迄自放不開，就是這點已足夠毀滅一個理智的嚴肅性曾為愛底熱然而得到調和平衡的人底理解力了。我們的確永久不能忘記一個獨子死亡後給與他的那些傷懷的和劇烈的暗示，這個兒子是他靈魂上的安慰，是他心中的驕傲，他曾妄想將他底不可磨滅的名字遺傳給他的。我們永不能忘記這個高尚的老人在惆悵着他底無量的哀愁的時候底那種悲涼的印象。「我生活在一個顛倒的世界上。應該繼我而生的，卻反允我而去。應該做我的後代的，卻反站在祖先底地位……狂風暴雨已經掠我而過，我倒在地上有如那些枯老的柵木，而最近的大風雨又復摧殘着我。我所有的尊榮完全被奪去了；我被連根拔去而被倒滅在地球上。」

如果試將這一幅面幕揭開而循索這個強大的腦力底衰退情形，恐怕未免是過分的好奇了。（註一九七）的確，在這樣的事情中，大多數的證據都消滅了；因為最有機會看見偉大人物底弱點的人，卻並不是最愛敘述這些弱點的人。確實的就是，他這種改變是恰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後纔首次發現，這是因他底兒子底死亡所積鬱而致的，而這種現象變本加厲地直至他死的一天為止。（註一九八）在他所著對於法國革命的反省（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聯盟國政策底要述（Remarks on the Policy of the Allies），給挾利俄特的信札

(Letters to Elliot) 給一個高貴的貴族的信 (A letter to a Noble Lord) 和關於弒君的和平的信 (Letters on a Regicide Peace) 等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連續增長及最後成爲不能制止的激烈表現。單爲痛恨法國革命這一件事，他不惜犧牲了他舊的相識和親愛的朋友。福克司，人人都知道，常常視柏克爲良師，曾從他口中親領到許多政治知識上的教訓。(註一九) 在柏克這方面呢，也充分地認識他底朋友底能力而因他底親熱的性情和沒有人能拒絕的那些引人的態度愛着他。可是現在，這兩個人底長期親密卻並沒有絲毫的私等攔雜於其間(註二〇) 而很劇烈地破壞了。因爲福克司不肯拋棄他們從前一向共同懷密的對於公共自由的愛心，故柏克公開地，並且在國會上宣布他們間底友誼從此斷絕；因爲這個原故他將永不再和一個幫助法國人民的人接談。同時，的確就是這件事發生的那一晚，向以禮貌著名的(註二〇) 柏克卻不慌不忙地又侮辱了其他一個用馬車護送他回家的朋友；在瘋狂的激動的情狀中，他堅持着要在大雨傾注的半夜裏由馬車上立即下來，因爲他說，他不能再忍耐和一個「法國人的革命主義的友人」坐在一起。

有人猜度他這種瘋狂的敵視完全是對於法國人的罪惡部分而發的，這卻未必真實。在那個時代，或在任何時代，都不易找到兩個較空多塞 (Condorcet) 和拉法夷脫 (La Fayette) 來得更活潑，更熱心好施的了。而且空多塞是那時一個最有深刻思想的人，在天才者尙被我們尊敬的時候，他是永不會被我們忘記的。拉法夷脫在能力方面，當然較遜於空多塞；但他是華盛頓底親密朋友，而以華盛頓 (註二二) 爲模範而且曾隨從着爲美國爭自由者；他底正直誠實是無瑕可譎；他底性格表現着一種義俠而高尚的特點，當柏克未受刺激時，對他也應第一個

加以讚美的。可是這兩個人都那個可恨的國家底人民而且會極盡辛勞地爲國爭自由。因了這個原故，柏克宣稱多塞是犯了「不虔敬的詭辯」的罪；是一個狂熱的無神論者，一個狂暴的民主共和黨；能「做出最卑陋最厲害最確定的罪惡來。」（註二〇三）至於拉法夷脫，當有人想減輕他由普魯士政府所受到的苛虐的待遇的時候，柏克非但反對下議院有這種建議而且還要乘機極力侮辱這個當時尚徘徊於地牢中的不幸的俘虜。（註二〇四）他對於這個問題是變成這樣地不近人情，以致他對於這個被折磨的有血氣的人祇可名之爲兇徒；柏克說：「我決不屈辱我底人格爲這樣一個可怕的兇徒作請求。」（註二〇五）

至於法國本身呢，乃是個「食人肉的堡壘」；是「暗殺的共和國」；是一個「地獄」；它底政府包含着「最醜惡、最卑鄙、最機詐、最好滑的人」；它底國民議會完全是「惡漢」；它底人民像亞美松強悍的女族和食人肉的巴黎男子底聯合軍；他們是「一個謀殺者的民族」；他們是「人類之最卑賤者」；他們是「謀殺的無神論者」；他們是「烏合的盜黨」；他們是「人類中的一批極下流的無賴」；他們是「一羣不顧死活的劫掠者、謀殺者、暴君和無神論者」。對於這樣一個國家作一線的讓步以謀保持和平，即無異獻犧牲者「於褻辱的弑君的臺上」；即使與之商議一點，也已似乎是將我們底惡疾的痛楚表露於「法蘭西共和國底每個驕傲的僕役的門前，在那裏，朝野之狗也不屑來舐的。」當我們底使節確是在巴黎的時候，他們「有這種光榮在那個弑君的詭卑的朝廷上恭敬地伺候着過他們底朝晨」；我們呢卻被人詬罵爲委「一個王國底貴族到世間卑賤的人民中間去。」法國在歐洲再也沒有地位了；它已經在地圖上被抹去了；它底名字也應該被忘記。那麼，爲什麼我們底人要在那裏

遊歷呢？爲什麼我們底小孩要學它底言語呢？爲什麼我們要使我們使節底道德受到危險呢？從這樣一個地方回來以後，他們免不了要腐化了他們底主義，而希圖反叛他們底本國的。（註二〇六）

從以前的柏克這樣一個人說出這些話來，確是很可悲的一件事；但以下的更能清楚地表明他底思想聯繫和組織是改變得怎樣厲害。以他底人格並不遜於其智力的人會極力設法阻止北美獨立之戰，但在他最後的幾年卻刻意要挑撥起一個新的戰爭，這個戰爭若與北美獨立之戰比較起來，那北美獨立之戰實是渺乎其小的了。凡人在平心靜氣的時候，都會很願意地承認一國所集中的意見就是一國所處之情勢之不可避免的結果。但現在柏克想用武力來改變這種意見。在法國開始革命的時候，他就堅持英國有權利和必需的要強迫法國改變她底主義；（註二〇七）後來，他還責備那些同盟國底君主爲什麼不對於這個偉大的民族賜以他們所應組織的政府。（註二〇八）這就是在他健全的智力中所顯現的破壞情形，爲反對法國的這一原因，他曾犧牲了一切對於公正、權衡和適應情勢等的考慮。他好像覺得最和緩的一種方式的戰爭還不足以洩忿，於是他想造成一種近乎十字軍式的戰爭，這種方式的戰爭，知識底進步早已將它捨棄的了；在他大聲宣布這種戰爭是屬於宗教的，非政治的時候，他又重新恢復許多偏見用以造成新的罪惡。（註二〇九）他又宣布謂這次戰爭底目的是報仇和防禦並重，我們必不能停止我們底軍隊，除非完全毀滅了引起這次革命的那些人。（註二一〇）而且這樣，他還認爲未足，他又堅持這種戰爭——所有戰爭裏面之最可怖的——開端以後，必不會輕忽地了結；雖然這個戰爭以復仇和宗教爲進行的目標，而文明人底力量也因着十字軍底熱烈情緒以爲鼓勵，可是這個戰爭仍不應率爾地休戰；它必須要

耐久；它必須含有永久性；柏克在燃燒着的情懷中說，這個戰爭必須延續爲一個長期的戰爭；「我很着重地這樣說，並且願望這個戰爭必須是個長期的戰爭。」（註二一）

這必須是一種強迫一個偉大民族改變他們底政制的戰爭。這必須是一種以責問爲目的的戰爭。這也必須是一種宗教的戰爭。最後，這必須是一次長期的戰爭。曾否有人願意將這樣蔓延廣闊，追究不捨而又延續不斷的災難來困苦人類呢？如果從一個神志清明的人發出這樣暴虐，這樣輕率而又這樣的精微的意見，或者竟會使最不着名的政治家永不朽滅，因爲它們將在他底名字上堆積着永不消滅的醜惡。因爲我們那裏能——即使在最愚關，最兇暴的政客中——找到像這樣的意見呢？然而這些意見卻是從一個幾年前曾著稱爲英國唯一的卓越的政治哲學家口中道出來。至於我們呢，祇有傷悲着晚節之不全。但除此點以外誰更不應對他再作求全之毀。我們對於這個重大的頹喪，應加以尊重的深長的思維；但其頹喪之不可思議卻沒有一個人擅敢指摘出來，除非具有我們文壇大師的文筆的人纔能告訴我們如何對付一種病態的思想，如何拔除深種於記憶中的憂痛和如何消滅創傷於腦中的苦惱了。

撇開了這樣痛心的一個問題不談，也真令人感覺到鬆快，雖然我們現在降而要談到英國朝廷中的渺小而斷斷較量的政治。確實的，我們最有名的這個政治家所經驗的待遇史實在可以描寫出當時的那個君主底特色。當柏克將他底生命寄託在大的公共事業上，努力改革我們底財政，改良我們底法律和啓迪我們商業政策的時，候——當他本人給這些事情佔據着的時候，這個君主很冷淡地和厭惡地對待他。（註二二）但當這個大的政治

家墮落爲一個狂怒的咆哮者；當他爲疾病所擾將他底殘年專注於煽動歐洲兩大國作殊死戰並宣布他將爲這個野蠻的目的犧牲所有的任何重要的政治主張的時候——於是他底大的能力纔開始在這個君主底腦中揭露。以前沒有一個人敢在王宮中稍事宣傳他底才能。可是現在他底思想能力連續迅速地頹喪下來，以致與王族底智力不相上下；於是現在他纔第一次得到王底寵愛的陽光底溫馨。現在他是與王同心一德的了。他死前約二年的時候，由喬治三世底溫旨賜他兩種數量可觀的恩俸（註二一三）這個君主還想拔擢他加入貴族團裏，以使貴族院可以因這樣一個偉大的顧問底幫助而得到裨益哩。

關於柏克個性底論涉已超出了我預定的範圍了；但我希望不要視此爲不重要；因爲除本問題固有的興趣以外，還可以表明喬治三世對於偉大人物的感覺如何及在他朝代時被認爲必需維護的意見是什麼。在這部著作的續篇裏，我將研討這種意見整個的對於國家底興替有何影響；但在這本書裏祇須拿一、二個無庸置辯的，更顯著的例證來指出其中的關鍵就是了。

在這些主要而顯著的事件中，北美獨立之戰是最早的一件而且曾完全佔據了英國政治家底注意幾致數年之久。在喬治二世朝代時，曾有人提議對於殖民地徵稅以增加歲入；北美人民在國會中既完全沒有代表，這件事簡直就是對其全部人民徵稅，而不問其是否同意。這個公開劫掠的計劃卻被當時這個具幹才而穩健的執政者所反對；這種提議既普通被認爲不能實行，於是遂告失敗，而且似乎確不能激起任何注意。（註二一四）但喬治二世時的政府所認爲濫用權力的事件卻熱烈地受到喬治三世時的政府底歡迎。因爲這個新王以有着崇視威權

的觀念和未受到良好的教育的原故，完全不明世情，以為徵收北美人底稅則來裨益英國人實是一件得意的政策。所以當舊的提議復活之際，很得到他底承諾；當北美人表示要反抗這個可惡的不公平的時候，他卻更堅持他底意見以為必需約制他們頑強的意志纔對。我們對於北美憤激情感爆發的迅速也不必表示驚疑的。確，當一方面看到革命後第一次復活於英國王廷中的專制主義；一方面看到殖民地人民底獨立精神——兩方底衝突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問題僅是這次鬭爭將採取何種方式及勝利將趨於那一方罷了。（註三一五）

在英國政府這一方，這事當然絕無耽擱。喬治三世接位後五年，就有一議案提出於國會，徵收北美人民底稅則；當時的政治已完全改變了舊觀，故絕無困難地通過了這個政策，若在喬治二世朝代時，那裏有一個大臣擅敢有這般的提議，以前果有此舉完受反對無疑了；現在政府中最有力的政黨卻都連合着表示贊成。這個王，苟有機會，就會表示慇懃於教士輩，——自從安娜女王死後，他們是早已不慣的了；因此，他確知他得到他們底擁護而他呢也非常熱心地盡力幫助他壓迫殖民地。（註二二六）貴族，除少數主要的自由黨以外，逢迎着王底意旨，且認徵稅於北美為減少他們自己貢賦的一種方法。（註二二七）至於喬治三世，他對於這個問題的感覺是盡人皆知（註二一八）而且那較急進的政黨因喬治二世底逝世而失去其權力的尚未恢復其元氣，故也不必恐懼在內閣方面對於該議案之通過會發生什麼障害；誰都知道這個王座是被一個君主佔據着，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使大臣們絕對服從他而苟有機會，他總引用那些懦弱、柔順，而毫不猶疑地服從他底願望的人。（註三一九）

一切的情勢既然如此，以後隨着發生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讀者都深知的那些詳細情形現在不必細述，祇

須簡單地說明，在這種情狀之下，前一個朝代底聰明而自制的政策已視爲無足輕重而國家議會卻在一班粗莽而愚闇的人指導之下，他們立刻就給這國家帶來了極大的災難，而且的確在幾年中這個帝國就分解了。因爲想不徵求全部的人民底同意而強徵稅則，故冒險作一種作戰無方，失敗的——而尤其者竟作那些文明國家所恥爲的殘暴的戰爭以制裁北美。此外，巨額的貿易因而幾乎極度減縮；各種商業皆牽入混亂的漩渦中；（註三三〇）我們在歐洲失了面子；（註三三一）且平增了一萬四千萬鎊的軍費的負擔；（註三三二）而我們還喪失了最有價值的殖民地爲舉世所未曾有者。

這就是喬治三世底政策底第一個結果。惟其流禍尙未已也。欲爲這次野蠻的戰爭文過飾非，乃不得不製造一些辯護的意見，而遁辭所窮又適足以作繭自縛。因爲欲擁護自己這次對北美自由的摧殘踐踏的舉措，就立下了許多原則，但如果這些原則施諸實行，英國人民底自由恐怕得首先被毀壞了。非但在朝廷中，而且在國會底兩院以及主教的裁判席上，各教會黨派的教堂講壇上都宣傳着這最有害的主張——這些原則是不適合於一個君權有限的國家的，當然決不相容的了。這種反動之至若何程度讀者很少能知道，因爲關於這方面的證據完全領在國會的辯論裏，神學方面的文學裏，尤其是在當時的佈道講經中找出來，可是這些，現在的人都不甚加以研究。但現在既不必預測關於這部著作的另一部分的事情，也就祇須說，這種危機是這般地迫近，以致使公衆自由最有力的擁護者都相信每樣事情都在危險中；如果北美人被克服了，那麼，第二步必要襲擊到英國底自由，而試在母國建立一專制的政府有如其將樹立於殖民地中的一樣了。（註三三三）

這些恐懼是否有些過分，卻是一個相當難解決的問題；但將那個時代和史家不甚採用的那些史料作一精密的研究以後，我深覺凡真確認識那時代的人將最先承認，雖然所懼的危險也許有些過慮，但究比近人所信的爲更嚴重。總之，政情底一般現狀的確被視爲激起大的驚恐的。而且在許多年中，王權繼續地伸長，直至不能在英國底許多世紀中找到同樣的例。英國教會曾盡量施展它底力量來偏袒王所欲強行的專制主義。而且的確，上議院因新加入許多持同樣見解的人而漸漸確定地改變其性質；凡過着有適合的機會的時候，總將高級的司法官缺或教會的官缺賜予那些祖護王室特權的人。這些都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我想，綜合看起來，北美獨立之戰確是英國史中的最大關鍵，如果殖民地底人民被擊敗，那麼，我們底自由在某一時期也必將受到相當的危機。我們是救北美人民從危機中拯救了出來，他們以英雄的精神抵抗王室底軍隊，無論在那一次都得到勝利，最後與母國分裂而開始奔赴他們驚人的前程，不到八十年，他們已達到了無可媲美之興盛。這一點應使我們深感興味，因爲可以表明一個孤立無助的自由民族能發展至何程度。

七年以後，這個大鬭爭已經成功地結束了，北美人民——爲人類底利益起見是可喜的——最後獲得了獨立了，其他一個國家卻又起來反抗它底統治者。法國革命底原因史將在這本書的其他部分敘述；現在我們祇須略述其因英國政府底政策所產生的影響罷了。誰都知道在法國這種運動是非常急速的；那些腐敗而致於完全不適用的舊制度很快地被毀壞了；而人民因受了數世紀的壓迫幾成瘋狂以致施行着最可憎惡的暴虐行爲，將玷污他們所奮鬥的高尚的動機的罪惡來摧殘了他們底勝利辰光。

這一切雖甚可怕，卻是事情之自然趨勢；這仍舊是專制激起了報復，報復使人民盲目於一切結果而祇縱情慚足其報復的情緒底一段故事。如果在這些情勢之下，而法國能不受他人干涉，則這一次的革命將如其他的一切革命一樣會立刻平靜下去而組織一個適合於實際情況的政府。至於將是怎樣一種方式的政府，卻不能說；但這是一個問題，對於其他的國家是沒有絲毫的關係的。無論它必須是寡頭政治，或專制的君主政體，或共和政體，都祇待法國自己去決定；當然不用任何的國家替她去想。而且在這樣困難的一個問題上，法國更不會屈服聽命於一個常常是她仇敵而又常是對她苛刻而勝利的敵人的國家了。

但是這些顯而易見的考慮，卻未得喬治三世和一班權勢階級的人底注意。一個大的民族起來反抗他們底壓迫者這一件事擾亂了佔着高位的人底良心。前幾年用來反對北美人的那同樣的惡情緒，惡言語現在轉用以對付法國人；當然很清楚的，同樣的結果亦必隨與俱來。（註三二四）祇因法國欲廢棄君主政體而代以共和政體，故不惜將駐法使節召回而違反了健全政治底一切正常軌則。這是公開破裂堅決表示的第一步，而所以採取這一步者，不是因為法國對英國有什麼損害，只不過因為法國底政制和政府有了變遷而已。數月以後，法國人步英國人前一世紀底後塵（註三二五）將他們底王置於公共審判之下，決其罪於不赦，而且是在他自己向日的京城中處以梟首之刑。我們必須承認，這種行為是無用的暴虐的，而且是非常失策的。但顯然，凡主張這種苛刑者祇須對上帝和他們底國家負責；若由其他任何國來的近乎恐嚇的干預，都必將引起法國底愛國精神，使所有的政黨團結在一起，而易使國家犯到一種在其他情形之下也許會後悔而現在卻因恥於屈服於外力的壓迫而不甘自認的

譯。

在英國，一旦法王底不幸消息到達以後，政府不特解釋，不問未來有否保障，立即視路易之死為對其本身的一種妄逆行為，而迫切地命令法僑立刻離開國境（註三二六）這樣就輕率地引起了那延長二十年之久，犧牲數百萬生命，使整個歐洲大起混亂的戰爭。其尤甚者，這種戰爭把在十八世後期為進步所迫而不得不採納的那些改革，卻在這時停滯不前達一世紀之久，因此阻止了文化底進步。

這個最可恨、最不公平、最兇暴的英國所惹起對他國的空前的戰爭，其對於歐洲所產生的結果將在以後敘述（註三二七）現在我祇循括地把它對於英國社會所發生的主要影響加以說明而已。

這個流血的鬪爭之所以異於前此之一切征戰，而其猙獰可怖之所特著者，其着重點是它完全是個意見衝突的戰爭——這個戰爭底進行，其目的不在奪取土地而在要阻絕現在歐洲主要國家所特著的任何改革底冀望（註三二八）故當戰爭開始時，英國政治即須盡雙重的責任：它必須毀滅國外的一個共和國，同時必須阻止本國底改選。第一個責任之實現就是浪費英國底血和財庫，直至使舉國窮愁，整個的國家陷於破產為止。關於第二個責任的執行，他們就想制定許多法律來制止政治問題底自由討論和壓絕每年勃長的研究精神。這些法律是這樣地包羅萬象，是這樣地合乎他們底目的，如果民族底力量不足以阻止其適宜的施行，則它們必將毀滅大眾自由底每一痕迹，或竟引起了一般的叛亂。的確的，在數年中這種危險是這樣的顯著，據幾個權威者底意見，什麼都不能防止它，祇有我們英國底陪審官底無畏精神。他們以仇視式的判決，反對政府底步驟拒絕執行王所倡議而

應法律屈服的立法者所心諾的法律。(註三二九)

我們如果考慮那些已實施的，那阻礙我們兩個最重要的制度——即出版自由和公共集會權——的步驟，我們便可得到關於這次危機底範圍底一些觀念。這兩個制度在政治的立場上看起來，是兩個最足以使我們判別於其他歐洲人民的特殊點。在這兩種制度能保持完善而能常不畏懼地應用着的時候，即常能有力地防止政府底職權上之越俎——這一點是不能過於妒嫉似的加以防範的，因即最自由的國家也常不免於此。除此以外，這兩個制度還含有其他最高統系的利益。它們因鼓勵政治底討論而增加了國家政治事業方面底知識量。它們也因激起大部分人民底盡量發展他們底才能——這些才能在另一種情勢之下也許會不得施展，但因了這兩種制度卻能加增其活動而有裨補於其他社會底利益——以增加國家底總力量。

但在我們現在所考慮的這個時期，卻以為人民底勢力最好減低；因此，他們以為人民常以習用來訓練他們底才能這一件事是不適宜的。假如要詳述十八世紀末期時，英國政府對於每一種自由討論所施的痛苦的惡密，必將超出這本書底範圍以外；我祇能約略地指出像對於阿丹(Adams)、蓬尼(Bonney)、克羅斯菲爾德(Crossfield)、夫羅斯特(Frost)、基拉爾(Gerald)、哈爾提(Hardy)、荷爾特(Holt)、荷得遜(Hodson)、荷爾克羅夫特(Halcroft)、喬斯(Joyce)、基德(Kidd)、藍伯(Lambert)、馬加祿特(Margaret)、馬丁(Martin)、牟爾(Muir)、巴爾(Palmer)、培理(Perry)、斯開文(Skirving)、斯丹拿(Stannard)、西華爾(Thelwall)、圖克(Tooke)、韋吉克(Wakefield)、華得兒(Wardell)、衛因得保森(Winterbotham)等人底證明的訴狀及證明的懲罰。所有

這些人都被起訴，許多都被判罰款、監禁或流徙，因為他們自由發表意見，因為他們用我們現在在公共集會中的演講者及報章上的作者所隨便應用的文字。

可是因為在幾件案件裏面，陪審官會拒絕判罰犯這種罪的人，於是就決定採取更確定的政策。在一七九五年，通過了一種法律其目的顯然就是要永久停止一切關於政治上或宗教上的公共討論。因了這個法律，所有的公共集會都被禁止，除非在前五天登報聲明（註三三〇）在這聲明裏應註明集會底目的、時間和地址。因為要將整個的事情置於政府監察之下，故命令非但這個登載的聲明應得屋主底簽字應許，而且原稿必須保存為保安官吏之隨時調查，因為他也許需要一個底稿；這是一種很顯著的恐嚇，在那時候，是很容易明白的（註三三一）又制定除這些預防方法以外，任何一個保安官吏都能強迫解散集會，如果他以為發言人所用言語有侮辱王或政府的嫌疑；同時，他有權逮捕他認為有違反行爲的人。解散公共集會和逮捕其領袖的人底權就這樣輕輕地賜與一個普通的官吏而絕無預防其濫用權力的設施。換句話說，就是將禁止公共討論重要問題的權授與一個王所委派而隨意可以更動的官吏底手中。又如果該集會祇包含有十二個或其以上之人數，而在命令散會後一小時尙聚集不散者——在這種情狀中，則須處以死刑，雖然也祇有十二個人不服從一個不負責的官吏底專制命令（註三三二）

在一七九九年，又有一種法律通過，禁止利用任何空曠田野或地方作為演講或辯論的場所，除非先從官吏處得到應用該地的執照。又制定，所有的流通圖書館和所有的研究場所都須受同樣的限制；任何人，未得合法當

局底應許，不得在自己家屋內出賃任何種類的報章、小冊或書籍。在這種書店開張以前，必須在兩個保安官吏處得到一張執照；可是這張執照且須按年更換而又隨時可以取消。（註三三三）如有未得官吏允許而出借書籍，或在住所中容許關於任何一種問題的演講或辯論，則必須爲犯了這一種重大的罪受每日一百鎊的罰款；任何人會幫助他管理討論事件或供給書本者則各罪須科罰二十鎊。至於佔有這樣有害的住所的那屋主，非但須受藉沒財產的罰款而且被宣布因是一個不法房屋的屋主。而須另受懲罰。（註三三四）

在現代人聽來，必覺非常駭異，怎麼一個公共研究場所底屋主非但須受重大的罰款還要依不法房屋底屋主底條例而受罰；而且這些加害於他都因爲他未得當地長官底應許而開設店鋪呢？但這雖然顯得奇怪，卻並非矛盾，因爲這就是將人們底行動以及意見置於行政部直接統制之下的通常政策之一部分。現在第一次通過的這些法律對於禁止報章是這樣地嚴厲，對於作家的處罰是這樣地無憐憫心，用意顯然是要剷除能發表獨立言論的一切公共作家。（註三三五）這些和其他此後將敘述的同樣性質的政策激起了這樣大的驚恐，照幾個精明的觀察者底意見，以爲社會一般情況已趨於絕境或無可挽回的了。在十八世紀末葉，一班自由運動之同情者底感到未來的絕端失望是很可以看得出來，而且在他們私人通訊中形成了一種特色。（註三三六）雖然比較上很少人敢公開地表示這種意見，但是福克司，他底大無畏精神使他一切危險，公開地說出如果言論和出版能自由，則必有所以阻止政府底越權之道。因爲這個再次重任國務員而最後又重登台的名政治家曾在一七九五年以他國會上的地位毫不遲疑地說，如果這些及其他可恥的法律確實通過，則人民對於政府底不得已的反抗乃不

過儘是個應否再加審慎的問題罷了；如果人民覺得他們自己的力量足以對付這個衝突則對於其統治者所用以消滅他們底自由底那些專制設施而出於抗拒的行動是正當的。（註二二七）

可是什麼都不能中止政府所急於要行的事情。這些大臣，因在兩院中佔據了大多數，既很能實行他們底政策來對人民挑戰，而人民也就用盡各種方法來反對，只差真實的暴動罷了。（註二三八）又因為這些新法律底目的在抑止研究的精神和阻止社會進步所不可少的改革，故自然地就產生一些趨於同樣目的的方法。若說英國在數年中完全在專制恐怖的統治之下卻並非過分之辭。（註二二九）自當時的大臣們將政黨底爭執轉變而為無法律保障的鬭爭，牢獄中即滿擠着他們底政治敵人而且在幽禁的時期中，予以可恥的凌辱。（註二四〇）如果一個人被認為改革者，則他將常有被捕的危險；又如果他躲避了，那麼，就要嚴密訪查，即他底私信也須受郵局底檢閱。在這樣的事情中，絕不容有所遲疑。就是家庭中，也逃不了偵察。沒有一個政府底敵人能在自己家中避免竊聽者底讒言和僕人底談論。不和陸竟被引入了家庭底中心，而形成父母與子女間底分裂。（註二四一）非但竭盡心力地壓迫報章底言論而且舊書者常常這樣地被懲罰，以致他們簡直不敢印行法院所反對的作家底著作。（註二四二）的確的，凡反對政府者皆被宣布為國家底敵人。（註二四三）政治團體公共集會很嚴厲地被禁止了。各個民衆底領袖都有身體上的危險；各個公衆集會，都受恐嚇或為軍隊所驅散。在十七世紀中最惡劣的一個時期所用的可恨手段竟盡諸實行了。招雇偵探；賄賂作證者；以欺詐的手段選定陪審員。咖啡館、旅館以及俱樂部都充滿了政府底暗探，專以報告一切普通談話為事。如果用了這種方法還未能得到任何證據，那麼，尚可用另一種方法以故實其罪

——這種方法是盡量的採用的。因為「出庭狀法令」既久擱置而不行，王就有不問究竟而無限制繼續任何反對內閣的人了，至於他們底罪，卻無庸加以證明（註三四四）。

這就是在十八世紀末葉時，英國底統治者在保護國家憲法的託辭之下，壓迫應受憲法利益的人民的方法了。他們所造成的患害還不止此。他們抑止民意之進步的企圖都和那畸形的外交政策底統系有着密切關係，我們因此被牽累以至要擔負無可比量的債務。因要付債務上的利息和供給一個浪費的和毫無打算的行政機關底經費，遂致各工業品和原料品都要徵收稅則。在大多數情形中這些稅賦降到大部人民身上，因此他們就處於一單獨掙扎的地位。因為上層階級非但拒絕其餘人民所急迫要求的改革，而且反強迫國家設法防範之。——這些防範因上層階級的拒絕人民之要求而被認為必需的。政府就這樣地減削人民底自由，浪費他們工業底出產以防抑為他們知識之物長所迫成的民意。

在這些情狀之下，無怪乎幾個精明的觀察者要對於英國底自由表示絕望而深信數年之中一個專制的政府必會很堅固地建立起來了。即使是我們，在半世紀以後纔看到這些事情而能稍持鎮靜觀點者和有機會多得知識，多獲經驗者也必須承認這種危機，以政治底立場來看，恰較自查理士一世朝代以來的任何時期為顯著。但那時，即使到現在還忽略的，就是政治事件不過是一個大國底歷史中許多部分中之一部分而已。在我們現在正在考慮的這個時期，政治的運動無疑地是較其他數世紀中為尤可虞。可是在另一方面，知識底運動，照我所看見的，也非常順利，而其影響也很迅速地傳佈開來。因此，國家底政治趨着一個方向，其知識則又趨於另一方向；政治

要我們開倒車，而知識卻推動我們前進。這樣，強加到我們身上的那些專制主義多少受到了些抵償的影響；雖然不能絕止它們所給與的重大痛苦，可是這種痛苦的影響就更能增進人民要求改革這種痛苦弊害所由發生的制度的決心。因為當他們感覺到這些弊害的時候，其所得的知識就使他們看到補救的方法。知道主持政事的人都是專制的；可是他們也知道使他們能得到這樣威權的制度底本身也必是錯誤的。這就堅定了他們底不滿意，而以決定改變新制度使他們底意見底呼聲能上達於國家議會為正當。（註二四五）這種決定心，不用說，愈來愈堅強，直至最後遂產生那些已經使本世紀顯著的，子民衆以新的旨趣的和改變英國國會之機構的偉大的立法改革。

於是在十八世紀底後期，英國底知識底增加及傳佈和當時所發生的政治事件就直接相敵對了。這種敵對的範圍和性質我曾在這個複雜問題和這本書底限制範圍以內很清楚地表明了。我們已經看到，以整個的國家看起來，一般事情的明白傾向就是在減削教會、貴族及君主底威權而使人民大量施展其權力。但如果不以整個國家來看，而僅注意到政治歷史方面，那麼，我們就發覺喬治三世底個人的特性及令他得以榮登王座的那時的情勢使他以阻止這偉大的進步而最後因以產生一種危險的反動。倘幸他和他底擁護者所欲摧殘的自由主義在他朝代以前早已這樣地佔勢力和傳佈廣遠，以致非但反抗這種政治反動，而且似乎反因這種抗爭，而更獲得新的力量。這種鬭爭是非常熱烈而有一時曾極度地緊張，這是不能否認的。但是自由思想底力量既是這樣大，敵一旦深入人民底腦中，則無論加以任何苦難，無論如何懲罰其袒護者都不能撲滅了；而且絕無法以阻止其繼

續增長。凡勢能顛覆自由原理的主義都受到這個君主個人底袒護，爲政府所公開宣布，且爲最有權力的階級所熱烈擁護；同時，與這些主義相符合的法律均已見諸明文而實際上亦施於法庭。但凡此種種究其實都無成效。沒有幾年，這一代漸成過去而改進的時代因以蔚興；專制制度也就傾覆了。在其他國度中——即使是完全自由的——也是一樣，每個制度都必須傾覆，如果它違反民意底進行和容納反對時代精神的言論及制度。在這樣的鬭爭下，其最後的結果大可預決矣。因爲一個專制政府底力量祇靠着少數的人，無論這些人底才具如何縱橫，及其既逝，其後繼者大率器識平庸而已。但公共意見底力量卻不受這些因果關係的牽制；它不爲死亡率底定律所影響；它底命運並非起伏無定；它並非靠着少數人底生命爲之支撐，卻是受着廣泛的、普通的因素底支配。這些因素因爲包含廣泛的原故，一時頗難察其端緒，但在較長的時期內，就可以看出它們較其他所有的考慮都重要，而且將國君及政客等所用的那些顛倒秩序及任意處置一偉大而文明的民族的詭計顯得非常渺小。

這些博大而普通的真理，凡富於歷史知識而能對於近代社會之性質及情形時加反省者都將無所疑問的。可是在我們所考慮的這個時期中，這些真理完全被我們底政治統治者所忽略，他們非但以爲自己能够壓抑民意底勃長，而且還完全誤認了政府底真正目的。在那時候，一般人以爲政府是爲少數人而設，大多數人卻是必須卑屈地服從那少數人底願望。又以爲立法權應當爲少數特殊階級所獨享；國家底大部分人對於這些法律毫無顧問的權利，祇有絕對的服從（註二四六）一個聰明的政府底責任就是要阻止人民爲知識底分佈所啓迪而使之服從。（註二四七）以上這些觀念和建立於這些觀念之上的立法統系會在半世紀之內這樣完全地消逝，而即使才

能普通的人都不再附和之。我們確要認爲是一個顯特的情形，其尤奇者，就是這個大的變遷並非受外來的事件或本國人民底驟然反叛的影響而起，乃是受無形的道德力量——這就是公共意見被壓抑下的潛伏勢力——底影響。我常以爲這是英國文化底自然的或可說康健的進行底確實證明。這是一個任何國家未曾表現過的彈性的而又沈着的精神的證明。沒有一個國家能逃避這樣一個危機，除非須經過一次得不償失的革命。事實就是我所試要研究的自十六世紀以來的英國一切事情底起伏在人民中間傳佈着一種人民自有的知識及應用這些知識的熟練及獨立性，當然不能說是完全無缺，可是仍較任何歐洲大國所有的爲勝一籌。此外還有其他此後將敘述的情形，會遠在十一世紀時開始影響我們底國民性，予以堅決的勇敢性，而同時賜以造成英國人思想底特色底遠謀深慮和沉毅審慎的習慣。所以我們愛好自由的心常爲審慎精神所調和，緩和其暴烈性而不致損害其力量。這種精神會不止一次地教訓我國人去忍受相當的壓迫而不冒險地起來反抗他們底壓迫者。它曾教他們停止他們底手；它曾教他們蓄積他們底力量，直至一旦能所向無敵地發出來。十八世紀末葉英國得以平安過去的就靠着這種偉大而有價值的習慣。如果那時人民起來反叛，那麼，他們或將大受牽累，至這種拚死一決之結果如何，誠無人能說了。尙幸他們還能安然稍待；他們願意稍俟以察事情的爆發。這種高尚的行爲使他們底後代收獲報酬。經過幾年以後，政治底危機日漸黯淡，人民重新回復他們從前的權利。因爲雖然這些權利會暫時中止，但使他們最後得到勝利的那種精神繼續存在而不至被毀滅。沒有人會發生疑惑，如果那些惡劣的日子竟延長了，他們底先祖在查理士一世朝代時所激動的那同樣的精神也許會從新爆發出來，社會或將要受到令人

不敢設想的革命的騷動。可是在這時候，一切都避免了；雖然騷亂在各處不時發生，政府底方策常常引起最嚴重的一種仇恨（註二四八）但是人民整個地看起來，仍舊堅持到底；忍耐地聚蓄他們底力量直至一個較光明的時期。那時一個新的政黨會為他們底利益而在國內組織起來，而且還會在國會裏很成功地提倡他們底利益。

這個偉大而有利的反動在現世紀底早期已經開始了；但它相關的各種情形是這樣極端的複雜和這樣地不甚惹人研究，以至我在本書內就算要寫一個單簡的總綱也不可能。現在祇須說，普通所必須知道的，這個運動會迅速地繼續了幾及五十年。凡所舉措，都足以加增了人民底勢力。一次一次地會予權力主要保管者的那些階級以重大的打擊。改革方案（The Reform Bill）舊教徒底解放（The Emancipation of Catholics）穀法之取消（The Repeal of Corn Law）這三者都被認為現代最大的政治成功。這三種大方案每種都會壓服一個有權力的政黨。參政權之推廣會減少世襲爵位底勢力和破壞地主們所久長劫持下議院的大的寡頭政治。保讓制度之廢除更又減弱了封建的貴族政治；同時，教會底教團所主倡的那些迷信先因試用法人法令之取消，後因舊教徒在立法上的被承認而受到極厲害的打擊；這些步驟都被據理地認為對於英國教會底利益有害的設施的先例。（註二四九）這些及其他現在顯然不可避免的議案會由社會之特殊黨派中奪取——而且將繼續地奪取——權力而賜予人民底全體。的確，民主思想之迅速進步是現代沒有人敢否認的一件事實。膽怯而愚闇的人對於這個運動是驚奇的；但確有這樣一種運動並已為全世界所週知。現在沒有人敢說抑制人民或反抗他們公共願望的話了。極其量也不過說，是應設法使人民明白他們自己的真利益和啓發公共的意見；但每個人都承認，

一旦公共意見形成，則再也不能抵抗的了。關於這一點，大家底意見都是相同的；而政治家皆已服從這種逐漸取代其他權力的新權力，假如他們生當六十年前也許會首先起來否認這種權威，譏笑這種要求，或可能的話消滅這種自由呢。

這就是分別我們現代的民衆和生活在喬治三世所要永保不滅的壞的制度之下的民衆的大鴻溝。很顯明的，這種大的進步，與其說是成功於民衆之改造，不如說是成功於舊制度之破壞。又很顯明的，這種制度之所以消滅就因為它不適合於時代的原故；換句話說，就是因為一個進步的民族將永不能饒恕一個不進步的政府。至於我們底立法者，雖到極緊急的時光，還會因循於這種革新的觀念底恐怖而拒絕每一種改革，直至人民底呼聲高至足以僑服之而強迫其許諾一切非在這種壓力之下決不願承認者。這一件事實不過是個歷史的事件罷了。

這些事情應該作爲我們政治統治者底一個教訓。也應該用以減輕立法者底專斷並且教訓他們，他們最好的方策也不過是適應情勢而留待後人去刪改的一種東西。如果這樣的考慮能阻遏那些膚淺的人底自信心，停止他們底煩言倒是很好的。這些人一得到政權，就以爲他們勢必要保障某幾種制度和抱某幾種的意見。其實他們應清楚地明白他們底職務並不在預測未來事件底進行而先爲這些遠的偶然的事故準備。在小的事情，這樣做當然不會有危險的；雖然照每一國家法律底變遷也很能證明這樣做也未必有利，但關於一個民族底命運底那些廣大而基本的方策，則這種預測其弊漏視無用爲尤甚——這是非常有損害的。以現在的知識程度來看，政制學非但不能稱爲科學，而且是各種學術中之最落後者；故立法者唯一的康莊大道就是應認他底職業有包含

採納暫時的方策以適應暫時的情勢的可能性。(註三五)他底責任就是追隨時代，絕不用他設法去領導。他應該滿足於研究週圍一切經過的事情，應該按照當代的真確的進步改易他底計劃，不應僅以前人所遺傳下來的觀念爲定，因爲他可以相信，社會底變動現在走得這樣的快，一代所需要的東西絕不能用爲推算測量其他一代所需要的標準，人們爲他們自己的進步所驅策，已對古人之所謂聰慧的無謂之談漸生厭倦，而遂解脫了那些陳腐而無生氣之說，底束縛永不使爲他們之累了。

(註一)在二百年以前，威廉麥姆培爾爵士曾說，荷蘭底教士權力較其他國家爲小，因此信教異常自由。(見麥姆培爾著第一冊第一五

七一—一六二頁聯拜之觀察(Observation upon the United Provinces))

(註二)「在維朝代之最初十一年中，沒有一個基督教徒曾單爲宗教原因而被控告的。」(見厄爾著清淨教徒史一冊第四四四頁(Neale's Hist. of the Puritans))

(註三)波四姆(Popham)裁判員在一六〇六年對於虐待基督教徒所作的無禮辯護茲姑不具引，只遙引伊利莎白女王的兩個直接繼位者底話罷。詹姆士一世說：「照我所知，事實是引人深懂的——最近實天的女王從未爲宗教之故而實罰任何羅馬教徒。」(見詹姆士王之著作對摺本第二五二頁一六一六年倫敦出版(Works of King James))又查理士一世說：「我聽說伊利莎白女王或我父親都從未公布任何牧師在那時單爲宗教之故而受刑罰。」(見國會史第二冊第七一三頁)

(註四)這是一五八三年在英國裁判之執行(The Execution of Justice in England)一書中所樹立的曲解，據云，這書是勃萊(Bulcraig)所作。(見哈拉姆憲法史(Hallam's Const. Hist.)第一冊第一四六及第一四七頁)又薩麥斯特的短論論文第一冊第一八九至二〇八頁裏說：「有許多，他們稱爲殉教者。」(見第一九五頁)又在第二〇二頁作者攻擊那些稱「爲叛逆而處死者謂爲宗教的殉道者」的不當。同樣的，現在一班反對解放基督教徒的人覺得他們不得不放棄舊的神學立場而以政治上的證據來辯護對於舊教的迫害。埃爾頓說(Lord Eildon)——一個反對宗教自由黨中的有力領袖——一八一〇年在上述法庭中曾說：「反

對宗教之法律是爲反對承認外國優越性之一種信仰在政治上的危險而設立，不是爲反對該宗教極象思想而設立的。」（見脫爾斯著埃爾頓之生活 [Life of Eldon] 第一册第四三五頁）

（註五）修威爾 (Mr. Sewall) 似乎在他著的（一八四四年出版）基督教政論 (Christian Politics) 第八册第二七七頁裏也有這種改變的見解。一個有才幹的作者曾對於十七世紀時英國教會反對她敵對者底迫害這樣說：「這是各國教士所有的陳腐的假託，在他們懇求政府設立刑法以反對他們稱爲異教徒或分離論者及催促官吏切實執行以後，即將所有的非難謗議諸政權在這方面被告說無法請求原宥，可是這種人現在不是爲宗教而是爲違反法律而處死了。」（見薩摩斯短論 文第十二册第五三四頁）

（註六）在任何方面看來都是重要的，前四本書於一五九四年出版。（見渥茲渥斯 [Worsworth] 著教會傳記 [Ecclesiastical Biography] 三册第五〇九頁中高爾登 [Walton] 著呼克爾之生活）第六本書雖說是不真確的，至於第七、第八兩本也有疑問，但哈拉姆以爲它們確是正本。（見歐洲文學 第二册第二四、二五頁）

（註七）奧埃爾 著的申辯 是在一五六一年或一五六二年出版的。這部著作，麥經和爾克 司著的殉教者 (Martyrs) 在伊利莎白 朝時曾令所有各教區之教堂中均備此書以供人民誦讀。（見奧布利底信札 [Audrey's Letters] 第二册第四二頁）

（註八）「因此，斷定我們動作的最自然的方法就是理智底判決，以斷定及定下什麼應該做的。」（見呼克爾 著第一册第九九頁中教會制度 第一本第八節）他要求他底反對者「不要強求每種動作合乎聖經中的知識——我們易於從這裏推論的——有如他們找尋各種聖律來實施一樣；不如承認——其實是如此——以理智律來規定這種動作之爲善。」（見呼克爾 著第一册第一五一頁第二本第一節）「因爲，人如被權威所束縛或領導，失了自決的判斷力，雖然有相反的理由亦不接受而祇像野獸般追隨着群眾中在前領導之獸一樣，則他們將不知所向亦將不嘗所向何處了。這是無理性的表現。又，這些人底權威如反對或超越了理智而會能流行於人們中，則決非我們所能信仰的。許多學者——讓他們永不不要這樣偉大和尊敬——都不得不屈服於理智了。」（見第一册第一八二、一八三頁第二本第七節）在第二册第二、三頁第五本第八節中他說，即使「教會底言論」也給他們認爲遠不如理智了。再又在第二二六頁裏說：「神道學是什麼，不過是神靈事物底科學罷了？沒有自然方面底理論和理智底幫助，有那種科學能成功的呢？他還很憤怒地質問那些堅持信仰至尊的人，「我們能使沒有理智的信仰在人們底眼前顯得合理嗎？」（見第一册第二三〇頁）

(註九)他既雖然教士在支那教會底事件方面被人們認為教外人來得適合，但還在實際上對於他們毫無裨益。「不以為我們精神上」的教師和主教遠較從事於其他職業的人為適合實是不自然的，但當各種智慧已盡其所能為教會計劃了法律以後，即是公眾的允諾給與教士這些法律底方式及實力，如果沒有這種允諾，這些法律亦不過像醫生對於病人的處方，任病人底探病與否認罷了。」(見教會制度第三冊第三〇三頁第八本第七節)他又在第三二六頁裏說：「除非已經證明基督耶穌底幾個特殊的教律曾永久地將制定教會法律的權付與教士，否則我們將堅持最公道和理智的意見，就是，沒有一個教會底法律能不得教士以及教外人底允諾——但最少的就是最高權力底允諾——而得在一個基督教的共和國裏建立的。」

(註一〇)這個廣大的見解可以概括教會制度底全部。我祇能稍引幾段精華作為例證，卻不能說是證據。證據，凡每個有能力的讀者都始在該書中一目了然的。「確實的，宗教底儀式愈古愈好，但卻不是絕對的確而無例外的，所謂真確，也須視是否各時代的情形都和教律底立那些儀式和教義時的情形相同。」(見第一冊第三六頁)「我們所謂完美的東西，就是自制定後無須有所增益的。」(見第一冊第一九頁)「因為當一樣東西不復有用，則其繼續引用亦必是多餘的。」關於上帝底法律，他也大膽地說：「不論創造者底權威如何，凡所創造之最終目的不能一定者皆有改變之可能。」(見第一冊第二三六頁)「所以，上帝所命定的而又定為繼續以達某項目的的法律，當其因人和時間底關係以致失卻達到某項目的之效力時，可以不顯而停止其繼續性。」(見第一冊第二三八頁)在第二四〇頁有：「故我底結論是，上帝為教會政制之法律制作者，或他將這些法律規定於聖經中等之說法都不足以論定所有教會必「永久保守這些法律而不改變。」

(註一一)關於這一點，惠特利大主教曾有很好的論述，可閱他著的從人類天性中所發見的羅馬基督教底傳統(Elements of Romanism traced to their origin in Human Nature) [卷第二三三三三頁]

(註一二)他們底名字是雷該特(Legat)和德特門(Wigman)是在一六一一年權繼的。

(註一三)為尊榮堪塞對(Cancer)法庭之故，我們必須提及，在十六世紀初時，這個法庭曾經其極力反對英國教會，以致害及了那些殘暴的法律。

(註一四)「所以，非難任何人因其不尊敬我們所尊敬的而缺乏恭敬之心，則不是不適切，就是徒事澆薄。這種事實——既是真實的——

實不用責備，而且應該尊敬；因為要尊敬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實在是絕對錯誤；對於不配接受尊敬的而我給與過分的尊敬，實非美德；非但不能得為和善懦弱的表示，且簡直是愚笨和罪惡。如果說他對於真正應加以尊敬的而不尊敬之，以至失了正當的尊敬心，則整個問題須加重討論，因為我們稱為神聖的，他卻視為偶像；譬如，我們以為對的，我們必須俯伏下來崇拜，但如果他們認為對的，他們未見得應該俯下來而毀壞之。」（見亞爾斯著現代史演講錄第二〇二一頁）以亞爾斯特底才能，他底偉大的影響，他底職業，他底風流以及他所演講的那大學底性質等等來看，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一著名的章節，值得那些要研究現代英國思想底趨向的人底注意的。

（註一五）在十七世紀中葉異教之急速增加是非常明顯的，而且因鼓勵獨立思想的習慣性很能助進了英國底文化。在一六四六至一六四七年之間的二月裏，波義耳從倫敦發表說：「在這裏可以公平地說，沒有幾天沒有隨着或宣示着新的意見的，而且，有幾種意見變化得這樣快，一天內被人重視為一種思想，二日後即棄如敝屣了。如果有人失去了他底宗教，讓他到倫敦去重覓罷，我擔保他一定能找到；我幾乎可以說，如果有人信一種宗教，讓他也來這裏，他也將會遺棄了的。」（見波義耳著第一冊第二〇及二一頁內柏希[Brish] 寫波義耳之生活 [Life of Boyle]）

（註一六）姑不計遜劣的人對於奧林渥斯底意見，祇說曼斯非爾德勳爵（Lord Mansfield）罷，他說他是個「理論的完全模範者。」（見蒲脫勒著回憶錄 [Butler's Reminiscences] 第一冊第一二六頁）

（註一七）勞德底人格現在是盡人皆知的了，他底可憎厭的殘暴被當代的人這樣地痛恨，以致定讞以後，許多人關閉店門，直至行刑以後方肯買品，這是高爾吞親眼看見而說說的。（見渥茲渥斯著教會傳記第四冊高爾吞著桑得松之生活 [Watson's Life of Sanderson in Wordsworth's Eccles. Biog.]）

（註一八）一個現代的作家非常簡單地表示奧林渥斯是從牛津得到他底自由主義，「就是這個大學育成了奧林渥斯高的智力和宗教自由的主義。」（見普爾斯 [Bowles] 著開恩主教之生活 [Life of Bishop Ken] 第一冊第二二一頁）

（註一九）呼爾克對於教會會議底過分的尊敬曾被哈拉姆所注意。（見憲法史第一冊第二二三頁）

（註二〇）讀到早期基督教著作時，他輕鄙地稱為不足道。（見奧林渥斯著新教徒底宗教 [Religion of Protestants] 第三六六頁）

即使對於奧古斯丁，其中最純粹的一個，奧林渥斯也不示謙遜。可參閱他在第一九六、三三三、三七六頁所說的；至關於神父一般的感情，可閱第二五二、三四六頁。奧林渥斯曾很痛快地說，教士，當他們「租讓他們，假稱他們為神父，但當他們反對他們的時候，則又稱他們為小孩。」（見卡拉帝底生活〔Calamy's Life〕第一冊第二五三頁）

（註二）觀察教士們對於這些事件的互異紛歧，就可證明神學家底遲緩的進步。在其他的探討範圍中，我們找不到像這樣的固執地，決道關於最近二世紀來所有思想家都反對的理論。

（註三）他確實企圖將這個同樣的學說應用於天主教徒；如果確實行，倒確能停止了爭論。他倒有些不公平地說：「你承認你底教會，因為你認你有理由這樣做；因此最後所有皆為你或新教徒自己的理智所解決。」（見新教徒底宗教第一三四頁）

（註四）「上帝祇希望我們相信前所應得的推論；我們信仰的力量須和妄信底動機相平均或成比例。」（見新教徒底宗教第六頁）「至於我，我確知上帝曾給我們以理智來分別真理與虛偽；凡不知利用這一點而不知所以然地妄信事物者，我可以說他是固然相信，而並無選擇的；我祇恐怕上帝將不接受這些愚笨人底犧牲。」（見第一三三頁）「上底精神，如果他願意的話，可以伸展無盡——即超乎一定證據之外的一定的固執性；但無論上帝和人都不勉強我們過分贊同某一前提所應得的推論；建造一個確定的信仰，於易於傾覆及不可靠的動機上，有如將一個偉大而宏闊的大廈安於力不足支持的基礎上。」（見第一四九頁）「因為信仰不是知覺，有如認三等於四的錯誤，但是信仰卻是包括於知識之內的，所以知者即信而或過之；但信而至多次者即是不知——而且如果他茫然然而信則他將永久不會知道。」（第四一二頁）

（註五）朱埃爾和呼克爾之敵對是這樣的明顯，以致呼克爾底黨備反對者竟引述朱埃爾底申辯來反對呼克爾。渥茲渥斯稱之為「一事」，但非如此可更怪了。

（註六）麥斯克斯（Des Maiseux）（見奧林渥斯之生活第二〇三一二頁）說：「他底書受到了普遍的歡迎；不到五個月，加印兩次，恐怕從未有討論的著作會這樣地盛行過……這本書底暢銷——尤其是一本對摺本的討論書籍——顯可以證明作者簡切中時的嗜好。」

（註七）在蘇特利書（Dangers to Christian Faith）一書第一八八至一九八頁中有一明白的敘論——現在

普遍接受的——反對爲宗教底意見而壓迫人們，但其中最有力的論據都是完全根據於適應情勢的，這在宗教信仰強烈的時代也許會遇到反對的。祇有幾個關於宗教自由底神學方面的困難曾在科爾利治底文學遺著(Lit. Remains)第一册第三一二至三二二頁裏談及；又在另一本書(朋友(The Friend)第一册第七三頁)裏提到當時實在的情形，即「道同樣的冷淡使宗教自由這樣容易地成爲我們底犧牲。」

(註二七)一個熟悉歐洲各大國社會情形的作者說：「教會權力無論在國家或個人的政治、經濟事件方面，或在內閣及家庭範圍以內，都不再成爲活動的分子了；一個新的要素——文學底權力——已經代替了它支配世界底地位了。」(見蘭精書丹麥(Denmark)第一二頁，一八五三年出版)

(註二八)「現代在英國底教士——主教、教授、主教堂之有傳教師——不是神道學家了。他們是論理學家、精於數學的化學家、歷史家、歷史學家、神學家、神學家。」(見巴利一八四八年批評雜著(Theodore Parker's Critical and Miscellaneous Writings)第三〇二頁)在第三三頁，這個高的權威者又說：「可是在現世中，有那一種用英文寫的關於神學方面的學問是有價值的，而在時代上留一深刻的印象的呢？布利治高次論文及培利之新版——我們實難於承認——算是最佳的作患了。」(威廉·哈密爾頓爵士曾注意到(見哲學底討論第六九九頁，一八五二年出版)「英國神學底衰微，」雖然他似乎不明其原因。華德牧師說(見一個基督教教會底理想(Ideal of a Christian Church)第四〇五頁)「不論我們如何地謹慎，我們不能不驚奇着專制神學底衰落和傾覆。」可再問(見大衛斯爾底神學文第四册第三三七頁)「我們想，高柏吞是我們偉大神學家之最後一個……卡德羅斯(Oudrotin)和巴羅士(Barot)克爾麥遜等傳道日子已經是過去了了。」(巴爾博士(Dr. Parr)是高柏吞以後唯一能以其淵博的學問恢復其地位的人，但他常常不自覺地爲時代精神所牽制而不顧這樣做。因此，我們發現他對馬其大主教(Archbishop Magee)這樣寫着：「至於我，早已決定不再爭辯的神學中佔着活動的部分了。」(見巴爾著(Parr's Works)第七册第一頁)

同樣的，自十八世紀早期以來，幾乎沒有人會仔細地閱讀早期基督教之著作，除非僅爲歷史或世俗的目的。最初的忽略是在十七世紀中葉，那時引用此等著作於講經的習俗開始廢止。此後就立即被人輕視；陶林牧師在教會史之研究第一九五頁(Study of Bookish History)裏說：「在一七四〇年去世的華德蘭是我們最後的一個偉大的教父的學者。」關於這一點，我可以加說，在華

德國去世後九年，神學事業之明顯的衰落先後打擊了高柏吞和格羅斯威，以至高柏吞寫給佐爾丁的信中似乎很憤慨地說：「什麼東西都可以在我們底教區中做一個教士了。」以後在牛津曾有人企圖補救這種傾向；但這樣的企圖既被一般文物之遊民所反對，已經且必然地無所施其伎倆了。的確，最近這些努力底失敗是這樣地顯明，就是從事於這一方面之最活動的分子也很坦自地承認，在知識方面，他這方的人實毫無貢獻；並且他還表示極大的痛心說：「這實令人沮喪而不願言，但主要的，或可說是唯一的英國作家而能有實績被稱為教會底史家者祇非基督徒之歧黨而已。」（見紐述 [Newman] 著基督教教義之發展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Doctrine] 第五頁）

（註二九）一個有才識的友人告訴我，有一部分人將誤會這種意思，還有一部分人，或解不了解而卻故意地曲解其意。現在不知將我所說的懷疑主義明加解釋罷。所謂懷疑主義，我僅指不輕於信仰；所以懷疑愈深，即表明陳說證明之困難愈甚；或換句話說，就是理論規則及證據定準之應用愈為廣汎複雜。這種猶豫的感覺和會慎的判斷在思想之每一部門，都佔着人類思想所經歷的各種知識革命中的前驅；要不然，就不會有進步，不會有變化，不會有文化了。在物理學中，它是科學底必須的前驅；在政治學中，它是自由底前鋒；在神學中，它是宗教自由底先鋒。還是懷疑主義底三種主要方式；因此很清楚的，在宗教方面，懷疑主義者在無神論及正教之間取一折中之道，而且對兩方底極端，因為他看到兩方都是不能證明的。

（註三〇）一個博學的史家所說的關於蘇格拉底底方法對於幾個希臘人底思想底影響實可用來表明現在歐洲大部分地方所經過過的情形：「蘇格拉底底辯論法，消除了思想上空想的知識底迷霧，暴露了真的愚闇，即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有如地震之轟動。這種對於愚闇之新感覺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痛苦的和風暴的——是懷疑不安而卻混合着從未經驗過的對於真理之內心的要求和追逐的一種時期。這種除非思想上個根本去除此虛偽的知識底幻覺而後方能開始的智力促進，蘇格拉底祇為非但是未來進步的指針和先鋒，且是未來進步之不可見的情況。」（見赫羅特之希臘史第八冊第六一四、六一五頁，一八五一年出版）

（註三一）羅爾特博士深察這種變遷，他說：（見近代史講集第二三二頁）「最使我們驚奇的就是，在伊利沙白時代所謂教士與教士間之爭論，現在都變為君主與國會間之政治大國爭。」平常的編輯如阿利松爵士及其他則完全誤解這種運動（見其歐洲史第一冊第五一頁）這是一個少有的錯誤，因為當時時代的人已有幾個認識了這種國爭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了。即使是克林威爾，雖然他必須認

力對付困難，也在一六五五年明白地表示這次戰爭根本並非爲的宗教。詹姆士一世也見到清淨教徒對於國家的危險較對於教育爲尤甚：「他們和我們在宗教上的差異還不如在他們底政策和類似事物之混合方式上之不同爲甚；他們永久不滿意於現在的政府，永久不耐於屈服於優越之下，這使他們底教派在任何剛精圖治的國家之下都會覺得不堪忍受的。」（見國會史第一冊第九八二頁）詹姆士一世之演說（Speech of James I. In Parl. Hist.）又可參閱薩摩斯短編論文第九冊第五七二頁所說的關於詹姆士（De Fox）底觀察：「王和國會轉而爭執着關於民權的事情……王和英國國會意見最大紛歧不是關於宗教的，而是關於民事方面的。」

（註三二）下議院在一六四六年對於「教士會議」之要求，其攻擊之努力實是這個佔優勢的政黨不喜教會使權之決心的許多證明之一。

（註三三）可是主教塞特（Bishop Short）在他著的英國教會史一八四七年出版第八冊第四五二、四五八頁裏說——當然是真實的——克林威爾對於教會的敵視不是神學的而是政治的。主教肯內特（Bishop Kenne）也作同樣的評述。

（註三四）沒有一個人不是這樣想，而能明瞭清淨教徒底真歷史的。在現在這部書裏要討論這樣廣大一個問題是不可能了；故我必須留在这部著作底後面敘述，那時對於英國歷史將特別加以討論。現在我可以說，狂熱和迷信之區別已被惠特利在他著的從人類天性中所發現的羅馬舊教底錯誤一書中第九四頁很清楚地說明——但非分析——了。

（註三五）在一六五〇年第二次選舉崇拜爲重罪而不利於教士；但王朝復興以後，查理二世及其友人覺得這個法律不甚方訓；於是也就廢止了。

（註三六）可閱一個教外人著的開羅盧生活（Life of Ken, By a Lay Man）一八五四年出版第一冊第五一頁。在第一二九頁這個作者又靈敏地說：「教會已恢復了許多現實的權利，但並非精神上的統治力。」主教底權力已因「高級教庭（Court of High Commission）之變遷而減少。」（見索特著英國教會史第五九五頁）

（註三七）巴倫干（Buckingham）和哈利法克斯（Halifax）恐怕是最熱心於查理二世的那兩個人，他們兩個都說他是一個信自然神教者。他後來之皈依基督教和路易十四後中世之益增虔誠相類似。在以上兩種情形中，迷信都成爲極盛最卑下，最甘於下流的快樂底一

個變遷而不滿足的放蕩者底自然退還所。

(註三九)最顯著的一個例，可以在巫術舊觀念之毀滅裏看出來。以教育階級而論，我們思想之重要革命是在王朝復興和革命之間的時期內發生的，就是說，在一六六〇年大部分受教育的人仍舊相信巫術；而在一六八八年大部分人都不相信了。黑爾男爵領事(Osborn, Baron Hale)在一六六五年曾表示舊的正教觀念，他在審判兩個爲巫術而犯罪的婦人的時候，對陪審官說：「我並不疑慮，確是有所謂『女巫』的，因爲第一，聖經曾這樣地確鑿有這種事實；第二，所有國家底憲章制定了法律來反對這種人，這就是他們確信有這種罪惡的一個證據。」(見卡姆培爾著裁判員之生活第一冊第五六五、五六六頁)這種理論是不可抵禦的，於是這兩個女巫被絞死了；但公共思想轉變且開始影響審判官，自這個男爵領事底這種體面的顯示以後，這種情景就漸漸鮮見了；雖然卡姆培爾勸導遲誤以爲遲，是「英國對於最惡之罪底最後的處死刑底處決。」而且一六八二年還有三個人在埃克塞忒(Exeter)爲巫術而處決哩。可閱哈松在一七二〇年出版關於巫術之歷史論文第五六、五七頁，哈欽松說：「我總還是在英國最後被絞死的三個人。」但如果有人能借巴爾博士所說的，則在一七〇五年還有兩個女巫在諾坦普頓(Northampton)被絞死；在一七二二年還有五個女巫在陶爾地方受同樣的判決。」(見巴爾著第一冊第一八二頁，共八冊一八二八年出版)這是更可駭了，因爲我此後將從當時的文學證明，在當時熱衷階級中，對於女巫存在之不相信幾乎成爲普遍化了；而舊的迷信卻仍爲法庭及教會所維護着。摩斯利，他處勢力合所有的主教都不得的，曾說：「真確的，一般英國人，而且大部歐洲有學問的人都視女巫及妖異之說爲老婦人底假託的故事。我頗爲此而扼腕……嚴密風術事實上，統等於廢棄聖經……但我不能對所有的大不列顛信自然神教者掩棄了巫術存在之說，除非直至我掩棄了對於所有公共神靈和世俗的歷史底信任。」

但是所有這些都歸無效。每一年都減弱了舊的信仰；在一七三六年在摩斯利紀錄了這些意見以前一世代，反對巫術的法律是之，落了，於是另一迷信底底跡又在英國法律中塗抹了。

更有趣的，就是在西班牙竟遲至一七八一年焚燒了一個女巫。(見提克諾著西班牙文學史(Hist. of Spanish Literature)第三冊第二三八頁)

(註三九)初版是印行於一六四六年印行。(見布朗爵士著Works of Sir Thomas Browne)第二冊第一六三頁)

(註四〇)確實的日子不知道，但威爾金(Dr. Wilkin)謂是「寓於一六三三年和一六三五年之間。」(見布爾斯著中，美德與朝之宗教 [Beligio Medice] 底引言)

(註四一)「至於我，總是相信，且現在知道，是有女巫這類人的。凡對於她們之存在抱懷疑者，非但否認有她們，而且還否認有鬼神；這些人當然都屬於一種——不是不信教者——無神論者。」(見前書第二册第四三、四四頁)

(註四二)「我確從這裏計算我底誕生。」(見前書第二册第六四頁)

(註四三)見布爾斯著第二册第一三、四頁美提契朝之宗教第九節；備過於冗長不易節錄。這是「我想這是不成的，」原是威爾金笑於 N. I. (Ferdinand abardicus) 曾一度被阿該爾公爵 (Duke of Arctie) 在上議院引為「古代宗教之規律。」(見國會史 第六册第八〇二頁)

(註四四) 休拔爾博士 (Dr. Whewell) 在布利治爾或論文 第二六六頁裏說得好，波義耳和巴斯卡爾 之於靜水學 有如伽利略 (Galileo) 之於力學 及哥白尼 (Copernicus) 之於天文學。

(註四五)這是波義耳 發見於一六五〇年，而一六七六年馬略特 (Mariotte) 為之證實。

(註四六)這種古代機械之輕滑常常現於他底著作中，故很難在許多段落中找到可選的引錄。我將從中選出我以為最明顯而且確是常常特著的一段。在他著的由自然中所得之尋常觀念的自由探討 (Free Inquiry into the Vulgarly received Notion of Nature) 一書中，他說：(見波義耳 著第四册三五九頁)「我之慣於評判意見有如評判錢幣一樣：當我接到一錢幣時，我對於這幣上之文字的考慮不若我對於錢幣製成之成分的考慮為甚。至於這錢幣是否在前或數世紀以前所鑄造的，或祇是昨天新出這幣廠出來的，於我無甚關係。」在其他著作中，他對於中世紀之煩瑣學者及文官之輕視不下於薩克。

(註四七)在他著實驗論文之考慮 (Considerations Touching Experimental Enquiry) 中，(見波義耳 著第一册第一九七頁) 他說：「恐怕你要驚奇，非勞非勒斯 (Phrophils) 我幾乎在以下每一論文中都這樣地不確定而常用「恐怕，」「似乎，」「不是不可驚」及其他的表語，好像我喜歡在意見之真實中證明疑惑出來，」等等。的確，他這種精神在每一處都可看見。因此，他著的水晶論文——以當時的知識程度來看，這本著作是顯著的出品——稱為「關於顯底奇異形狀底團疑及實驗。」(見波義耳 著第二册第四

八八頁) 故復得稱他爲「雷厲而慷慨的波義耳。」不是沒有理由。(見洪保羅著有秩序的宇宙 (Cosmos) 第二册第七三〇頁)
註四八) 柏里斯博士 (Dr. Paris) (見維爾爵士之生活 (Life of Sir A. Dary) 一八三一年出版第二册第一七八頁) 說「皇家學社、皇家中說該社是爲推進自然科學而設。『自然』這個辭語原意我想很少人能知曉。在這個學社建立的時期，巫術及占卜術技藝還是很普遍地操縱着；故『自然』這個字在當時就用爲與『超自然』相對的意義。」

註四九) 最近這種趨勢被孔德在他著的實驗哲學中解釋得非當明白他對於人類思想之最初階段底結論處處爲我們對於野蠻民族所知道的所證實；而又爲——他已確實證明了的——自然科學史所證實。在他所援引之事實以外，我可以說，地質學史所具有的實據和他在其他部門所蒐集的頗爲類似。

這種超自然的因果關係的信仰之如何成爲一般的觀念可以在科姆 (Combe) 所敘說的一種情況中看出來。他說在十八世紀中葉的時候，愛丁堡之四庫一個鄉村是這樣地不合衛生，「以致每到春天，農夫和他們底個戶就多染着熱病和瘧疾。」在這些病源未曾發現以前，「這些病實底纏綿都稱爲上天所使，」但經過相當時期以後，土地乾竭了，瘧疾也就消滅了，於是居民方纔明白他們所信爲超自然之力者，實完全是自然底，而其原因乃由於土地而非神底干預。(見科姆著人底體構 (Constitution of Man) 第一五六頁，一八四七年愛丁堡出版)

(註五〇) 我所說外表之神祕者因它並不減少了真的神祕性。但這點也並不影響於我所說的真確，因大部分的人從不細辯定律與原因的差異的處，這種差異是這樣地被忽略，以至在科學書籍中，亦常不見提及。人們所知道的，就是他們以前所相信的直接由神所統治而改變的事件，現在非但能爲人所預測，而且還被人類底干預所改變。培利和其他人類從定律以求原因一點來解決這個神祕性的企圖，當然是徒然無效的，因爲在理智的眼中這種解決和問題本身是一樣地不能了解；而自然科學家底論說，祇以論據一點而論，是必須俟形理智。有如超邁很真確地說，「一個無因而存在於永久之中的上帝實和一個無因而存在於永久之中的世界一樣地不可了解。我們必不能因其不可了解而反對後一個理論，因爲任何可能的理論都是一樣的。」(見超邁者靈魂之自然史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oul) 第三六頁，一八四九年出版) 這個結論之真確，無意中爲舊的辯護方法所證實，這方法是休揆爾在布利治爾或論文 (第二六二至二六五頁) 中所立定的，因爲這個有才靈的作家所說的是關於具有大權力的人大概都易有空想的宗教見解，這種見解漸漸於

估總着我們，康達恐怕是十八世紀一個最深思想的人了，他很清楚地看到，從外界所推論的論據沒有一個能證明一個第一原因的存
在。(The Existence of a First Cause)

(註五) 安道爾特斯 (Andokides) 報告於雅典法庭之前的時候說：「不審判官長，告發和審判底危險是人類底 (human)，但在海上所遇的危險卻是神靈的。」(見格羅特著希臘史第十一册第三五二頁) 又據說補歐底危險曾激起了益格羅底人底迷信。埃爾曼提到貝加爾湖 (Lake of Balka) 航行之危險時說：「在伊爾庫次克 (Irkutsk) 有一種諺語說祇有在秋天的貝加爾湖上人纔知道從心中發出警告。」(見埃爾曼著西比利亞之旅行 (Travels in Siberia) 第二册第一八六頁)

(註五二) 但所有的最高的權威者都以爲這種愚昧是不能持久的，我們現在在自然科學中所常成就的進步自然就使我們解明了這些現象。譬如雷斯利爵士說：「但這是不能爭辯的，所有在我們大氣中之本體中所起的變化——無論是如何地反覆無常或不合規則——總不脫爲固定之原理底必然結果，恐怕和那些支配太陽系的旋轉的原理一樣地簡單。如果我們解釋這個錯綜複雜的迷亂，我們也許能預索每個明顯的原因底消滅，而因此推論及它們混合運用的最後結果。有了這種集合之事實以後，我們也許能確定預測未來的一個時期的天氣情狀有如我們現在計算日蝕和月蝕或預言行星之會合一樣。」(見雷斯利著自然哲學 (Natural Philosophy) 第四〇五頁)

(註五三) 風味和虔誠之間的關係是這樣地明顯，許多國家都各奉氣候之神來作他們底護佑。有些國家不奉這種神，於是就將天氣底變化歸因於巫術或其他超自然之力。

至於在和我們相近的社會情狀裏，我們發現九世紀時基督教國家都姑以風和雹爲出於巫蟲之作。(見厄安得著教會史第六册第一一八、一三九頁) 這種觀念直傳至十六世紀而爲路德 (Luther) 所認可。(見摩利著至誠之靈傳 (Mary, Legends Proven) 第一八一、九頁) 最後祇在七年以前，當斯文本 (Swinburne) 在西班牙的時候，他看見教士們將禁止歌劇之演奏，因爲他們將「天
卑之靈歸因於受了這種邪惡遊戲之影響。」(見斯文本著西班牙之游歷 (Travels Through Spain))

(註五四) 以羅爲觀點，波爾或把相反的農藝和工業的趨勢在農藝統計一文之中作一審慎的對照。(見統計學社雜誌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第二册第二九五、二九六頁)

(註五五)的確，在英國沒有一個時期，物理實驗會像這樣地風行一時。這不過值得稱爲是該世紀底表徵罷了，因爲查理士二世及其羣族並不會，且不會對於我們所知有任何的增益，而且他們對於科學的這種獎勵，與其說是促進科學，不如說是退化。

(註五六)這種無恥的監劫所造成的恐慌會被威爾遜所描寫過。(見威爾遜著伯爵之生活 (Wilson's Life of De Foë) 第一册第五二頁。)

(註五七) 彼普斯日記 (Pepys' Diary) 第三册第二四二至二六四頁中有關於那時倫敦人所感覺的恐怖。彼普斯本人隱藏了他金子(見第二六一頁及三七六至三七九頁) 換未林 (Evans) 在日記第二册第二八七頁裏說：「這種驚恐是這樣地大，以至使鄉村皆陷於恐慌，震動與恐怖之中，這種情形我希望永不再看見，每人都過逸而不知所向。」

(註五八) 最重要的這些改革都時常是違反統治階級底真正願心而進行的。查理士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常說到出底狀態法令，以爲「政府決不能和這樣一個法律同存在。」(達爾利姆普爾 (Dalrymple) 著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記 (Me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第二册第一〇四頁) 皮爾福德 (Lord Keeper Guilford) 且還反對軍役土地保有權之廢止。他底兄弟說：「他將廢止軍役土地保有權，實對於英國人民之自由是一個絕望的損害。」(見北都人底生活 (Life of the North) 第二册第八二頁) 這些就是大國被統治的人。

(註五九) 這就是一六六九年關於斯金納 (Sinker) 底著名的討論底出發點。哈拉博說：「從這時候起，貴族祇有默然地放棄了民衆訴雙方面所要求的司法權。」(見憲法史第二册第一八四頁)

(註六〇) 卡博瑞爾 (見權要之生活第三册第二四九頁) 說：「一六六七年的爭鬧永久地停止了通常的詰責。」

(註六一) 印爾最初爲皇家布告所支配，漸爲處理叛亂罪之法庭 (Star Chamber) 所管，最後則爲長期國會 (Long Parliament) 所支配。管理叛亂罪之法庭底法令曾被認爲當時法令底範疇及基礎的，但這個法令已在一六七九年廢止，而未在查理士二世無代時復甦。

(註六二) 在我所見的歷史中，關於這次大革命掃除封建制度的舊觀念和習風方面敘述得最詳細的，可算是哈利斯 (Halliday) 著的新編國特皇族之生活一書。(見第四册第三六九至三八八頁) 但哈利斯雖然是一個勤力的蒐集者，但不是一個有能力的，而且並不明白

變遷——明顯而直接的實際結果不過是其中最小的部分罷了——虛真性質。其實，不過是國家立法形式上承襲中世紀是已經過去而必須開始一個更現代而革新的政策罷了。此後我們將詳細研究並表明這不過是革命運動底表徵而已。

(註六三)哈拉姆曾有復偉大的一段軍節高英國朝廷之失；對於英國文化之推進；「可是我們倒應深深感激克利夫蘭德(Owland) 杰公爵夫人白勃拉(Barbara)撰實茅斯(Portsmouth)、公爵夫人路易莎(Louisa)和埃拉諾·傑夫人(Mrs. Eleanor Gwyn)我們亦感謝梅伊斯(Maye)基利格盧(Kiligrere)啓弗因(斯)(Chiffinch)和格拉蒙(Grunont)等人他們在廢除對於王國處策的忠誠方面曾加着有力的部分。他們使我們底前人免於審判叛亂的法庭和高級法庭；他們站在他們底地位上努力反對常備軍和腐敗；他們推進了英國自由底偉大和最後的保障——即是驅逐斯圖亞特皇朝。」(見哈拉姆之憲法史第二冊第五〇頁)

(註六四)箱內特(見我們底時代[Own Time]第一冊第四四八頁)告訴我們，在一六六七年這個王竟在會議案上表示反對主教，並且說：這些教士們「什麼都不會想，祇想獲得好的俸祿和珍鑽之奉。」在另一處，第四冊第四二頁彼替斯寫着：「且我相信，不論他們願意與否，這個政體不久即將動搖；依我所知，王對於他們不悅而且攻擊這種政體。」埃未林和彼替斯談話時曾對於查理士這種行動表示惋惜，「一個主教將永不要教他看見有如法國君王所常有的情形一樣。」(彼替斯第三冊第二〇一頁)埃未林仁慈地將這點歸因於「教士底疏忽」但歷史教訓我們，教士從來不會忽略君王，除非君王先忽略他們。李厲斯佩爵士(Sir John Roebury)曾將他和查理士二世關於僧侶底談話作一引人注意底敘述，在其中將查理士二世對於僧侶的感覺寫得非常明顯。(見李厲斯佩著遊歷與傳奇[Travels and Memoirs]第二三八頁)

(註六五)箱內特大主教在他退休的時候談到說：「因為他從來不是一個偉大的教士，故現在給予養老金而令其退職。」(見我們的時代第一冊第三〇三頁)

(註六六)科爾利治(見文學叢書第三冊第二〇八頁)說：「查理士對於廢羅的怒略恐怕泰羅底德行是其中最重要的作用。」

(註六七)所關總當然是指理解力和他研究範圍之廣，所以一個可敬的權威者說他是牛頓爵士偉大的前輩，英國騰躍上的榮耀。(見西塞羅斯教會傳記第四冊三四四頁)

(註六八)馬考利(Mr. Macaulay)所說關於教士在查理士二世朝代時所受的輕視是完全正確的，而且從我所算算的證據來看，我知

這這個非常有能力的作家——關於他巨大的研究很少人能勝任評判之實的——並無過其賞，倒反有不盡之處。有幾方面，我敢說我是和馬考利有不同之點；但我不得不對於他底毫不疲乏的精力，整理材料底完美的技巧，和激勵他全部工作底自由底高尚愛好，深表感佩。這優點性質將永久辟除那些弱小的勝勝者底廢曹而存——這些人在知識及能力方面看起來，都不配批評他的。

(註六九) 廣成培利大主教，在一六七八年擬企圖勸誘詹姆士改信宗教；在他寫給文撒斯威 (Whigs) 主教的信裏，他曾說到關於他成功底「快樂的報果」。

(註七〇) 在一六八二年高爾教會印行的一個反對驅逐羅素的冊子裏，詹姆士底案件曾提出討論過；但其中堅持著詹姆士必須忍受「一個舊教徒」。

(註七一) 在詹姆士二世登位的時候，「全英底教會震動着歌頌之聲；充滿了許多用有力辯辭來表現的陳述，和永不潰滅的忠憤的誓詞，圍繞着他。」(見厄爾著清淨教徒史第五冊第二頁)

(註七二) 一六八七年三月十八日詹姆士王對樞密院宣示他決定以他底權力「賜他所有的人民以信仰底全部自由。在四月四日就宣佈值得紀念的宗教自由宣言。」(見馬考利著英國史)

(註七三) 在一六八五年之秋季，教士和政府極盡惡毒來迫害違反國教者。據說教會團體常利用教會法庭來勒索不從國教者底金錢。

(註七四) 供軍事部底記載來看，詹姆士在登位的那年已有近二萬之數的常備軍了。馬金托什著革命 (Revolution) 一書，第三、第七、第六八八頁；「約計二萬人之有訓練的軍隊第一次在這個島太平無事的時候設置起來。」因為這不免要激起極大的驚恐，所以王特宣布其數實未超過一萬五千人。(見克拉克編著詹姆士二世底生活 (Life of James II) 第二冊第五、二、第五七頁)

(註七五) 「從這個和前一個朝代底教士們底行為看起來，很清楚的，如果王是個英國教會公認的新教徒，或是一個安靜而服從的舊教徒，並無任何宗教的熱心——一意對付國事，而對於教會底財產具相當的尊重——他也許能任情掠劫其他新教徒，踐踏國家底自由而不會遇到反抗的危險。」(見厄爾底底宿編底生活第一冊第一三六頁) 或像福克司所說，「因此，在詹姆士能滿足於其政治上之絕端的權力而不利用其權威以反對教會時，事情就平順而容易了。」(見福克司著詹姆士二世史第一一五頁)

(註七六) 達奧來 (D'Oyly) 說，(見奧克羅夫特底生活 (Life of Barendt) 第一一六四頁) 「總而言之，游蕩起來，全部教士，以一萬人

來計算，不過二百個是服從那王處請求的。」「在倫敦城以外，祇有七個，而全英國卻不到二百人。」（見柏內特我們處時代第三冊卷二一八頁）一六八八年五月二十日星期日，克拉林教敵書寫：「我在聖·詹姆士教堂裏，當晚我聽說在城市和自由區域裏一共祇有兩個教堂宣讀這個宣言。」（見克拉林教敵通信第二冊第一七二、第一七三頁）當這種行為顯明了以後，人人皆知當教會能指授君王，則神權之，若不得任其施行強迫宗教，則立刻反叛了。」（見馬金托什著一六八八年革命（*Revolution of 1688*）第二三五頁）

（註七七）他們最初去結合違反國教者，是當詹姆士王所偏護的「信仰自由」的宣言將公布而牛津處事會議發表明堅決廢棄教會所專佔的職位的時候。「教士們同時懇求違反國教者站在他們底一邊，援助教會，而且應許當他們一旦得權時就優厚地報酬一番。」

（見厄爾著清淨教徒史第五冊第二九頁）

（註七八）這是一個直接的原因，曾被擁護當時的康威培利大主教並作傳記的人毫不羞恥地——以身為教會團體之主腦——承認。「王在一六八八年五月四日在樞密院中所宣布的命令，即指令所有大主教及主教將信仰自由宣言分送與其轄境內之教士並囑在全國教堂中公開發讀，使康威培利大主教不能再忍耐地要宣布反對王現在正不快樂地執行的勳諭了。」（見邁奧來著奧克

夫特處生活第一五一頁）

（註七九）有幾個作家曾企圖為教士辯護，因為他們以為公布這樣一種的宣言是不合法的。但這種辯護和他們底默從的主義顯然矛盾，而且和他們底前例及決議都相反。摩羅在他著的 *Ductor Dubitantium*——這是他們權威之作——裏說：「一個真實的若法底不合法的布告和勅令，教士可以在他們底嚴謹訓令裏印示出來。」（見潘柏 [Paber] 著養神處生活 [Life of Taylor] 第二八六頁）潘柏又說：「我承認我沒有發見摩羅這樣說過，我又感謝上天這個主義沒有被英國教士在一六八七年採納。」但為什麼在一六八七年不採納這種主義呢？是因為一六八七年王攻擊了教士所享有的專利，於是教士忘記了他們底主義，而企圖打敗他們底敵人。使這種改變的動機更來得顯著的，就是在一六八一年 康威培利大主教選擇使教士聽讀查理二世所公布的宣言哩，而且在新舊二條正稿裏也對於禮拜規程加入這一項。

（註八〇）續教自由案是在一六八九年通過的。違反國教的史家曾有一副本，一班違反國教者稱爲他們底大憲章。聖教補處史家也同樣

承襲，威廉三世應稱代是「他們能開始享受宗教自由的一個時代」。(見蒲脫勒著教徒底言行錄 *Memoirs of the Catholics*) 第三冊第一二二頁(第一三九頁)蒲脫勒所說的不是指新教遠反國教者而言，乃是指舊教徒而言，所以現在我們有兩派的教團都承認這時期的重要。有如哈拉姆很真實地說就是一七〇〇年逼退威廉的那可恥的行爲也是掩飾而行的。(見憲法史第二冊第三三二、三三三頁)

(註八一) 庫克 (Mr. Cooke) (見政黨史 *History of Party*) 第二冊第一二四八頁)曾注意到這金錢階級在十八世紀早期的顯著勃興，但僅說這個結果將增強民權黨底力量。雖然這無疑地是真確的，但其最後的結果——此後我將指出——那遠較任何政治或經濟的效果來得重要。直至一六九四年英國銀行才設立起來，而這個大的組織最初就遇到霍爾古代的人底熱烈反對，這個人底銀行一毫無用處，因為他底底層先並不需要銀行。

(註八二) 讚美他的人也常常誤聽了他。譬如，一個在世的作家告訴我們，「以許多不同的眼光來看，英國對於這次革命所應感謝的當然很大，但尤應感謝的，就是它迎入一個君主，善於抑制無意識的重征稅則，這是自由社會中的一定的特性，因此就產生一個能將人民底活動和精力轉入最好的軌道的政府，同時又因此可以維持他們底獨立。」(見阿利松著歐洲史第七冊第五頁)這我將想是對於威廉三世從未曾有過的極極了。

(註八三) 在一六八七年底十一月，據說他願意遠反國教者「有盡量行使他們底宗教底完全自由，和免除一切刑法底嚴酷待遇。」(見薩摩斯短編文集中卷第九冊第一八四頁)這是我所發見的，威廉希冀將教會實則不從國教者底極底最初的明顯表示，但當他到達英國以後，他底意向更顯明了。在一六八八和一六八九年間的正月裏，教會底友好者想怨說：「他給與遠反國教者底榮譽表示太使英國教會屈辱了。」(見克拉林致通信第二冊二三八頁)

(註八四) 李爾斯傳醫士，一個留心的觀察者說，「這個君主到達了以後，似乎對於長老會徒較國教徒爲尤偏袒，這使教士們都非常震驚。」見李爾斯傳底游歷及報告第三七五頁；又可參閱第三九九頁及第四〇五頁：「教會裏的人很痛恨這個荷蘭人，而且他們寧願變成天主教徒而不願接受長老會徒。」可比閱埃未林日記第三冊第二八一頁：「這些長老會徒，我們底新統治者。」

(註八五) 柏內特 (見我們底時代第四冊第五〇頁)說及一六八九年的教士：「這個王被他們所懷疑，因爲他對於遠反國教者表示好

意；但主要原因卻是爲他廢除蘇格蘭主教統治制和允諾在那裏建立長老會。關於英國國教對於蘇格蘭主教統治制的廢除所表示的懷疑，可閱薩麥斯短篇論文集第九册第五一〇、第五一六頁中一當代的短篇論文，在那篇文中表示恐懼威廉將在英國採取同樣的步驟。這個作者很公平地在第五一六頁說：「因爲如果我們放棄了蘇格蘭主教統治制，那麼，我們也必不得不屈從廢棄英國底主教統治制了。那時我們將完全無根據了。」

(註八六)可閱邁奧來著桑克羅夫特底生活第二五九頁，他底牧師窩吞底敘述，那裏說道大主教是非常忿怒並且告訴他：「他以後必須拒絕爲道斯王和他底王后作禱告，或在他底禮拜堂中盡任何職務。」又諾利治主教也宣布「他不爲威廉王和瑪利王后祈禱。」(見克拉克教通信第二册第二六三頁)這種態度在高級教會教士中是很普遍的，若公共的祈禱呈與道個王和王后，就被道班不輸誠的人稱爲「不道德的祈禱」，而這句話也就變成專門和公認的名辭了。(見一個教外人著開恩底生活第二册第六四八、第六五〇頁)

(註八七)內原論文(Nairne's Papers)中提起，在一六九三年，「有六百個牧師沒有發誓。」(見馬克羅松原稿 [MacRerson's Orits Papers])

(註八八)威廉在教士中所有的朋友就是以後所稱的那些低級教士，而且據說在一六八九年僅佔全體教士的十分之一：「如果我們估計他們佔全體牧師十分之一，恐怕我們所計過於他們底數量。」(見馬考利英國史第三册第七四頁)

(註八九)教士們在威廉入主英國以後的行爲對於教會底損害，其最早的暗示可以在埃夫林日記第三册第二七三頁裏看出來——這是很精巧的一段，徵措「公衆的驚疑」，「廣或培利大主教及其他底行爲。」對於愛護教會的埃夫林，這是個不愉快的問題，但其他的問題比較沒有這個來得嚴重，而且尤其是在國會中，人人都舉無忌憚地表示凡不個體的觀察者所必有的情緒。當王座尙屬空虛的時候，波勒克斯番 (Colleton) 在一六八八至一六八九年間之正月的有名的辯論會裏說：「有些教士想這樣，有些教士又想那樣；我總他們總不知道他們應該怎樣。」(見國會史第五册第五五頁)在二月，美那德 (Marsden) 在國會中最佔勢力的一員，很憤怒地說：「我總，教士們底心神是昏亂了，我又相信，如果他們得志，我們恐怕很少，或竟沒有一個得會留在這裏了。」(見前書第五册第一二九頁)教士們本身也很痛苦地感覺到這普遍的敵愾，其中有一個在一六九四年寫着以下的話：「英國底人民，當主教最得信仰的時候，他們是選擇非常地被我們所攝迷而不敬不崇拜我們，現在——我願我能說——即對於我們冷淡而漠視了。」(見薩麥斯短篇論

文庫第九卷第五二頁)

(註九〇) 柏內特這樣地稱呼他們：「這些憤怒的人曾在教會中備起這個大爐。」(見我們底時代第五冊第一七頁)

(註九一) 高教會教團確在他們底出版物中明白說明，如果詹姆士不獲召回，則他必持國外的軍隊以圖復辟。柏內特(見我們底時代第四卷第三六一、第三六二頁)說，當他們聽見一六九七年的和平，他們「驚慌」了；在路易十四去世的時候，卡拉密(見他自己的生平 *Life of Himself*) 第二冊第三三三頁)也下同樣的評述：「這非常混淆了詹姆士二世底黨員底謀謀而毀壞了他們底計劃。」

(註九二) 一六九三年桑克羅夫特在薩赫爾留時，「還為激因革命而毀滅的多難的教會而痛苦。」

(註九三) 爾原雖然被剝奪了職位，卻從不承認政治權力能有剝奪的權利；而且人人都知道他故意地保留他底頭銜。(見普爾斯開恩底

生活第二冊第二三五頁) 同樣的，聯合在一七〇三年選著「威靈·諾利治」等字樣。(見一個教外人著開恩底生活第二冊第七

二〇頁) 雖然法律上被褫職以後，他之不能再為諾利治底主教，有知他不是中國底皇帝一樣。又被達奧來所發表的(見桑克羅夫特底生活第三〇三頁) 桑克羅夫特底信札中也簽著「教會委員康忒培利。」

(註九四) 詹姆士和威廉間的鬥爭實完全是教會利益和政治利益間的衝突；道早在一六八九年已經可以看出來，那時我們從柏內特——與其說他是一個牧師，不如說他是一位政治家——裏知道「教會，就是詹姆士二世底政黨所說的教會，在那裏他們可以很平安地隱匿他們自己。」(見我們底時代第四冊第五七頁) 陶維爾很公正地說：「被褫職的主教底繼任者在宗教觀點上看起來，是獨立論者；又如果他們假託權威以為是充實有力的，那麼，他們將推測教會之成為一個社會。」按照教會底原則，威廉所選的主教當然不是僥倖者；他們底僥倖行為既祇有按照政治底原則被認為合法，那麼，僥倖行為底成功就等於政治原則得制伏教會底原則而得到勝利。

因此，一六八八年叛變底根本意義就是政治地位之超越於教會；恰如一六四二年之叛變底根本意義是民衆之超越於君王。(註九五) 卡拉密(見我們底時代第一冊第三二八至三三〇頁，第二冊第三三八、第三五七、第三五八頁) 關於因遭次革命底原故，在教會中所起的紛爭有一很富於趣味的敘述的確，他們底情感是這樣地破壞，勢至必將為他們分立兩派名目；於是在一七〇〇年及一七〇二年之間我們第一次聽見高級教會及低級教會底名稱。

(註九六) 其他那一方面底意見實很適切地寫在一六九一年的一封信上。(見一個教外人著開恩底生活第二冊第五九九頁) 「如蒙

被褻職的主教被認爲合法的主教，那麼，在他轄境內的教士和人民是必須承領他的了，於是所有主教由新任的大主教獲得有其權力及與之共精神上之生活者皆是分離論者；而和分離派底主教共精神上之生活的教士，其本人亦是分離論者；於是現在在法律上所建立的英國整個的教會將皆是分離論者了。」

(註九七)馬休頓爵(Lord Malmesbury) (見英國史第二冊第二四五頁)曾注意到他所謂的因一六八八年的革命而起的「教會與政府間底不自然的疏遠」以及因這次革命而漸減削的教會權力。

(註九八)這就是從前所謂「正規的及法定的」荒謬之處，好像任何人都能够保留人民不容其佔據的王座。

(註九九)一七一五年雷斯利，其中最具才德的一個，因此說到他們底地位：「你們現在是被迫着處於兩難之境——發誓或不發誓；如果你們發誓，則殘殺了你們底靈魂；如果你們不發誓，則將因失了你們底麵包而殘殺了你們底身體。」(見薩麥斯短篇論文集第一三三頁第六八六頁)這種兩難之境底結果就是我們所能預料的，一個高級教會底作末在威廉三世時跨得(見薩麥斯短篇論文集第五冊三四四頁)教士們所舉行的誓言對於政府並沒有什麼保障的；「政府並沒有在這些誓言裏得到任何的保障。」惠斯吞也在他底自傳第三〇頁裏說：「但我很記得，大部分的那些學院和教士團當時對於政府所發的誓言，若說不是違反他們底教訓，我總覺得是不由於裏的。」這是在一六九三年，在一七一〇年，我們又發現：「現在的情勢使我們相信，除各黨教士亦同樣地依此方法舉行任何誓言藉以獲得教教的地盤爲盡其宗教的義務來狂聲宣布其世襲的權利，即爲君底僞尊稱。」(見薩麥斯短篇論文集第一二冊第六四一頁)這種假託的方法或竟可以說，這種情爲可憐的事實立即傳佈了開去；八年以後，當時的大法官，即賈時登的羅柏頓爵(Lord Campbell)在上議院裏說：「陛下亦有土地之最好的部分及所有的貿易的利益，至於教士，他將不表示意見——但是很明顯的，大多數的民衆都接受了他們底誓書，而這種誓書至今還未完全消滅哩。」(見國會史第七冊第五四一頁)

(註一〇〇)「還許多人對於這種靈神的一件事底通辯簡直沒有強固現代正盛行着的無神論。」(見柏內特著我們底時代第三冊三三八頁)我誠不用說，那時對於懷疑主義和無神論常混淆不明，雖然這兩樣事情非但不同而且還是矛盾的。

(註一〇一)在這設計裏面，必須特別提出非難所有引起自由研究的書底實施。在這方面看起來，教士們實爲害不淺。

(註一〇二)在一七〇四年柏內特(見我們底時代第五冊第一三八頁)說及教士會議，「因爲對於它們不看重視，故關於它們的反抗」

也不甚厲害。」一七〇〇年關於康沃特地方底上下教士會議起了爭論，這無疑，更助增了這些誤視的情態了。

(註一〇三) 福脫黎 (見回憶錄第二册第九五頁) 說，最後的開會是在一七二〇年，照我所發見的其他的權威作品都寫的是一七一七年。

(註一〇四) 一七二七年克爾登牧師 (Rev. Thomas Clayton) 寫的一封信是值得閱讀的，因為他表明教士對於這問題底感覺。他說：

「這個時代底明顯的墮落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教士會議底廢絕，而大膽和不虔敬的書籍得以公開流行而不受公共的非難。」

(註一〇五) 歐納在搖籃十五世紀時英國底情形時曾說：「在亨利六世及以後的朝代中，教士們當着政府底大臣，掌璽大臣，內閣顧問，金庫長，各國使節，出席國會及廷蘇格蘭之代表；御膳長，皇族著作底檢閱者，大臣，紀錄底保管者，喪葬司管長，而且還是王和格羅斯威公，爵底御醫。」(見歐納著英國史第六册第一三三頁) 關於他們巨額的財富可參閱狄克爾斯著英國家第一四六頁：「在十四世紀早期，據估計王國之土地幾盡半皆在教士底手中。」

(註一〇六) 一六二五年林麻主教 (Bishop of Lincoln) 威廉 (William) 被解保管御璽之職；卡姆塔爾公 (見權要底生活第二册第四九二頁)：「這是教會底人之能任英國國璽大臣之最後一次，雖然有些地方禮稱爲中古時代的習俗，但我卻以爲這種試驗恐怕不會立即恢復的。」

(註一〇七) 蒙克 (Monk) (見本特利底生活 [Life of Bentley] 第一册第二二三頁) 說：「布利斯特底主教 (Bishop of Bristol) 約翰·魯賓遜博士 (Dr. John Robinson) 是御璽大臣及伏特累克特條約 (Treaty of Utrecht) 底全權大臣，而且是英國教會中人能執政府最高職位的最後一人。」一七一二年，一個高級教會作家曾對於「選出教會權力於政府」底努力表示不滿。(見麥斯底新編論文第一三册第二二一頁)

(註一〇八) 亨利三世及其後一朝，「大主教，主教，僧長，修道院院長及教會中人的數目大多和政治上的貴族及男爵底數目相並，而且反選起此數。」(見巴利 [Party] 著英國國會及會議 [Parliaments and Councils of England] 第一七頁，一八三九年倫敦出版) 關於這點，巴利曾舉了好幾個例，其中最顯明的就是：「在亨利三世底第四十九年，被召於國會的有一百二十個主教，而教外的顯爵祇二十三人」這當然是一絕對的例外。

(註一〇九)據一八五四年陶德(Doe)地方底報告，所發見上議院包括有四百三十六個議員，其中有三十個議員是屬於教會方面的。

(註一一〇)一個很精明的觀察者在當時曾痛憤地表示，教士之被逐出於下議院即主教被逐出於上議院的自然的預兆。在討論關於「阻止教會中人加入衆議院底議案」時，瑟爾羅爾勳爵(Lord Thurlow)「提起主教們在當時的保有權，而且說，如果這個議案刺穿了，下級教士底選舉權，則它竟或會動搖對立的那一院底教士議員底權利。雖然他知道這些可尊敬的主教以佔有男爵品位底權利而前，是被認爲政治上貴族議員的。」(見國會史第三五册第一五四二頁)

(註一一一)現在要確定十七世紀時英國教會追逐反國教者底極高的程度是不可能的，但據戴累特(Jeremy White)曾計算在一六六〇至一六八八年之間曾有六千個受難者，其中有五千餘人是死於獄中的。(見著格(Boguel)和本內特(Bennett)合著的遠反國教者史料(*History of the Dissenters*)第一册第一〇八頁)的哈烏得(Harwood)在一六七二年在衆議院裏很坦白地說：「我們底目的是要將所有遠反國教的人帶入新教會，凡不願加入道教會底人將不會得到安適。」(見國會史第四册第五三〇頁)

(註一二)除馬爾巴羅公爵夫人爲教訓後代的原故而保存的信札以外，我們還可以在達爾利姆普爾著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記中所發見的信札內找到估計安廊底能力底種種資料。剛在宗教自由底宣言公布了以後，安廊在一封情真篤著：「這是我們，全英國教會，所有的一個可憂慮的現象。所有的獨立派門徒，現在可以任所欲爲了。每個人都能自由實踐其宗教，其目的當然在於傾覆我們，這我相信，對於所有的不偏心的評判者是非非常明白的。」(見達爾利姆普爾著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記第二册第一七三頁第五本之附錄)

(註一三)可哈拉姆著憲法史第二册第三九六、第三九七頁。哈拉姆說：「不容疑慮，如果這個王后底生命再爲保守黨之政府保留幾年，則宗教自由底每一痕跡都將被抹去。」在一八四一年倫敦出版的弗奧遜信(*Vernon Correspondence*)第三册第三二八頁裏說，在安廊離位以後，就有「排斥遠反國教者底選舉投票權」的提議，而且我們從勃納裏(見我們底時代第五册第一〇八、第一三六、第一三七、第二一八頁)知道，如果安廊反對遠反國教者底熱烈表示較其原來的更甚，則教士們將更喜悅。

(註一四)參維德遜著教會教徒史(*Vimey's History of the Baptists*)謂安廊之死是「遠反國教者警告之結果」。

(註一五)其中兩種最惡劣的，即「反對臨時信奉國教令及限制教育令在一七一九年的會議中取消了。」(見哈拉姆著憲法史第二册第三九八頁)「反對臨時信奉國教令底取消曾被約克及康沃培利大主教所極力反對」(見著格及本內特著遠反國教者史料第三册)

第十三頁)；但他到底反對是德熱的；當倫敦主教在一七二六年想設法收回宗教自由案的時候，他就爲據事長姚克(Yorke)所阻止了。

(註一一六)在十七世紀末葉，遠反國教者之開始組織會社及宗教會議實激起極大之注意。

(註一一七)羅爾斯短篇論文集第一二冊第六八四頁裏說，在查理二世初代時，「這種惡劣的待遇釀成遠反國教者對於教會迫害底極大怨恨。」

(註一一八)如果感動力是評判一個演說家底最適當的測驗，我們確可以斷言惠特非爾特是十二使徒以來之最大的演說家。他第一次的佈道是在一七三六年，戶外傳道開始於一七三九年；在他三十四年的傳道事業中所傳佈的一萬八千次講道，對於各階級，無論受教者與不受教者，實產生了極驚人的影響。

(註一一九)關於他，麥考萊曾說「他在政治上的天才並不亞於黎塞留(Richelieu)」；他這句話底附辭是這樣地着力，凡曾比觀凱斯利底成功和困難者皆不會視爲過甚其辭。

(註一二〇)在一七三九年，韋斯利第一次公開地反抗教會和拒絕服從要他離去主教管轄區的布利斯托爾主教底命令。同年他開始戶外佈道。

(註一二一)他們坦白地承認，「宗教冷淡的情緒是增強遠反國教道一主義底又一危害。」(見普格及本內特合著遠反國教者史料第四冊第三三〇頁)在紐遜著基督教教義之發展一書第三九、第四三頁，有關於韋斯利主義衰落底敘述。紐遜似乎將衰落底原因歸因於韋斯利信徒已趨於「以規則代替了熱誠的地步一事實。」(見第四三頁。)這或者是真實的，但我們仍以爲較廣汎的原因總是那比較實際的原因。

(註一二二)高爾波爾以夷鄙的態度提到十八世紀中葉監理會教派底傳佈(見高爾波爾信札第二冊第二六六、二七二頁)而卡來爾(Carline)在一七七五年對上議院說(見國會史第一八冊第六三四頁)「監理會教派一天一天的得勢，尤其是在工業城市裏；」過後似乎威靈吞公爵(Duke Wellington)寫給埃爾頓的一封信裏(見脫維斯著埃爾頓底生活第二冊第三五頁)說大抵在一八〇八年的時候，這教派竟在軍隊中宣傳改教。

這些證據雖然確實，卻也有些空泛；但我們還有其他關於宗教分裂的急速增長的更確實的證據。據說在威廉三世稱帝中所擬定而後來被達爾利博普爾所發表的一張公文（見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記第二冊第二篇第一章之副錄第四〇頁）說：「在英國，信奉國教及不從國教的人底比率是二十二又五分之四對一。威廉死後之八十四年，這反國教者——以前祇佔二十三分之一——現在竟計有全社會底四分之一。」（見國逸夫主教新宗底生活 *Life of Watson, Bishop of Landsat*）第一冊第二四六頁中窩宗於一七八六年致羅德蘭公爵 *(Duke of Rutland)* 底信。）

從這時起，這個運動就沒有間斷過；而最近政府公布的報告顯露一驚人的事實，即一八五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日英國教會底教徒參與禮拜的僅超過另設崇拜處所的那些獨立教會派底會員、浸禮信徒及監理會教徒等底半數。（參國統計雜誌第一八冊第一五一頁底戶口調查表）假如這種衰落的程度繼續下去，確要使英國教會不能再受她敵人底攻擊而生存於未來的一世紀。

註二二三）惠斯利信徒由教士中——大半都是魏真——所受到的迫害表明如果這種殘暴的行為不為政府所阻，則其受害者將不知伊於胡底。惠斯利本人也曾詳細記載——賈四以為不宜敘說的——他和他屬信徒所受的教士們底侮辱及誹謗。格羅斯萊 *(Grosvenor)* 在一七六五年游歷英國時說及惠特非爾德，「這已確立的宗教底牧師們極力地破壞這個新的傳道者；他們佈道反對他，對人民說他是個宗教底狂妄者，一個幻想者等等；結果，他們底反對他是這樣地勝利，以致使他在每一地方，當對公眾開口的時候，就被人用石投擊。」（見格羅斯萊著一七七二年倫敦出版倫敦之行 *Tour to London*）第一冊第三五六頁）

註二二四）書籍及本內特合著的違反國教者史料第三冊第一一六頁第一一六頁裏很審慎地觀察到，惠斯利主義以井然有序的性質浸著於分裂英國國教的事業中而助進了分裂之勢，這些性質相當地近乎教會底訓練。但這些作家對於惠斯利太過苛刻了；雖然無疑的，他是個非常野心的人，而且過於喜歡攪擾。在他事業底早期，他開始專注於較清淨教徒所企圖的更高的目的，而他對於清淨教徒底努力——尤其是在十六世紀時——似有幾分輕視。譬如，在一七四七年，祇在他反抗教會後八年，在他底日記裏對於那些「聖神的做偽者底權利」（即伊利亞白清淨教徒）表示驚異，「他們大都受了這樣多的時間與力量於白法衣及僧帽底爭論，或跳在聖案之下而曰：」（見日記 *Journal*）第二四九頁，一七四七年三月十三日出版）這樣的奮鬥必不會滿足惠斯利底超羈的頭腦的；從淺淺於他巨額的日誌裏的精神及他為管理他教派所立的審慎而遠見的設施看起來，復顯然的，這個偉大的分離論者具有較任何前人為

大的見解，並且他希亞組織一制度足以抗衡已確立的教會。

(註一二五) 哈拉姆 (見歐洲文學第三冊第三九〇頁) 說卡姆柏蘭德「似乎是第一個基督教作家，想設法有系統地建立脫離宗教而

獨立的神權權利底原則」以神學為運轉學底基礎所常遇的危險現在是大家所深知的，但沒有一個作家會像孔德這樣清楚地指出。

(註一二六) 這點可以在德爾為教會與政府之聯合 (The Alliance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一書中找到，這本書據勞德

(Hard) (見一七九四年出版哈爾生生活 [Life of Warburton] 第一三頁) 就是在 一七三六年出現，並且可以將這會引起

了極大的騷動。這關於這本書所生的影響，我將俟有機會時加以探討。

(註一二七) 卡姆柏蘭德和休謨間的關係包含在純屬現世的相對裏面，照這策劃，他們兩個都研討着倫理學；在其他方面，他們底討論顯

有極大的差異，但如果反神學的方法被認為有力，則當然休謨處理這問題的方法於前提上較他底任何前達者為重要了。就是這一點

使休謨成為卡姆柏蘭德底繼續者；雖然俛侍的是，非但他號卡姆柏蘭德出生過半世紀，而且還具有較富於理解力的頭腦。

(註一二八) 培利底運轉系統，既本質上是屬於實利主義，也就完成了這一研究範圍的革命；又他底工作是用極大的能力作成的，故對於

正預算要接受它底工作這一時代發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底道德及政治哲學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出版於一七八

五年；一七八六年這本書即成為劍橋大學底標準讀本；至一八〇五年它已經經過十五次的覆版了。

(註一二九) 這兩個學齡的人底著作組成了一同策劃底各部分，凡曾研究過他們所屬的學派底歷史者無不深知；至關於他們彼此在智

力方面的關係，我最好只有介紹爾爾本人寫的一封信 (見哥林 [Coarling] 編纂邊沁教書 [Bentham's Works] 第

一〇卷第四八一、四八二頁)

(註一三〇) 試用法令底取消，舊教徒底被允入國會，及贊許容納猶太人底情緒之繼續增進都是這個偉大運動底主要徵象。

(註一三一) 陶脫勒 (見舊教徒實行錄第三冊第一八二—一八四頁又第三四七—三五〇頁) 顯然歡樂地注意及這個名辭的辯論臨

與英國教於查拜的地步的影響。

(註一三二) 對於教條及舊條之訂定攻擊最力的牧師羅德海之室一書是在一七六六年出版的；據當代一個批評家說，「這書激起了普

遍的研究精神」。結果在一七七二年布拉克本和其他英國教會底教士組織了一個會社，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廢棄所有宗教上傳統條

訂定。反對教條的請求書立刻草就，爲二百名教士共同簽名而呈於下議院。在繼着的一個激動的辯論會上，美畢遜斯爵士 (Sir Wm. Han. Meredith) 說：「英國教會底三十九條教條是在獨立研究精神及自由的擴大的觀念還在幼稚的時代造成者。」(見國會史第一七卷第二四六頁)他又在第二四七頁裏說：「有幾條教條是絕對的不可通解，而且確是矛盾和可笑。」湯受勒爵 (Lord George Graham) 說：「以我所見，此中有幾條是不可通曉，又有幾條是自相矛盾的。」(見第二六五頁)羅勃萊 (Sandbridge) 宣布這些教條是「驚人的荒謬」羅脫爾 (R. B. R.) 以爲它們是「極荒謬之能事，而不容辯護的了」鄧寧 (Dunning) 以爲它們是「顯然的滑稽」(見第二九四頁)

(註一三三) 按蓬著 查德與傾覆 一書現在實受兩世紀的熱誠和無所顧忌的反對者所嫉妒地詳密審查；但我現在只表明適切的評判者應一般意見，即每一次的審查都加增了這書底新的聲價。因反對他那有名的第十五、十六章，所有的辯論方法都用盡了；但唯一的結果卻是這個史家底名譽永不磨滅，而他底仇敵底攻擊卻完全被遺忘了。波蓬 著作存在；但誰還對於反對他底文章一點感到興趣呢？(註一三四) 對於地質學的懷疑性在十八世紀最後三十年方第一次清楚地表現出來。以前，地質學家和神學家大致相聯繫；但因公共意見底繼續增長的確證，現在使他們不願以前所接受的教義，組織了獨立的研究。以這一點而論，哈頓 底研究工作影響最大，他底著作，埃爾斯士脫 含有「最早」的以完全自然動力底關係來解明地殼以前的變動」的企圖。(見埃爾斯士脫 地質學原理第五〇頁) 建立這種方法，當然就是要分解和神學家的連合；但這種化底較早的徵象是在一七七三年，就是哈頓 寫這本書之前十五年；可閱高宗 著他自己的生活 (Life of Hume) 第一册第四〇二頁那裏面說：「自由思想家」攻擊「摩西」計算世界底時代，尤其是在布利唐 (Brydone) 底 遊歷西里及馬爾泰 (Travels Through Sicily and Malta) 一書出版以來。」按耶特斯 (Journals) 說：「見編纂者教本 (Bibliographer's Manual) 第一册第二七九頁」布利唐 底書是在一七七三年出版的；一七八四年瓊斯 爵士注意到這些研究底繼續，可閱他著希臘意大利及印度神底討論 (Discourse on the Gods of Greece, Italy and India) 在裏面，他惋惜地說，他生活在「一個時代，那時聰慧及善良的人傾向於懷疑摩西 對於原始世界之講述的真確性。」自此以後，地質學底進步是這樣地迅速。摩西 著作底歷史價值都被所有的有識者以及教士們本身所棄絕了。

(註一三五) 通常以爲主日學校是在一七八一年創始於果克斯 (Calkin)；但雖然他似乎是第一個人組織得稍具規模者，可是開始建立

的當然是林齊(Lindey)，他在一七六五年或較勝。

(註一三六) 亨特(Hunt)見新聞史(Hist. of Newspaper)第一冊第二七三頁裏所提到的日曜日新聞報並沒有早於一七八五年 克拉布(Crabbe)所說的，但一七九九年 塔爾格累夫(Lord Belgrave)在下議院裏說，道登新聞報「大概在一七八〇年」出現的。見國會史第三四冊第一〇〇六頁。一七九九年威爾柏福斯(Wilberforce)擬設法頒佈法律以禁止之。

(註一三七)當一七二五年 佛蘭克林(Franklin)到倫敦的時候，在這首都裏簡直沒有一個流通圖書館。在一六九七年倫敦底唯一近乎公共性質的圖書館就是在四杭大學(Ston College)，屬於於倫敦教士的圖書館。(見埃利斯著文人書牘(Letters of Literary Men)第二四五頁)最早的流通圖書館底確實日子我還不能確定，但按羅西說在倫敦最早設立的是十八世紀中葉時潘考考(Ranuel Pancoote)所設立的一個。哈頓見他自己的生活第二七九頁說：「我是第一個在一七五一年在伯明罕(Birmingham)開設一個流通圖書館的人。」

(註一三八) 一七四六年 吉安忒(Gent)——一個有名的印刷家，書寫他自己的生活，在這本珍奇的著作裏，他說，在一七一四年「除了在當時的倫敦以外，英國沒有幾個印刷者，我可確定在那時，撒斯忒、利物浦、曼徹斯特、肯達爾(Kendal)和利茲(Leeds)，也都沒有。現在大部這樣地繁多。」(見吉安忒底生活(Life of Thomas Gent)第二〇二頁)這種情形之如何補救是史家底一個最要緊的研究，在這個註釋裏面，我只得舉幾個例表示各區域底情形。在羅徹斯忒(Rochester)第一個印刷所為非雲(Fisher)所建立，他死於一七八六年；在惠特牌(Whitby)最早的印刷所建立於一七七〇年，而格林(Richard Greene)——他死於一七九三年——「是第一個帶印刷機到利池非爾(Lidfield)去的人。」在安姆朝代時，伯明罕沒有一個書買，但在一七四九年，我們發見一個印刷者在那裏開辦。(見赫爾信札(Herl's Letters)第一冊第九二頁，一七七八年倫敦出版。) 一七七四年在雷爾刺克(Raithick)也有一個印刷者。(見國會史第一七冊第一〇九九頁)在其他地方這個運動是比較遲緩些，據說，約在一七八〇年時，「簡直沒有一個書買在康瓦爾(Cornwall)」(見德流之子著德流底生活(Life of Samuel Drew, by his son)第四〇四—一八三四頁出版)

(註一三九)得左格李斯(Deagalliers)和希爾(Hill)是最初專從事於書及物理真理的兩個作家。在喬治一世朝代開始時，得左格李

斯是「第一個在倫敦講關於實驗哲學的講演的人。」（見羅西著平凡的書第三編，一八五〇年出版第七頁）至於希爾，據說是開始以叢書式來印行羅西科學著作的人，這種方法是這樣地適合於那愛好研究的時代，如果我們相信好萊斯·高爾波爾的話，他曾「賺十五金幣一星期。」

十八世紀底後半葉對於自然科學書籍底要求很迅速地增加，在喬治二世朝代之早期，普利斯特利（Priestly）就用通俗式寫關於自然的題材。哥德斯密（Goldsmith）也差不多走着同一方向，而彭南特（Parnet）——他最早的著作是在一七六六年出現——是第一個在不列顛用通俗及有趣的風格寫自然歷史的人。喬治二世時，出版界開始鼓勵對於化學作最初步的工作。

（註一四〇）十七世紀末期，在英國第一次企圖創立文學雜誌但評論報——以我們現在所知的，一種批評的出版物所謂評論報者——在喬治二世登位以前還是沒有人知道的，可是在他朝代底中葉，這些報乃開始增加。

（註一四一）一七六九年底夏季可以定為英國公共集會底最初建立時期。（見阿爾培馬爾（Albemarle）著洛克金罕人（Men of Rockingham）第二冊第九三頁）「公共集會……人民可以在其中表示他們新獲得的權力的感覺……不能很清楚地溯源於一七六九年以上，但現在卻變為（即一七七〇年）日常所見的事了。」（見庫克著黨政史第三冊第一八七頁）

（註一四二）最有名的書列在喬治二世朝代末期初次在報章上公布出來。

（註一四三）在一六九六年唯一的報章就是週刊，而最初的日報是在安妮朝代時出現的。至一七一〇年，它們不僅記載消息，且開始參加「政治問題底討論」（見哈拉姆著憲法史第二冊第四四三頁）；又因這種變運的前幾年，政論小冊子售價便宜，故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其傳播性底偉大運動已顯然過於肩了。在安妮去世後之二十年中，這個革命也就完成；於是報章，在世界史中，開始成為公共意見的代表。據我所知，這個新權力在國會中所受到的最早注意的是在一七三八年丹弗斯（Danvers）底演說中；這次演說很值得轉錄，因為一方面它表明一個時期，另一方面它足表示丹弗斯所屬的那一種亂的階級底特性。這個著名的立法者說：「但我相信，大不列顛底人民現在被一種從未在任何世代或國家所聽聞過的——以最高權威而論——權力所統治。這種權力並不包含在君主底絕對的意志之內，不在國會底意向之內，不在軍隊底力量之內，不在教士底影響之內；這也不是婦女操權；但這是報章底統治。我們週報內所充滿的材料所得到的人民底敬禮較國會底決議案還重要；而任何一個半耐寫作的記者底意見對於民衆底力量較王國中最好的政治家」

底意見都來得厲害。」（見國會史第一〇册第四八頁）

（註一四四）這個大的爭論在一七七一年及一七七二年中告了一個結束；那時，如卡姆塔爾爾勳爵說：「刊登國會辯論稿是堅固地確定了。」（見卡姆塔爾爾著重要底生活第五册第五一一頁，第六册第九〇頁）

喬治三世常常因執拗，極力反對民權底伸展。一七七一年，他致函諾爾斯勳爵（Lord North）：「刊登國會辯論於報章這個習慣而不按的方法極須禁止。但上議院豈非一個最好的法庭去審判這種惡徒的嗎？因為它既能判罰，既監禁囚，又有够力量去擔負這種道義有利的政策而避免贖責。」

（註一四五）約翰·羅素勳爵（Lord John Russell）在他著的英國憲法史（History of English Constitution）裏說：「暫布博士（Dr. Jobb）及以後的卡特賴特（Cartwright）宣傳着個人代表的理論；」但這似乎是錯誤，因為這個理論據說是一七七六年時卡特賴特初次發表的。

（註一四六）關於這一點，我有一有趣的辭語上的評釋——即，我們有理由可以相信「獨立」這個字以現代的意義來說，在十八世紀早期以前尚未發見於我們底語言中。

（註一四七）惠特利大主教說：「在上一世紀底末葉以前，無論在攻擊我們底宗教方面，或擁護宗教攻擊底證據方面都並沒有以民衆的方式舉行的。在兩方面，學者（或那些自認爲學者的）似乎都同意於這一點——即人民大眾是服從優於他們的人底決議的，他們不願，且亦不能於這問題運用他們自己的思想。」

（註一四八）科爾利治（文學遺著第一册第二三〇頁等）曾對於英國文體有所評述；而且很公平地說：（見第二三八頁）「革命以後，國家底精神較以前愈更商業化，一個通俗的團體，或所謂牧師者已漸漸消滅；普通的文學開始通行於一般民衆之間。」他繼着爲這種變遷表示痛心；關於這一點，我是和他不同意的。可再閱朋友一書第一册第一九頁，在那裏他將現代的文體與十七世紀底偉大作家底那「莊嚴的造租和困難的演變」作一對照。

事實是，這個運動不過是社會各階級互相混合接近的趨勢中的一部分罷了，這種趨勢在十八世紀時開始清楚地被看出，它不但影響於作家底文風，而且還影響於他們底社會習慣。休斯脫在前一時代學者和世界太過隔隔了；但在他底時候，他們漸漸較易於「接

談」(見休謨著哲學叢書(Hume's Philosophical Works)第四卷第五三九、五四〇頁)繼約翰生(Johnson)、波遜和巴爾傑予以反對;但因與時代精神相違反,故不久即靈煙似地消失了。

(註一四九)這種卑躬屈節大都是得到很好的酬報;當然,這種酬報遠邁於其所值。在十六、十七及十八世紀早期,金錢常常奉送給這些作家以買他們的獻身。當然,恭維愈烈,則須錢愈多了。

十八世紀中葉就是這種乞憐情狀底轉機。

(註一五〇)當布藍(Le Blanc)在喬治二世朝代之中葉訪問英國的時候,作家依附個人保護的風氣開始湮滅,而預約印書的方法亦已普遍了。柏克在一七五〇年到倫敦時表示驚奇地說:「第一流的作家既已落於反覆無常的民衆保護之下,但這些不良的現象姑不計及,文學確已進步至一高深的程度。」(見普賴厄(Prior)著柏克底生活(Life of Burke)第二一頁)這種編具增高的獨立性,我們也可以從一七六二年一個眾望所歸的作家直接攻擊為民衆服務之「社會人」的事實裏看出來;以前以作家是祇敢指出他所攻擊的大人物底名字之第一字母的。」(見馬洪著英國史第五冊第一九頁)

(註一五一)在英國,書籍數量底激增開始在十八世紀之後半葉,尤其是在一七五六年以後。關於這點,我可以加述,在一七五三年及一七九二年之獨報草底銷售也倍見加增起來了。

(註一五二)少數量的明顯反覆性及無規律性,那是由於不重要及常常尚未發現的定律底運用所產生的擾亂而起。在大數量裏,這些擾亂相平均地抵消;我以為這就是由平均數內所得的正確性底主要基礎。如果我們能將所有的現象都歸原於它們所屬的定律,那麼,我們可以永不用平均數。當然,「反覆無常」這個辭,嚴格講起來是不正確的,不過是我們愚昧的一種測算罷了。

(註一五三)喬治二世底缺點,就在他底英語發音之不流利;但喬治一世非但不能發不正確的英語,且只能和他底大臣羅白脫·窩爾波爾爵士(Sir Robert Walpole)以拉丁語談話。法國朝廷見此情形,不禁深喜;一七一四年底十二月,受特農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致函厄賽斯公主(Princesses des Ursins)說:「人說那新王討厭他底臣子們而他底臣子們也討厭那新王,望上帝鑒察一切安置好吧。」(見曼特農書牘(Letters inédites de Maintenon)第三冊第一五七頁)

(註一五四)一七一五年雷斯利寫信說到喬治一世,「他對於你是個陌生人,完全不明你底言語,你底法律,風俗和憲法。」(見薩摩斯所

（譯文第一三冊第七〇三頁）

（註一五五）最近出版的赫維勳爵著傳記（Lord Harvey's Memoirs）對於喬治二世底性格頗多發見，這是一本很珍奇的著作，完全證實我們由其他方法所得到的關於這個王對於英國政治之意味的確的，這個君王什麼都不顧，祇顧兵士與女人，而他最高的野心就是製造成一個大將軍與成功的淫逸者。除赫維勳爵底證明以外，我們從其他方面的權威，確實知道，喬治二世既被輕視，又被厭惡，而且觀察者以及他自己的大臣輕鄙地談到他底人格。

至關於王權底衰落，很重要地應加以說明，自喬治一世接位以來，我們底君主沒有一個是被許參加國家重要政事之籌劃的。

（註一五六）英國教會通常對於一二世兩喬治政府底厭惡是公開地表現着，而且是這樣地堅持不屈，以致成爲英國歷史上的主要事蹟。一七二二年，阿忒柏利主教（Bishop Atterbury）被捕，因爲發覺他和偽君（即詹姆士二世）聯合作叛。在他被捕以後，教會立刻爲他辯告。馬洪勳爵說——「假託以爲他受着痛風症之苦，全倫敦及韋斯敏斯德之教會公開地爲他辯告。」（見馬洪著英國史第二冊第三八頁）

牛津大學裏——教士在那面久佔優勢的——他們是這樣地努力灌輸他們底主義，以致引起了老彼得底忿怒，他在一七五四年的國會演說裏譴責那大學，以爲它「從事多年不斷的叛逆——從未會有這樣一個學校」

這種情形底直接的結果非常顯著。因爲政府和這反國教者既同被教會所反對，自然也就聯合起來。這反國教者用他們所有的力量來反抗那「偽君」，而政府則保護他們以免於教會底迫害。

（註一五七）「一七六二年是這兩政黨底一個可紀念的時期，因爲它證明高位與非佛獨佔的毀壞，這些高位與非佛曾被民主黨佔有四十五年之久。」（見庫克政黨史第二冊第四〇六頁）菩林布盧克勳爵（Lord Polingbroke）很清楚地預知喬治一世接位以後所發生的結果。安輝剛去世，他就致函羅徹斯主教：「但最使我深感憂慮的就是，我清楚地看到保守黨已經消滅了。」（見馬克非原稿第二冊第六五一頁）

（註一五八）格羅斯在喬治三世即位之後五年游歷英國時，說起英國人民知道王能說英語而無「外國的聲調」後所產生的大的影響。（見格羅斯著倫敦之行第二冊第一〇六頁）誰都知道，王在第一次演講時曾自誇爲不列顛人，可是一般人不知知道這個光榮是

在政府方面的：「是怎樣一件光榮的事。」上議院對王說：「這是怎樣光榮的一件事加到大不列顛底名上，當你陛下樂於視為家驩。」（見國會史第一五册第九八六頁）

（註一五九）喬治三世之即位，普遍定為英國雅各黨消滅之時期。好萊斯·窩爾波爾說：據說道新王第一次朝謁時，「利池非爾伯爵，巴爾特爵士（Sir Walter Bageot）和主要的雅各政黨皆進了法庭。」（見窩爾波爾著喬治三世傳記第一册第一四頁）祇三年前，雅各黨徒會非常活動，一七五七年李格佩（Ragby）選致喬治德福公爵（Duke of Bedford）說：「福克司在文左（Windsor）之選，是極有疑問的。雅各黨會捐集了五千鎊之數用以反對他而以達什烏爵士（Sir James Dashwood）為首。」（見培德福通信 Bedford Correspondence）第二册第二六一頁）

（註一六〇）查禮士·斯圖亞特是這樣地天賦愚癡，直至二十五歲還未能書寫，且完全不能辨字。一七六六年，他父親死後，這個自稱為英王的卑劣的角色即奔走羅馬而沉湎於酒。一七七九年，斯文本在佛羅被確看到他，他是常常每夜偶然大醉地留戀於歌劇院的。（見斯文本著歐洲宮廷（Courts of Europe）第一册第二五三至第二五五頁）一七八七年，他死的前一年他還繼續着這種墮落的生理。

（註一六一）喬治三世對於教會儀式所常顯示的尊敬，與其前幾代的君主底漠然的態度顯然相反，這種變化使一般教士暗自深喜。

（註一六二）喬治三世失學實甚，成年以後，他從來不想補救這種缺點，卻甘於一生處於可憐的愚闇中。

（註一六三）在一七八二年提議國會改革案時，他曾宣布「這是必需的。」一七八四年他曾提到「國會改革之必需。」有人說他以後因當時情形之不順利，故放棄了改革的動機，其實這是不正確的。反之，他在一八〇〇年一次演說裏說：「關於這問題，先生，我想我應表白我深藏的思想；我應宣布我最堅決的意見，即雖然時候是合於這些試驗，可是任何——即使最輕微的——在這樣一個憲法中的改變，都必須被編為一種禍害。」很奇的，在一七八三年這樣早，培利似乎已懷疑彼特之公認擁護改革的真誠了。

（註一六四）一七九四年格累（Grey）在下議院嘲笑他這一點說：「威廉·彼特，當年的改革者，是現在的壓迫者，是的，也是改革者底壓迫者。」卡姆培爾說：「他以後還想絞斃幾個繼續為此而奮鬥的改革同志。」（見戴列長（Chief-Justices）第二册第五四頁）

(註一六五)這就是這個王偏護奴隸販賣的熱心，在一七七〇年「他親自發出一訓令命令這個官吏(即弗基尼阿(Virginia)官吏)大違其初願地不贊同以任何理由禁止或阻礙奴隸運口的法律。」見麥克萊夫著美洲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第三冊第卅五六頁。所以傑克遜降生在第四六九頁真忿怒地說，當法院已決定「任何奴隸一踏入英國國境，即可得自由的時候，英王即站在人道主義處中途而甘為殖民地奴隸販賣之支柱。」彼特在這件事上的反覆的行為使任何忠實的人都難於寬恕他。

(註一六六)學識豐富的作家——在其他方面，意見都不相同的——曾承認彼特固願保守和平，他所以忿忿和法國開戰者都是受了羅歇影響之故。

(註一六七)單是這個政黨及這個名稱的存在，在政治的觀點上，已可表明英國在這時期正在撤銷革命時所建立的主義了。

(註一六八)政府人員能力底衰微，柏克在一七七〇年視為這個新制度底自然結果。可參照現代不揣底考慮(Thoughts on the Present Discontent) (見柏克叢書第一冊第一四九頁)及國會史第一六冊第八七九頁他對於喬治三世最初九年中的退步底驚人的概述。「因此，最後的問題不是誰能擔任公共的事業而是誰願擔任去做。有才具及正直之士將不願接受他們不容自下判罪及不容衰頹他們底心底純正的職業。」一七八〇年當這種禍害更形明顯的時候，這個評論者在他對於布利斯托爾選民的名演說中直接痛擊這一點。他說，「現在，是朝廷企圖要減削它底官吏底權實。」(見柏克叢書第一冊第二五七頁)

(註一六九)布盧安勳爵(Lord Brougham) (見政治家分論(Bleches of Statesmen)第一冊第二二三頁)曾發表喬治三世對待查爾斯輝斯爵之他自己所謂「純屬野蠻的暴怒」底驚人的證據的確，這個王在這個偉大朝臣底辭職時還表現着他底盛怒。(註一七〇)布盧安 (見政治家分論第一冊第二一九頁)說：「這倒是個疑問，在任何時代中，曾否有政治家像他這樣地明於與他本國相往來而須維持關係的各國底各種興趣及確實的地位。」

(註一七一)柏克在法國革命以後還說，阿克則底性情是「最率直坦白，開放和仁道，不喜極端；即使對於一種過失亦能和平寬恕地過之，不存一點惡恨在他底整個性情中。」(見國會史第二八冊第三五六頁中一七九〇年對軍隊評述的演說)

(註一七二)一七二五年，華吞公爵(Duke of Wharfon)寫給「僑君」的一封信中，除提到閣及下院之議事日程外，又加說，「在上院中我們底人數是這樣少，任何行動都不見重要的了。」(見英法英國史第二冊附錄第二三頁)

(註一七三)這是不明瞭而不能否認的；一八〇〇年尼科爾斯(Nicholls)在下議院中嘲罵政府「將貴族爵位賜與——或拔擢至極高的貴族爵位——任何能在國會中得一定數目之議員席而得選者。」(見國會史第三五册第七六二頁)

(註一七四)當時曾有人預言，在彼得乘機時所造成的許多新貴族的結果將減低上議院底聲價。但他們底實情雖如此憤慨，卻為不願完全與朝廷破裂的願望所阻止。其他地位較能獨立或絕不願將來進階之機會者則頗能在國會中言前人所未言。譬如羅勃(Bolton)；「布」在現在首相權力中所造成的貴族簡直不配做他底僕人。」(見國會史第二七册第一一九八頁)在國會以外，輕視的感覺也同樣地厲害。

(註一七五)在他一七九一年所寫的法國事件底考慮(Thoughts on French Affairs)一文中，他說：「在英國史中，從來沒有一個時期，有這樣少的貴族是出於商界或出於新由亞爾而起的家族的。」(見柏克叢書第一册第五六六頁)的確，以拉克爾爾爵士(Sir Nathaniel Wraxall)說起來，(見巴羅末斯自傳(Pastimes Memoirs)第一册第六六、第六七頁，一八三六年倫敦出版)「第一」的例就是喬治三世被擢升斯密斯銀行家為「格林查勳爵(Lord Carrington)」。拉克爾爾是個無足輕重的名作家，也許不止此一例；但當然是很少的，說都不能記得是誰了。

(註一七六)尼科爾斯，他繼續他的，說：「柏克底政治知識幾乎可以調為一本百科全書；凡和他接近的都能從他底庫中得到教訓。」(見尼科爾斯著回憶[Recollections]第一册第二〇頁)

(註一七七)「他天才橫溢非可描摹。他無上的幻想曾使整個自然供奉於他，曾蒐集遺物之每一景象，學術之每一流淚以成大富。」(見喬爾叢書[Works of Robert Hall]第一九六頁，一八四六年倫敦出版)威爾柏福斯也這樣說到他，「他造國會很遲，因而有時他的觀察知識之大，他引事例證的範圍很廣，好像神仙寵愛的宴會中的人物，當他開口時，寶珠和鑽石都從他口中落下來。」(見威爾柏福斯底生活第一册第一五九頁)

(註一七八)惠爾遜勳爵，據說曾宣布，柏克底名譽將被彼得和福克司為尤能永存，這我以為現在每一適當的批評家都這樣想的。(見惠爾遜勳爵第一册第一六九頁)但給與柏克最高崇的榮譽者乃是該黨領袖為尤偉大的人。一七九〇年，福克司在下議院裏說：「如果他能將書中所習得的科學中所獲得的，以及世界及其事件教訓他的所有的知識列於一項，又將他從他這個正直可敬的服友的教訓

及談話中所得的進步列於另一項，則他將不知應取那一方了。」（見國會史第二八册第三六六頁）

（註一七九）卡姆塔爾爾（見裁判長底生活第二册第四三頁）說「柏克——一個富於哲學思想的政治家——深深浸染着科學的法學原理。」

（註一八〇）巴爾（Barry）在他著名的給與文藝政權學社的一封信（Letter to the Dietarian Society）裏對於柏克底改鑄美術之學為政治學底追求表示惋惜，因為他具有可變美的廣大及浩瀚的智力，能體納全部的藝術，古代的及現代的，本國的以及外國的。（見巴爾遺著（Barry's Works）第二册第五三八頁，一八〇九年出版）一七九八年版（Annual Register）第三二九頁二版裏說，亞爾爾「視柏克為他所知的最好的國畫評判者。」

（註一八一）阿丹·斯密斯告訴柏克，「在他們討論政治經濟問題以後，他是唯一未經交換意見而對於這些問題具有同樣見解者。」（見傅塞脫（Forsyth）著柏克底生活（Life of Burke）第二册第四二九頁）

（註一八二）「政治學不應以人類理知而應以人類本性為依據；理知不過是政治底一部分，且非極重要的部分。」（見柏克著第一册第一一三頁最近國家情形之觀察（Observations on a Late State of the Nation））因此，他常常所見到的哲學及政治學原則上底分別，就是哲學底通則應是堅定不可動搖的，而政治學的通則必須是可變動的，因此在他名著現代不滿底原因底考慮內，他說：（見第一册第一三六頁）「對於公民智慧及政治智慧不能下一界線，它們是不能下確實定義的東西。」

（註一八三）一七八〇年，他明白地告訴下議院「人民是主人，他們不過是廣大的及整個的表明他們意願的羣體了。我們是專門的藝術家；我們是技巧的工人，將他們底願望構成完美的方式而得以配合器具以致用。他們是受害者，他們告訴我們疾病底象徵，但我們知道這底確實根源及如何根據技術底法則而下對症之方。這將怎樣地令人震驚，如果我們因欲躲避我們底責任及欺騙我們底僱主——我們當然的主人——而利用我們底技術為非作惡以摧殘他們底所希冀的東西呢？」（見柏克著第一册第二五四頁）一七七七年，在他致布利斯托爾州長信中有（見其著第一册第二一六頁）「事實上是要追隨，並非壓迫公共的傾向；對於社會的一般意識，以方針形式，專門的潤飾以及特殊的制裁方是立法底真正目的。」在他關於國會年限的一封信（Letter on the Duration of Parliament）（見第二册第四三〇頁）有「的確要令人恐怖，如果國內的任何權力能拒絕這個同一的願望，或大部分及堅決的人。」

虛願望。人民在選擇一種目的時也許會被激混。但我從未見到他們所選擇的目的會這樣地有害致使任何存在之人類力量得以反駁之。現在既再舉一個例，但是個很確實的例，他在一七七二年當演講般類底進口與出口底一個議案時說「這一次我贊成現在這個議案，並非贊成這個政策底本身，卻是因為我想，服從時代的精神是聰慧的。人民願意如此，不容他們底代表說「不」字的。但我卻不能不提出異議反對擁護這個議案的普通政治原理，因為我以為它們是絕端危險。」（見國會史第一七冊第四八〇頁）

（註一八四）柏克底深奧的見解對於下議院所產生的影響很少人能充分明白，可是曾為海伊博士（H. Hay）——他曾聽過他一次偉大的演講的——所描述，他說他底演講好像是一種新政治哲學。（見柏克底通信第一冊第一〇三頁）

（註一八五）柏克對於那普通的議論——即以爲若干特殊風俗之在一個國家既能盛行日久，那麼，那些風俗必是善良的風俗——曾施以不斷的攻擊。關於這一點，在他對於檢察長在職務上的檢閱新聞權的演講中，可找到一個極好的例；在那篇演說裏，他辯論這種推論者有如斯克利布利斯（Scribblers）底父親「這爛鋸蝕及腐敗之物，這些東西乃堆積爲銅壺蓋鑲於一個英雄底盾上。」他又說：「但，先生，據說這種體力存在的時候，就是專制政體最興盛的時候；那時，這兩種東西不能如因果相類似地彼此生存着嗎？豈不是一個人當用柵木製的杖的時候，身體較以後用竹杖時爲康健，而那像督伊德教教徒（Dutch）一樣不知道在柵木中有一種隱藏着的效力，而柵杖和康健乃是因果底關係嗎？」（見國會史第一六冊第一一九〇、第一一九一頁）

（註一八六）還有如庫克真實的說，是貴族式偏見之一例，但可以確定，由喬治三世底一個暗示也許就可以補救這個可恥的忽略。（見庫克著政黨史第三冊第二七七、第二七八頁）

（註一八七）這很容易想像得到，喬治三世必曾爲這些意見而惱恨；「我不贊同那些反對擾亂民衆靜態的君子，凡有弊害的時候，我願有意聞的輿論；中夜底火警雖擾你底清夢，但它卻可使你免於燒死在牀上。呼籲和叫囂雖驚動了道州郡，但卻可保存這省底所有的財產。」（見國會史第一七冊第五四頁，柏克於一七七一年對於毀謗文底壓迫的演講。）

（註一八八）他擁護取消這些法律，就是查塔姆勳爵也在一七六六年發表一宣言反對那些壟斷商業者及居奇而售者，而很得着馬洪爵士底讚美，他說：「查塔姆勳爵以特殊的能力而奮鬥。」（見馬洪英國史第五冊第一六六頁）其後三十餘年，且在柏克死後，那時的威列且肯勳爵（Lord Kenyon）頌揚這些不合理的法律。（見霍蘭（Holland）著民主黨傳記（Mem. of the Whig Party），第

一册第一六七頁)

(註二八九)那項自由在商業制度上，我相信總有一天被採納的。(見柏克著第一册第二二三頁)在他寫給勃爾姆(Burke)的信中(見前書第二册第四〇九頁)有「但我特別注意的就是要在聖島上的所有港口確定了屬於公正之上及利益公眾的自由貿易的原則，但主要的即是亞高之權的獲得。」

(註一九〇)柏克在論在二十餘年以前已能預知羅克而威有名的稅務議案(Taxel Bill)，這個議案直至一七九二年纔通過，雖然在一七五二年附審官已開始不願審判官而依據案情之曲直退回普通判決書。

(註一九一)法爾(Fair)，在統計學社雜誌第二册第一〇三—一二五頁中之關於文官職之統計的那篇有價值的論文稱柏克「是國會中最先驅而最有才具的經濟改革家。」(見第一〇四頁)其實最先驅一辭他實之誠無愧色。他在國會中首倡減少政府經費支出的普通而有系統的計劃，其時他對於這計劃的初次演說實可算他所有的論著中的最佳作。

(註一九二)一七七八年洛金學勳爵在上議院，「不稱道為戰爭，國會底戰爭，或人民底戰爭，卻稱為道王底戰爭，他陛下所喜歡的戰爭。」(見國會史第一九册第八五七頁)尼科爾斯(見回憶錄第一册第三五頁)說：「這次戰爭被視為王個人底戰爭，擁護這次的戰爭者稱為王底朋友，而那些願意國家停止戰爭及從新考慮繼續爭鬥之適當與否的人卻被污辱為不忠者。」

(註一九三)「我現在並非要特別權利，更非企圖要指出其範圍。我並不加入道在學上底區別的激濁；我並且離開這些名稱。」(見柏克著第一册第一七三頁中關於一七七四年徵稅美洲的演講)在一七七五年(見第一册第一九二頁)他說：「但我底考慮是狹窄的，完全限於政策上的問題。」在一八三三頁裏又說：「我們之對付美洲，不應依據權利上的抽象觀念，更不應依據政治上的幾個普通原理，在我們現在的情勢中所採取的政策，我以為不見得較顯然的輕浮為勝。」在他一七六九年所寫的最早的一本政治小冊上，他既反對美洲者底論據「是終結的結論，還是對於權利而言，但對於政策及實施方面則適極相反。」(見第一册第一一二頁)

(註一九四)一七六六年，喬治三世寫信給洛金學勳爵說：(見阿爾塔馬著洛金學第一册第二七、第二七二頁)「道爾普特(Dorset)對於印花稅案的態度之合理恰如我所希望的；但堅持我們宣布我們底權利，但情願取消！換句話說，寧願以抽象的權利名義編造美洲人民，但謹慎地放棄這種權利所能產生的利益。」

(註一九五)喬治三世對於美洲人的深恨是他這樣一種人所驟有的結果，故在爭鬪確實迫近的時候，他雖常常表示仇恨的態度，卻沒有人能排斥他。但真正不名譽的乃是戰爭以後，當他在必須抑制情感的時候，他卻仍表現這種仇恨。一七八六年督德松 (Tolstoy) 和阿丹斯 (Adams) 因公務到英國，按例覲見英王，故出現於英廷。但喬治三世是這樣地不顧其地位原有之尊嚴禮貌，對待這兩個名人以顯著的無禮，雖然他們那時是來到他宮廷內對他示敬的。

(註一九六)所有的革命，在其進行時，總有一直或增加精神病的趨向，而且恐怕還會在以後繼續重相當時期；但在這方面，有如其他方面一樣，由法國革命所釀成的這種犧牲者底數目總是佔第一位。

(註一九七)這種表明其有疾病的這些激烈的爆發性底最早而確實的例可在一七八九年二月時的攝政攝察 辯論裏看出來。那時潘爾 爵士韋 正直地當面指出柏克 底瘋狂。(見國會史 第二七冊第一二四九頁)

(註一九八)他底兒子死於一七九四年八月，他最激烈的著作是在一七九七年六月——他兒子及他自己去世之間的一個時期——寫的。

(註一九九)「這個門徒，是以自願為門徒而驕傲的。」(見布波安 著政治家 (Statesmen) 第一冊第二一八頁) 一七九一年福克司 說：

「柏克」曾將他所知的政治學都教給他。」(見國會史 第二九冊第三七九頁)

(註二〇〇)這是在一七六六年開始的，那時福克司 祇十七歲。

(註二〇一)這一點常被用以與約翰生 底純直相比較；這兩個人是當時的德談者。

(註二〇二)這是一個政治反對者底最忠實的語言；他說，在會談解散以後，「拉法 底脫教法雖盛頓底行為，他曾將華盛頓 底行為做他的模範。」(見卡桑雅克 (Cassagnac) 著法國革命 (Révolution Française) 第三冊第三七〇、第三七二頁)

(註二〇三)「空多塞」雖然不是像革命以前他所自稱的侯爵，和布利索 (Brissot) 是另一種出身，另一種習尚和另一種職業的人；但在每一原理，每一傾向，無論對於最低、最高及最確定之罪惡 方面都是相等的。」(見柏克 著第一冊第五七九頁，法國事件 的考證)

(註二〇四)「展轉 於馬格德堡 (Magdeburg) 地獄中，高登德利 之」(見培爾 著 (Belsham) 著大不列顛史 (Hist. of Great

Brechin) 第九册第一五一頁)

(註二〇五) 這很難令人相信，這種習語會加到保拉法奧脫這樣的人底身上；但我是從國會史第三一册第五一頁及阿多夫 Adolphus 第五册第五九三頁裏看到的。唯一差異點就是在阿多夫中的語辭是「我不會降低我底仁慈」；但在國會史中則是「我不會亂施底仁慈」。但兩個作家都同意於柏克所用的「可怖的惡棍」的名稱。

(註二〇六) 在他死的前一年所出版的關於一個弑君的和平底書信中，他說：「那些使節也許很容易地可以回來作忠貞之臣，有如他們受命出國的時侯一樣，但他們能夠從那墮落的居所回來做忠誠的人民，或真心愛護他們底主人，或真心附從他們國家底憲法，宗教或法律嗎？現在有一種大的危機，就是凡歡笑走入這個窳腐者皆將變成愁鬱及嚴肅的叛黨；而且這將在他們底一生中繼續下去。」(見柏克叢書第二册第二八二頁) 在這本書底第三八一頁，他又說：「難道爲這個利益的原故，我們開展和平和親善底羈繫關係嗎？難道爲這原故，我們年青的男女以旅行來造就他們自己嗎？難道爲這個原故，我們要費了金錢和麻煩去牙學語地學習法國文嗎？……這大家都記得，沒有一個年青的人能夠歐洲底任何部分去而不在途中經過這個惡毒的傳染病的地方的；同時社會上比較不活動者將因這種旅行而墮落，兒童將在這些學校中深受毒害，我們底商業也將永淪不振。沒有一個工廠設在法國而能不變爲一團純粹的法」
激烈黨人。像這種所述的年青人底意欲將爲他們在宗教上、道義上及政治上的所得的污毒所染，而他們將在短期間將遭覆毒害分送於全國。」

(註二〇七) 他在一七九三年出版的少數人底行爲底觀察 Observations on the Conduct of the Minority) 裏說：「在四年中，他曾願意對於法國激烈黨人及其主義開戰。」(見柏克叢書第一册第六一一頁)

(註二〇八) 「因爲，第一，兩風王國因承繼與法國內政毫無關係而致對其反法的舉動很有損害。」(見現在情勢之考慮 頁目) (H. G. G. for Consideration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Affairs) 書於一七九二年十一月，在柏克叢書第一册第五八三頁) 他知道這不僅是毀壞一個政黨的問題這一點，可以在以下可察的情形中看出來，就是在一七九一年一月當他致國函利佛爾 (Troyes) 談到戰爭時還說：「法國固然是衰弱、分裂及紊亂；但上帝知道，當這些東西都被實施以後，這些侵略者是否不會發現他們底事業不是要助助一個政黨，而是征服一個王國。」(見柏克底通信第三册第一八四頁)

(註二〇九)「我們不能——如果我們將會——欺騙我們自己關於這個可怕的爭國底真實的情形。這是一大宗教的戰爭。」(見柏克著第一册第六〇頁同盟國底政策底評述 [Remarks on the Policy of the Allies])

(註二一〇)「一七九四年他告訴下議院『這個戰爭必不能祇限於妨礙法國底目無法紀及野蠻的權力底無效的企圖，卻必須直接指向於其能達到的唯一合理的目的，就是完全毀壞使這種權力發生的遺棄亡命的軍衆。』」(見國會史第三一册第四二七頁)

(註二一一)見柏克著第二册第二九一頁中關於一個試君的和平底書信。在這可怕的句中——恐怕是英國政治家所永未會寫過的可怕的句子——斜書的字不是我寫而是原文中所有的。

(註二一二)在顯明其智力頂點的那些宏偉的演辭中，勃爾克說：「我知道英國底地圖有如貴族們或任何人一樣，我又知道我所採取的方針不是人們讚許之道。」(見國會史第一七册第一二六九頁)

(註二一三)「據說這是由於這個王底特別的願心。」(見普賴厄著柏克底生活 [Life of Burke] 第四八九頁) 普賴厄估計這些歷年每年逾三、七〇〇鎊；但如果我們相信尼科爾斯的話，數目且更大：「柏克被賜以兩種恩俸值四〇、〇〇〇鎊。」(見尼科爾斯著

回憶錄第一册第一三六頁) 柏克是六十五歲，如以當時計算的表來看，三、七〇〇鎊一年不會過四〇、〇〇〇鎊之數。普賴厄之說在一七九四年曾被魏西 (Walesby) 所證實。

(註二一四)「曾有人對於羅波脫、高爾波爾爵士提議徵收美洲底稅來增加收入，但這個大臣，他底眼光超乎暫時的利益之外的，卻宜布須比較他大膽的人才敢出此一策。」(高爾波爾著喬治三世第二册第七〇頁)

(註二一五)我總想我們必須承認雙方底破裂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不是必須相信好萊斯·高爾波爾底敘述他說(見喬治二世傳記第一册第三九七頁)在一七五四年他已預測到美洲底叛變了。高爾波爾雖然是一個社會外觀底精明的觀察者，但不是具有這種見解的人，除非——這也是很不可能的——他曾聽見他父親表示過這種意見。羅波脫、高爾波爾爵士也許曾說到關於殖民地愛好自由之心底增加，但他決不會預測喬治三世政府底專斷的行動將會成這種愛好自由之心的。

(註二一六)當時的信札包含教士劇烈反對美洲人的確鑿證據。一七七七年柏克還寫信給福克司道樣說：「保守黨的確普遍都想，他們應權力及地位包含在美洲事件底成功中。教士們對於這事是非常的熱心，至於這些與他們當然的頭腦——王——合為一體而為教

士所設想的保守黨究竟是什麼，只有你自己更爲明白而已。」（見柏克選集第二冊第三九〇頁）

（註二一七）「這些政府的責成應犧牲美洲以減少地稅。」（見莊克羅夫著英國革命史第二冊第四一四頁）商人在另一方面都反對這些殘暴的行動。

（註二一八）當時都相信——不是不可能的——是王本身表示對美洲徵稅，這顯赫首先即爲格林維爾（Greenhill）所反對。這批評僅是一種謠言，但很和我們對於喬治三世所知道的相符，合編之，他對於這個問題的所有感覺是不必置疑的。他確實曾力勸諾爾斯顯爵麥克萊蘭爭，並且引誘這個大臣出征，以證明成功之必無希望而尚不休。在美洲，這王底意見是人所共知的。一七七五年曾黎松由拜列得傳報羅遜信說：「我們被告訴說，——而且每一樣事件都證明——他是最殘酷的敵人。」（見曾黎松著選集第一冊第一五三頁）又一七八二年佛蘭克林致函李文斯東（Livingston）說：「這個王最深恨我們。」（見佛蘭克林之生活（Life of Franklin）第二頁第一二六頁）

（註二一九）阿爾塔馬所說的，「一個需要大臣們不做國家公僕，而僅於王底私儀的朝廷。」（見阿爾塔馬著洛金罕傳記第一冊第二四八頁）同樣的，柏克也在一七六七年寫：「他陛下從來不十分高興，他需要一個歌劇無能而富依賴性的內閣，而且最好這種情形能繼續下去。」（見柏克底通信第一冊第一三三頁）十年以後，查塔姆對爵公開地譏罵這個王有這種可恥的特性：「這種遺憾曾一度顯過光榮的帝國的政府所委託的不是有才能的人，而是柔順的人。」

（註二二〇）在曼徹斯特，「在那城中的職工十分之九是因美洲風事而被辭退的。」這是一七六六年一個不下於康衛（Conway）的德威作家所說的話。（見馬法著英國史第五冊第一三五頁）

（註二二一）就是阿多夫在他保守黨史裏也說，在一七八二年「大不列顛所持的理由似乎已降至最低的地位；失敗及一般對其措置失當的意見竟使歐陸諸國自私強國羞于擁護。」（見喬治三世本紀第三冊第三九一、三九二頁）

（註二二二）阿克雷爵士（Sir John Sinclair）在他所著稅收史（Hist. of Revenue）第二冊第一一四頁裏說是「三九一七」三、七、六、七。

（註二二三）哲布博士一個有才具的評論家以爲美洲之職必是決定兩國自由約戰爭。（見迪恩內著哲布之生活（Disney, Life of

Jobs) 第九二頁) 所以查塔姆勳爵也在一七七七年寫說:「可憐的英國將踏入自殺之途了。」(見格林維爾論文 (Greenhill Papers) 第四册第五七三頁) 同年, 柏克說到關於以武力統治該殖民地的事,「在美洲建立這樣的力量將完全傾覆我們底經濟。」(雖然是一定的影響)於我們倒算是最小的事情。它將成爲毀滅我們這裏的自由的適合的有力的及確定的發動機。」(見柏克選集 第二册第三九九頁) 因此, 福克司竟情願美洲人得勝。(見約翰羅素著福克司傳記 (Mem. of Fox) 第一册第一四三頁) 因爲這一個原故, 有幾個作家確實強他爲缺少愛國心的。

(註二二四) 一七九二年因此在戰事前, 蘭司陶勳爵 (Lord Lansdowne) —— 一個能超越於普通的腐化的極少數貴族中的一員——說:「現在這個事例令他回憶這個國家以前對付美洲之戰的行動。以前加於美洲人的那些同樣的辱罵及貶謫的語辭現在又用來對於這個國民會議——同樣的結果也許會顯着來。」(見國會史第三〇册第一五五頁)

(註二二五) 剛在革命以前羅勃脫·聖·文孫特 (Robert de Saint-Vincent) 憤憤而適切地說:「英人曾殺了七個君主, 而統了第八個。」(見馬雷特·孟·亞傳記 (Mem. of Mallet du Pan) 第一册第一四六頁; 又據阿利松著歐洲 (第二册第一九九、二九六、三二五頁) 中說, 一七九二年路易「已預知會陷查理士二世底運命。」

(註二二六) 塔爾曼 (大不列顛史第八册第五二五頁) 以爲——恐怕是有理由的——在路易之死以前, 英國政府已傾向於開戰; 但但平——見 湯姆(Comline) 著彼特 第二册第五九九頁——直至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巧佛林 (Chaulain) 後確實被命離英的, 而這是由於「英國朝臣得悉法王被利後的結果。」故普通人總以爲路易之遭利是兩國仇恨之近因, 這似乎是對的。

(註二二七) 布盧安 耐爵說到這次的戰爭似乎很有見解:「現在的最年輕的人將不能避免道影響的政治距離所產生的致命的影響。」(見政治家分論第一册第七九頁) 但喬治三世對於這次戰爭是置於地熱誠懇, 當威爾柏福斯爲戰爭的原因與彼特分裂而在下議院議院對面題設法修正時, 王爲表示其憎惡態度起見, 竟於下一次 威爾柏福斯上朝時不與招呼。(見威爾柏福斯底生活第二册第一〇七二頁)

(註二二八) 一七九三年及以後, 反對及擁護政府之兩方皆就對法之戰是直接反對其主義及意見, 而由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阻礙民主政體之進展。

(註二二九)卡姆培爾爵士說如果這些法律在一七九四年會施諸實行，「則唯一的避免爲奴隸的機會恐怕只有內戰。」(見福要底生活第一册第四四九頁)可再比圖布盧安底政治家第一册第二三七頁，第二册第六三、六四頁關於我們在「一七九三至一八〇一年間之幾乎沒有戰勝希望的爭鬥中……」所得以逃避的壓迫及專制之權力。「這兩個作家對於歐斯金(Osborne)影響於陪審官底成功之努力表示極大的及其應得的尊敬。的確，陪審官底精神是這樣地堅決，以至在一七九四年在審判圖克案件時，他們只商議八分鐘即下釋放之判決。(見斯提文斯著圖克傳記(Stephens, Mem. of Horne Tooke)第二册第一四七頁)人民完全和犧牲者表示同情，當哈爾福德審訊尚未判決之時，萊列長司各脫(Sooty)當離開法庭的時候常常爲民衆所包圍，有一個時候，他底性命也發生危險。

(註二三〇)「至少五天」(見統計學社雜誌第三六册第八章第一節喬治三世還是對於「以考慮或預備任何請求書、申訴、抗議或官署或其他對於王、兩院或國會中任何一院的呈文等爲目的，或以改變教會及國家所已成立的事情爲目的，或以籌備在教會及國家中之不滿情況爲目的，及假託爲名以招集會議者而施的。」唯一的例外就是長官、官吏以及偉大的陪審官底大多數所召集的會議。

(註二三一)在報章上插入這段聲明的人「將妥慎保存這個聲明及根據……而且還要將那真的底稿(如果需要的話)送與那人所住的地方、鎮市或城邑或州郡以及那報所印行的地方底保安官吏，而他底本人也要這樣。」(見統計學社雜誌第三六册第八章第一節喬治三世)

(註二三二)這個法令說：「此應判以重罪而不得享有教士底維護待遇；違律者將判以死刑，亦不得享有教士底維護待遇。」(見喬治三世統計學社雜誌第三六册第八章第六節)

(註二三三)「這張執照底有效時期只有一年而不能延長，或只註明不到一年的時期，而且這張執照，保安官吏有權撤消及宣布無效；……那時這樣的執照將停止，從此以後完全無效。」(見喬治三世統計學社雜誌第三九册第七九章第一八節)

(註二三四)這種事情是這樣地不可深信，那麼，我必須再摘錄原來那個法令底句子：「每一房屋、居室或地方，開設以用爲讀書及披閱報章以及一切雜誌之集合地方而藉以徵收每一閱者底金錢者(如未按例得當局之許可者)須視爲一不法的房屋，而開設那房屋的人將「按不法的房屋法律以科罰。」(見喬治三世統計學社雜誌第三九册第七九章第一五節)人類思想之最制的部分之被沒見沒有能假在立法史中所見到的那般洩洩若觀火的了。

(註二三五) 摩特在第二八四頁裏說：「在這些完全對付出版方面的法律以外，還有其他的法令專為抑制公共意見底自由發展而設。」
一七九三年卡利博士寫：「政府對於全英國底印刷者，出版者等等所施的迫害將令你覺得大可驚異；而這些都是為若干月以前為帶
盤違犯者而施的。」曼徹斯特導報 (Manchester Herald) 底印刷者曾為那報上的記載有七種不同的訴訟而去告發他；六種不同
的起訴曾對他備實六種關於萊因 (Raine) 的報——這都在萊因審判案以前所發生。這個印刷者是富有資財的人，據說擁有二〇〇〇
〇〇鎊的家產；但這種種的訴訟將令他蕩產傾家了，因家這些訴訟都是有意對付他的。」(見卡利底生活 (Currier's Life) 第一加
第一八五、一八六頁)

(註二三六) 一七九三年，卡利博士在提及政府企圖要減出版自由以後，又說：「至於我，我已預測到混亂的事情，而且看到這個國家從來
未曾有過這樣的危險。」(見卡利自傳 (Currier's Mem.) 第一册第一八六頁) 一七九五年福克司 (見約翰羅素著福克司傳)
第三册第一二四、第一二五頁)：「我覺得現在沒有選擇了，除非人民絕對放棄自由，或在現在時候，相當冒險作一有力的嘗試。」我不
願，我對於事情是抱悲觀的；而且我相信，在幾年之中這個政府將變成完全的專制，或這個混亂將造成一種性質幾乎似專制本身一樣
不受歡迎。」同年，雷因博士 (Dr. Raine) 寫：(見巴爾徹著第七册第五三三頁)：「秉權者底有害的行為久已使這國家不安於逸，
及和平者底居住；他們現在的舉動使我們底地位驚動，我們底期望可怖。」(可再閱第五三〇頁) 一七九六年，剛達夫主教寫 (見密宗
底生活第二册第三六、第三七頁)：「羅登憲法的疾病 (是王底影響) 是不可救藥的；重的藥劑也許可以試用，但其有效與否是可疑
的，而且我絕不願意見它們試用。」又在一七九九年 普利斯特利恐懼着革命底發生，但同時以為「決沒有和平和逐漸改革的希望了」。
(見普利斯特利傳第一册第一九八、第一九九頁)

(註二三七) 在這個可紀念的宣言裏，福克司說：「他有極希望，並且意料，這些絕對取消「權利議案」(Bill of Rights) 及將我們底
有限君主政體變為絕對的專制政體而根本破壞我們憲法底議案不會被國會反對大多數人民底宣示的意見而施諸實行。如果大臣
們以其在國會兩院中所佔有的腐化勢力，竟至違反國家大多數的明白的意見，遂決定通過這些議案而這些議案卻又被他們努力地
勒令執行，又如果人民以服從的問題來徵求他底意見，則他將告訴他們，現在不再是道德上的義務或責任問題而是審慎與否的問題。
當然反抗是絕對正當的，唯一的問題就是這種反抗是否審慎考慮過而已。」(見國會史第三二册第三八三頁) 關於這一點，文達著

(William) 評說，而福克司也不否認，「這意思很明白的，就是這個有理而可尊敬的人將動人民，在他們足夠力量的時候，拒絕這種法律的執行，」而對於這一點，射利丹 (Sheridan) 及格萊都立刻回应的。(見第三八五至第三八七頁)

(註二三八) 在年紀最老的人底記憶裏從來沒有顯現過對於內閣底政策有這樣多的堅決的敵對像現在這個時候一樣 (就是一七九五年) 公眾對於這件事是這樣地發生興趣，以至各個人，非但上等的人，即那些從事普通職業的人，都費了相當的時間及事務來參加全國無數的集會，專以反撲內閣這種企圖為目的者。(見國會史第三二册第三八一頁中註釋) 就是這個時候，福克司作就我在前個註釋中所摘錄的宣言。

(註二三九) 那時被譽為「恐怖時代」的確這是對於每個政府底反對者而言的。

(註二四〇) 這個秘密警察的暴制度，在這個制度之下，現在彼特和敦達斯 (Pitt and Dundas) 將所有的監獄充滿了國會改革者，這些人沒有被控而被禁於地牢中，且出獄狀况又已奪取其上訴之希望。(見東克著政黨史第三册第四四七頁)

(註二四一) 一七九三年，羅斯柯 (Roece) 寫：「每個人都被利用來監視他自己的兄弟。」(見羅斯柯底生活 [Life of Roece] 第一册第一二七頁) 可參閱福克司所述 (見國會史第三〇册第二一頁) 所謂政府所做的是，「非但將每個人確立成爲一個查究者，且成爲一個批評者，間諜，及告發者——使父子兄弟互相仇對，在這樣的情形中，而你卻希望維持國家底安靜。」(可再閱第三〇册之一五二九頁，而在科爾利治著的傳記文學 [Biog. Lit.] 第一册第一九二頁裏也有談到關於一七九三年及其後之「秘密監視」一語之廣的一股顯著的文字。

(註二四二) 當時爲福克司所著的偉大的首語學者作 (The Diversions of Parley) 找尋一個印刷者還發生了相當的困難。見斯提夫斯著國史傳記第二册第三四五至三四八頁) 一七九八年，福克司寫信給卡特賴特 (卡特賴特底生活 [Life of Cartwright] 第一册第二四八頁) 「反對韋克非兒底出版者的決心，我看起來就是決心反對出版自由的，確，從這件事發生以後，那裏有一個憲法，而商人請取股法出版大臣們不喜悅的東西呢。」

(註二四三) 凡反對韋克非兒者則被稱爲法國過激黨及「大臣們底敵人」，而卓著的卡利博士亦被宣布爲法國過激黨人及「他底「底底底底」，因爲他抗議英國政府在一八〇〇年允許虐待法國底囚犯。

(註二四四)一七九四年羅克司在演講關於停止實施出庭狀底法令的時候說：「凡自由談論這次戰爭及由中心表示厭惡這次戰爭者，也許要及將要落於大臣們底手中。生活在這種政府之下，及處於叛亂的情狀中，他自認，將這兩種禍害比較起來，那他們要選擇較的禍害還不及補救本身所造成的禍害之爲烈。」(見國會史第三一冊第五〇九頁)一八〇〇年，黨爾勳爵在上議院裏說：「在戰爭底七年中，出庭狀倒有五次被停止實施，而大多數因此狀之停止實施而被監禁的，卻很少受到審判，且祇有一人是證明有罪。」(見第三四卷第一四八六頁)

(註二四五)對於十八世紀後期的事情底一個留心的觀察者曾表白一些話，是在十九世紀初期漸對於現存之腐敗不發生興趣的那些平易而富於理解力的人所深信的：「無節制的課稅——喬治三世朝代時底那些不需要的戰爭底結果——是我們現在窮困的原因，而還無節制的稅卻是充滿着不以保護人民底財產爲懷的那下議院所招致而來。」(見尼科爾斯著回憶第一冊第二一三頁)

(註二四六)喬爾斯利主教(Bishop Horley)現存情勢之極大擁護者，於一七九五年在上議院說他「不知道任何國底民衆，除服從以外，於法律究有什麼關係。」(見庫克政黨史第三冊第四三五頁)

(註二四七)科柏恩勳爵(Lord Cockburn)說(見哲夫利斯底生活[Life of Jelreys]第一冊第六七、六八頁，一八五二年出版)「如果在六十或五十，或竟四十年以前，有一原理爲秉權之全部政黨所敬重爲不可爭辯者，則若要民衆服從該法律，民衆之愚昧是必需的。」其中一論據則是「廣佈教育將倍增其欺騙之犯罪。」(見波爾改著國家之進步第三冊第二〇五頁)

(註二四八)阿利松爵士在他著歷史第四冊第二一三頁中曾提起「不滿底精神在一七九六年是如何地廣佈遍及」最怪者，是人民能隱忍待斃。但這是一個問題，非他這樣的作家所能計及的。

(註二四九)柏哲斯主教(Bishop Burgess)在寫給貝爾勞勳爵(Balbourne)的信中，曾深深埋怨舊教底解放乃是「英國立法之純粹的新教性質之消滅。」(見哈爾福特[Harford]著柏哲斯底生活[Life of Burgess]第五〇六頁)無疑的，這個主教很對的估計到他自己「深底危險，至關於法人及試用法令，則另一個主教說(見湯爾著彼特底生活第二冊第六〇四頁)：「很公平地被視爲英國教廷之最靈固的磐石，」這種的感覺如此強烈，故在一七八七年的一個主教會議裏，祇有兩個會員願意取消這些壓迫的法律。換個願書，他是至死衛護教會的，宣布取消這些法令的議案乃是「革命式的議案。」(見脫維斯著埃爾頓底生活第二冊第二〇三頁)

(註二五〇) 羅伊爵士(Sir O. Lewis)雖然在他著作中會譏諷政治家所有的智識，但他也承認他們是很少能預測他們政策
結果如何的。(見羅伊爵士觀察及解釋政治之方法(The Method of Observation and Reasoning in Politics)第二章
第三六〇至第三六二頁，一八五二年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94601.4A)

中山英 國 文 化 史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上册實價國幣壹元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H. T. Buckle

譯 述 者 胡 肇 椿

編 輯 者 中山文化教育館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六七二上

(本書校對者馮寶武)

復

